

二零二零  
夏季号  
复八十二期

82

# 清华校友通讯

82

清华校友通讯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夏二零二零  
季二号

Tsinghua  
Alumni  
Gazette

CN 10-1674/G4  
ISSN 1006-7663

清华校友总会



传播母校信息  
报道校友业绩  
联络校友感情  
弘扬清华精神



刊址 清华大学同方部  
电话 010-62792246  
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定价 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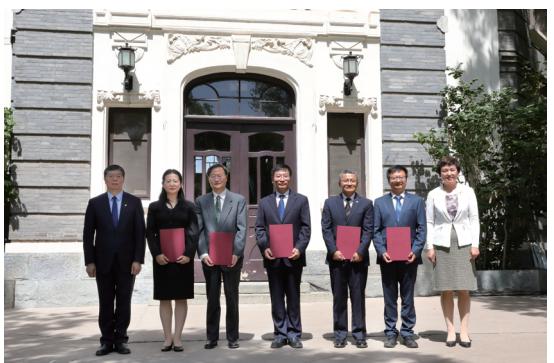


刊址 清华大学同方部  
电话 010-62792246  
邮箱 editor@tsinghua.org.cn  
网址 http://www.tsinghua.org.cn  
定价 20元

## 第五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掠影



▼ 校长邱勇与研究生毕业生代表座谈



◀ 2020届毕业生党员大会暨启航出征仪式举行





## 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启动会暨书院院长聘任仪式举行

5月12日下午，清华大学强基计划启动会暨书院院长聘任仪式在清华学堂前举行。校长邱勇，校党委书记陈旭，副校长、教务长杨斌，副校长彭刚，校务委员会副主任袁驷，校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朱邦芬院士，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亚栋院士，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史静寰教授等出席仪式。学校各院系院长、系主任、党委书记，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以及北京16所中学的校长代表参加仪式。彭刚主持仪式。

在清华的第一栋教学楼——清华学堂前，全体与会人员齐唱国歌，共同见证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陈旭宣读成立书院决定。陈旭表示，为落实教育部《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启动实施好强基计划，推进完善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教育体系，经学校第十四届党委第117次常委会会议讨论通过，决定成立清华大学致理书院、日新书院、未央书院、探微书院和行健书院。五个书院按学校实体机构运行，并聘请李艳梅、王中忱、梁曦东、刘铮、李俊峰五位教授担任首任院长。之后，陈旭作了题为“筑强国建设之基，育可堪大任之才”的讲话。

邱勇、陈旭为五位书院院长颁发了聘书。致理书院负责基础理科学术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由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科技部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国家级教学名师李艳梅担任书院院长。日新书院负责基础文科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由清华大学中文系教

授王中忱担任书院院长。未央书院对应数理基础科学（含工程衔接方向）专业的人才培养，由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梁曦东担任书院院长。探微书院负责化学生物学（含工程衔接方向）专业的人才培养，由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刘铮担任书院院长。行健书院负责理论与应用力学（含工程衔接方向）专业的人才培养，由清华大学航空航天学院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李俊峰担任书院院长。

随后，邱勇、陈旭共同为书院揭牌。邱勇作了题为“以自强精神夯实人才成长之基、筑牢民族复兴之基”的讲话。邱勇表示，强基计划不仅是一项招生计划，也是一项培养计划，更是一项本科教育的改革计划。强基计划的正式启动和五个书院的正式成立是清华大学本科教育发展和本科教育改革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强基计划的定位是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邱勇选取了在招生咨询中同学们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一一作答，详细介绍了清华强基计划的特色和亮点。邱勇强调，全球高等教育版图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中国的大学要站在世界地图前思考办学定位，在高水平的国际竞争与合作中培养高层次人才。一流大学只有在服务国家的伟大进程中才能成就一流的高度。

仪式通过人民日报客户端、中国青年报客户端、腾讯新闻客户端、清华大学微博等多个平台直播。全国千余所中学组织师生收看了直播。  
（吕 婷）

## 2020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举行 6599人获博士、硕士学位

6月22日上午8时，我校2020年研究生毕业典礼举行。大礼堂前、东大操场、北院草坪等17处典会场布置温馨，典礼全程面向全球进行中英文双语直播。“云毕业典礼”的形式让师生跨越距离，相聚线上线下。

副校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教务长杨斌通报了清华大学2020年研究生毕业及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情况。经清华大学2019—2020学年度第4次、14次、21次和28次校务会议批准，2019—2020学年度研究生毕业共5991名，其中博士生2028名，硕士生3963名。研究生结业共53名，其中博士生7名，硕士生46名。上述研究生中包括北京协和医学院—清华大学医学部毕业博士生597名，毕业硕士生547名。经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2019年10月10日，2020年1月9日、4月9日、6月18日共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决定授予6599人博士、硕士学位，其中博士学位2138人、硕士学位4461人。

校党委书记陈旭宣读了《关于表彰2020年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优秀硕士毕业生的决定》。经清华大学校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授予66名博士毕业生“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称号，授予69名硕士毕业生“清华大学优秀硕士毕业生”称号。在热烈的掌声中，清华大学校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邱勇走上前台，寄语毕业生们“用一生去坚守不可放弃的职责”。2001级校友、北京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医疗队第二批队员、医疗组长丁欣作为校友代表发言，分享了自己从医以来的思考与感悟，讲述了医疗队援鄂抗疫的经历。两位毕业生代表，电子系2015级博士生孙跃，医学院2019级硕士生、来自波黑的伊瓦娜先后发言。

由于疫情，不能返校的毕业生和不能到学校参加典礼的毕业生亲友们通过网络直播参加了毕业典礼。

(李晨晖)

## 2020届本科毕业典礼举行 3312名本科生开启新征程

6月23日上午，清华大学2020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举行。大礼堂前、荷塘畔、西大操场上，温馨打造的16处典会场，满载着收获的喜悦，洋溢着烂漫的笑容。线上、线下，园里、园外，世界各地的清华师生同频共振、心意相连。本次特殊的“云毕业典礼”面向全球进行中英文双语直播。

8时，毕业典礼正式开始。身着学位服的毕业生们欢呼着迎接他们期盼已久的

时刻。毕业典礼由副校长彭刚主持，他通报了清华大学2020届本科毕业及学士学位授予情况。经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审议，批准2020届3312名本科生毕业。经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全体会议审议通过，决定授予3425名同学学士学位，授予579名同学第二学士学位。

校党委书记陈旭宣读了《关于表彰2020年清华大学本科毕业班先进集体、

优秀毕业生和优良毕业生的决定》，并向获表彰班集体、学生及全体毕业生致以祝贺。经清华大学校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授予10个班级“清华大学毕业班先进集体”称号，授予64名同学“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授予332名同学“清华大学优良毕业生”称号。

在热烈的掌声中，清华大学校长、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邱勇走上前台，寄语毕业生“谱写新时代的命运交响曲”。邱勇希望同学们把握人生方向，做命运的主人，将小我融入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大我当中，以民族复兴的步伐为节拍，以永

远奋进的青春为旋律，谱写新时代的命运交响曲，共岁月峥嵘、留历史回响。

航天航空学院2002级校友、任职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谷振丰作为校友代表带来视频发言。谷振丰回忆了自己与航天事业结缘的历程，参与“神舟十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等50多次航天发射任务的切身体会。谷振丰将同学们比作一枚枚检测合格、蓄势待发的火箭，即将开启新的逐梦之旅，并用航天发射的方式祝愿大家：“5、4、3、2、1，点火，起飞！”人文学院2016级本科生袁舒作为毕业生代表发言。

（吕婷）

## 我校与帝国理工学院抗击新冠联合研讨会成功举办

6月10日，清华大学与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共同发起抗击新冠疫情联合研讨会。来自两校的校领导和专家学者们相聚“云端”，共同探讨全球疫情蔓延下的高校科研，展望全球经济“新常态”，进一步加强海内外高校疫情防控工作交流，深化教育科研合作，彰显世界一流大学携手抗疫的使命与担当。

会议由帝国理工学院外事副校长玛吉·达尔曼主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陈旭在致辞中表示，全球大学应共同致力于提高教育的适应力，以及应对全球突发卫生事件的能力。帝国理工学院院长爱丽丝·加斯特表示，面对新冠疫情，单靠一个国家或一所大学是无法解决的。

清华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有着20多年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生物医学成像、计算、能源等领域科研合作紧密。此次更是共同启动联合种子基金，支持两校开展

合作研究。

在主旨发言环节中，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院长、世界卫生组织原总干事陈冯富珍发表了题为“携手合作是战胜疫情的唯一选择”的主题发言。她高度肯定了中国政府和人民为抗击新冠疫情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世卫组织新冠疫情应对特使、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全球卫生创新研究所联合主任大卫·纳瓦罗表示，疫情给全世界上了宝贵的一课，提醒人们在科学、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不断改善和进步。

专题发言环节围绕疫苗研发、病毒检测和经济挑战三个议题展开，来自两校的专家学者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研究见解。

清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杨斌和帝国理工学院外事副校长玛吉·达尔曼作了总结发言。两校部分受邀师生、校友，以及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伙伴院校代表共计1000余人在线参加了研讨会。（刘书田等）

## 新冠病毒抗体再突破！我校与深圳三院发布最新合作成果

近日，清华大学医学院张林琦教授、生命学院王新泉教授课题组以及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南方科技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张政课题组取得最新合作研究成果，研究分离得到的高活性中和抗体，为研发抗新冠病毒抗体药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相关成果5月26日在《自然》杂志以“加快评审文章”方式，在线发表了题为《人类新冠病毒自然感染诱导的中和抗体》的研究论文。目前，高活性中和抗体的生产和临床研究工作正在全力推进中，力争尽快实施动物体内的安全性和保护性评

估，开展人体临床试验和推向临床应用，造福于广大新冠肺炎感染者，为遏制疫情发展作出贡献。

本研究得到了国家科技部、国家卫健委、国家自然基金委、北京市科委，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中心（北京）设施清华大学基地及深圳市科技创新委员会应急攻关专项的关键技术支持，并得到北京市结构生物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市生物结构前沿研究中心、蛋白质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腾讯基金会、水滴筹和泰合资本的大力支持。（清华新闻网）

## 清华主办 2020 世界和平论坛特别视频会议

6月16日，2020世界和平论坛特别视频会议在线拉开帷幕。本次特别会议主题为“后疫情时代：中国与世界”。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来自多个国家的前政要、智库负责人和战略家针对当今世界人类所面临的新安全挑战进行讨论，提出建设性应对方案，努力推动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

清华大学校长、世界和平论坛主席邱勇院士出席论坛并致开幕辞。清华大学副校长彭刚主持开幕式。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泰国前副总理素拉杰，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金星焕，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莹，印度前国家安全顾问、印度前外交秘书梅农，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等出席论坛。

本次特别会议讨论了当今世界关切的重大议题，就如何继续应对疫情后续影

响，管控大国分歧，避免新冷战的出现，促进国际秩序的良性变化，以及如何塑造开放和进步的国际体系展开沟通和对话。世界和平论坛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前瞻性的国际安全预判及可能的安全合作建议，多种形式的讨论为与会者提供了表达不同观点和建议的平台。由于疫情关系，本次和平论坛特别会议以线上形式进行，并进行中英文直播。本次特别视频会议设4场分组讨论，涵盖疫情危机后的世界秩序、后疫情时代的人工智能、疫情危机后的亚太安全和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等主题。

世界和平论坛创办于2012年，是由清华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协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承办的中国第一个高级别非官方年度国际安全论坛，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届。因疫情关系，第九届世界和平论坛预计将于2021年举行。（李含等）



# 73年前参加的一次校友聚会

○茅 沔（1950届土木）

《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

寄上一篇短文，叙述的是我在清华几年中有幸见到一次梅校长，并听到他极有感情且富有深刻意义的讲话，其中有些原话极有风趣。70多年过去了，现在能记得这个讲话的人可能已经不多，写下来留个记录。

1947年秋，在北平北池子骑河楼举行了清华复校后一次重要的校友聚会。北平的校友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校友，大家欢聚一堂，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最后请梅校长讲话，梅校长身穿长袍站在台前，刚要发言，有人拿了两个石榴放在讲台上，说这是校友会院子里树上结的，请校长给分一分。梅校长不慌不忙地问坐在前排的几位校友他们各有几个孩子，然后把石榴给了两个校友，并说：“你们俩孩子最多，石榴多籽嘛。”接着，梅校长就进入到讲话的主题“蜀道难”，说的是抗战期间他带队到四川各地考察各院校教学情况。旅途中遇到很多困难，多是吃饭、住宿、交通等问题，但因为各地有清华校友，问题都顺利解决了。

梅校长还回忆说：“同行的有杨宪益和他的洋太太（即戴乃迭， Gladys Yang）。她看到问题都解决了，非常兴奋地对我说：‘Dr. Mei, you are really wonderful.（梅博士，你真的太棒啦。）’”后来，旅途中遇到个最大的困

难，经费用尽而后继的经费还没汇到。虽然银行行长也是清华校友，但仍不敢违规地把没有汇到的钱款先垫出来。最后，还是校长亲自出面写了保证才解决了问题。梅校长说：“这时候那位洋太太一定觉得我更wonderful 啦。”“蜀道难”讲完后，梅校长严肃而自豪地说：“一个人只要当过几年清华大学校长，走到任何地方都不会有困难！”校友们听到校长寓意深邃而又有风趣的讲话都站起来热烈地鼓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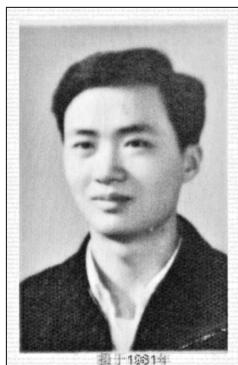
当年，我是清华复校后的二年级新生，本不可能去参加校友会，是音乐室主任张肖虎先生派我和两个同学去表演音乐节目为校友会助兴，才有了与梅校长的一面之缘。节目中最受欢迎的是侯宝林的相声。侯宝林是有备而来，开口就说：“我也留学美国，可是我不学技术我改学艺术了，为什么？人家不拿真东西给你。机器用了好几年啦，拆下来当新的卖给你，安上没多久，老出毛病。要不然咱们北平现在老停电呢。”话音刚落全场大笑，并且目光都看着一个方向。原来，当时北平发电厂的负责人也是清华校友，就在座，显得非常无奈。侯宝林也愣了，这个效果恐怕是他没有预料到的。

2020年3月17日



# 我们很平凡，但不平庸

○朱渥恩（1960届土木）



年轻时的朱渥恩学长

摄于1981年

弹指一挥间，65年过去了。65年前，我考进清华大学土木系房01班。我们一群各地的“学霸”来到清华园，来到我国工程学科的最高学府，在这里度过了数年紧张、愉快的学习时光。

清华环境优美，条件优越，教师优秀，给我们上课的很多是国内顶尖的教授，如：教材料力学的张福范教授，教结构力学的杨式德教授，教钢结构的王国周教授，教土力学与地基基础的陈仲颐教授。他们知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我们像海绵一样汲取知识，同时也学习做人，锻炼身体，给一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华的培养使我受益终生。

我是1955年入校，按5年学制应该在1960年毕业。后来我被选入工读班，延长到1961年夏天才毕业。毕业时正值国家困难时期，基本建设项目大多都下马了。我被分配到福建省，人事局的干部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大学生很不好安排，如果分到某单位，该单位就要多下放一个老职

工。我最后被分配到泉州市一个不到20人的小设计室，它属晋江城建局与省建五公司双重领导，但业务与技术两边都不管。我是第一个分配去的大学生，因为设计力量很弱，管理也不规范，一直都是搞一点小项目，当年任务更是很少。这种情景与在清华时的憧憬落差太大了，我感到非常苦闷。当然，混日子也可以，反正不管在哪里大学生的工资都是同一个级别。然而，我想到了清华对我六年的精心培养，我觉得不能消沉，相信国家的困难是暂时的，基本建设总会要发展的。如果混几年学校所学都忘记了，等国家再需要时却什么都不会，怎么对得起清华，怎么对得起那些教授呢？所以，我要求自己按清华校训的教导，在困难的环境下要自强不息。我不能改变环境，但我可以改变自己。

于是，我将一些简单的小工程项目当作精品来设计，不仅认真画图，还工整地写出计算书。没人要就自己装订好，收集保存。结合工程查阅一些在学校看得少的各种手册、图集及一些苏联规范，还借题发挥查阅相关教科书。不是工作需要，而是结合设计学习。业余时间，我只进行身体锻炼，从来不打牌，也不与人闲聊，总是一个人看相关书籍和资料，分门别类地摘抄了多个笔记本。我深信这些将来一定会用得上。

四年后，经过不懈努力，单位同意我调回老家。我找过湖南大学和长沙的设计院所，都没有成功，最后湖南省化工设计

院接收了我。该院有400多人，设计力量较强，管理也很规范，工程项目多半是一些支农产品，任务比较饱满。我虽然对结构设计的流程步骤比较熟悉，可以独立工作，但毕竟没有搞过较大较复杂的工程，对化工厂建筑物的很多特殊要求也不清楚，因此，我需要尽快学习新知识。我想起在清华读书时，经常早起到图书馆排队占座，然后一整天除了吃饭都是高效率的学习，晚上10点关门才离开。清华园养成的这种学习的劲头我依然保留着，通过紧张的学习，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独立开展工作了。

20世纪70年代初，长沙只有两台晶体管计算机，一台机器要几十平米的房间才放得下。当时要用8位制数字填表，穿孔后光电输入。我最早学会了操作，我们院的结构计算都可由我到省计算中心去计算，这可算是国内较早的计算机辅助设计。

改革开放后，我们更是放开手脚大干快上，完成了大量设计任务，取得了一些成果，还获得了很多奖项。但在我的心中，省级设计院所完成的项目规模和复杂程度都非常有限，但是作为单位的技术骨干，要想离开也不现实。于是，我就参加到全省范围和化工部的一些兼职技术活动中，争取更高的平台，参与一些更复杂的技术工作，拓宽自己的知识视野。在化工部就有十几个部属设计院，长沙也有7家部属设计院，可以说人才济济，我之所以最后还能跻身专家队伍，是清华大学的这张“名片”帮了我的大忙。

我从80年代初就当上了化工部建筑技术委员会的委员，每年都有活动，参加部颁规范和标准图的编写和审查，参加大的工程技术课题和大型工程项目方案的审查



（二〇一〇年四月，  
站立者二排左二）与同学合影  
朱渥恩学长

鉴定。后来不当委员了，还是不定期地被邀请参加活动，2012年还参加了《化工厂房设备基础设计规定》的改编工作。90年代初曾被评为“全国化工先进工作者”。

80年代，我进入湖南省建筑技术专家行列，经常参加各种技术课题和工程项目的讨论、审查和鉴定工作；每年代表建设厅到所属单位进行工作检查，曾是省属单位四个特批的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之一。我当过省高级职称评委，曾是全省最早六个超限（超高层）审查委员之一，获得了国务院政府津贴。

直到75岁，我才主动辞掉所有工作，这时我已经为祖国健康工作了51年。2018年，我工作了一辈子的湖南化工设计院庆祝建院60周年，评选出五个功勋奖（一等奖），我是其中之一，这是对我一生贡献的肯定。

在清华历史上，培养出了一代代行业精英，他们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但与大多数清华毕业生相比，他们只是少数人，更多的是一些小人物，他们扎根基层，默

## □ 值年园地

默无闻，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是所在单位的优秀员工。他们一生没有辉煌的成果，没有显赫的职位，也没有太大的名气，但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清华人，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我就是这些清华人中的一员，一辈子过得很平凡，也很平淡，但是并不平庸，而是非常充实。在清华毕业60周年之际，以此小文感谢母校的培养和教育。

2020年4月

# 铭记校训 砥砺前行

○凌桂生（1970届土建）

毕业离校50年了，回顾往事深感在每个人生关头，都是母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激励我不断前进。

## 一篇文章改变人生轨迹

1970年3月，清华、北大搞毕业分配试点。工宣队听说我在家乡农村有个未婚妻，就照顾我分配到了江苏省高邮县。

3月24日，我到高邮县革委会政工组报到。之后，政工组把20名各校毕业生集中起来，到各个乡镇巡回举办《打倒新

沙皇》展览。在一个月内，我们乘着几条小船走遍了高邮所有人民公社。这项光荣任务完成后，政工组召集我们公布分配方案。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我们这个才子秦少游的家乡教师奇缺，绝大多数毕业生将到农村小学教书，而我将到最大的县属工厂——水泵厂当工人。县委常委、政工组主任顾正云作了政治动员后，组织组长李瑞公布方案。李瑞刚说完五个人的去向，顾主任接到一个电话，兴奋地说：

“这次我县办的展览很好，扬州军分区要我们立即写份总结报上去。你们谁来写呀？”我说：“当然是由学中文的同学写啦。”这无异于引火烧身，几个分配到边远农村的中文人才异口同声地说：“清华高才生什么都能干，让凌桂生写最合适。”没等我反驳，顾主任就拍板了：“小凌快去写吧。你写完了再分配工作。”

我花了一下午写成，第二天上班送给顾主任看，他手一挥：“我不看了，你快拿介绍信到扬州广陵东路军



2010年校庆返校合影。前排左起：周世荃、殷步九、刘增全、王曲吉、班主任黄勇、杨科如、王坤海、高学筠、王林，后排左起：石志澄、周志生、郭玉顺、张玉良、张俊杰、凌桂生、蒋仲达、张勤冠

分区找程政委，他让怎么改你就怎么改，改好再回来。”我立即奔赴扬州，顺利找到政委，他审阅后笑着说：“行，不用改了。回去向顾主任问好。”我立即回程复命。

不几天，顾主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非常高兴地对我说：“小凌你看，我们的总结登上江苏省军区的简报了，你可为高邮长脸了。我们研究决定，你就分配在政工作组工作了。你去找李瑞，参加配备公社领导班子的五人小组工作。”我找到李组长，声明我不是党员，不适合在组织组工作。他说：“你跟我一起工作，可以争取入党嘛。”他带我进入档案室，要我翻阅几大柜子的干部档案，把被考察人的简历和优缺点分别摘抄到一张表格上，提交县委讨论，确定哪些干部可以提职。当天下午，总务处在政府大楼后院给了我一间房，粉刷一新，配好家具用品，帮我从招待所搬来定居。半年后，我成了县委书记查长银的跟班，二人骑自行车下乡都是他撑船过河。

### 一纸调令让我从零开始

好景不长，我妻患病需我回家照顾，我想调回泰兴。请调报告送上去第二天，财政局长带我到政府旁边200多米远的一块菜园，说领导想在这里盖个小院给我住，要我把农村妻子接来，安排在城里当代课教师。我对他们的盛情深表感谢，但我母亲坚决不肯离开家乡。无奈，经组织发函协调，泰兴那边同意调进，但是要分配到农村当小学教师。

我去泰兴组织部报到时，我说：“我思想没改造好，会把学生教坏，您让我再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锻炼一

下吧。”接待我的同志同意了，用手一指说：“好吧，你到对门儿356办公室去工作，干完了再分配。”

356办公室原是深挖“516分子”的，后来成了“双学办公室”。总负责人是县革委会副主任栾玉太，办公室主任是教育局长陈景东。陈主任见我钢笔字写得漂亮，就安排我跟着老秘书抄材料。一个多月后，栾主任要对全县工作队讲话了，老秘书要我先起草，经他修改后再抄整洁送上去。我连夜赶写，他看后让我直接送大主任。我送去后，栾主任很满意。从此，他的报告都由我写了。半年后，办公室撤销，栾主任通知组织组分配我到县团委工作。大家都说团委是出干部的地方，但我还是希望去工业局做些接触实际的工作。栾主任正好是分管工业财贸的，他当即同意。第二天我就从组织组拿到介绍信去了工业局。

在工业局干了几年，我被调到县计划委员会，后来成立了经济委员会，我又来到经委。虽然岗位不断变换，但我除了完成本职工作外，还要随时为县领导写会议报告。局长、主任的报告要写，县委分管工交财贸的副书记、副县长的报告要写，还经常被抓差参加县委书记的重要报告起草。十多年间，我从一个泰兴不愿接收的办事员成长为秘书、科长、主任。1988年8月，调任兴化市副市长。

### 一个错误导致削职为民

20世纪80年代后期，江苏省号召工厂企业出资培养人才。正在我忙于去兴化市赴任的时候，参加高考的大女儿分数出来了，差3分可以上本科。朋友们出主意：全县已有2300多个学生是工厂出资上大学

## □ 值年园地

的，我们让扬子江药业集团出点钱让孩子上本科吧。我同意工厂出一半学费，孩子毕业后到工厂工作七年以上。我妻在朋友陪同下到厂里取了3800元，之后交给无锡轻工业学院让女儿上了本科。

1990年，江苏省纪委开始清查子女上学“自费公报”问题。在调查我女儿上学问题中，文化程度不高的妻子因为找不到学校的收款凭证，就说把那笔钱存银行了。这就导致了我“以女儿上学为名侵占集体资财”的违纪问题。4月6日，《新华日报》头版刊登报导，我被撤销副市长职务。全县用公款送子女上学的人员中只有我一人受到处分！

我想立即移交工作返回家乡。兴化市委、市政府再三挽留，并新设“重大工程办公室”，任命我为主任。正值此时，兴化遭遇了百年未见的洪灾，整个城乡都浸入水中，连李鹏总理来视察的直升飞机都找不到停机的地方。我把个人的事扔到一边，义无反顾地投入抗洪救灾工作，日夜苦干。三个月后，洪水退去，我又奉命带一名助手赴北京筹办“兴化市抗洪救灾汇报会”。我们向中央八位部长和150多位司、局、处长及北京各大媒体记者汇报抗洪救灾情况，会议安排得到一致好评。

离京回到家，我翻箱倒柜，最后在妻子衣服里找到洗成团的女儿上学缴费收据，用水泡开。市委书记连夜带我去南京面见江苏省领导。一个多月后，兴化市人大常委会全票选举我担任副市长，继续分管工交外贸工作。

### 一颗初心奉献父老乡亲

几十年间，我都在工交外贸战线工作。起初，我是为一些老干部起草关于

全县有关工作的报告、文件，因此，我被称为经济的“活字典”、领导的“金拐棍”。我走上领导岗位后，就把母校给我的教育运用到实践中去。

20世纪80年代初，我亲自编写了《全县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改中间，补两头，发展产业链”的目标，交县人代会讨论通过后付诸实施。我重点鼓励企业大力开发市场和实行产品更新。我明确提出“供销是第一车间”的口号，多次召开局长、厂长会议，督促他们把眼光投向市场，按社会需求组织生产。我请来多所高校营销方面的教授、专家，给厂长们上课；让营销工作做得好的企业介绍经验，迅速扭转大部分企业产品积压、资金流转不畅的局面。为了让厂长们开阔视野，我四天内两次飞赴广州，租下广交会对面的体育馆，在广交会开幕前一天，开办了“泰兴名优特产品展销会”。我们半个月接待国内外客商五万余人，签订800多份合同。

在技术和产品更新方面，我一边动员工厂积极与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挂钩，一边把所有银行行长集中起来作思想动员，请求他们对经过论证的可行项目给予大力支持。我还统筹了数百万元让经济委员会直接控制，对新品开发急需用钱的单位立即放款，见效极快。微小破旧的轴承厂开发出餐桌转盘，获得大量订单，我立即支持他们7万元，迅速形成批量生产能力，两年搬进了新建的厂房。全县纺织龙头企业黄桥布厂，年产值多年徘徊在一千万元左右，我几次去国家计委，争取到160台阔幅织机和60台剑杆织机，成功织出了符合外贸要求的牛仔布。接着又搞成了预缩、水洗、石磨等工序，年产值很快突破

亿元。泰兴制药厂口岸车间被国家医药总局凭一封人民来信定为生产假药企业，我请来国家、省、地区和县四级药检机构检测，鉴定的1501批药物全部合格。我带着两个助手赴京，多方奔走，最后由新华社写进“大内参”送到中央书记处获得批示，由国家经委主要领导裁定我们胜诉。国家医药局在全国为该厂恢复名誉，拨给1500万元技术改造费，我又请江苏省政府直接批准了“扬子江制药厂”的名称。这个厂几年的产值都突破百亿，成为全国知名的药业集团。

兴化是农业大市，工交和基础设施薄弱。我向上要钱，向下发动，三年实现所有乡镇通公路，6000门程控电话投入运营，新建了22万伏变电所，根除了城乡经常停电之苦，破天荒引来日本、美国、中国台湾客商兴办合资企业。我大力培植骨干企业，发现一个3000千瓦小火电厂的厂长很有闯劲，就带他上北京、下广东，开发子午线轮胎钢帘线。我八次拜访化工部长顾秀莲，在部里找不到就去她家，终于批下了项目，获得了首期1600万元。经过百折不挠的努力，搞成了数百亿元的集团，不仅为国内十大轮胎厂配套，还大量生产供应米其林轮胎，成为世界知名企业。

## 一个创意干出一番事业

1995年底，我奉调任扬州市政府驻北海办事处主任，负责东南亚事务。我们首先与越南建立了合作关系，在越南广宁省办起了手扶拖拉机组装厂，将拖拉机拆解以零部件免税进去，组装后销往南北农业区。同时，把扬子江药品销往西贡。

1997年，我的血压高至201mmHg，请病假休息几个月后办理了病退手续，从

此来到我最熟悉的城市——深圳。从每天超负荷工作一下变成无所事事的闲人，这种滋味非常难受。在身体逐步好转之后，我决心重新奋起。

我分析形势，觉得祖国的振兴在于科技，因此决定办一个科普教育基地，从娃娃抓起。我把想法与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长陈观光商量，他是清华1969届精仪系校友，非常支持我的方案，当即同意以市教育局名义出具兴办科普基地的文件。

拿到批文，说干就干。但是，我平生的积蓄只有一万块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平生第一次向朋友借钱，租下了深圳农科中心的场地，亲自带领新招的员工开荒平地，清理杂物。

搞科普基地必须有科技含量高、寓教于乐的项目。农科中心有一些科研项目可以就地取材。我又专程去北京参观中国科技馆，绘制了一些易于制作的项目草图。回来用角铁做了自行车走钢丝、滑轮组“自我提升”“角力擂台”“磁性排雷”等项目。第一学期接待了1700多学生，虽然亏了，但看到了希望。谁知，一场“非典”让所有学生不准出校园，我们亏得更多了！但我坚信：开展科普的方向是正确的，只好咬牙挺着。“非典”后的一学期，接待学生17000余人，略有盈利。我又赴京，请中国科技馆的清华校友引见帮助，制作了“无水鱼池”虚拟场景、没有皮的鼓、激光琴等项目，大大提升了科普水平。

2008年，深圳市科协发文正式命名我们的“贝尔科普”为“深圳市科普教育基地”。各媒体都在头版刊登新闻：祝贺深圳首家民营科普企业挂牌。市委书记也来电话，感谢我们为深圳孩子做了件大好事。

## □ 值年园地

2011年，市科协牵线让我们与中国农业科学院碧岭基地合作。这里是全国青少年科普示范基地，是袁隆平50亩超级杂交稻试验基地，有大片的果园、蘑菇园，农业科技氛围浓郁。我们增设了力学、光学、电学、磁学、激光、传感、数码、机器人、无人机，还有300多台微型机床，

使科普工作上了新台阶。2017年，我们开辟第二个基地，增加了曲柄犁、水车、风车、石磨、石臼、微型织布机、针织机、独轮车，还有活字印刷、扎染工艺，搭建赵州桥，拆装孔明锁等，让学生体验农耕文化和传统工艺。2018年，学生接待量突破15万人次，跻身同行前列。

# 大学一年级纪事五则

○ 卫景彬（1970届力数）

今年是我们清华毕业五十周年。在这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我愿献上大学一年级的几则纪事，以感恩母校培育之恩，怀念同学友谊之情。特别难忘我们力004班，大一时被评为全校四好班。

### 我的恩师、清华老学长叶庆刚

老学长叶庆刚是我在中学时的恩师，还是我来清华大学的指路人。听说他两次进大学学习，第一次学习土木工程，所以学校让他教物理课，我们在课上还听他说起钻过污水管道。1946年又入清华文学院外国文学系，1948年毕业。后在国家对外贸易部工作，中英1954年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后，曾担任英国卸任首相艾德礼的访华翻译。

叶老师于1957年下放劳动被分在河北省隆尧县，后在隆尧一中任教。1962年他教我们高一物理课。他教学精益求精，严谨认真，耐心讲解，教学效果很好。物理课是高中阶段学生学习物理概念和数学应用的最好结合点，叶老师还引导我们讨论由物理课所延伸的知识。叶老师是恩

师，更是益友。1963年暑期，我还收到了暑假回北京的叶老师寄来的当年最新出版的《高中物理复习提纲和习题》，使我深受感动，难于言表。1963年暑假后回校，又购买了两本物理书，让我交给另外两个同学。后来叶老师不再担任我们高二物理课，但却一直关心我们的学习。1965年高考，我们班有三个同学都考上了清华大学，成为我们隆尧一中的骄傲。

在我去清华报到前，叶老师给了我一封信，让我到清华后与另外两同学一起去



2015年校庆，卫景彬（中）与同班同学刘建（右）、张冠忠合影

拜访程紫明教授。程教授是叶老师同窗好友，清华大学数学教授。清华校园太大了，我们不知道如何找到程教授的家。路上询问一位学长，他说正要去上课，不过耽误一会儿没关系，就把我们带到了程教授家门口，才跑步去上课。刚进清华校门，使我们感受到清华园的温暖。

程教授看完信，给予我们非常热情的接待，他教导我们要完成好从高中到大学阶段的过渡，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还要求我们多多参加体育活动，等等。这为我们大学生活奠定了一个非常踏实的心理基础，打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1978年，叶老师调往石家庄一高校任教，2007年我和夫人曾到石家庄拜访。那天叶老师和师母谈兴甚浓，叶老师说，如果有客能让你们住下，我们聊个通宵最好了！他又说明年有北京奥运会，我们都去北京，一定好好聊个痛快。还说到2011年一起去参加清华百年校庆。可是万万没想到，2008年1月18日叶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不能不让我们悲痛万分。

### 学长高季洪一席话

1965年8月底，我乘火车到达北京永定门车站，清华新生接待站同学帮着把行李接走。力84班的学长把我领到食堂，帮我买了一碗米饭和一碗炒菜，对我来说真是大餐。北京的新生早到校几天，先熟悉学校环境，然后做向导帮助外地新生。在宿舍楼道里，我问墙壁上可以上下拨动的小东西是什么，张冠忠和刘建同学告诉我是电灯开关。我说我们高一才有了电灯，还是我们师生义务劳动去刨坑栽电线杆，我只见过拉线开关，感叹城里同学比农村同学见识多。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们专业三年级力94班团支书高季洪学长找我谈心。在宿舍13号楼外，我们席地而坐聊了起来。他给我讲了清华大学一些历史，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良传统，学好基础课和专业课关系等，使我受益匪浅。他特别说到清华的学生，个个都是各地尖子，因此每个同学一定要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同学。要谦虚谨慎，一定不能盲目骄傲。对“不能盲目骄傲”这句话，我感到很新鲜，印象特别深刻，成了我以后学习和工作的座右铭。大一期间，我到他们班借画图工具，得到高季洪、黄庆风、乔宗淮等不少学长的帮助。

高季洪1968年毕业分配到黑龙江省工作，后任黑龙江省科学院技术开发公司总经理，是黑龙江省劳动模范。1988年，我们共同翻译出版过一本译著《能源工程基础》，由当时的能源出版社出版。

### 京密运河劳动

我们大一第一学期，即1965年下半年，学校决定大一新生参加四周修建京密运河劳动，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京密运河是北京市引水工程，提供北京市民日常用水。

有一天，时爱民老师召集我和力001班团支书吴炜煜同学开会，我是系学生会中唯一的大一新生。时老师详细讲述了施工部署和要求，他的讲解条理清晰，我非常佩服他在黑板上面画的图。我被指定负责这次任务中我们系与校施工指挥部的联络。

随后我们系领导向全系大一五个班新生进行了动员。同学们热情高涨，个个摩拳擦掌。劳动工地在颐和园的北面，每天早饭后，同学们排队步行到施工工地，按

## □ 值年园地

照设计图纸开渠挖土，把土运到水渠东侧的坝顶上，施工要保证河堤斜度。劳动强度很大，不一会儿大家就累得够呛，但是同学们都说不累，还进行劳动比赛。不少同学手掌起了大血泡，脚底磨破了，也不休息。每天的午饭在工地上吃，下午继续劳动。施工结束后，同学们排着队，唱着歌走回清华园。

食堂师傅为同学们准备的晚饭是肉包子、稀饭，高班同学与食堂师傅都热烈鼓掌，欢迎我们劳动归来。为了同学们的健康，学校特别规定我们参加劳动的同学，在劳动期间吃饭不限定量，所以有的同学一顿饭能吃十几个包子。在粮食限量供应的年代，这确实是难得的美餐享受。施工结束后，我有时要到学校施工总部汇报情况，再步行赶到食堂，有时没有肉包子吃了，但觉得多做工作，吃饱就好。不过心里还是很想那香喷喷的肉包子的。

大一时，学校还组织了三项重要活动。一是参观在图书馆老馆举办的1957年“反右”斗争展览，二是到圆明园大水法废墟前上政治课，三是组织“红专”辩论，端正学习动机走又红又专道路，努力把自己培养成红色工程师。

### 参加体育代表队

入学填表时，我在“体育或文艺爱好”一栏填写爱好自行车运动。小时候我的确喜欢骑自行车，坐在车座子上够不着脚蹬子，右脚就从车的横梁下跨过去骑。

后来接到学校通知，某日到清华西门外举行测试选拔。那天每位测试同学自己挑选一辆自行车，先调整好车座高度、手闸松紧、车把高低和角度。准备就绪，发令，我们骑车向北，到达北京体育学院大

门，再转弯骑回西校门。这一测试看似简单，但是回到西门终点时，很多同学控制不住，一下车就跪倒地上了，更有甚者把车都摔出去了。我骑回来一下车，双脚着地感到脚腕非常酸软，不过扶着车把，勉强没有跪倒。

可能因为我没有倒地，就算测试合格了，被接收进入清华自行车体育代表队，通知我到自行车队参加训练。我和另外一名新生的教练是一位土木建筑系1963年入学的学长，下午体育锻炼时间，每周三次，我们三人在西体南侧集合。我们新生训练用车是普通28型车，可在西操场骑几圈热热身，然后随教练骑往香山一带。有时教练让我们骑到前面，指导我们骑车姿势；有时教练骑在前面，他骑的是赛车用车型，有变速功能。他骑得快，我们要拼命追赶，后来就慢慢适应了这种训练强度。训练回来，在西体内南侧浴室洗个澡，畅快淋漓。印象特别深的是整个澡堂都是歌声嘹亮。

清华自行车队有位张立华学长，是国家运动健将，在全国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他是我们的榜样。

大一第二学期，由于我在北医三院做了耳科手术，体育老师怕我因听力问题骑车有危险，就把我从自行车队调整到男子棒球队。在棒球队训练也同样辛苦，但是充满了乐趣。由于兴趣，自行车运动我一直保持着。

### 感恩清华 根治耳疾

进入清华时我是带着多年的耳疾烦恼的。我患中耳炎多年，右耳膜穿孔听骨已有病症，过去请大夫治过，药物治疗效果不大，手术费用高昂，我家负担不起。但

是大夫说如不手术就有延及大脑甚至生命危险，因此我期盼能有早日根治的机会。

我把耳病的情况汇报给辅导员和班主任李栓龙老师，他要我抓紧时间去校医院看大夫。校医院耳科吕大夫很快就跟北医三院联系，安排我第二学期去三院耳鼻喉科住院手术。

1966年3月5日，我住进北医三院5楼耳鼻喉科病房。那时每个病房有毛主席著作学习小组，小组长是一位北京语言学院的学生，我住进后第二天他出院了，病友推荐我担任下一届组长。护士长赵大姐介绍了两位主刀大夫：科主任老吕大夫手术排得很满，需要等；年青的李大夫不用等。我想，我的病已经判定，李大夫能被分配到北医三院，业务一定错不了，就选定了李大夫。

3月8日手术那天一大早5点多，值夜高护士匆匆叫醒我，说大楼刚才摇晃过，担心出问题，要不要把病人转移一下。后来听广播才知道邢台发生地震，而震中就在我的老家邢台隆尧。国家对灾情十分关心，周总理两次飞到震中，看望受灾群众。后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在隆尧县卧牛山建起红山地震台，中国地震测报事业从这里正式起步。

8点前，护士给我打了第二次麻醉针，后来我就进入麻醉状态。我只记得后来有过两次敲打脑袋，那是大夫用刀子、锤子、錾子剔除骨头。下午4点多我苏醒过来，那时已经被推回病房。大夫用手电照着让我向左右看，看五官面部肌肉是否活动灵活。大夫说没问题，效果很好。手术做了6个小时，可是不小的手术。

每天，大夫和护士都来查房关心病人，我们小组也常在下午学习毛选。我们

班许多同学都到北医三院来看我，童鲁、李建国、陆佩忠、周宗彦等同学是从清华园跑步锻炼到北医三院。有同学说，你住院落下的功课，我们帮你补上。数学课代表钱博同学帮我补习了积分部分，记得在高等数学期中考试中我取得了97分的好成绩。同学的情谊深厚无比，这些都感动着我，鼓励着我。

病友们也很团结，每人出院大家都依依不舍相送。我出院时，已出院的电子工业部和北大的两位病友都专门回来，用自行车驮着我的东西，我们走着聊着，一直到清华宿舍。

后来去三院复查，我专门申请看老主任吕大夫。他确实经验丰富，在耳道内取样，先去培养，研究确定是何种细菌，然后再专门配制最有效的用药。

这次手术不仅根治了我右耳乳突疾病，实际从根本上挽救了我的生命，手术后再没有发生无故犯困现象，一身轻松地投入学习生活。我万分感恩清华母校，感恩我们伟大的祖国，感恩党，感恩毛主席，这是救命之恩！

卫景彬，1970年力学系毕业留校。1988年获得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博士学位。先后就职于清华大学力学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葡萄牙里斯本高技术学院、德国哥廷根大学、美国戴维斯加州大学。1984年在力学所领导支持下筹备成立力学所研究生会并任第一任会长；1990年在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支持下，筹备成立葡萄牙华人学者学生联谊会并任筹委会主任；2003年在美国筹备成立含戴维斯加州大学在内的加州大首府地区清华校友会并任第一任会长。

# 奉献核事业——我的美好人生

○王慧芳（1976级工物）

201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坐在电视机旁观看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阅兵式。当我看到由7个型号导弹方队组成的战略打击模块驶过天安门时，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这是我们中物院人的自豪！

我于1977年3月跨入清华大学的校门，在工程物理系核物理专业学习，经过近四年的学习生涯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分配到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以下简称中物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工作。作为一名清华学子，我从1980年11月起加入到了我国核武器研制这个光荣神圣的队伍中，参加了自1981年中国完全转入地下核试验后的大部分核试验近区物理测试的工作，特别是在中子弹核试验、核武器小型化的关键技术突破中，为我国在核武器设计的核心技术上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洒下我的汗水，付出了我的心血，贡献了我的聪明才智。

40年前，当我刚从北京来到四川绵阳的一个深山沟时，巨大的环境落差也使我彷徨过。但当所里干部部门负责人把我交到203室华欣生主任手里时，华主任向我介绍了该室的发展史。这是一个100多人的研究室，主要从事核武器试验近区物理测试研究工作，有着辉煌的业绩，有许多是从参加第一次核试验开始，到现在仍然奋战在科研第一线的老同志。我院的老院长胡仁宇院士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唐孝威院士、王乃彦院士曾是该研究室主



在清华读书时，王慧芳学长在原清华东门留影

任。华主任希望我到中子测试组去工作，这将使我在母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完全能用得上。我愉快地接受了安排，到了中子组报到，又得到了组长梁淑贤、副组长孙玉章以及潘文明等几位老科技专家的热情欢迎。进一步熟悉工作后，我热爱上了核武器试验近区物理中子测试研究工作，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虽然过去40年了，但当年203室华欣生主任向我介绍院所发展史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他介绍的胡仁宇院士、唐孝威院士、王乃彦院士，都是业界知名的专家大师，一项项我闻所未闻的攻坚成果，一张张平凡无奇的照片和那些照片背后辉煌耀眼的成就，使我心中油然升起了一种崇高的敬意，那是金钱、名誉、地位都无法衡量的。我终于明白，这儿就是我该来的地方！

在中子测试组，因为专业对口，我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赢得了多位老专家的认可，也很快热爱上了自己的本职工作。那时，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开展核测试有关的技术研究及核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只有在进行地下竖井核试验或平洞核试验的时候，才会远赴新疆戈壁滩的核试验场，也只是从这里的人迹罕至去到了另一个人迹罕至。

蓝天作帐地为床，黄沙拌饭可口香。这就是我们工作、生活的真实写照。正是乐观的精神，成为支撑我一路坚持的重要支柱。

核试验的一个专业术语叫“零”，意思是倒数的最后一秒，也就是起爆的一瞬间。新疆戈壁滩上最难忘的就是每一次“零”前的那几天。用“夜不安寝，食不知味”来形容也毫不为过。核试验装置和所有的测试装置都已埋入了地下，但各种不利因素都是难以预料的，心怀期许焦急等待，无疑是这世上最煎熬的事情。

在“零”前的几天里，最难忘的则是“零”前的几个小时。每当此时，我们都



曾忠永学长  
二〇二〇年六月，王慧芳与丈夫  
（一九七五级工物）

要整装待发，在起爆后第一时间冲上测试车“抢回”核试验的测试成果。防护服的不便、氧气瓶的重量，还有那迫不及待的心情，直到40年后的今天还是记忆犹新。

恐惧，当然还有恐惧，一旦出现“冒顶”或大的放射性泄漏，我们就会受到大剂量的辐射。可面对这生与死的考验，我们参试人员没有其他选择，既然没有选择那就不要去选，更不要去想。随着一声撼天动地的巨响，我们每一个人就像是赛场上的选手，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快一点，再快一点，以最快的速度拿到试验测试成果。当那一张张测试成果胶片、一组组测试数据证明试验圆满成功的时候，那种喜悦只有亲历者才能真正感受到。

1996年7月29日，这一天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它是两个不同战场的决战，使我终生难忘。这一天，远在日内瓦进行的核裁军谈判战场，谈判代表唇枪舌剑；另一边，在新疆核试验基地，我们进行了我国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这次核试验，是我国在禁止核试验前进行的最后一次核试验（第45次核试验）。上级命令：务必要把为“禁核”后转入实验室研制核武器所需要的数据全部拿到手。

因此，此次试验一旦出现失误，将会给国家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作为我国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近区物理测试十多个项目的总负责人，我肩上的责任和精神压力可想而知。那时，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必须做到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提出的“十六字”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我们要测试的信号特点是快、不可再现，因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们变压力为动力，仔仔细细地查漏补缺，认认真真地去检查每一个测试

## □ 值年园地



二〇〇六年十月，王慧芳学长（右）  
于爱华同学在母校团聚  
回校参加活动，与曲长芝老师（中）、

系统……直到“零”前数小时，总指挥部下达撤离命令，我才与战友们离开。

当发令员发出5、4、3、2、1、起爆（“零时”）时，顷刻间，震天动地的巨响再一次响起，我预感到核试验成功了，但还是必须靠测试数据结果才能作出成功与否的判断。我们迅速冲进了离爆心X米处，从测试车上抢出了珍贵的成果。当我们打开那一张张贵如生命的测试胶片，并读出了所记录的测试数据时，我们立即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指挥部报告。通过我们获得的测试结果，充分证明了这次核试验获得了圆满成功！

同日，我国政府发表声明：1996年7月29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郑重宣布：从1996年7月30日起中国开始暂停核试验。这一天也是我们的老院长邓稼先逝世10周年的日子，我们以此来向老院长表达了悼念之情，因为这也是他所盼望的结果。

在我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中，有很多记忆存在脑海不曾退去，无法忘记。

1988年参加一次核试验之前，我父亲病危，医生说可能最多只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但是，我要做中子弹辐射武器测试“出场”前的准备工作，一人一岗，无人顶替，没有时间陪他。告别父亲时，他问我：“女儿，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就没有假期啊？”我无法回答，因为有保密纪律。所以，父亲到了“天堂”也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是做什么工作的。后来，当我可以自豪地说出自己工作的时候，父亲却再也听不见了……这件事过去了很多年，但每次回想起来，我就会泪流满面，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这就是忠孝不能两全吧！

在经历过一次次核试验，一次次“零前”煎熬，一次次“零时”震感，一次次“零后”冲锋陷阵后，我得到了历练，得到了成长。我毕业后就投身到了我国核武器科技事业中，几十年来，我一直用当年入学报到时悬挂在母校大操场的“清华——工程师的摇篮”来激励和鞭策自己，从一名初级科技人员，成长为一名具有研究员职称的高级科技人员。在行政职务上，从中子测试研究组的组员成为组长、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副主任，后又被提拔到中物院环保工程研究中心任党委书记、副主任。我曾先后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此项成果填补了该技术在国内的空白；部委级和军队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共7项还获得了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光阴似箭，转眼间我已毕业40年了。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我无怨无悔。我没有辜负母校的厚望和老师的嘱托，是清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我衷心感谢母校的培养，衷心祝福母校的明天更美好！

2020年2月于四川绵阳

# 我们是建管第一班

○杨怀宇（1985 级土木）

这是毕业 30 年的作业，初宏伟布置的。我一直在拖，因为实在不知道写什么好。躲“新冠”整天闷在家里，大脑缺氧不善思考更不善回忆，几次打开电脑写个开头，最后又删了。

前两天，王守清在师兄弟群里发了一份讣告：佟一哲老师 5 月 11 日仙去了，很伤感。佟老师和已经过世的卢谦老师、邝守仁老师，是施工教研组复建以后的第一代教师，也是推动建管专业成立的中坚。斯人已去，生者如斯，建管专业如今已是清华的一个系，而我们毕业也已经 30 年了。

我把题目叫“建管第一班”，有两层含义。一来我们建管 5 是清华第一届建管专业学生，在校时书生意气，曾以黄埔一期自比，颇有开风气之先的豪气；二来建管作为一个“和尚班”，是一个荷尔蒙过剩的群体，二十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曾经共同挥洒过自己的青春。如今人过半百回头看去，才知道那份单纯和激情的可贵。写下这些文字，就权当是对当年兄弟们的一份念想吧。

进校的时候土木系没有建管专业，大家都是结构工程，三个班：结 51、结 52、结 53。到了 1986 年上半年，传出了要成立建管专业的消息。系里为此办了好几次咨询会，印象比较深的是邝守仁老师给大家讲中国在非洲的工程项目，每次和业主开会，中方项目部都要派一辆面包车，里面有项目经理、翻译、项目总工、法律顾问、

造价师，外加司机，结果对方就来了一个人。然后邝老师手一挥：“我们建管专业就是要培养既懂工程，又懂管理，外语又好的专业人才，帮助我们中国建设走向世界。”下面听得热血沸腾的年轻人里，就有我。

大二开学的时候，建管专业正式成立。三个结构班每班有 10 个同学报名转到了建管，总共 30 人。刚开始的时候建管没有自己的班号，结 51、结 53 地乱叫。到了 9 月底，班号终于批准，叫建管 51，但是大家嫌麻烦，一直都叫管 5。

管 5 是一个减员严重的班。分班没有多久，结 53 过来的王东就被他爸说服，回去继续学结构了。多年以后，王东成了王牧师，不知道是不是结构的枯燥让他看破了红尘。陈昊和方贤兰离开管 5 则是因



1990 年毕业时，“建管第一班”同学与老师合影。前排老师有（左起）：邝守仁、滕智明、江见鲸、朱金铨、卢有杰（班主任）、缪立新（辅导员），二排右 1 是匡文起老师。最后排左 2 为作者杨怀宇

## □ 值年园地

为病休。昊子转到管 6 大家基本没有什么感觉，在一个青瓜蛋子遍地的年代，昊子居然经常带着他的天津女朋友到 2 号楼招摇，很招人恨，现在大家眼不见，心里似乎反而宽慰了许多。

方贤兰的休学对管 5 的冲击很大，因为她从根本上改变了管 5 的生态环境，让管 5 从此成了“和尚班”。贤兰休学以后，管 5 和北师大图书馆学系的友谊班级很快告吹。毕竟有贤兰在，还可以讨论讨论男生女生的活动安排，贤兰一休学，所有的联欢设想基本都在对方男同学狐疑的眼光中无疾而终。要知道，没有女生的班级是肆无忌惮的，像一些两眼放光的狼。管 5 的同学里，张为民、李海平、方贤兰三位同学已经先后离开了我们。每每想起，让人泪目，太早了。清华说“为祖国健康工作 50 年”，我只愿大家都能信守诺言。

建管的全称到底是“建筑工程管理”还是“建筑管理工程”，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争论。大家毕业时拿到的工学士证书似乎说明：不管叫什么专业，我们还没有被分到经管学院去。不过，专业定位的模糊对我们影响还是很大的。表现就是管 5 同学毕业后的行当相当多姿多彩，有为政一方的，有商海创业的，有做海外工程的，有搞房产地产的，有从事建筑施工的，有投身金融投资的，还有不少在体育健身、核工业、航天各个行业，有监理，有 IT，还有太平绅士。也许正像是一个草包娃娃，水浇下去，不知道从哪里就可能长出一棵苗。

记得当年还为另一个“高大上”的专业名称努力过。因为不符合国家专业目录要求，“国际工程管理”最终没有叫成。不过，建管对外语的重视却是实实在在的。大二的时候我们开设了英语口语课，教师

是北大刚毕业的一位年轻女老师，姓陈。这门课是管 5 出勤率最高的一门课。我的同屋唯峰，经常翘课和女朋友去圆明园钻小树林，但是陈老师的课他却一次不缺。我猜是因为陈老师让他出演过迈克尔·杰克逊的缘故吧。

因为重视英语，我们在系里的英语文艺汇演得了大奖。方贤兰出演在楼道里用粮票换鸡蛋和方便面的小姑娘，带着延边口音的英语让人捧腹。

说起为什么转建管，每个人应该都不太一样。有觉得新专业新气象有前途的，有觉得管理学起来更轻松的，有不喜欢结构工程趴图板的，也有懵懵懂懂的。曾经有人觉得管 5 的人学习不好，类似高中时候数理化差只好去学文科班。这种偏见惹恼了以崔维兵、王文凯、陈森林、初宏伟、蔡于胜、蔡勇等人为首的管 5 学霸群体。典型案例就是方鄂华老师的“高层建筑结构设计”，这本是管 5 的选修课，但是学霸们不惧“杀手锏”的威名，仍然有多人选修，并且成绩出色。毕业设计也有多人去了设计院，以实际行动证明：对于结构，建管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建管和结构在课业上的差别主要是从大三以后开始的。管 5 虽然也学“三大力学”，但深入程度已经不如结构专业。探索性的一些新课曾经让我们云山雾罩，典型者如卢有杰老师的“预测学基础”，很多同学迷失在马尔可夫链、随机稳定和非线性回归的海洋里，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记。以至于多年以后郝九江说起他的清华求学岁月，还对这门课耿耿于怀，但却回忆得前言不搭后语，可见伤害之深。

由于是新专业，管 5 的课程感觉有点摸着石头过河。比如“运筹学”“国际工

程招投标”“国际商务”“FIDIC 合同”，等等。从课程的设置看，以卢谦老师为首的专业创建人是想把管 5 推向国际工程一线的，但是这似乎超出了一个施工教研组的能力，所以学校请了很多有本事的牛人来给我们上课。比如中冶的老总汤礼智，当年每逢汤总讲课，张为民必定第一排就座。毕业后如愿进入中冶，是实现管 5 “国际工程梦想”的第一位同学。

现在清华的建设管理系，可持续发展、城镇化研究、安全与健康、数字化技术四大特色学科方向和当年的建管几乎全不搭界。房地产成为建管甚至结构专业同学毕业后的一大就业方向，也是当年读书时从没有想到过的。

清华给我最大的感悟，是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聪明的脑袋太多。那些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外加智慧的大脑，造就了管 5 的多姿多彩。我们有诗人王福远，“甦原文学社”的创始人之一，笔名“宇文耐尔”，因为“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所以和几位诗歌同好把它分担了。英特好像是结 51 的刘宗旭，纳雄是 6 字班的张勇。老二王福远现在监理之余，钻研上了甲骨文。三瓶啤酒下肚，还能抱起吉他弹一曲《恰似你的温柔》，真正过起了“员外”的生活。管 5 有原创校园歌手组合张为民和董江涛，老三张为民是清华文艺社团的骨干，天生一副好嗓子，会乐器懂作曲，身姿挺拔台风飘逸。他们两人合作写过几首歌，入选过校园歌曲专辑，刻成 CD 放到音像店卖的那种。有首歌的名字叫《男孩的宣言》，曾经在校园歌手大奖赛上拿过名次。那可是一个出过胡杨、宋柯、高晓松的年代。如今唱歌的男孩老三已经和我们阴阳两界，真的让人心很痛。

除了张为民、江涛组合，管 5 还有很多人玩乐器，当然主要是吉他。这种价格亲民、只需要知道 C-Am-Dm-G 四和弦就可以弹唱一曲的乐器，十分适合用作雕虫小技在有女孩子的时候展示。鼎盛时期管 5 有十几位同学能弹吉他。李海平会键盘，曾经和老三动过组建乐队的念头。无奈大家玩吉他的动机大多是吸引异性眼球，并不是真的想混娱乐圈，老大的计划最后不了了之。毕业汇演时，雎锋主唱，身后五把吉他伴唱，算是管 5 音乐史的巅峰了。

大三的时候管 5 搞过一本油印小刊物，叫《三年集》。至于为什么写，我把总编刘伟明的原话抄录下来：

读书读到三年级，总有闲着的时候。

朋友们挤在一起，酒瓶子早已空了，香烟也开始烫手。

每个人都有那么一段故事，我们依稀寻到一些沉重，一丝忧郁，一点无可奈何，并开始妄图解释感情的涵义。

后来就说把这种感觉写出来，一定要好好写。

东西写出来，又看了一遍，不免苦笑了一下。终究是学理工的，语言上的幼稚似乎只有自己可以原谅。

又都是写给自己看的，顾不到读者，然而可以慰藉的，毕竟文字里有自己的一颗心。

为了对得起作者拳拳的心，终于下决心把它们全印出来，成了现在这集子。

不知道十年、二十年后，偶然再翻起它们时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再一次苦笑。

想起了陶渊明的两句诗：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共勉吧！

现在 30 年了。我翻看了一下，实在

## □ 值年园地

不相信这是我们自己写的东西。但是，谁没有年轻过呢？《三年集》是手刻蜡纸油印版的刊物，印数有限，但是流传却很广。曾经有两个隔壁学校的文学女青年要求见《心祭》的作者，和刘伟明关在屋子里探讨了很长时间。刘总曾经想上北电导演系，可惜学习太好进了清华。他在毕业汇演的时候实现了一下他的导演梦。这是一个穿越剧，如果你问我剧情，我觉得《芳华》抄袭了刘总的创意。

体育方面，足球是管5第一运动。快马于志勇，高中锋陈志伟，中场雎峰、董江涛，后卫李海平都是系队选手。还有大

门孙乐民、铁卫李海清、后起之秀王成林一众高手。可惜过于自信，以管5单独组队参加系联赛，折戟而归，但爱好体育的传统依然流传。如今王锋登峰造极，把自己都搞到健身行业去了。

写到这里回去读了一遍，才发现拉拉杂杂码这么多字，很多东西还没写到。30年后努力回忆当年的点点滴滴，似乎也只能做到这样的浮光掠影了。但不管怎样，这是写给我心里一直惦记着的，我们“建管第一班”人。希望下一个10年、20年，你们还都好好的，大家聚在一起，还能同唱那首《咱们建管有力量》。

# 七律·清华大学校园诗 ——步光华、东光兄韵奉和

○朱顺波（1970届工物）

## 大礼堂

清华往事说荒唐，多少风波大礼堂。  
昔日红颜真尽力，而今白鬓假逞强。  
悲歌国际皆狂语，颂曲神州乃梦长。  
愧负书生一腔血，虔心向月问高王。

## 附光华兄原玉：

谁砌红砖如堡垒？风吹雨打立斯堂。  
七零后辈追前辈，五四诸强慑列强。  
工理称雄月奇异，人文荟萃日新长。  
讲台三尺烽烟起，舌战也曾挫霸王。

## 附东光兄原玉：

清华楼宇谁为首，圆顶蓝穹大礼堂。  
今古同音歌伟岸，声情并茂赞刚强。  
房前绿野地天阔，屋后万泉气运长。  
玉柱铜门风骨在，直言无讳地标王。

## 体育馆

水木清华赞马翁，钟情体育合毛公。  
南翔运动三周测，约翰徒操一日雄。  
窈窕芬芳争美丑，严寒酷暑竞西东。  
勤劳半纪为民志，一代名园尚悍风。

## 附光华兄原玉：

南蒋求贤倚马翁，东何受宠伴毛公。  
醉心体育多才艺，寄意诗词一代雄。  
锻炼读书无上下，练球跑步各西东。  
已临耄耋身犹健，全仗当年运动风。

## 附东光兄原玉：

赛会总裁约翰翁，泳池击水润之公。  
秋冬春夏人人练，跑跳掷投样样雄。  
锤炼技能争冠亚，精修魄力定西东。  
清华体育惊天下，今日仍传好校风。

注：光华兄为高光华（1970届工化），东光兄为王东光（1970届精仪）

# 清华精神指引我前行

○田 勇（1995 级能动）



田勇在鞍钢炼钢炉前

自接到《清华大学2000届毕业二十周年纪念专刊征文通知》的那一刻起，思绪不禁飞回到25年前去清华报到的那一天。记忆犹如时光穿梭机，入学、上课、毕业、工作、相聚、离别，一幕一幕不断在眼前浮现。回首二十多年，从年少追梦到载梦而行，从历经坎坷到克难攻坚，从投身家乡到坚守执著，每时每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都在指引着我前行，激励着我成长，我为我是一名清华学子感到骄傲，我更为我的母校感到自豪。

## 清华大学，曾经梦中的“象牙塔”

清华大学，这是莘莘学子心目中的圣地。我从初中时便立下志愿，并以无数个挑灯夜战的努力向着梦中的“象牙塔”发起冲锋。在收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时，真可以说是心潮澎湃、百感交集，在如此幸运梦想成真的同时，清华也为我开启了通往未来的大门。

从本科、硕士到博士，我就像一棵小树扎根知识的土壤，如饥似渴地吸收营养，王补宣、柳百成、彭晓峰、姜培学等

著名院士、教授为我们答疑解惑。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讨论解题方法、分享知识要点；图书馆查找科研资料，埋头撰写学习论文等场景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在清华的十年时间，是极其富有挑战的十年，是不断突破自我的十年，是我个人由量变到质变的十年。这十年，老师和同学在学术知识上的言传身教、人格思想上的谆谆教诲、日常生活上的关心爱护，都是我受用终生的财富。这十年，不仅有专业能力的提高，更有人格上的塑造，让我更加明德明理，领悟大学之道——“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学风，“爱国、成才、奉献”的成才之路。

## 清华校训，永不磨灭的印记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清华的校训激励无数的英才志士奋勇前进，也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成为了无法磨灭的印记。2005年博士毕业的我义无反顾地返回家乡，投身共和国钢铁长子——鞍钢的建设。十几年的工作经历，我看到了家乡的巨变，参与了应对钢铁“寒冬”打胜扭亏增效攻坚战，见证了鞍钢发展与振兴。个人也经历由车间工程师、主任，到分厂厂长、炼钢部部长，再到世界单体规模最大的炼钢厂厂长的身份变化。在锻炼与洗礼的过程中，我同样有过低迷与失落，也曾遇到过艰难和险阻，每每这样的时刻，“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就会回响耳畔，指引着我前行。

## □ 值年园地

在炼钢总厂四分厂3#连铸机改造期间，作为现场调试工艺负责人，我与施工人员吃住在一线，和一线技术骨干共同翻译了近20万字的技术资料，实际解决设计错误和工艺瓶颈问题30余项。2018年，我们紧跟市场形势变化，牢牢抓住“擦亮鞍钢品牌”工作主线，全年产钢1829.1万吨，实现了几代炼钢人超越1800万吨产能的夙愿。2019年，在市场与竞争、改革与发展的各种困难和考验面前，我们制定实施“两改两保两降低”工作举措，产量规模、品种质量再创历史新高。我们加快装备升级改造，厚板坯铸机大修改造，采用重压下、干式拉钢等前沿技术，达到国际一流装备水平。在未来的生活与工作的道路上，我将永远保持“追求真理、行胜于言”的清华校风，为全面建设世界一流精品钢生产基地再立新功，再做贡献，用行动践行清华人的初心与使命。

### 清华学子，团结真挚的友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一晃离开清华校园十多载，清华学子之间团结、友爱、互助的真挚友情更是我内心最感温暖、最为珍惜的部分。不管是否同班同系，无论是否相识，不在乎年长年青，只要提及清华，我们的心就在一起，我们的友情就倍加亲密。工作遇到难题时的一封电邮资料，出差外地时的一次小聚谈心，人生低谷时的一言开导解惑，攀登技术高峰时的一场探讨学习，新冠疫情时的一句嘘寒问暖，清华就像一张名片拉近了每个清华人的距离，清华就像一块磁石吸引凝聚着每个清华学子。偶尔翻看当年的毕业照片，一张张青涩稚嫩的面孔都会引发无边的回忆；每当轻抚清华的校徽，都会感到前进

的背后有着强大的支撑；每每看到、听闻清华人在各行业取得的成绩，都会引以为豪。在这里，我发自内心地说一句：“我最亲爱的清华校友们，人生有你们的陪伴与支持，真好！祝福你们幸福安康快乐顺意！”

最后，也祝愿清华——我们为之骄傲与自豪的母校，在新的世纪里继往开来、桃李芬芳，再造新优势，再创新辉煌！

### 水龙吟·登零零阁抒怀

○宋彩功（1970届精仪）

华园四月芳菲，零零阁里诗情溢。  
临漪蕴秀，莲桥献彩，晗亭廊第。北岸丹园，天香争艳，芸芸如子。望近春遗址，荒芜百载，今重现，蒸蒸意。

校史百年熠熠。众莘莘，前仆后继。  
东西奉璧，洋为中用，大师拱立。多少萌龄，纵横风雨，拼搏崛起。有今朝邂逅，寰球大疫，看峰嵘记。

### 沁园春·毕业三十年

○齐 联（1985级电机）

清华生辰，我等秩年，同窗聚首。看紫荆花开，校园尽染；思成名楼，披红挂绶。餐挤食堂，汗洒球场，兄弟相逢携童叟。笑彼时，忘终考几何，只知饭否。

如今故地重游，忆往昔青葱岁月瘦。庆吾辈幸运，国盛当头；英姿勃发，大展拳手。武当勤王，文则封后，半百辛劳为神州。望明日，盼身心行健，载物德厚！



# 清华求学随记

○ 王勤謨（1951届机械）

以1949年10月1日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标志，是我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折的时期。此时，我在清华大学上学，这也是我个人历史发生转折的时期，即由一个不闻时事的学生转变为中共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 一、考入清华和参加学生运动

我于1929年2月出生于今宁波市慈城镇以王姓家族为主的黄庄村，后来在这个家族办的崇本学校上小学。

1940年日本占领宁波慈溪后，我去上海，和一个年近70岁的亲戚住在一起，并在当时的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学。这个亲戚在河南路开了一个销售科学仪器的商店。我去时，他已把商店的经营交给他的堂弟，他则住在商店的四楼上，看书、写书、藏书。两间房子，靠墙地方，自地面到屋顶，都是一个个大书箱，箱上都标名为“古驩室藏书”。藏的都是线装书，仅《二十四史》就有不同版本的三部。拜访他的也都是一些老夫子，年轻一些的也是老夫子的后代，如章太炎之子。我在另一间房里学习、看书。除了上学、春节时到亲戚家拜年外，他不许我随便外出。我们都不过问时事。他在我高三时去世。

194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四所国立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我选择了清华大学。到清华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当时清华有一个惯例：一年级新生

住善斋，一室四人，不分系别。1947年寒假，我不回家。一个要回家的航空系的同学请我替他参加同学自行举办的“中学生寒假补习班”。补习班借用北京大学（当时在城里沙滩）的教室，需要住在北大的宿舍。我答应了。后来才知道，这是清华地下党组织的一项活动。

由于北大校方不同意借教室，因此，补习班的组织者一方面继续和北大校方交涉，一方面借了一些书供参加者阅读。这些书中，有翦伯赞的《中国通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这些都是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新思想。加上当时又发生了“于子三事件”。于子三是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死在国民党的监狱中。在很多城市掀起了一场抗议国民党政府暴行、纪念于子三的学生运动，北平也不例外。补习班的组织者带我参加在北大红楼广场上举行的追悼于子三的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没有做什么事，主要是观看。但通过这个“观看”，也使我具体感受到“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首先是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观点。回校后，在补习班一些参加者的介绍下，我又参加了一个由跨系同学组成的读书会。在读书会中，我开始读一些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虽然这些书的内容，当时我并不能很好理解，但也开始信仰马列主义了。

1948年开学后，我被班里推为参加学生会的代表。罢课游行的事都由学生会讨论通过后组织。在讨论要不要罢课游行时，我都发言表示赞成。通过后，就回到班上征集同学签名参加，大多数同学都踊跃报名。在1948年上半年，有过两次罢课游行，其中一次是抗议国民党军队枪杀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学生。游行时走在前面的是几十个穿着青年军制服、戴着钢盔的从青年军退役的同学。当时，国民党在北平驻有青年军部队，并且镇压过学生游行队伍。让退伍的青年军同学穿着青年军制服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如果碰到青年军来镇压，就含有“（现役）青年军不打（退役）青年军”的意思。在我参加的读书会中，就有一个从青年军退役的气象系同学。他告诉我，青年军是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是为了去缅甸作战而组建的。国民党为组建这支部队提出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在当时是十分激动人心的。当时参加青年军的也都是一些为了抗日的热血青年。

## 二、加入地下党

我是在1948年上半年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一个小组，三个人，组长是化工系的同学陶炳伦，组员中另一个是我同班同学薛君礼。同年12月，我们两个盟员同时入党，介绍人是在上海读中学时入党的同班同学王震寰。

我对当时从事学生运动的学生的才干是十分钦佩的。在“于子三事件”中，国民党报纸发表诬蔑学生运动的报道后，我亲眼见到补习班组织者，问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是不是要写反驳的文章。他回答：“是！”并很快写出来，第二天就散发出

去了。在开大会时，听说国民党特务要用暴力袭击会场，这些学生很快就贴出一批揭露和制止暴行的标语，很能打动人心。例如，有一幅对联式的标语，我只记得其中一联：“何不思其源”。这是指毕业于北大的、当时任北平市长的何思源。他如下令袭击北大，就忘了自己的母校。在他的名字中嵌入“不”“其”，就把这个意思非常巧妙地表达出来了。学生会讨论通过罢课游行的决定都要经过激烈的辩论。那时，学生会主席站在凳子上，在听取各种意见后，合并相同的意见，归纳成若干种意见，再就这几种意见进行讨论；再归纳为较少几种意见后再讨论，最后归纳为两三种意见进行表决。在归纳时，是不能落下与会者曾发表过的意见的，否则就要被指责为不民主，就要被扣上“强奸民意”的帽子。支持国民党的学生就会趁机制造混乱，使会议归于失败。所以，我对这个学生会主席（可惜我已不记得他的名字）清晰的头脑、杰出的归纳意见和驾驭会议的能力，至今想起来仍钦佩不已。

当时领导地下党的是查汝强（总支书记）。清华解放后，他在生物馆一个教室里召开了一次全体党员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我已记不清了，能记得的一句是：“这个教室也是‘一二·九’运动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召开过全体会议的地方。”开会后，他就调走了，由彭珮云接任。1957年“反右”运动中查汝强被打成“右派”，平反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查是一个有水平、有能力的人。查1990年9月20日去世后，199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金凤写的题为《哲人其萎，哀思绵绵》的纪念文章，文章中充满

了惋惜之情。确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知扼杀了多少人才啊！

我为什么会从一个只读书不闻窗外事的人，到清华半年后变得热衷于学生运动，以至参加地下党呢？我自己的思考是：既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主要有二：一是儒家的书是教人从政的书。《大学》开头就说，做人就是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书，我虽然读得不多，只在小时候读了一些，但潜意识里不免受了它的影响。二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遭受了一连串割地赔款的屈辱，所激发的民族感情，特别是抗战中亲身经历日本侵略，又有了具体的感受。这种民族感情集中到一点就是：盼望国家能富强起来，个人能为国家的富强尽一份力量。近因主要是，抗战胜利后听到的是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腐败丑闻，对中国能在其领导下走上一条振兴之路的愿望是落了空的。我在上海念中学时，对中国大地上还有共产党、解放区，而且还和国民党存在激烈的斗争一事，是一无所闻的。到了清华后，一是加深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认识，认识到国民党不仅腐败而且专制独裁；二是知道了共产党，而且还知道了它的一些理论依据和治国之道，认为共产党是复兴中国的希望所在。因此，吸引我跟着党，参加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工作。另外从外因来说，地下党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促使其进步，则起着关键性作用。这些不同的方式也有其共同的内容，就是结社和通过结社传播新思想。当时清华大学采取兼容和保护学生的办学方针，为这种结社和传播新思想提供了活动的空间。

### 三、参加教学改革小试验

我们机械系这个班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教学改革试验。大学毕业后，一般要实习一年。原机械系教授孟少农，新中国成立前去了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回到北京，负责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他到学校提出学生能否在三年级后实习一年，回来再念四年级，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学得更扎实些。学校同意了这个试验。我们这个班正常是1951年毕业，现在要推迟到1952年毕业。学校同意在1952年毕业后仍划在1951届行列内。由于是试验，采取自由报名方式。我们班大约有100人左右，有一半报名参加。实习是定向的、自愿的，有30多人选择去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十多人去一个重型机器厂的筹备组。我报名参加前者。孟的动机似乎是预定一批清华学生。由于后来还在汽车工业筹备组内设立了坦克工业筹备组，所以我1952年毕业后就分配到坦克工业系统工作。

### 四、在学生会搞宣传工作

我回到学校念四年级后，不知道被谁推荐去学生会搞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在中午吃饭时搞广播。为此，给我配备了一个小班子，包括两个广播员，但写稿子的任务基本上落在我的身上。这样，除了念书外，我每天还要写一篇广播稿。不过效果还不错，同学们即使吃完饭一般也要听完广播才离开食堂。我还在图书馆举办了两次时事宣传活动，一次宣传国际时事，一次宣传国内时事。形式都是我写出提纲后，请会画画的同学根据提纲内容在大字报纸上画成画，配上必要的但尽可能少

的文字或数字，因此内容表达比较形象、生动。当时学生会还组织每一个班级集体去看，甚至有外宾来访时，学校领导也领着这些外宾去看。

清华一直是中央对知识分子宣传教育的重点单位。解放初期，中央领导经常来清华作报告，彭真、薄一波、邓颖超等都来讲过，甚至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的王明（陈绍禹）也来讲过婚姻法。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京后就马上来清华作报告，一讲就是六个多小时。中央还给清华配备了固定的宣传员，有艾思奇、蒋南翔、刘鼎。其中艾思奇还是清华的政治辅导员，给我们上大课，讲社会发展史，当时称之为讲“猴子变人”。到1952年就不主动来了，要去请，我就请过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伍修权。记得到了伍的办公室后请他去清华作报告，他要我请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去，到了陈的办公室，陈说你还是请伍去，我又到伍的办公室，最后伍还是答应了。

### 五、参加国际学联理事会

我1952年8月毕业，组织上让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由全国学联主席（姓田，名字忘了）为团长的代表团，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参加第六届国际学联理事会（代表团中在校学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我，另一个是沈阳医科大学的一位女同学）。

行前，团中央在北京饭店设宴为我们送行，有第一书记冯文彬、书记蒋南翔、国际部部长吴学谦等。由于这时中央已决定冯文彬调离团中央，由胡耀邦接任，因此胡也来了。但因为正式文件还没有到，所以仍由冯致欢送词。



1952年王勤謨（左1）参加国际学联大会

我们是在8月21日早6时从西苑机场乘飞机去莫斯科的。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停留一天，第三天到苏联伊尔库茨克，第四天到莫斯科。从莫斯科到布加勒斯特则是乘火车，8月26日动身，28日到达。

9月5日，国际学联理事会开会，11日结束。15日，参加会议的代表组成若干代表团分赴罗马尼亚各地，报告会议情况。我去克鲁其市，并由我任这个团的团长。到该市下火车后，在车站发表讲话，后又在该市为这次会议专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了报告。17日回到布加勒斯特后，罗方特地把我们单独留下来，游览一些地方，表示格外的友好。这些都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地位的提高。9月26日自布加勒斯特回到莫斯科后，苏联共青团中央还要我们在莫斯科住一段时间，并在莫斯科过国庆节，一直住到10月6日。我们住在莫斯科郊区共青团的别墅里，白天游览，晚上看戏。这些都表明苏联对中国的特别友好，也含有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先进程度，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的意思。

10月10日回到学校后，21日我就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六局（即坦克工业局）报到，被分配到长春一个发动机修理厂工作。

## 六、清华精神对我一生的影响

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发端于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一次题为《君子》的演讲。清华校训是对中国传统的人做做事精神的高度概括，也是我毕业后做人和做事的准则。例如，长春那个坦克发动机修理厂，原是长春市的一个民用机械工厂，难以胜任坦克发动机的修理任务，需要进行技术改造。我一到该厂，工厂就让我担任工厂技术改造组组长，和分配到该厂的20多个大学生进行厂里的技术改造工作。当时该厂有一个苏联顾问，不但不支持我们，还说你们这些大学生没有搞过工厂技术改造，搞了不但搞不好，

还给国家造成浪费，他要向周恩来总理告我们。但最终我们还是秉承“自强不息”的精神，比较好地完成了该厂的技术改造任务。

历次运动中都要批斗一些无辜的人，我总是设法避开，并同情这些被无辜批斗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也这样做，结果被一个参加过长征的极左领导打成了“极右分子”，去农场劳动改造。但一想到“厚德载物”的精神，我也无怨无悔。

我继承了以刘仙洲为代表的前辈知识分子的做法，在做好工作的同时，也写些文章和书。现在我已经正式出版了七本书。受清华精神的影响，我工作和生活得很坦荡和从容，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

# 我与三位清华校友的小故事

○李剑白（1961届机械）

我是1956年考入清华的。从1956年到现在，我与清华和清华校友共同度过了64个年头。作为清华的一个学子、校友，我总的感受是处处沐浴着母校的阳光，受惠于母校和校友们的呵护。不管什么事，都能受到母校和校友的关爱。作为回报，不管我能力有多少，首先想到的是要回馈母校和校友的关爱。

下面就讲一下我与清华校友之间“既有呵护、又有奉献”的三个小故事。

### 与校友老伴的故事

我的老伴赵安庆，与我同一年考入清华。当时她在机械制造专业制12班，我在金相热处理专业金11班。我住在诚斋，她住新斋，互不认识。到1959年，系里成立

了“精密仪器”新专业，从全系各班抽调了45名学生到新组建的专业，我们两人都被抽调到新专业。我当选为班里的团支部书记，她当选为团支部组织委员。就这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慢慢就变成了一对。

后来又进一步分专业。老伴与其他14人学习精密仪器（陀螺仪专业），我与另外29人分到光学仪器专业，又成了两个班。但毕业时学校还是很关照，把我们两人一同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这是全国光学机械系统最好的一个研究所，有职工3000多人。工作很顺心，生活也很满意。

到现在，整整61个年头，我们生活上是伴侣，工作上是搭档。我调回江西，她



1996年李剑白与赵安庆夫妇参加校庆合影

是江苏人也来到江西。退休后两人都返聘到泰豪公司，又干了十年。这就是我与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位清华校友——校友老伴的故事。

### 与校友潘君骅院士的故事

1962年我毕业分配到长春光机所基础光学研究室光学检验组，接待我的第一个人就是潘君骅。也真巧，他也是一位清华校友。他是1952年清华毕业分配到光机所的，比我早了10年。当时他从苏联留学回来，拿了副博士学位。一见面，他就给了我几篇俄文的学术论文，要我先看文章，尽快熟悉光学检测研究工作。那时潘先生是8级助理研究员，相当于讲师、工程师级别。现在当然很多，但在当时的光机所则是凤毛麟角，属于少数拔尖人才。两年后，我当上光学检验组副组长，成为潘先生的副手。

以后我们两人亦师亦友，由于同一专业，几乎他走到哪里，我也就走到哪里。后来我们都是中国光学学会理事，年年开会还在一起。再后来他担任全国光学测试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我是那个专业委

员会的委员，又在一起。1993年参加国际光学学会年会，他从南京、我从南昌都到了日本京都。1999年他申报院士，8月份我们在安徽光机所开会，晚饭后一起散步，他悄悄地问我：“李剑白，这次院士我能不能评上？”看来他还是有点紧张。我说：“院士一定能评上！留苏副博士又有成就的人应该没问题！”评上院士后，我邀请他来江西，到南昌航空大学访问作学术报告。2018年召开全国光学测试学术交流会，我们在长春又见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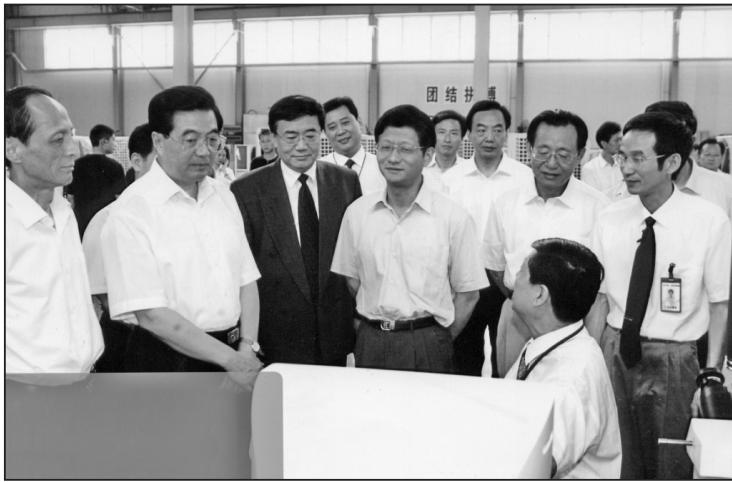
一直到今年，徐军梅打电话来说，泰豪公司要建院士工作站，要我聘请一位院士担纲，我找到了潘院士，他满口答应。现在手续都办妥了，就等着院士工作站开展具体工作。

从1962年我毕业分配后认识校友潘院士，到今年邀请他主持院士工作站，我们相识已58年，这是我与清华校友的第二个故事。

### 与校友老总创业的故事

来到南昌后，我认识了泰豪公司的黄代放、徐军梅等一批清华校友。大家一起合作、攻关、创业，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

最有意思的是2003年春夏之交，SARS冠状病毒突袭全国。4月份，我们正在唐山市人民医院进行培训工作，突然遇到唐山市封城，把我们赶回到南昌。在隔离7天后，我回到泰豪上班。这期间，我看到报纸上刊登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发成功检测SARS病毒抗体的试剂盒，最终是用荧光显微镜检测诊断，效果很



2003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多终端光电荧光显微工作站创新成果及检测SARS应用，李剑白（坐者）向总书记汇报

好。这个报道启发了我们，我们研发的泰豪超高倍光电显微仪正好可以解决他们的短板。将我们的仪器光电化、信息化、智能化、网络化，肯定比他们的检测设备更先进、更优越。

我们汇报到徐军梅，徐军梅上报黄代放。我们的思路与黄总的雷厉风行作风一拍即合，三天就立项，资金很快到位，真是从未有过的速度。课题组也顺势而上，在两个月内完成研发、试验、应用，一气呵成，创造了完成课题的神速度。5月份有想法，7月份完成试用，8月份迎来胡锦涛总书记的视察。这种速度大概也反映了清华校友真抓实干的精神吧。

17年后，今年新型冠状病毒又来袭。这次比2003年更加凶险，更加迅猛。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北京新冠病毒防控科技攻关时，我从电视中看到他们考察的第一站正是我们当年进行试验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所，大楼还是当年我们去检测的那座大楼。过去我们用的是抗体检测，这次新

冠用的是核酸检测。两种检测方法不完全相同，也各有特色，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最后一步病毒分析检测都是用荧光标记，用荧光分析仪识别判断。

这就是我要讲的与清华校友“既有呵护、又有奉献”的三个小故事。最后，感谢清华，让我找到了人生伴侣，结交了亦师亦友的知己；感谢

清华，让我有幸与优秀的校友们搏击时代，砥砺前行！自豪吧，清华人！

#### 对TH-E型泰豪光电荧光显微平台系统评定意见

受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经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同意，我们对TH-E型泰豪光电荧光显微平台（站）进行了检测使用验证试验并对其性能效果进行评价，意见如下：

1.该仪器在我中心进行了乙型脑炎病毒感染细胞的荧光检测试验，SARS冠状病毒单克隆抗体的荧光染色检测试验，以及SARS病人血清标本检测观察试验等。结果表明，该仪器观察荧光的敏感性高，影像清晰，与背景反衬分明，影像传输前保持异性良好。仪器操作方便，图像记录打印清楚，性能效果也好。

2.该仪器运用光电技术的新产品研发成TH-E型光电放大器具有灵敏度高，成像清晰，性能效果有创新特点。

3.该仪器应用软件采用当前流行的编程工具和功能强大的数据库系统，存储量大，访问速度极快，有包括SARS病毒检验在内的10个临床检验项目和大容量标准图像库，以及各种查询检索功能与医院信息联网、远程传输、会诊功能，是当前医学检验中功能应用广泛的软件系统。

4.该仪器具有智能化多终端和跨距离音像传输系统，运用效果良好，可以跨过SARS病区和强毒实验室防护区，在区外观察研究检测的全过程。尽早取得最佳的图片和检测结果，另外，对于降低医护人员感染率和保护高级专家的安全也有重要意义，这一设计思想和多终端的巧妙应用，在国内外同类仪器中是没有的，有创新性。

综上所述，该仪器有众多的特点，性能优良，功能强大，临床使用效果好，是值得推广应用的一种检测各种病原体的多功能、多终端、智能化的光电荧光显微工作平台（站），希望今后能将有线影像传输改为无线传输。



在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病毒所检测  
试验结果

# 从清华早期校园歌曲开始： 一路歌声，一生欢笑

○胡 杨（1978级土木）



作者近照

在园子里生活学习工作了11年，度过了人生中最为宝贵的年华。回头看看，我真的愿意再重复一遍。都说我们60后是最幸福的一代人，什么都赶上了趟，我觉得一点也不夸张。

## 一、歪打正着之白桦乐队

刚进清华，正好赶上学生文艺社团恢复，我就加入了学生民乐队，担任二胡首席，并在音乐室民乐教授王震寰的鼓励下担任民乐队指挥。1983年，文艺社团集中班恢复，我又幸运地成为了“文革”后第一批集中班成员。也正是集中班的恢复，才有了清华大学史上的第一支电声乐队的诞生。

大约是1982年或是1983年吧，民乐队搞了一个专场演出，其中有一个民乐轻音乐演奏，主要由我和“大白鲨”一起张罗编曲搞的。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能够听到邓丽君的歌，非常喜欢，所以就扒带改

编了两首，演出后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后来集中班成立后，我们马上想到的是组一个电声乐队。因为集中班的各位同学都有“大白”系列的外号，比如大白鲨、大白猪、大白狼、大白羊、大白耗子、大白菜等，所以我们决定启用“大白”乐队这个名字。排练了几次后，我们就计划在地下食堂开始我们的第一次专场，就是周末舞会。

学生会文艺部的主管也是社团舞蹈队的姚坤同学，负责给我们发海报宣传。写海报时他觉得“大白”乐队名字太土，就自作主张地写上了“白桦”乐队的名字。清华史上第一支电声乐队“白桦”就这样诞生了。

这之后，白桦乐队在周末舞会演出慢慢就成为了常态。只不过，地下食堂太小了，后来辗转九食堂、七食堂，最后落脚在西大饭厅，场地总算够大啦。那个时候，海淀区只有两个每周都有现场乐队的周末舞会：一个是中关村的旱冰场，另一个就是清华的西大饭厅。但是我们的舞客多，因为票价便宜场子大，所以周边的潮男潮女们都来清华跳舞。我们乐队的成员也成为了学生中最早“发财”的，因为每个周末都有5块人民币的乐手收入，所以我们能够经常光顾大学生之家吃夜宵。

当时，中关村旱冰场的乐队是科学院的，他们会很多老歌，水平也比我们高。

为了与他们抗衡，我们只好走捷径，搞最新的歌曲，比如邓丽君的、张行的、罗文的、周峰的、陈琳的，等等。我扒带的功夫就是那个时候练出来的。

刚刚开始时，我们是没有架子鼓的，就去清华音乐室的仓库里找来一些不用的鼓，拼凑了几个，再加上军乐队的小军鼓就算是个改装的架子鼓了。正规的电子琴也没有，但正好学生科协有自己组装的电子琴，我们称之为“拍打牌”电子琴。因为有时候电路接触不好，需要拍打一下才会出声。另外，还要备好一个手风琴，以防拍打不成的时候派上用场。

舞会保安请的是学生武术队的同学。因为校外来的低素质青年及小地痞们经常来舞场争风吃醋，所以要有专业的保安。当时我们的经验就是，如果出现争吵或斗殴，乐队一定不能停止演唱演奏，不让争执双方得到关注，这样才能不把事情搞大。记得有一次演奏朱明瑛的《等到明年的这一天》，因为有人打架，乐队反复N次，被戏称等到后年了。

乐队有架子鼓、吉他、贝司、键盘、夏威夷吉他、小号、长号、萨克斯。记得当时小号手正在追某校花，总是要下舞池去陪校花跳舞，搞得我们乐队只好以别的乐器来替换。小号手还振振有词：“我们吹号的太辛苦，力气活，需要常常休息一下。”

我们的鼓手单治良是文艺社团的独唱演员，但是他打鼓的时候不能同时唱歌，于是吉他手的机会到了。时不常地我就开始了舞会现场唱歌。当时唱张行、周峰的比较多一些。记得有一次乐队中场休息放音乐时我去邀请班花跳舞，然后向她吹嘘刚才唱歌的是我，她不以为然地说：“哦，我还以为是个女歌手在唱。”好尴



白桦乐队在清华西大饭厅周末舞会演出。单治良、胡杨现场演唱《迟到》。图中键盘为学生科协自己研发安装的“拍打牌”电子琴，左1为客串鼓手陈鸿波（1979级工物）

尬……

1985年文艺社团去厦门、福州等地巡演。我们还实地考察了当地的商业舞场。厦门当时是跟深圳一个级别的特区，各方面比较开放先进一些，舞场也是。记得那是一个地下防空设施改装的舞场，装修非常专业，音响好，乐队也好。乐队刚刚开始，我们就迫不及待地上场翩翩起舞，只是发现当地人并没有起身进场的意思。等到两三首歌曲过后，当地舞客才缓缓入场。后来才知道，这是当地的规矩，前几首歌曲是供人欣赏的，不是给大家伴舞的。

键盘手李国华（1984级电机）的加入，让我们乐队水平提升了一个台阶。后来，“老帮菜”离校了，键盘手李同学继续未竟事业，重组乐队，改名为威肯（Weekend）乐队，延续着青春的故事。

## 二、早期校园歌曲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张明敏把流行唱法带进了内地，也陆续带来了在台湾已经流行过的台湾校园歌曲。其实在园子里，在台湾校园歌曲打入大陆之前，

## □ 我与清华

我们就已经有自己的校园歌曲了。

第一届清华歌声演唱会是在1982年，在清华主楼后厅举行。与后来的台湾校园歌曲和再后来的校园民谣不同，尽管都是学生们自己写的，这些歌曲基本上还是沿用老的方法：手风琴伴奏，由歌剧唱法或民族唱法的文艺社团合唱队业务骨干演唱。所以基本上写词是一个人，写曲是一个人，歌者是一个人，手风琴伴奏又是另外一个人。

1981年成立了清华学生吉他社，黄晓辉（1979级计算机）和牟文殊（1977级自动化）是吉他社骨干。记得牟同学的土造电吉它是他自己弄的“法制器”，就是把木吉他的声音转换为电声的吉他效果器。我在1983年土木系结8班毕业告别演出时还借用了一下。据说第一届清华歌声演唱会上牟同学和白同学的原创作品主要是用吉他和尤克里里伴奏的。

当时在清华音乐室有几个教授，其中瞿至善教授是专门教作曲的。在学生文艺社团的旗号下，有一个作曲班，就是由瞿教授指导。第一届清华歌声演唱会也基本上就是作曲班的作业展示了。我因为不是作曲班的，没有参加第一届比赛，所以对那一次的细节不太清楚。

据了解，作曲班的同学也不都是第一次接触作曲。其中有清华附中考进清华的丁滨、曾莹，他们以前在附中王玉田老师（著名儿童歌曲作者）的影响和指导下，初步接触了一些作曲的理论和实践。另外，1977级的学生有一些从社会上来的，如白硕、老顾，上大学前曾经也在工厂、农村搞过一些歌曲创作。

尽管没有参加第一届清华歌声演唱会，我还是在第一时间吃了螃蟹。我是在

民乐队王震寰教授的影响下开始作曲的，处女作写于1980年或1981年的暑假。暑假很漫长，班里的同学都回家了，只有家在新疆的蒋平同学因回家距离太远而选择留守学校。蒋同学给我写了封信，其中有他的诗《秋吟》。这首《秋吟》就成为了我的处女作。后来由合唱队“著名男杂音”本班陈康胜同学演唱，刘巍同学手风琴伴奏，参加了第二届清华歌声演唱会并获奖。记得这首《秋吟》曾经拿到瞿教授那儿请求斧正，教授曰，旋律优美，结构混乱。近40年后，蒋同学找专业人士为此歌编曲，也得到类似的评价——这首歌拍子有点乱呀。

第二届清华歌声演唱会大概是1983年在大礼堂举行，基本上还是跟第一届同样的模式。我们班上去唱了一首小合唱《清华，清华》，记得开头是这样的词：清华清华，响亮的名字……因为不知道老校歌的存在，所以胆子挺大，就想写首校歌出来唱唱。同班同学陈晓明和陈康胜也作曲，其中陈康胜的《小船》一曲是他喝酒喝多了以后灵感大发，在酒馆开的发票背面写下的曲谱。

1983年清华学生文艺社团在江苏巡演，我们把贾海东（1977级力学）作词、牟文殊作曲的《我们大学生活》搬上了舞台，由段新独唱，小乐队伴奏。这也是清华文艺社团第一次把吉他搬上了正式演出的舞台，由曲作者牟文殊弹奏。

1985年清华学生文艺社团在福建巡演，我也模仿张明敏的曲风写了一首《春的播种》，由单治良演唱，小乐队伴奏。另外在从上海到厦门的船上，我们白桦乐队苦于无演出曲目，逼着键盘手李国华写了一首器乐曲，成为了他的处女作。

合唱队的民族唱法女声骨干王晓律也自己写歌。一首《校园春雨》由民乐队伴奏，配上王同学嗲嗲甜甜的声线，演出效果很不错。

当年白同学喜欢上了住X号楼的一位女生，常常抱着尤克里里在女生的窗户下面唱情歌。记得白同学作曲、贾海东作词的一首《你带走了一片云》成为了文艺社团男女对唱的保留曲目。很有意思的是，这首歌后来被称之为北大的校园民谣。因为白同学后来考入北大读研究生，在徐小平的张罗下出版了一盒磁带，这首歌也被收入出版发行，换了个校徽。

那个年代，北京大学文艺汇演总是在广播学院和清华之间争名次。记得有一年刘天礼作曲的《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由广播学院演出并获奖。这首歌后来也被认为是北京早期校园歌曲代表作之一。

### 三、前校园民谣

1986年12月12日，清华主楼后厅，第三届清华校园歌曲大赛成功举办。这次大赛与之前的两届“清华歌声”演唱会有很大的不同。第一，这个时候因为已经有台湾校园歌曲传入大陆，“校园歌曲”这个名词就直接被引用了，而之前的“清华歌声”被抛弃。“演唱会”也被改为“大赛”，紧跟当时流行的术语。第二，这一次打开了校门，请来多位著名的词曲作家当专家评委，如乔羽、谷建芬、王铭、王晓岭、王健等。第三，大多数的作品都是以唱作人的形式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大多数歌者就是词作者（或曲作者）。第四，大多数的唱法已经是流行唱法（当年称之为“通俗”唱法）。

其实说起这个第三届清华校园歌曲

大赛，就不得不说一下在这之前主办的清华通俗歌曲大赛。通俗歌曲，因为张明敏1984年的到来而在内地遍地开花，到1986年的时候，已经是通俗歌曲火得不行了，一些唱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的都恨不得改行去学唱通俗。而“威猛”乐队（WHAM!）现场音乐会、世界和平年的《We Are the World》电视直播，《让世界充满爱》百名歌星演唱会以及崔健的《一无所有》横空出世，都推动了通俗唱法的迅速流传。

然后大家还发现这个通俗唱法起点很低，五音全了，有点节奏感，似乎就可以唱歌了。嗓子不好的反而成为了有沧桑感、有深度的标记。也就是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没准你就是一歌星的料。

听过了多年的民族唱法和美声唱法之后，突然有自然而又不失美感的通俗唱法出现，大家都是一窝蜂地推崇，在清华也不例外。主楼后厅的清华大学第一届通俗歌曲大赛观众爆满，极受欢迎。其中1981级土木系的吉他三重唱英文歌曲《巴比伦河》很好听，毫无悬念地获得比赛第一名。因为三位同学都姓肖，被称之为“肖三组合”。

然后就自然而然地有了第三届清华校园歌曲大赛的唱法转向。当时唱通俗唱法的有蒋铁兵、宋柯、罗宏、肖泓、何东、胡杨、黄之阳等，都不约而同地抱起吉他唱起了原创。《我把心儿融进琴声里》《一走了之》《母亲的油灯》《中秋》《相聚何必只明日》等歌曲都出现在这届比赛中。其中轻松愉快的《祝福你去远行》（胡杨词曲）获得了大赛第一名，《友谊列车》（宋柯词曲）获得了第二名。

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插曲：专家评委之

## □ 我与清华

一王健老师对我们的大赛评价很高，以至于赛后几天专程从城里来清华“采风”，将部分歌谱歌词整整齐齐地抄了下来。那个年代没有复印机，只有靠手抄了。几个月后，由王健老师作词的《烛光里的妈妈》诞生，不知有多少灵感是从《母亲的油灯》中“采风”而获得。（《母亲的油灯》作词邱柯（1980级机械），作曲胡杨，1986年北京电视台首届BTV歌赛优秀歌曲奖。）

12月底正好有一个北京电视台的首届BTV歌赛，我和蒋铁兵作为清华的代表直接参加到了选拔赛中，并顺利通过初赛、复赛，进入决赛。

中央乐团的乐队现场伴奏，我和蒋同学唱了《我把心儿融进琴声里》和《母亲的油灯》。这是清华的校园原创歌曲第一次走出了校园，走进了社会，飘进了北京地区的大学生和中学生的耳朵中。记得1994年有一位北京籍的学弟跟我说，他把那场比赛的电视转播录了下来，一直保存着。当时我们是得了演唱第三名——优秀作品奖。

比赛期间，评委之一的谷建芬老师问蒋同学愿不愿意去谷建芬声乐培训班，被蒋同学一口回绝，托辞女朋友在美国，要去美国留学。当年谷建芬声乐培训班都收了些什么人？刘欢、那英、孙楠、毛阿敏……

由于参加比赛，我认识了一些圈内人士。其中有中央乐团的乐手，同时也在帮唱片社物色新人，于是蒋铁兵和我就有了第一次进录音棚的机会。当时是中国电影音像出版社牵的头，把当年香港流行的一些歌翻唱一次，同时加入一首我写的半原创作品《问雁儿》。当年年轻人喜欢看琼

瑶的小说，我为了讨好当时的女朋友，就把《雁儿在林梢》的这首诗给谱了曲，唱给同学们听，大家都还挺喜欢的。当时好像是给了50元人民币的稿费。

那盘盒带有王迪、王晓芳、田震、蒋同学和我。由王迪操刀编曲，北京最好的乐手和录音师制作，熬了几个夜就把盒带录制完成。《问雁儿》应该是校园原创歌曲里最早商业出版发行的歌曲了吧。那时是1987年春节前后，离校园民谣《同桌的你》传遍大街小巷还有两千五百多天。因为是琼瑶的词，后来邱柯同学又重新填了一版词，改为《问燕儿》。

马上又接到中国录音录像总公司吴海岗导演的邀请，参加中国星海杯歌赛，录唱了颂今的作品《童年的校园》、我和邱柯合作的作品《他们说》。在天津体育馆现场演唱，天津电视台直播，《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导了我们的演出。

记得我们当时是第三个出场。第一个胡月、第二个蔡国庆现场都唱跑调了。轮到我们业余的上台，吴导当场决定假唱对口型。果不其然，演唱会的第一个高潮出现在我们的二重唱。尽管现场效果很好，还是被我同屋闫勇义同学（合唱队男中音，考入清华前在部队文工团专业唱歌）在看电视直播时一眼看穿，说我的口型对不上出来的声音。

后来蒋铁兵同学毕业去了四川，忙乎他的出国事宜了。我没有了玩伴，只好找低年级的宋柯（1983级环境）、罗宏（1984级力学）等一起玩。那个时期，不知为什么我们都喜欢重唱，好像一个人没法唱似的。我们参加了北京市“牡丹杯”吉他弹唱比赛并获奖，又在某次演唱会中登上了首都体育馆的大舞台。

1989年底，我也要去美国读博士了。临走之前，于立山、袁剑雄等帮我举办了一次“胡杨《是路就走》告别清华校园原创歌曲演唱会”。请了李蔚、金得哲、周旗刚等演唱嘉宾，词作者邱柯、范波、张磊、黄潮等都到场支持并朗诵了部分歌词。那一晚唱了23首原创歌曲，在中国大陆的校园音乐也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次吧，圆满地画了一个句号。

四年后的1994年，《同桌的你》和

校园民谣在神州大地流传开来，胡杨博士此时在美国已经拖家带口地在讨生活了……

回头望望走过的路，有那么多的青春美好记忆，而那些古老的旋律则加深了这些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交到的朋友，也是发自内心最真诚的那种。有这么一个爱好，真的挺好。直到现在，我还偶尔写写歌、唱唱曲、弹弹吉他。一路的歌声，一生的欢笑。

## 我在清华大学求学十二年

○李文喆（2001级物理）

2019年7月13日，毕业典礼后整一周。六点钟习惯性醒来，吃了早饭，把桌子收拾干净。泡了一杯咖啡，坐到电脑前。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子洒进屋里。放几首喜欢的音乐，开始敲下这些文字。

我在清华求学12年，获得理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博士三个学位，分别在物理系、经济管理学院、五道口金融学院三个特色鲜明的院系就读。学生生涯要划上句号了，用一句话概括清华教育教会了我什么，我想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八个字。“西山苍苍，东海茫茫，吾校庄严，巍然中央”。每次唱老校歌，都不觉泪目。12年了，清华我爱你。

2001年刚到清华，惊讶于清华之大。夏日的清华园，六教东侧的林荫路一眼望不到头。这些年里，无数次在清华园里走过，校园里所有小路都可如数家珍。主楼和大礼堂前，我曾数十次亲手升起国旗。每周都会有新生来看升旗，仪仗队里喊口号的就是我。周日仪仗队会在主楼前广场

训练，军姿、队列、正步。我父母很喜欢我在仪仗队矫正了站姿。队员们至今保持着密切联系，对祖国的热爱、对国旗的责任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经管学院的伟伦楼布满了教师的办公室，每间办公室都堆满了书，仅能容一人落座。“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用来形容经管学院恰如其分。这里的教授学问低调而华丽，老师们并不热衷于上媒体、搏热点，却甘坐冷板凳，数十年如一日，为国家培养经济管理的栋梁之才。即使在我从经管毕业后，恩师仍多次给我指点和支援。记得有位老师刚出差返京，就赶来参加论文答辩，一到现场就说：“因你是经管学院的学生，我才一定赶来参加。”一听此言，心中暖意涌动。

万人（现名“观畴园”）、紫荆、十四食堂（现名“丁香园”）、十食堂（现名“听涛园”）大约是我就餐最多的几个食堂。由于学校大规模兴建并调整宿

舍，一字班（2001级）可能是换宿舍换得最多的一届。紫荆公寓是新宿舍区，夜晚路灯下，伴着花草的清香轧马路，浪漫至极。学生组织议事时，或在几个宿舍楼来回穿梭，或找间宿舍一落座就汇报工作，颇有些回忆。十四号楼是经管研究生的宿舍，2008年收拾行囊，乘出租车和爸妈一起从这里出发搬离清华园，仿佛仍是昨天。

老图书馆是自习者的天堂，座位充足、有空调，开门早、关门晚，近九十年的外墙 上布满了爬山虎，这也是读博期间去得最多的自习室。新馆、文科馆、李文正馆这几个图书馆都偶有去过。在文科馆，我习惯固定在三层的一个座位上自习，中午去旁边的清芬园（原七食堂所在位置）吃碗面。有了文科馆，清华在经管社科方面的藏书的确是大为丰富了，仍往往是早年的版本。经济学藏书在三楼和地下大库都有。一字班毕业十周年集体向学校捐赠了李文正馆的书桌，每张书桌都镌刻着捐赠班级的名称。在一字班学生会主席的带领下，我曾有幸作为组织者做了一点工作。

大名鼎鼎的科学馆，对我们最主要的意义是普通物理实验室。若实验室主任抓住学生数据造假，便用流传于世的名言教训他，“你这样的数据根据我的测算只有几百万分之一的概率会出现。”经过这般严格的实验训练，“不能造假”这四个字写进了物理系每一位同学的基因。

理学院广场是我眼里清华最美的设计，台阶、草坪、讲台、周围低调的红色建筑，清晨阳光里，或是雨后彩虹时，美得醉人。物理系毕业典礼、历次合影、学生活动会在这里。理学院东边是物理系，西边是数学系。物理系三楼报告厅和数

学系南边的郑裕彤讲堂条件甚好，常举办学术和学生活动。在物理系的一间办公室里，经两位教授面试，我被录取至基础科学班。老师们宽容真诚的笑容，大概是我对物理系的第一印象。大四到研一每个星期二的中午，我们几位辅导员都会到物理系一间被各式实验设备包围的办公室里，开学生组会。物理系学生工作组副组长，是目前为止我在清华担任的最接近教师角色的一个职务。在我要离开学生工作岗位时，物理系团委的同学们在三楼报告厅送给我一份特殊的礼物，珍藏至今。

大礼堂和综合体育馆是办学生节和其他大型文艺活动的指定场所。头几年，我还对参加这些文艺活动兴趣盎然，只是票很难排到，只能作罢。蒙民伟楼是艺术团的大本营，我至少三次参加艺术团代表队的面试，却始终与艺术团无缘。2004年，我有幸在蒙民伟楼领到了校团委颁发的“社会实践标兵分团委”奖状。

东大操场、西大操场、紫荆操场、北操，这几个操场常去跑步和运动。上过排球、羽毛球、手球、游泳、棒球课，参加过篮球、排球、棒球比赛。记得西操物理系足球队夺冠之战，我从仪仗队训练场奔过来着戎装举着系旗绕场跑了一圈。棒球队每周四、六两次训练，教练让我们多吃土豆炖牛肉多长肉，底盘稳了才能打好球。“无体育、不清华”是近年来才流行的口号。十年前我们只知道“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足以让每一个清华人热血沸腾。任何仪式上年纪大一点的校友讲话，如果能来一句，“我已经实现了蒋南翔校长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要求”，全场必爆发出热烈掌声。那时，校园里报名参加北京国际马拉松刚刚兴起，我大一

参加了五公里，大二参加了十公里，大三参加了半程，大四报名了全程，可惜那天睡过了。跑步很简单，但需要坚持。

第一至第六教学楼，简称一教至六教。六教未建好前，我在三教和文北楼上过数学课、物理课。考试周一大早三教门前等待开门自习的队伍有几十米。在四教上了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一位教授讲授的“流形上的微积分”，一学期不知其所以然，最后一节课老师的最后一句话，“这样就在一个拓扑空间上构造出一个笛卡尔坐标系。”他边说边用粉笔在黑板上很得意地画了一个小句号。那一刻我似乎全都懂了，第一次亲身体会到打通任督二脉是什么感觉。六教建好后，大部分课程搬到了六教，期末考试座位也缓解了许多。五道口的博士生入学笔试在六教，当时考生坐满了A区的两个大教室。

建筑馆报告厅能容纳几百人，一般是在全校性选修大课的地方。2014年博士开学前的暑期团校结业联欢会上，所在班级有个朗诵节目，我的台词是，“我到十五号楼下面的修车铺，想买辆自行车。我跟师傅说：‘我在这儿待了七年，硕士毕业、工作六年后又考博回来。’（观众欢呼鼓掌）师傅问我：‘为什么要费劲考回来？也不一定能毕业。’（观众爆笑）”

金融学院在早些时候是人民银行入职的面试地点。那时的五道口，外立面是大理石，门内方正的设计和机关单位一样。五楼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博士学位论文写作期间，在这里曾向六位老师一对一报告论文，老师们或推掉聚餐、推后约定的面谈听我讲，或给予别具一格、水平甚高的修改建议，或热情鼓励、要求快投快发快毕业。特别是导师为培养博士生倾注心

血，严格要求，时时督促。既教学问，又教做人，春风化雨，一身正气。念及师恩，不胜感激。

我在博士学位论文的致谢中专门为金博14班同学写了一段，后来不经意看到这是全班同学在论文致谢中不约而同的举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35位同学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也见证了彼此有趣的灵魂。班里年龄最长的同学，无疑是带头人和灵魂人物，治学、为人、写作、拍照都极认真，生活、锻炼习惯亦领风气之先，每读其文、每次聊天都颇受教益，实为2014级博士同学的楷模。还有一位和我同岁的同学，看书很多，学术研究极专注，但对写作业不太上心，对宏观、计量比较擅长，写论文期间曾和他讨论了几十个回合。记得第二学期期中考试前一天听讲座，收到该同学的核桃奶，考试前的焦虑心情顿觉平复了很多。

毕业前，曾想在周末找一天回学校，再体验完整的一天学生生活，在图书馆、六教上自习，到万人吃饭，去和相熟的老师聊天，在操场跑步，竟找不到时间。6月29日，在国家博物馆看展览，看到邓稼先在美国留学的照片。照片中西装革履的邓稼先1950年博士一毕业就投身国家建设。人的一生应当怎样度过？这张照片催人沉思。7月1日，清华新闻网登载了一条新闻《校领导“七一”之际看望慰问老党员、老同志》，照片中的老教授们家中朴实无华，很多在用上世纪80年代的简易沙发，简朴的屋子难掩他们精神上的富足、人生的达观和追求，其精神境界值得学习。

7月6日的毕业典礼后，在校园里拍照用了六七个半小时。留恋徜徉许久，向清华学生生涯告别。



## 开启尘封的往事

### ——追寻父亲沈同归国抗战的足迹

○沈 还

来伊色佳已一年矣，皓月几满，当在中秋前一二日。几时才没有灾民，几时才没有外侮，几时圆圆的月儿照着尽是快乐的人？ ——September 17, 金, 19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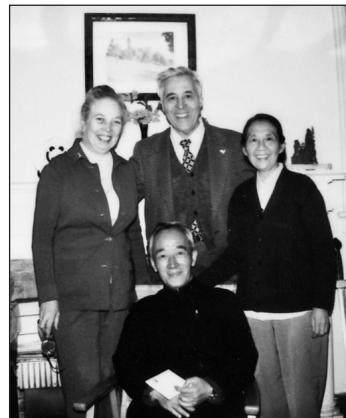
华北沦亡，淞沪抗战，国家民族生命危在此刻矣！ ——August 30, 月, 1937

国军仍守住吴江。想念母亲弟妹平安。又念千万同胞已遭难，对于生命一念已由“个人生死”扩展至“民族生死”，有时念及全人类。 ——November 18, 木, 1937

以上三段文字皆摘自父亲沈同1937年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的日记，这本日记至今仍保存在康奈尔大学的Olin图书馆。

父亲沈同1929年由苏州中学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1933年毕业后留在清华做助教，1936年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师从生物化学教授梅乃德（L.A.Maynard），从事动物营养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父亲留学期间的后两年住在康奈尔大学社会学教授商徒生（Dwight Sanderson）家里，与他们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商徒生教授原是昆虫学家，后转攻社会学。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商徒生教授的女儿爱丽丝（Alice）与丈夫约翰（John）于1983年和1985年两次访问中国并到我们家中做客，他们带来了父亲留学期间手书的一厚本英文自述材料的复印件。

近些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及我们的下一代曾陆续从世界各地专程前往康奈尔大



1983年，沈同、查良锭夫妇与Sanderson教授的女儿Alice、女婿John合影于北京大学燕南园53号寓所

学的Olin图书馆，阅读并复制了部分保存在那里的父亲在留学期间的日记、信件、照片、剪报及手稿等文字资料。这些历史资料都是商徒生教授家人珍藏多年后交给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保存的。

那天接待我们的是该图书馆的馆长David W.Corson先生，他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翻开文件夹，朗读着信件，展示着照片。我们含着泪水仔细聆听着，翻看着。一篇篇日记，一封封信件，一份份剪报，一张张照片，使历史变得清晰，为我们展现了70多年前发生在一个留美中国学人身上尘封已久的事。

父亲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赴美留学，

时年25岁。父亲留学的第二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的日记中多次出现“苏州被炸”“日轰炸广东”“贼陷平望”“国家、民族、生命危在此刻矣”“中华民族一定复兴”“相信中华军人一定能驱敌出境”等字句，日记本中贴着有关中国战事报道的剪报。

父亲虽然是公费留学，但由于战事频仍，学费总不能按时收到，生活相当拮据，再将省吃俭用的学费寄回国补贴家用，更是难上加难了。

父亲在1937年8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钱真没有了，身上就只剩一个25分和些铜子和一个dime。早上喝一瓶牛奶，中午一个sandwich一杯coffee。晚上不够吃晚餐了，回答着朋友说肚不舒服，买了些饼干当晚饭，还留下日充饥。”

对祖国命运的忧思，对亲人的挂念，身处大洋彼岸的父亲抱定了归国效力的决心。他要用所学报效祖国，他积极地为归国效力做准备。

在October, 4, 1937年的一篇日记中，父亲写道：“下午4时后，Animal Nutrition Seminar, Dr. Asdell 报告返英半年中经历，谈及英国实验所工作情形。J. Hammond 之工作及其为英国战时食物计划诸端，极使我高兴，感觉我回国，正亦诸事待我去做，至少可步 J. Hammond 后尘。”

父亲1939年6月获得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当月就动身前往旧金山准备乘海轮回国。商徒生教授一家在父亲离开他们一天后，就提笔给父亲写信表达他们依依不舍及牵挂之情。父亲一直珍藏着两封美国来信，其中就有商徒生教授一家1939年写给他的这封信。

商徒生教授写道：……我们想让你知

道我们真的很想念你，还特别想知道你所有的旅途情况。……如果你的耳朵在发烫，你就能猜到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你，而且我想在你安全到达你的目的地中国之前你的耳朵会一直发烫下去的。你成了我们在这儿的真正的朋友，而且我们和你相处得非常愉快。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之间在没有建立深厚交往之前是很难了解对方的，我们知道你是你们同胞中非常与众不同的人，然而正是因为对你的了解，我们才会对所有的中国人始终充满友好的感情。

商徒生教授夫人在信中写道：刚过去一天，亲爱的同……我一直在想着你……我知道你的祖国需要你，你也会尽你最大的努力回报它。你有勇气、忠诚，你有能力也愿意为国家效力。

孩子，让爱与你相伴。虽然“全身心地爱”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为生活中遇到的责任和需要而献身，但是爱可以融入到生活中各个方面。盼着你的来信，我也会常给你写信。把我当作你的美国母亲吧。

作为一个居住在教授家的留美中国学生，仅仅两年多时间，父亲就与他们结下了如此深厚的友谊。令我感动的是商徒生教授一家人发自内心的真挚语言，是父亲对自己国家的忠诚，父亲的责任感，父亲的善良、真诚、乐观、勤奋深深打动了他们，进而影响到他们看待中国人的目光，并因此对中国人充满友好的感情。

1939年8月父亲归国途经香港时，收到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的来电，获悉在昆明和贵州有一些工作在等着他。父亲又辗转海防，经滇越铁路到达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清华的生理研究所，父亲见到汤佩松教授，了解到当时由于营养不良造成部队的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急需派他到

## □ 名师轶事

贵阳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任营养指导员，开展前线士兵营养状况的调查与改良工作。到了救护总队，总队队长林可胜教授推荐父亲做英庚款资助下的营养学相关研究并同时进行难民和士兵的营养调查，他问父亲能否上前线去，父亲没有犹豫，立即承担下来。他深知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生理学和营养学的基础，对医学、农学以及地理环境、社会知识都要有所了解，他做了细致准备，在制定了详尽的调查方案后偕同几名联大毕业生奔赴抗日前线。

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保存的父亲写给商徒生教授家的一封信里就有如下描述：

“明天一早，我和三名营养队的大学生就要踏上无路的征程奔赴湖南前线。我们预计工作到6月底。虽然信件走得很慢，但是我会坚持给你们写信的，不论信写得潦草或是简短，我都会写的。……我们会到前沿阵地的部队工作，所以我不可能考虑是否危险了。不过我会加小心，可以避免的和没必要的危险事情不会去做。你还是可以把信寄到清华大学。”

父亲在1940年3月22日给商徒生教授家的一封信中画了一张简图，标明了他已经走过的和将要走的路线（纽约伊色佳—上海—香港—印度支那—昆明—贵阳—衡阳—长沙—重庆）。父亲有的信中描述沿途看到的风土人情，用画笔勾勒出贵州山民跳芦笙舞的情景，寥寥几笔栩栩如生，充满情趣，有的信中还夹着战地采集的野花。

令我感动的是，父亲在其中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很高兴那么快就确定了我的工作方向，但是另一方面，在生活上我确实还很艰难，因为直到1940年3月我才领到薪水，那之前多亏了周围朋友们的帮助。”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为确立了工

作方向而欢欣且全力以赴，绝不会因为待遇问题而有丝毫懈怠。

在那种艰苦的环境下，父亲一直与康奈尔的师友保持联系。康奈尔的中国留学生及父亲的老师们从他的来信中获知，由于维生素等营养物质摄取严重不足，许多中国士兵体质虚弱并患有一系列疾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康奈尔大学的留学生及生物系的教授们纷纷募捐了当时产量低、价格昂贵的结晶维生素，并准备了相关资料希望能对父亲的工作提供帮助。

父亲他们冒着日机空袭的危险，辗转在战火纷飞的湘赣黔抗日前线进行营养调查，写出营养调查报告并打印成册，得到林可胜教授的鼓励。在此调查报告基础上，父亲撰写的相关论文刊登在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期刊*Science*（1943年98卷）上。

1940年8月父亲回到昆明西南联大教书，进行生理生化实验研究，培养研究生。

在《李约瑟游记》80页有一段话：“有一个由精力过人的沈同博士领导下的营养学实验室，他们刚发现了一种特别丰富的维生素C的新来源，也许是已知最丰富的宣檄（也译作：余甘），它常常被描述为中国橄榄，但实际是大戟属植物。”

利用这一颗颗余甘，父亲的实验室成功试制了能够被人体吸收利用的维生素C的制剂。父亲在1944年5月14日给商徒生教授的信写道：“这一学期在我的土实验室里，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维生素C的研究，最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余甘生产维生素C制剂了。”

父亲在他的《追求真理，乐于教学》一文中对西南联大时的工作情形做过描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南区的实验室是泥地面、土墙和洋铁皮屋顶。物质条件艰



沈同在西南联大

苦，还时有日机来袭的警报。尽管如此，凭着青年人的求知热忱，我们不但做了许多工作，还得到了热忱的外来资助。例如，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博士曾了解我们的研究课题，及时提供文献资料和实验药品等；又如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许多师友，集资购置各类结晶维生素，装成一木箱，登报征求来华医生带来，并寄来热忱鼓励的签名信。我们这个土实验室吸引了来自浙江大学物理系、化学系的毕业生，以及华中大学和西南联大化学系的同学。……我们在40年代完成了多篇营养、生理、生化方面的论文，均发表在英、美的某些学术期刊上。”

父亲将1940年12月康奈尔师友捐赠维生素的签名信一直珍藏着，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同：

我们想告诉你在圣诞节来临之际，你在康奈尔的很多朋友都非常想念你并希望你的工作马到成功。虽然在你的信里对你自己取得的成绩只是轻描淡写，但是我们都知道你是在为改善你们国家人民的营养状况和健康状况而在努力工作着。我们准备寄给你一些浓缩维生素以帮助你的研究工作。就大量的需求而言，虽然这点维生

素微不足道，但是一想到有可能因为这点维生素而拯救几条生命，特别是有可能对你的工作是一种鼓舞的时候，我们因此都会很高兴。这么想来让我们在圣诞节期间看到了些许的光明，否则就只有战火纷飞给世界带来的黑暗了。我们经常想起你。送去我们诚挚的问候及新一年最好的祝福。

领衔签名的就是父亲的导师梅乃德教授（L. A. Maynard）夫妇、还有S. A. Asdell教授夫妇、C. M. McCay教授夫妇、商徒生教授夫妇等四十几位康奈尔的师生及在康奈尔的所有中国学生。

在康奈尔大学 Olin 图书馆保存的资料中，关于康奈尔师生赠送实验用维生素的相关报道是这样说的：“购买维生素晶体的经费源于由中国学生、研究生和营养系教职员发起的筹款基金。这批维生素晶体会被送往沈同博士的实验室。”

另一篇关于捐赠中国的维生素已安全抵达的报道中说：“这是1940年12月送给沈博士的圣诞礼物，可以放2磅糖果大小的盒子，内装的维生素足够16人一年试验之用。一个两盎司瓶装的维生素可满足一个男性一年的需要。

这个包裹是通过在纽约的中国人救援机构转递的，来自昆明清华大学的感谢信的日期是1942年3月3日。”

有一篇更加详细的报道说：“1940年为帮助39级博士沈同在中国昆明清华大学进行的改善军人营养的研究工作，送给他的圣诞礼物，维生素晶体包裹辗转滇缅公路，现在终于送到昆明。”

报道中还特别转载了1942年3月3日沈同在收到礼物后给动物营养教授克莱夫·麦凯先生（C.M.McCay）发来的感谢信：

在中国红十字会工作的Basil Wang的

热心帮助下，我收到了装有维生素晶体的包裹，包裹完好无缺。王大夫是我在红十字会工作期间结识的朋友，他是一名在英国培训过的外科大夫。他是沿着滇缅公路把包裹带到昆明的。听说护送他的一辆卡车在路上不幸遇到车祸，卡车完全报废了。

我迫不及待要告诉你当我终于收到来自康奈尔的礼物时我是多么高兴。几个月来我一直盼着，可惜的是在去年夏天去贵阳的时候没有收到，我原想带上这些维生素解决战士们因饮食不当引起的痼疾，这件事我在去年夏天在给梅乃德教授的信中提及过。现在我终于收到了这些维生素，另外还高兴地发现这些维生素结晶里除了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外还有许多B族维生素，这对研究中国军队营养问题特别重要。在包裹到达之前收到的关于维生素的刊物也非常有用。

对我来说，这包维生素对我的工作不仅帮助很大、是实质性的鼓励，而且也表达了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和同情。邪恶的日本侵略者是不可能占领中国的！

父亲沈同1911年出生于江苏吴江，那里既是鱼米之乡又得风气之先。父亲7岁时我的祖父故世。但是祖父对父亲的熏陶却极为深远。祖父沈叔明，辛亥革命时改名沈天民。他是有革新思想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生致力于家乡教育事业，热衷新潮办学，在民国初期创办吴江第一所小学，任校长，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祖父在课堂上讲戚继光的爱国故事给父亲留下很深的印象。父亲4岁起就跟着祖父母学写大字和作文，6岁那年在一次家长会上当场研墨，提笔写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八个大字。祖父有许多藏书，包括经史子集和教育方面的书籍，也手抄



1946年，沈同（中）随清华大学复员回北京，任清华大学教授，次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复校，兼任协和生物化学系系主任，并在北京农学院讲授生物化学和营养学

了许多书籍。晚上常有人提了灯笼来祖父书室读夜书。祖父故世后，父亲常自学祖父遗留的书籍。

父亲二十岁在清华园读书时曾在自己少年照片上题书言志：“……愿今后：拓吾心胸，健吾体魄，庶几学术素志得所伸。”

父亲赴康奈尔大学留学就是要实现自己的学术素志，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但是在面临责任的担当还是个人的发展这一抉择时，他毅然选择了前者。他要用他的所学报效祖国而且义无反顾。回国后他又是根据需要，毅然决然奔赴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在西南联大时期，物质条件如此艰苦，父亲和他所在的实验室不但做出了让国际学术界瞩目的工作，还为培养中国自己的研究生尽心尽力。

父亲像他那一代的多数老知识分子一样，深受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得到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滋养。他们是站在中西文化交汇点的一代人。父亲既受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传统思想

的影响，而又兼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达观态度；在融汇了西方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创新意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和人性平等博爱的观念以后，他的眼界更高，心胸更加开阔。

父亲对我们子女从来没有说教，而是循循善诱，春风化雨般的滋润。在以往我们看到的父亲留下的文字中，他对自己的经历总是简洁的几笔，点到而已。阅读康奈尔图书馆珍藏的一篇篇史料，使青年时代的父亲鲜活立体起来，一篇篇史料折射

出父亲的爱国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感。在整理史料过程中，我一遍遍地被感动。

我们由衷感谢商徒生教授夫妇和他们的女儿爱丽丝整理珍藏我父亲沈同的资料，特别感谢康奈尔大学图书馆对存档资料的专业细致的管理。他们对友谊的珍重，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他们对创造历史的人的尊重，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们期待着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前往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继续品读历史，品读父亲的人生。

## 一封无法投递的信，写给杨绛姐

○吴学昭

杨绛姐：您好！

时光飞驰，不觉您已走了四年了，您和钱先生、钱瑗都挺好吧，非常想念。

一直想给您写信，汇报一下我们对您遗物处理的情况，苦于没有邮址，无法投寄。谨试借您一向喜读的《笔会》的一角刊出，但愿您能见着，也让关心您的读者得知一些信息。

在您浴火重生的第五天，也就是2016年6月1日，我和您的另一位遗嘱执行人周晓红，还有您母校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陈旭（她真不愧您所称的“知心娘家人”，各方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派来的两位精力充沛的年轻助手：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池净和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的刘立新，进驻您南沙沟的寓所，按照您的嘱咐，清点处理您的遗物。这以前，自您2016年元月底住院，家里一切都由阿姨小吴夫妇在料理。

我们从小吴那里接收了您的存折、存单，按您的遗嘱悉数捐赠给了清华大学教



杨绛（右）与“好读书”获奖学生谈钱先生批注的大辞典

育基金会“好读书奖学金”基金。其后所收单位发给的丧葬费、抚恤费等，也一并捐赠“好读书奖学金”基金。

考虑到您家三十年不曾装修，门窗老旧，珍贵文物留置无人看守的家中，安全没有保障，我们尽量抓紧时间，加快清点处理，有时一天工作十二小时。幸得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二部和清华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同志的积极配合，不辞辛劳，与我



钱锺书、杨绛夫妇在家中

们一起挑灯夜战，及时将被清点过的珍贵文物和重要的书籍、文稿、资料，接连运送回馆，保证了对您所捐赠遗物的妥善收藏。

您于2014年8月已当面交付国家博物馆一批家藏的名人字画、册页、遗墨、手迹、碑帖等珍贵文物。据国家博物馆邀请的专家们鉴定，您所捐赠的这批文物，如张之洞手书的诗稿等，刘鹗、钱基博题跋的《大观帖》，清末学者邹安跋的《急就章》拓片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及艺术价值。国家博物馆这次收藏的珍贵文物有：你们使用的印章；你们读过的书籍，常用的汉语及英、法、德、意、西等语种的字典、辞典，包括那部长达2662页、满布钱先生批注的韦氏第三版《国际英语大辞典》；您的作品手稿，包括您在“文革”中失而复得的《堂吉诃德》中译文手稿；你们的读书笔记、记事本、零墨散笺、诗词手迹；你们所获得的奖章、证书，从西班牙国王颁发给您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到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颁发给钱先生的奖牌；你们珍存的父辈纪念书物，钱基博老先生的《复堂师友书札精华》，杨荫杭老先生

1909年留学美国宾州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证，以及先辈的行状墓铭、文献笺疏、函札手稿等等。

此外，国家博物馆还收藏了不少你们的相片、衣物、文具、生活用品和各种证件，或许备于今后得以展示你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钱先生常穿的蓝色中式外衣，棕色中式棉袄；您为钱先生亲手编织的毛衣，曾被钱先生称为“慈母手中线”而舍不得捐出者；您爱穿并亲手缝补的蓝格衬衫；您常站在五斗橱前，为亲友通关起封的那副牙牌；钱先生的眼镜，用过的纸墨笔砚，图章印泥；您的针线盒、笔袋、老花镜、放大镜；您为钱先生理发用的剪刀、推子……还有你们的名片，以及从居民身份证、选民证、干部退休证、老年优待证、南沙沟小区出入证，直到居民死亡证等各种证件。你们的粮食供应证本里，夹有你们在国家困难时期节省剩余的粮票、面票、米票。

以上诸件，统装入你们1938年从巴黎带回的那只欧式老旧木箱中，由国博同志一并运送回馆收藏。他们叹说：这些遗物，看似普通，但意义非凡。我们在帮助收拾你们的这些遗物时，联想起它们背后的种种故事，也常常思绪万千，不胜感慨。

记得您说过：“钱锺书因没有一个藏书的家，所以往往把读完的书随手送人。书室内留下的，是舍不得送，或还没有送，或还未读完的。有的书上留有钱锺书的批语，或铅笔划痕。有用得破烂的字典辞典，多半上有添补。有部分是我的，有部分是钱瑗的。”实际家中存书亦尚有上千册之多，我们除将其上有钱先生批语的部分书籍交清华档案馆保藏外，其余的全部交给了您的“最爱”——清华图书馆收藏。

捐赠清华档案馆的，除了您生前指定的珍贵文物，还有您的许多部作品手稿、改稿；钱先生的旧作修订本；你们的旧作校改本、复印件；所收存的中外文学评论及各种有关报刊、文学资料；所留存的全部相册及照片；您未及或不舍毁弃的友人来书和众多读者来信，包括石阳小朋友和他的几个同学送您的一本他们自制的小书，还有赵再斯小朋友为您画的那张您喜欢的“会笑的猫”……

您起居室的所有家具，包括大小书桌上的文具，书橱上的照像、摆件，全部交由清华图书馆同志拉回。他们假老图书馆的一室，按照原来式样恢复摆设，就像你们的书房兼客厅完完整整地搬到了清华。您的日本小友、《我们仨》的日译者樱庭弓子女士，2018年访问清华，踏入该室，蓦地感觉似到了您南沙沟的家，心上酸楚。

您卧室的家具亦由清华拉回处置。电器等居家用具赠与小吴夫妇使用。

您在起居室大书桌的中间抽屉里，留给我许多小纸条（大概是您住院前不久，随时想起写下的），我读后均已照办。您贴有标记的所收贵重礼品，如吴仪同志为您祝寿的心形玉石，温家宝同志送您的象征“我们仨”的三株小榕树盆景，铁凝送的燕窝，李文俊、张佩芬送的小玉佛手等，我们都一一退还。陈希同志送您的那只玻璃猪，您很喜欢，称之为“聪明猪”的，您生前已自己送还了。您所拟赠友人《杨绛文集》，我们已全部送达。您让退回的通数较多的友人来书，本地的，我们派人登门奉还；外地的，交快递送达。有的附上一两件您使用过的旧物，如一支发箍、一方丝巾、一杆毛笔、一把小剪子等，留作纪念。周毅希望得到您晚年进餐



钱锺书读字典和旧笔记

使用的饭巾（围嘴），我们就将您常用的那方深红色饭巾洗净熨平，附上您围此饭巾进餐的照片，寄给了她。

我们清理遗物期间，有您至亲好友登楼来访，我们都由他们自己择取一些衣物，留为纪念。出版社所送样书，留给清华图书馆一两套，其余全部捐赠贫困地区的学校、图书馆。

附带提一下，我们的清理工作虽然紧张，也不乏乐趣。我们偶发现钱先生飞舞在小纸片上的明港（干校）打油诗：“平伯世昌与何生，赛梦红楼作主人，挤挤一堂三宝玉，不知谁贾谁复甄……”不禁大乐赞赏。您的字本已娟秀工整，可您总嫌自己字丑。清理中喜见您长年累月积攒的一摞摞日习毛笔书写的的大字，钱先生加评的红色单圈、双圈或杠杠。又见钱瑗1981年9月23日写于片纸上的数语：

上午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送来《围城》样书。中午吃饭时，Pop说，一有人来，“功课”没来得及做，下午得补。Mom说那你今天就不做算了。Pop说：不行，我的学问就是从做功课中来。（钱瑗注：“功课”指练字，看自己的旧笔记，看新书，看字典，etc.）Pop说，现在每天看几页旧笔记（瑗注：一天中文，一天外文）。联系新看到的东西，常有所新发

## □ 名师轶事

现。这就能保持自己不断有所进步。

读到这些，我们怎能不感受教益。

您留给我的钱先生《管锥编》原稿中的一节：《全上古三代文》卷一〇宋玉《高唐赋》，即上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管锥编》责任编辑周振甫审阅时，“恐滋物议”，命钱先生删去者；而钱先生“以所考论颇能穷源发覆，未忍抛掷，录存备万一他年拾遗补缺焉”。我已将钱先生手稿复印交三联书店有关负责同志，请在《管锥编》再版时，补入此一节文。

您留赠我的那九册由钱先生精心遴选、您工楷抄写的《全唐诗录》，所选305位众所周知的诗坛大家和向颇少见的小众诗人的诗作共1863首，体现了钱先生对唐代诗歌的精深研究、独特的鉴赏眼光和选诗标准。我对出版钱先生此部巨作的建议，曾得您首肯，故于2017年郑重托付您也熟识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同志董理，组织该社古典文学编辑部的力量认真考订整理编辑出版。近闻经过他们三年努力，这部具有无上价值的大书，可能于年内面世。相信你们听到这个消息也会感到高兴。

清理工作结束，我们与中国国家博物



2001年夏，杨绛学长在清华度过她的91岁生日。摄于清华图书馆

馆和清华大学经过友好协商，分别签订了捐赠协议，根据您的旨意，就所捐赠遗物的保管、使用等项作了周详约定。

您寓所各室腾空后，我和晓红致函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领导，拟将你们所遗房屋按当年以成本价购进的原价退回国管局，所得款项捐赠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好读书奖学金”基金。没想到国管局领导的回复竟是：感佩杨绛先生高风亮节、无私奉献的崇高品格，愿尽最大努力支持杨绛先生的公益善举，准许出售杨绛先生名下住房，所得款项全部捐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好读书奖学金”基金。我们十分感激国管局领导为支持善举作出的破例准许，遂将此事委托清华全权办理。

你们虽已先后离去，作品仍长销不衰。“好读书奖学金”基金总数金额，现为人民币6618万元；自2001年“好读书奖学金”设立以来，受奖学生1446名。我们曾与陈旭书记相商，希望“好读书奖学金”更多向家境清寒的好读书子弟倾斜，得到她的支持，决定今后除在本校更多向家境清寒的子弟倾斜外，也向清华对口支援的青海大学的家境清寒、好读书的学生颁发奖学金。

您走后这些年，陆续有单位和个人来要求授权改编钱先生的《围城》，拍摄电影、电视剧，创作连环漫画等；也有要求改编您的《洗澡》《洗澡之后》的。我们均以你们二位所留遗言相告：“钱锺书、杨绛作品（翻译作品除外）除已改编为影视作品或已授权改编者外，今后不再授权改编成影视作品或其他艺术形式。”婉辞谢绝授权。

最后，祝你们在天上一切顺心如意！  
2020年5月

# 清华水利三教授

○徐家鑫（1958届水利）



1998年校庆日，张光斗先生（中）与水利系1958届校友在一起

我1953—1958年在清华水利系学习，毕业后一直在江西省水利、电力部门工作。我这里回忆的清华水利系的三位教授是张光斗教授、黄万里教授和施嘉炀教授。我在写本文初稿时张教授以“水利泰斗”之尊尚健在，而如今三位老师均已作古多年，但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我的脑际。

三位教授在清华很有知名度，也很有代表性，他们纵向可以构成一幅历史的长篇，横向又可以组成一幅时代的画卷，因此回忆起来很有意思，也很有教益。需要说明的是我不是他们的“入室弟子”，师生之谊也不深，他们当年也未必记得我这个学生，毕业后仅偶有接触，我只是远距离地观察并记录下对他们一鳞半爪的印象，未必恰当。

——  
张先生是清华大学著名的教授之一，后又是两院院士。我们班的“水工结构”

课不是由他亲授，作为水工教研组长，他偶尔来看看，指导一下课程设计。有一次他说到，他作为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工程师设计四川桃花溪水电站，因抗战时期钢材水泥缺乏而犯愁时，一位四川老石工硬是凭精湛的技艺，从岩石里给他“雕”出一只发电尾水管，并以此来为“卑贱者最聪明”作佐证。

张先生的优势在于他做教师之前已有丰富的工程经验，他从一位同学设计的混凝土构件的“含钢率”中能看出结构设计出了差错，并且风趣地对那位同学说：“你如果没有错，我让你师母烧一只老母鸡来请你吃。”

1958年“大跃进”，清华数水利系最风光，水利系又数张先生更风光。我们毕业班的师生在北京密云水库“真刀真枪”做毕业设计，确实名噪一时，连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后，深夜还要来看看我们的成果。我们这些莘莘学子都想一展身手，方案比较，应有尽有，纵横捭阖，洋洋洒洒，真是好不热闹。但是学生们毕竟理论热情有余，实践经验不足，收摊子吃苦的还是那帮年轻的助教，最苦的当属我们的张先生。如今还能看到一张当年的照片，毛主席在沙盘前听取密云水库的汇报，张先生隔着两个人跻身在侧，用全部注意力注视着领袖的面部表情。想比当年那些被“拔白旗”没完没了，诚惶诚恐写检查而不能过关的众多教授们而言，好多人都十分羡慕张先生的境遇呢！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有机会与张先生邂逅于一些全国性学术会议场所。在这些场合，张先生的出席是礼仪性的，一般坐在台下前排不会讲话，因为他是水利界的泰斗，同他搭讪的人自然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我有时会感到一点尴尬，张先生年事已高，不会全记得我们这些学生，我若前去声称“我是您的学生”，这似有几分“攀附”，若不前去问候一声又有失对老师的尊敬。有一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大坝会议上，我问候他：“张先生身体可好？”不想他回答说：“不好！”并摇了摇头紧接着说：“很不好！”我只好说了一声：“还得多多加保重！”后退出。

2002年春，我应邀回清华参加水利系建系50周年庆祝活动，这次活动的真正高潮是为张先生庆祝90华诞，宋健、钱正英等领导都来了，水利部、电力部、科学院、工程院、学校也来了不少人，济济一堂。张先生未写讲稿，即席作了答词，讲得不长不短，内容和遣词也很得体。祝寿会送给与会者每人一本张先生写的《我的人生之路》，这本自传56万字，据说是张先生用了三年时间亲自在计算机键盘上“敲”出来的。张先生是许多重大水利水电项目的亲历者与见证人，因此张先生的人生之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我国水利水电事业发展之路。看了张先生的书才知道他在“文革”中也吃了不少苦头，被扣了不少帽子，这真可以说“彼此、彼此”了。

2003年，渭河水灾，罪魁祸首自然是三门峡工程。我们都知道，他当年是支持这一工程的，处于他的地位，这本无可非议，但此时 he 带头问责，说了一些话，在网上则遭来一些微词。

张先生这一生不容易，人生只有一次，中国知识分子又一向有“治平”的抱负，谁都想干一番事业，显一番身手，跟一点“形势”，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谈到政治方面，学者们终究是“外行”。

不管怎么说，张先生一生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即使年老体衰，也矢志不渝，奔走于全国水利水电工地指导工作，我们做学生的应好好学习他这种精神。

## 二

黄万里教授是水利系学生最喜爱的教授之一。他有时穿一套白色西装，皮鞋擦得锃亮，体型硕大，仪表堂堂，睿智幽默，讲课生动。听他讲“水文学”，不仅是一种学业上的传授，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所以我们都愿意争坐到教室的前面，以便更清晰地一睹他的风采。他说一个水利工程师当看到一条河流时，要能估出它的流量，这是一项基本功。日后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在练这个基本功，但的确很难。他说到他在年轻时，在南美看到世界第一大河——亚马孙河，当时流量在每秒20万立方米以上，那种浩浩荡荡的壮观场面，抑制不住兴奋心情，几十年后在课堂上竟举着双手用英文高呼“A-ma-zon！”他的这份赤诚和率真，在经过“洗脑”后的清华教师队伍中已不多见。

1957年5月，黄先生在《新清华》上先后发表小说体文章《花丛小语》和它的续篇。在这两篇文章中，他创造了两个名词，并在整风中为大家所习用，这就是“歌德派”“但丁派”。我欣赏这两篇大作，一是他的文采，二是敢于说真话。文章传到主席那里，很不高兴。因此，这两篇文章让黄先生成为钦定右派。据说有一



黄万里先生（中）与学生马力（左）、张玉美次主席见到黄先生之父——黄炎培老先生，对他说：“你们家中也分左、中、右啊！”黄老先生是毛的前辈，又是前清举人，我们可以想象到黄老先生当时的尴尬。其实主席生气的还不止是这两篇小文章，此前在讨论黄河三门峡工程能否根治黄河水患时，黄力排众议投了反对票。黄先生从“水沙平衡”和“水流具有一定的挟沙能力”出发，认为黄河不可能清，黄河真的清了是祸而不是福。三门峡工程的后果不幸为黄先生所言中，水利工程变成“水害工程”，这已是后话。据说学校向他宣布划为右派分子决定时，他掷地有声地回答：“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我最敬佩的是黄先生虽然沦为“阶下囚”，但忧国忧民之心不变。他担心三峡工程成为第二个三门峡，担心长江的大量“推移质”毁了三峡。他三番五次积极进言，对三峡工程提出异议，这种精神是极为难能可贵的。

我工作生活在长江之滨，对沿江千百万百姓“命悬一线（堤线）”感同身受。在江西省省长办公会召集我们谈三峡时，我是赞成三峡工程的，对黄先生的意见不敢苟同。我也请教了他的几位搞泥沙

研究的学生，认为模型试验与计算机计算的成果并不完全支持黄先生的意见，但是对推移质泥沙的研究远不成熟，黄先生的忧心有可取的一面。国家在三峡工程尚未完建，立即决定在上游金沙江上修建一系列的梯级电站，不仅是电力的需求，实际上也是以此来分担推移质对三峡水库的压力。

三峡工程顾问潘家铮院士曾说，对三峡工程提出质疑乃至反对的同志，同样对三峡工程做出了贡献。我认为此言不虚。

黄先生在他沉疴不起之时，给他的学生沈英、赖敏儿写的最后遗言，说的还是“治水四策”，真可谓呕心沥血，至死不渝。治水之策可以有各家之言，也在随着科技进步不断发展，但黄教授的这颗心是和我们治水的老祖宗——大禹、李冰、范仲淹、潘季驯、李仪祉一脉相承的。

### 三

施嘉炀教授没有给我们亲授过课，但是给同学们的印象依然很深。我记得在学校时，他白皙的面庞上架一副金丝眼镜，以自行车代步，一副潇洒的学者气派。施教授早年小学毕业后由福建省选送清华，以“庚款”留学美国，他充分利用在美五年时间学习多个工科专业，先后获得三个专业的四个学位，乃至飞行员的资质，以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他是清华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时年35岁。

1952年清华改为“多科性工业大学”，施教授正好可以施展抱负，不知为何仅担任个“水文水能教研组组长”，连个系主任也摊不上，同学们为此不太理解。施教授不像清华的名教授如钱伟长、梁思成那样显眼，他温文尔雅，从不张扬，更增加

## □ 名师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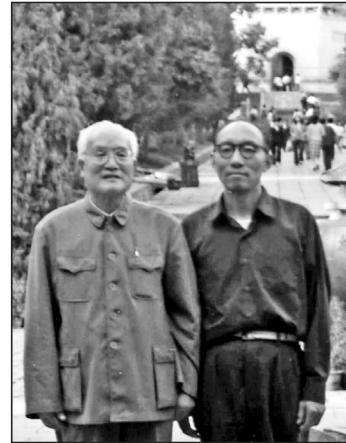
了同学们对他的几分敬重。

我与施老师有较多的接触还是在1983年之后，那离我从清华毕业已经20多年了。此时施老师担任中国水力发电学会会长，我正在筹备江西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写信给施老请求得到他的支持，施老积极回信表达支持我们的努力。水利界的同志，包括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有一种“大水利”的思想，他们认为“水利”已涵盖了“水电”，成立水电学会有点多余，因此水电学会的工作是有点难度的。施老是学会的会长、名誉会长，在学会已成为一种团结的象征，他无为而治，不动声色，水电界的大腕人物，如李锐、李鹗鼎、张铁铮、潘家铮、罗西北、崔军等，无不对他十分敬重。

我体会无论在学术或对人处事，施老总是高境界、低姿态，一切坦然处之。据我所知，施老是把苏联的比较单纯的“水能利用”学科发展成符合我国国情的“水资源多目标综合利用”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也是较早地全面论述了水电站的梯级滚动开发所带来的国民经济效益。在纯抽水蓄能电站刚起步时，他划清了一些非议，及时阐明了这种电站在电力系统中的独特作用，为纯抽水蓄能电站在我国的发展扫清道路。施老在学术上厚积薄发、大象无形，他从不以权威自居，在工科教育方面的贡献也是有口皆碑，真可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在和施老的交往中，不免会谈到昔日清华的一些人与事，施老大多是一笑置之，表现了一位宽容的长者襟怀。

施老说他走遍了全国的很多省份，唯独没有来过江西，说江西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看看的。施老的夫人则说因为她是清



教授（左）游览南京灵谷寺  
一九八八年作者陪同施嘉炀

华的校医，“文革”时期随“五七”大军来到江西鲤鱼洲，现在清华人“谈鲤色变”，因为那个“小虫”（血吸虫）比老虎还厉害，至今清华还有不少人在享受“血防津贴”呢。施师母虽然平静地说起这件事，我这个“进口老表”还是感到十分自惭，好像把清华师生弄到这个连劳改犯都呆不下去的地方，我要负责似的，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这时，施老赶紧给我救场，对他夫人说：“你在江西呆了几天？人家在江西呆了一辈子才不容易呢！”我缓过气来见机说：“这样更要请你们二老来看看我们江西的新气象、新面貌。”很遗憾，因为施老工作与身体方面的原因，我这个邀请一直未能兑现，直至他去世。

斗转星移，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三位师长都是留学美国的饱学之士，回国后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为国家、为教育、为清华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从上个世纪下半叶起，境遇却很不一样，我也从这些“不一样”中悟出了一些道理。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此言我信。

2019年11月定稿



# 幸运在西南联大，遗憾也在西南联大

○郑 敏（口述）

王晶晶（采访整理）

郑敏，唯一健在的九叶派诗人。1920年生于北京。1943年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后赴美国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55年回国。1981年，《九叶集》出版，九叶诗派由此得名。文学评论家公认，九叶诗人在用诗歌表现重大社会问题的同时，又兼顾抒写个人心绪的自由，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剖析，比以前任何的中国现代诗歌流派都更尖锐。

郑敏的家在清华荷清苑一个僻静的单元楼里，客厅很大，堆满了大大小小的油画作品。“都是我女儿画的，她在艺术上很有天赋。”郑敏说道。95岁的她，身着红袄，留长发，全披散在脑后，如同一个时髦的艺术家。

## 两个女孩结伴到昆明

我本姓王，我家在福州算是大家族，我的祖父王又点是前清颇有名气的词人。1岁多时，我生了一场大病，差点死掉。好了之后，就被过继给姨妈。她成了我的养母，我的养父姓郑，也是我亲生父亲赴法留学时的同学兼好友。姨妈没有生育，我于是成了郑家唯一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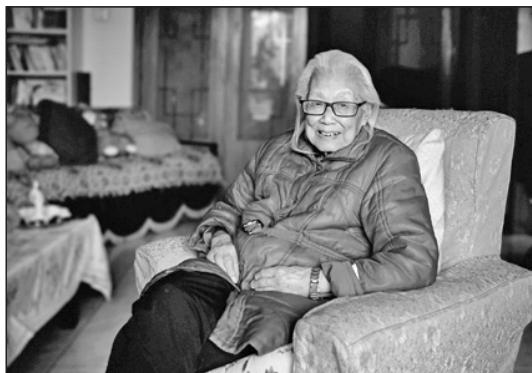
养父回国后在煤矿上当工程师，我们家住矿区，周围都是贫苦农村，教育很差，但养父以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最开明的思想抚育我，因此我的童年和少年极少封建色彩。我现在身体这么好，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他。我记得小小年纪，他就要求我每天爬山、游泳，告

诉我不能做“东亚病夫”“旧式小姐”。

10岁那年夏天，我跟养母回北京住，才进了学堂。虽然是新式小学，但老师也像旧私塾那样打手板，对孩子们体罚，我成绩又不好，看见老师打人就害怕，实在不想上学。父母于是把我转去读教会小学，慢慢地成绩好起来。所以来我有了孩子，从来不体罚。

1937年抗战爆发时，我念高一。当时我家已经搬到南京，一家人先去了庐山避难，过完暑假，又坐船到了重庆，在重庆我继续读书。高三毕业，考上了西南联大。

去西南联大的那一段旅程，我一辈子都记得。因为是战时，大人没法送我。父亲一位朋友的女儿也考上联大，我们就一起做伴，两个女孩，从重庆出发，经过贵州到昆明。记得夜里在贵州一座很高的山上，司机突然就停下车，站在车外，欣赏起风景来。我们一路颠簸，偶尔还会停



2015年5月15日，郑敏在北京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

## □ 人物剪影

靠在荒郊野岭的阴森小客店，走了很长时  
间，终于到了昆明。

### 冯至是被忽视的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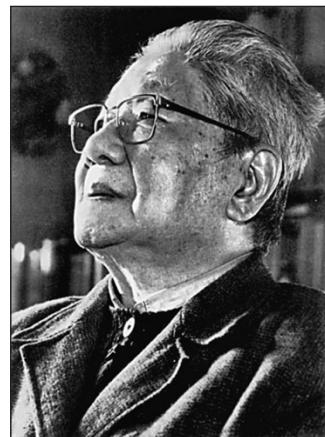
西南联大的生活，现在想一想，真是  
幸运，但也觉得真遗憾。那么多大师、那  
么多社团，学术空气那么活跃，我却算不  
上太活跃的人，因为不想卷入政治，总是  
与风云人物保持距离，看得多，做得少，  
独来独往。大好年华，都被我辜负了。

我上的是哲学系。因为那时候思想方  
面的东西很热门，大家都希望用思想来救  
中国。引我走上诗歌这条路的，是冯至老  
师。当时联大学生大一大二都要学外语，  
哲学系的学生按规定得学德语，他就是我  
们的德语老师。我记得还选修了他的一门  
讲歌德的课，他讲得非常有感情。他翻译的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  
封信》，在联大很火，学生们都在传阅。

那时冯先生刚步入中年，胖胖的，总  
穿一身长衫，拿着手杖，走起来却大步流星，  
像个年轻人。他在课堂上的言谈更是  
充满了未入世的青年人的气质。他总是笑  
容可掬，但没有和学生聊天的习惯，很少  
闲谈。我好像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句玩笑  
话；他的文章也是这样，没有一句是随随便  
便的，都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大三的某一天，课上完了，我鼓起勇  
气追上冯老师，把我写的诗给他看，大概  
有十多首，用一个小本子订着。第二天一下  
课，他就把我叫出来，把诗稿还给我，  
说：“写诗的路是很长很寂寞的，你这里  
有诗！”我心想：既然他说我写的算诗，  
那我就坚持吧。

冯至老师是先学哲学，后来去德国学  
文学。我也是先念哲学，后来对文学感兴



冯至晚年照片

趣。冯先生的《十四行集》出来时，我简  
直顶礼膜拜，它也影响了我以后的诗风：  
不要纯抒情，而是带着智慧与思考。

那时候日本飞机时不时来捣乱，我们  
就会出去“跑警报”，有时学生们会去教  
授家。我记得某天去的是冯先生在钱局街  
的寓所，但那天和先生讲了什么，现在已  
经都记不清了。

对冯至先生，我充满了感激，我认为  
他至今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他的十四行  
诗虽然很受尊重，但真正理解起来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诗歌融合了西方古  
典哲学和中国古代文人，尤其是杜甫的情  
操，说是独步诗坛也不为过。但中国一般的  
文学爱好者，更喜欢令人激动的、浪漫  
主义的诗歌作品，他的诗歌便被忽视了。

### 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有几门课，我到  
现在都有印象。比如，冯友兰先生的“人  
生哲学”、郑昕先生的“康德”、汤用彤  
先生的“魏晋玄学”，还有冯文潜先生  
(冯至先生的叔叔)的“西洋哲学史”。

联大对学生的管理很自由，没有人去

查到、管纪律，大家反而上课积极。每个系都有名教授，教授们都重创新，以讲自己的教材为荣，用现成的教科书则是不光彩的事。名师的课总是很受学生欢迎，教室里站不下，学生们就都挤在窗边听。

闻一多先生的课我旁听过，到底是“楚辞”还是“唐诗”，我已不记得了。他一边叼着烟斗，一边讲课，黑板上一个字也不写。但他讲得非常入神，绝对是用自己的方法去解释那些古文。我当时有个感觉，不管是多难、多古怪的东西，好像都能被他解出来，而且，不是引经据典的，完全都是自己的见解。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我也去听过。我觉得他的小说写得真好，那种湘西的气息非常独特。他特别爱写板书，讲每句话、每个字都有逻辑，只要记录下来，就会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但他的口音实在太重了，很多话我都听不懂，所以收获有限。

我留学回国后，还见过沈先生。当时是同学袁可嘉请我吃饭，和先生巧遇。席间沈先生还问：你们记得有个写诗的郑敏，现在去哪里了？我心中窃笑：就是我啊。

联大的教授，每个人都是自成一家的风格。汤用彤先生给我们讲“魏晋玄学”，他长得矮矮的，还光头，但给大班上课时嗓门特别大。我喜欢他的课，那种道家的境界、魏晋玄学的潇洒，对我影响深极了。我一直对老庄的东西非常赏识，到现在也经常会读一读，跟汤先生有关。

卞之琳老师的新诗我从大一就开始读，在冯至先生家也见到过他。他成名早，是真正的青年才俊，总是西装革履，戴着金丝边的眼镜，充满了浪漫气质。

最有意思的是冯友兰先生和金岳霖先生。冯先生留着长髯，穿着长袍，开过一门课，叫做“人生哲学”。课讲到最后是讲境界，说人生有4个境界，最低的是“自然境界”，为了过日子而过日子，什么都不想；往上是“功利境界”，开始懂得为自己打算；再往上是“道德境界”，心里面有了他人，是贤人；最高境界叫“天地境界”，这种人心目中有宇宙大爱，是圣人。

金岳霖先生给大家讲逻辑，当时他刚从美国回到昆明，比较轰动，因为他穿得很时髦，不只是西装衬衫，还穿夹克、风衣、戴墨镜，跟周围人都不一样，他的身材又高，看上去真“酷”。

有一天，冯友兰先生要给我们上课，他走在前面，我和一位同学正好跟在后面，都往教室赶。垂直的另一条小路上，看到了把外衣搭在肩上，戴着墨镜的金岳霖先生。只听金老师问：“芝生（冯友兰的字），到什么境界了？”冯老师回答：“到天地境界了。”两位教授大笑，擦身而过。

我经常回想，也许正是在西南联大那样自由、充实的氛围中，接触到冯先生关于“天地境界”的想法，才让我的思想得到了升华。后来到美国留学，我待的地方一度流行麦卡锡主义，仇视华人、留学生。我的学业断断续续，最终就是靠着这些信念熬过了艰难岁月，坚持读完了硕士，拿到了学位。

我觉得西南联大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每个教授跟他所研究的东西是融为一体的，好像他的生命就是他所思考的问题的化身。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的思想，无论什么时候都在思考。这对我的熏陶极深，

## □ 人物剪影

但是这种精神，我以后在任何学校、任何环境中都找不到了。

郑敏最早的一部作品集叫做《诗集：1942—1947》，里面的很多诗，都酝酿于西南联大时期。昆明的石板路、石榴花，突然来又突然去的阵雨，给了她很多灵感。

当时西南联大的诗歌创作空气是非常浓厚的，冯至先生、闻一多先生、卞之琳先生……可以说，上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云集了中国新诗各阶段的主要诗人，并培养了穆旦、杜运燮、袁可嘉、郑敏等新生代。采访过程中，郑敏反复说，联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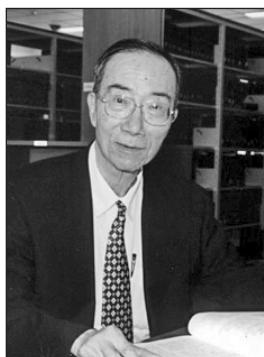
学生很自由，“如同野地里的花花草草一样，肆意地生长着。”

从西南联大，郑敏走向了她的诗歌人生。如今耄耋之年回望，那短短的4年，竟是她人生最大的转折。从西南联大毕业后留学美国，学成归国，在各种波折、劫难中踽踽独行，等到上世纪80年代以九叶派诗人的身份回归时，郑敏已年过花甲，还没怎么写，诗坛就又归于沉寂了。正如她所说，西南联大是她人生中最幸运的时光，也是最遗憾的所在。

（转自《环球人物》，2015年6月）

## 谢毓元：本然化成

○陈珂珂



谢毓元院士

谢毓元（1924—），药物化学家、有机化学家。祖籍江苏苏州，出生于北京。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学系后留校，1951年转入中科院有机化学所药物研究室（该室于1953年扩充建立为中科院药物研究所，以下简称药物所）。1956年被推荐留学苏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学研究所，从事四环素类化合物的合成研究，1961年取得副博士学位。1984年任药物所第三任所长，大力开展国际合作，推进新药研发及科研基本设施建设，打开了药物所发展的新局面。1988年卸任所长后，他又重新出山，主持“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筹建工作。

谢毓元在多个科研领域开展研究并取得重大成绩：在医用螯合剂领域，他的成就独树一帜，在国内外都处于领先地位；在天然产物化合领域，他是国内率先可以

他是官宦子弟，却饱尝了战乱流离之苦；

他酷爱文史，却选择一辈子与化学相关的瓶瓶罐罐打交道；

他一生多次更改研究方向，却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穷期本然，化为践履，谢毓元先生毕其一生，从青丝到华发，始终不忘科学报国之初心……

系统完成发现活性物质—阐明结构—进行全合成的化学家之一。

他参与的普鲁卡因合成于1965年获中科院推广奖；他首创的放射性核素<sup>239</sup>钚、<sup>234</sup>钍、<sup>95</sup>锝促排药物“喹胺酸”于1980年获国防技术重大成果奖三等奖；他主持的莲心碱与甘草查尔酮的研究作为药物所“中草药活性成分的研究——12种新有效成分的发现”的组成部分，于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他首创的放射性核素<sup>90</sup>锝促排药物“酰膦钙钠”，于1983年获中央卫生部甲级成果奖。1991年，谢毓元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 苦读不辍 结缘化学

1924年，谢毓元出生于北京。其父谢镜第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曾任交通部路政司要职，其母徐墨蕾是苏州豪门之后。因时局动荡，又因为人耿直难为新任上司所容，谢父于1928年携全家迁回苏州蒙葭巷生活。

谢毓元自幼熟读古文经典，文学造诣颇深，兼以孔夫子的忠恕之道为立身处事哲学，一辈子与人为善，不参与文人相轻，还和三哥谢毓寿一样酷爱阅读英文小说，就此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在中学和大学阶段使用英文原版教材学习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为避战乱，谢家先后避居洞庭东山、辗转上海租界，谢毓元先后就读于三所中学，他非常珍惜在烽火战乱与不断迁居中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习异常刻苦。谢父秉承实业救国思想，认为学文、法科，走仕途，会永久受人气，所以只准子女学理、工、医、农，将来靠“本事”吃饭。因此，在1940年6月从苏州中学毕业并考



谢毓元清华大学毕业证

入当时迁沪的私立东吴大学时，本来爱好文史的谢毓元选择了化学工程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了上海租界，东吴大学被迫停办，谢毓元无奈辍学4年之久。其间，他苦读不辍，打下了坚实的中英文基础，为日后书写论文、查阅外文文献、开展科研工作带来诸多便利，也为他以后为学者、为人师、为领导者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谢毓元辗转于南京求学，参加南京临时大学补习班，然而不久临时大学宣告取消。1946年5月西南联大结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分批北返重建，清华大学于1946年10月10日正式恢复教学。22岁的谢毓元以破釜沉舟之决心认真复习，于1946年考取清华大学，插班进入化学系二年级就读。

当时，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都是留学归国的，很多教授用英文授课，化学实验严格按照规范操作，用英文撰写报告，化学系有自己独立的图书馆与齐全的专业期刊，化学系学生一路经过严格的考试筛选，毕业率只有60%左右。在这种环境下，谢毓元刻苦勤奋，成绩一路领先，基

## □ 人物剪影

本功扎实，科研技能精湛，深得无机化学教授张青莲的信任与器重。1949年，谢毓元以化学系第一的成绩毕业，随后留校，先后任无机、有机分析助教。

### 无心插柳 意外突破

因个人兴趣，1951年2月，谢毓元离开了学习和工作近5年的清华大学，来到上海，成为当时挂靠在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下的药物研究室的一员，跟随赵承嘏先生从事中草药的提取及小分子化合物的合成工艺研究。当时，赵承嘏不断地在国内外招募合成化学、中药研究、药理研究和抗菌素研究这4个领域的人才，截至1953年正式成立之际，药物所人才储备已可开展化学学科和生物学科两方面的研究。

在建所之初，药物所主要任务是协助政府发展制药工业，协助企业解决技术问题，通过开展系统研究指导国内流行疾病的新特效药合成。1951—1956年，谢毓元在这里先后参与了常山叶中常山碱的提取及含量测定、普鲁卡因合成工艺改进、抗血吸虫病治疗药物的化学合成等多项研究工作，逐渐从一个药物研究的门外汉成长为可以独立开展工作的研究者，他也亲历了药物所从弱小到壮大的发展过程。

1951年，谢毓元采用简便的有效成分提取方法，出色地完成了常山叶中抗疟疾成分的提取及含量测定工作，最终发现常山叶中所含有效成分约占0.20%，是常山根所含有效成分的10倍，并建立起一套简单可行的常山叶中碱性物总含量的测定方法；次年，他又以曼陀罗及类似物为原料，选择能应用于工业生产的适当方法，制成医疗上必需的药品阿托品和后马托品，实现了这两种药品的国产化；1952—



1953年，谢毓元在上海武康路395号实验室做实验

1953年间，谢毓元作为主要参与人员，将法国制药厂先进经验本土化，成功完成普鲁卡因的两个重要原料——对硝基苯甲酸和二乙胺的合成工作，解决了普鲁卡因和青霉素普鲁卡因盐生产原料的自给问题。

1953年，作为主要参与人员之一，谢毓元参加了由嵇汝运先生负责的抗血吸虫病药物的设计及合成工作。嵇汝运很是放手，让作为组内大弟子的谢毓元充分发挥才能。在详细文献调研基础上，谢毓元带领组内几个成员合成了若干含巯基的抗血吸虫病化合物，其中有一个是二巯基丁二酸钠（又称二巯丁二钠），虽然最后二巯基丁二酸钠没有成为一个很好的血吸虫病治疗药物，但是无心插柳，二巯基丁二酸钠及其游离酸二巯基丁二酸却陆续被开发为享誉中外的广谱重金属解毒药物，不仅可以解锑毒，还可以解汞、砷（砒霜）、铅、铜等金属毒，并用于治疗铜代谢障碍引起的肝一豆状核变性疾病。

这次设计合成是谢毓元涉足医用螯合剂的开端，也为他十多年后从事另一项医用螯合剂的研究——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

研究打下了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 留学苏联 硕果累累

由于在药物所工作成绩突出，1956年，谢毓元获得留苏预备生的资格，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有机化学合成专业。

从1957年到1961年，谢毓元在位于莫斯科的苏联科学院天然有机化学研究所留学，师从苏联天然化合物化学领域的杰出科学家舍米亚金院士，开展四环素类化合物的合成研究。其间，谢毓元的学位论文

《去二甲胺基去氧四环素合成方法研究》对于从氧化蒽酮转向四环化合物的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是天然有机化学研究所抗生素实验室进行的四环素化学研究的重要部分，为1966年该实验室完成四环素全合成工作作出了贡献。

1961年春，谢毓元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副博士学位。他出色的工作也得到舍米亚金的高度评价：“他有一双幸福的手，别人合成不了的东西交给他做，总是能很好地完成。”

对于谢毓元来说，他在苏联期间的收



红场留影  
一九五八年，  
谢毓元在莫斯科

获，远不止一个副博士学位，更重要的是得到了如何做科研工作的完整训练，这正是他之前缺乏的。

1961年9月回到了阔别近5年的药物所之后，谢毓元凭借在苏联学习到的一套方法，在天然产物全合成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先后完成了莲心碱绝对构型的确证及全合成、甘草查尔酮的结构确定及全合成、灰黄霉素的全合成、放线酮类物质化学成分的研究、抗菌素C-4826的化学结构测定、补骨脂乙素的全合成等工作。

谢毓元几乎没有休息日，每天痴迷于他的研究。在甘草查尔酮结构鉴定中，他曾连续奋战36个小时，只为确定一个羟基的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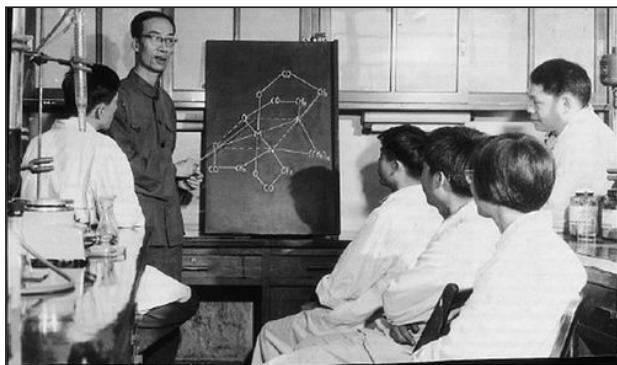
这些天然产物全合成是我国科研人员运用现代物理学、化学等技术，对我国传统中草药进行的系统研究，为探索新生物活性物质及原理提供了线索，对推动天然产物化学研究的系列性和完整性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天然产物全合成所取得的突破性研究成果，让谢毓元越发体会到文献调研的重要性。“我做任何工作都是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所有想要解决的问题都尽量从文献里面找到解决的方法。”谢毓元曾如此说。熟练运用英、德、俄、日四门外语进行文献调研，严格按照实验流程操作，锲而不舍地验证自己的创新想法，谢毓元对天然产物全合成研究饱含深情。

### 重续前缘 再创辉煌

1966—1969年，谢毓元先后接到二机部（后来的核工业部）、上海跃龙化工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字166部队等部门委托给药物所的放射性核素<sup>239</sup>钚、<sup>234</sup>

## □ 人物剪影



1982年，谢毓元在实验室给组里的科研人员讲授螯合剂方面的知识

钍与95锆的促排药物化学合成的重大任务，这使得谢毓元重拾了十几年前进行广谱重金属解毒药物合成时涉足的医用螯合剂研究。

为了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上级指派的3项重要军工任务，谢毓元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搬砖头”工作——对美国《化学文摘》影印版及相关文献原文进行调研。经过充分的文献调研，谢毓元发现这3个元素性质具有共通之处：3个元素外层电子排布有其相似性，钚为 $5f67s2$ ，钍为 $6d27s2$ ，锆为 $4d25s2$ ，最外层电子数均为2，这3种元素的化合价均有+3和+4价，当这3种元素的离子在与络合剂配位会表现出相似的性质。

谢毓元脑海逐渐形成了一个“一石三鸟”的策略——设计一种高效低毒的、具有多胺羧结构的邻苯二酚型螯合剂，毕其功于一役，将这3种核素的促排同时解决。按照这一思路，他研究出一套系统的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研究方法，设计合成了国际首创的促排药物——喹胺酸，并从藜豆中提取有效成分，实现了震颤麻痹症药物左旋多巴的国产化。该成果载入1977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1974年，海字166部队又将一个世界性的科研难题——放射性元素90锶促排药物的化学合成任务委托给了谢毓元。

锶是第二主族元素，与前述的钚、钍、锆性质相差较远，之前所有积累的设计与合成经验都不可借鉴。在新一轮的文献调研之后，谢毓元提出了利用积二磷酸化合物既可以进入骨骼又可以迅速排出的性质，来进行亲骨性锶的促排的设想。经过3年的努力，在合成的200多个化合物中筛选发现了促排效果良好的酰膦钙钠。该首创性研究于1983年获中央卫生部甲级成果奖。

“文革”结束后，二机部对放射性核素促排药物研究不再投入，但谢毓元和当时药物所的同事并未就此停止，而是继续开展研究，发现了目前国际上铀促排效果最好药物双酚胺酸。但由于临床病例少的原因，他研制的这几个药物都没有被正式批准成药。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国内重视经济发展，核能的利用逐渐趋向于民用，国家停止了对放射性核素促排研究的资金资助。谢毓元开始进行多方面的尝试，将自己多年来在医用螯合剂研究领域积累的经验和成果进行民用开发，开展羟基乙叉二磷酸合成工艺改进及成果转化、靶向性抗肿瘤药物研究及偕二磷酸类抗骨质疏松药物研究，并低成本大规模成功合成植物生长调节剂天丰素——混表一油菜素内酯，对农作物产能与免疫力提高意义重大，为“科技兴农”作出了突出贡献。

## 高瞻远瞩 开拓局面

自1984年起，谢毓元担任药物所第三任所长。任期内，谢毓元采取“自由报名和学术带头人选择相结合”与“自由结合和组织安排相结合”方法组建课题组，明确了研究室的学术领导与科研体系，改善了科研秩序。同时，他统筹兼顾了药物所学科发展与科研布局，主张保留了药物所自己的图书馆。

其间，谢毓元落实执行了中科院在全部研究所推行的所长负责制，显示了对药物所长远与全局发展的领导力。

当时，据国外统计，一个化合物从药理初筛到最终发展成上市新药的平均几率仅为万分之一到八千分之一，研究周期为8到10年，平均耗资为0.8亿~1亿美元。而1984年中科院院部给予药物所全年的实际科研经费只有110万~120万元人民币。虽然药物所的课题组每年都会申请“中国科学院院内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但这些基金的资助金额很小，根本无法缓解经费紧张问题，满足新药开发的需求。

谢毓元清醒地认识到，在当时我国医



谢毓元院士在药物所成立80周年大会上讲话

药企业管理体制下，即使是大型和托拉斯型的国内制药企业，也没有投资新药研发的实力，再有远见的厂长也无法支持新药研究的前期工作，解决研究所的科研经费只能依靠国际合作。

于是，他积极与国外药企接触，着力介绍药物所丰硕的研究成果与强大的科研实力，吸引国外药企的投资愿望，同时也可藉由开展国际合作，使药物所了解国外药企新产品开发的组织管理工作，为我国研制的药物跻身世界市场创造条件。

在谢毓元任期内，药物所先后与日本全药、山之内、津村顺天堂、昭和以及美国普强、罗氏、格拉苏等药企建立合作关系，为药物所争取到了约150万美元的经费，购置了400兆核磁等多台精密仪器，开拓出良性循环局面。药物所财政从他接任时的捉襟见肘，转变为卸任时的颇有盈余。

为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生物资源，创制新药造福我国人民，谢毓元于任期最后一年开始着手“新药研究开发中心”筹建工作，获得全所上下积极响应。

1987年12月，国家教育委员会与世界银行合作的“加强研究生教育的贷款项目”启动。逢此良机，已卸任所长之职的谢毓元重新出山，在已有“新药研究开发中心”的建设基础上，主持筹建开放实验室，参与角逐贷款项目资格评审。严格的审批整整持续了一年，最终，“新药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顺利获得世界银行贷款资助，更凭借出色的科研成果和采用先进管理模式的能力成为7个试点实验室之一，被列入试点实验室管理计划，谢毓元又一次展现了自己出色的领导能力。

（转自《中国科学报》，2019年12月13日）

## 我的舅公吴景荣

○巫育辛

我的舅公吴景荣（1915—1994）是著名英语教育家，《汉英词典》和《新时代汉英大词典》主编。《精选英汉汉英词典》（汉英部分主编）《汉英词典》是他和北外的几十名专家学者历经八年编写完成，于1978年正式出版，这是新中国第一部沟通汉英两种语言的词典。《新时代汉英大词典》是由商务印书馆于世纪之交隆重推出的词典，是当时篇幅最大、收词最全、内容最新的一部大型汉英词典。舅公为之付出了10多年的心血。舅公离世后，没有编完的部分由外交部英语专家程镇球继续完成。他静静地走了，给世间留下永远的馨香，给亲人、朋友和学生留下无尽的思念。

他和王佐良、许国璋被誉为新中国三大英语权威。他们都是浙江人，也都在一年内相继离世，是中国英语界的重大损失。舅公离开我们21年了，但他的教诲总是在我经历人生低谷的时候鼓舞着我，他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想起他的时候总有许多让我感动的往事，仿佛他并没有离开。其实，他走了，给我留下的是丰厚的精神和文化遗产。2001年以来我使用明霞姑姑寄来的《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的时候，备感亲切，简直就觉得是在向他请教。我认真学习英语的时候，就会感到特别充实和快乐，似乎冥冥中也是在告慰舅公的在天之灵。

舅公吴景荣是我祖母吴玉秋的胞弟，他们这一辈姐弟三人。我祖母有两个弟弟，舅公和友三公。我的祖父巫冬来很早



吴景荣教授

就过世了，40年代故于抗战。舅公就像父亲一样关怀我的父亲巫凌云。在浙江老家有个习俗，如果父亲过世了，舅舅就可以代替父亲的地位。父亲初中毕业也没有钱读高中了，到糕点厂工作了几个星期，又被舅公喊回来读高中。听我父亲讲他读高中的时候，舅公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留学，那个时候英镑不能直接寄到国内，就只有把玻璃丝袜寄来国内，我父亲拿去卖了钱来交学费。所以患难使得舅公和父亲情同父子，他们外貌也很相像。父亲去北京出差，外人见到还以为他们是父子关系呢。高考前舅公对父亲说：“我学西语，你学东语吧。”1952年父亲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泰语，半年后院系调整，转到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学习傣语。1958来到云南工作，日后成为著名少数民族语言学专家，为边疆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人才，他一直感念舅公早年的栽培和抚养。父亲在回忆起舅公的时候也说过一段往事，他到北京出差的时候住在舅公家，

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舅公晚上说的梦话全是英语。

我也曾听舅公讲述过一些家史和往事。他说：吴家祖上400多年前生活在福建，做磨剪子刀生意来到浙江温州平阳县。他的父亲（我的曾外祖父）吴志谦曾在县城的衙门工作，舅公于1915年2月出生在这样一个小康之家。他的外祖父王鼎铭曾是清朝的拔贡，还去北京的国子监考过试。本来可以留下来做官，可是目睹清代朝廷的腐败，毅然决定南下回老家，就当了一名中医，于1927年过世。舅公早年深受外祖父的影响，很早就开始诵读诗书，9岁的时候他的外祖父和他对诗句，说“书难读尽深如海”，他回应外祖父，并写下了一生的志向“好男儿志在四方，学不成名誓不返”。舅公说他小学是在平阳县读的，他和我的祖父还是小学同学呢。他11岁就到温州中学学习。初中时开始学习英语，他说学英语不是赶时髦，吃洋饭，而是出于对英国文学的热爱。1932年考大学那年，同时考取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他选择了清华大学学习英语语言文学。他说他读大学的时候，家境不是很好。他的父亲借钱供他读书。他后来受到范存中教授的帮助才有了日后的成功，范老是他的恩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因气管炎发作，休学回老家，在平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并和几个同学一起创办平阳历史上的第一所中学。他后来到昆明的西南联大读英语的研究生，住在青年路的节孝巷（我有好几次独自漫步在节孝巷，备感亲切。似乎是在寻找舅公当年的足迹）。后来拿到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奖学金，赴英国利物浦大学读英国文学两年。他对英国作家简·奥斯汀及其作品

《傲慢与偏见》颇有研究，获得硕士学位。1949年有人介绍他到联合国工作，也有人高薪聘请他到台湾工作，他都婉言谢绝。于1949年8月途经香港回到北京，为的是报效祖国。

1986年回温州过年的时候，见到舅公的弟弟，就是我的友三公。他说：“我们吴家是世代书香。”（我舅公的舅父王建之是我们县城有名的诗词大家）。在闲聊时友三公说，舅公大学二年级回平阳过暑假的时候，他陪同舅公去找县城里的一个英国传教士练习英语口语，那个传教士说舅公的英语水平很高，已经可以写书了。友三公还说，舅公开始当英语教师的时候，学生们看他个子不是很高大，不很尊重他，可是学习了几堂课下来，就对他刮目相看了。

舅公培养了父亲，也花心血栽培我。我从上中学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学习英语。其他的功课都学得不好，就是英语学得好。记得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舅公还写信来鼓励我好好学习，有一句话至今还记得：“努力吧，孩子！”他还给我寄英语读物和英汉小词典。我爸爸说：“你多幸福啊，那么有名的教授还给你寄书来。”我高考的时候没有能考上北京的大学，在云南读大学，学英语。舅公就以信函的方式指导我的英语学习，还在百忙中来信谈该如何读书、使用英语词典，并为我制定学习的方向。古代汉语他也教了我许多，他在信中谈古代诗词。80年代，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给他写信谈谈学习和生活。他写信给父亲问候：“小楠好否？均在念中。”现在回想起来，深感三生有幸，有这样一个平易近人的长者。他的学生很多都很有成就，全世界很多的大使馆都有他

## □ 人物剪影

的学生，可是我却是最承蒙他关爱的学生之一。他说英语可以做个工具，英国文学太玄了，不要学。他还说当年如果学的是某一个专业，可能会有更高的成就。他建议我学习美国历史作为专业。因为没有基础，也没有老师指导，学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成效，又转回头来学习英语。可是我也还是有收获，因为学习英语语言，必须对英美国家的文化和历史有所了解。除了学习上的指点，在做人和品格的形成方面，他也给我树立了榜样，也是我的老师。我不想读书的时候，他苦口婆心地给我讲要勤奋，要有追求，但又不把他的意志强加于我。我骄傲自满的时候，他总是让我学会谦卑下来。来信告诉我：“人的使命是为社会做贡献，为祖国增添光辉。”我学习有进步的时候，他给予鼓励和表扬；我情绪低落，失去勇气前行的时候，他又帮助我重新树立信心。1991年，我身体不好，情绪低落。他亲自选了吴仲贤的英文小说《金谷恋歌》的部分章节让我翻译，又和《英语世界》杂志社联系。我的译文由舅公亲自校对，于1992年6月在《英语世界》上发表。那是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激动万分。

1994年初，我到北京办理赴德国的签证，住在舅公家。他说：“你享受家庭成员待遇。”舅公确实把我当作家里的一员。他那时候身体虚弱，每天服药，还坚持工作5~6小时编写《新时代汉英大词典》。有一天他对我说：“你为我祈祷，我还有三年的时间就可以编完词典了，我就可以放心地走了。”当时他是很认真地说这话的，那是永远难忘的一刻，我亲眼目睹了一个伟大学者对未竟事业的执着。现在回想起来还深受感动，也还在鼓舞着我的

英语教学，这句话也点亮了我的人生。

舅公治学严谨。听姑姑说，有时为了一个释义或一个例子，不惜查阅几十本中外词典，并一连几天沉浸其中，字斟句酌，甚至半夜起来伏案疾书，生怕第二天忘记。他从来不让不满意词条和例句从他的手下漏过，经常反复修改自己和别人的稿子。他一生淡泊名利，出版社要给他主编的地位，他都不肯要。稿费也不愿多要，与大家平分。我只能用高山仰止来形容他的人格。可是他在生活中说话又很风趣幽默。1995年，我在南开大学偶然遇到一个英语教授，她说曾经和舅公在一起开过学术会议，并说舅公是个说话很幽默的人。在家里，舅公经常和他的外孙女小青还有外孙小晖逗乐，常常充满欢声笑语。有一天舅公收到一封关于保健知识的信件，开头就是：某某先生、女士，您的健康对我们的社会非常重要。舅公就和小青开玩笑，把开头改成黄青女士。小青一回家，他就把这样开头的信件，拿给小青看。逗得我们大家都乐不可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对待原则性的问题，就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他的学术成就达到一个时代的顶峰，人又很谦虚，有一次在给父亲的来信中说他自己一事无成。他从少年时代就开始患支气管炎，一生中很多时间（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拖着病弱的身体从事繁重的工作，在与病魔抗争。这使我联想到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坐在轮椅上攀登科学的高峰。他带病坚持工作的时候就像希腊神话中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颇有英雄气概。茶余饭后开玩笑的时候，和家人就像忘年之交，那样的平易近人，完全没有著名教授的架子。

# 食品专家李祖平的世纪多彩人生

○张永祥 泰 栋 方 平

李祖平，又名李光言，1917年出生。祖籍浙江省镇海县崇邱乡港口村（今宁波市小港经济开发区）。祖父李濂水，系清光绪丙子年进士，供职于清政府户部。父亲李善祥虽出身豪富之家，但不甘坐享祖宗基业，在动荡年代中奋斗一生，成为中国苹果和果艺事业的开拓者。李祖平继承祖辈精神，为中国食品工业的发展做出毕生贡献。

## 张贴战事新闻 演唱救国歌曲

1937年8月13日，日军开始进攻上海，李祖平当时住在上海，刚高中毕业。受到战争影响，一部分高校的招生被迫停止。为了避开战争，他于9月中旬搭乘上海宁波同乡会组织的难民船离开上海回故乡宁波小港。据他回忆，难民船为了通过日本鬼子的封锁，挂上了英国国旗。因小港李家住宅靠近海边和港口炮台，常遭到海上日舰炮火袭击，他只好住到离海边较远的小港李家经营的洽元当铺内。与他共居一室的失学青年虞亦博，恰是李氏养正义庄经理虞述圣先生的儿子。

那时，小港没有收音机，信息十分闭塞。小港镇上有个阅报室，每日只有一份报纸在下午三四点以后从宁波送到。李祖平和虞亦博商议，每天先来看报，将报纸上的战争新闻写成大字报，张贴于大街上，让小港的居民及时了解抗战进展。报道战争的大字报张贴后，乡民阅读非常踊跃。

他和虞亦博在阅报室写大字报时，失学



2019年12月，西南联大校友后代登门探望102岁的李祖平老学长（右2）

青年林圣纬（白马湖春晖中学学生，林晖）也来帮忙写。后来曾在上海参加进步社团“蚁社”的失业青年汪波，女青年乐群、乐莉、乐陶、乐杏云等都来参加。人数多了，大家也开展了一些其他活动，一起练唱抗日革命歌曲，如《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毕业歌》等。

看到小港人的抗日热情如此高涨，大家酝酿成立小港抗日救亡宣传队，并公推祖平任队长。宣传队建立后，大家在小港街头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话剧，主角为乐群、乐明华等，演出效果很好。以后参加宣传队的人数愈来愈多，有金涛、林昌全、乐秀运、唐海等二十余人，宣传队到各处演唱抗日救国歌曲，宣传抗日救亡。

1938年初，李善祥叫大儿子到昆明上大学。李善祥说，国家急需人才，无论是战争时期还是战后建设，都不能没有人才。

“父亲安排很周密，让我和外甥夏功权经香港从越南到云南。到昆明后，我和夏功权一起考过空军，但我的视力不及格，随后，我考入了刚迁移到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学校参加了进步学生活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听说我弟弟祖宁，妹妹幼兰（又兰）、采芝（李锦）和小港宣传队中部分青年到汉口，经周恩来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四妹采荷于1942年夏参加浙东新四军。父亲经常能从他们的来信里了解到新四军队伍里的新人新事。他还有幸读到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当他得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的消息，怒不可遏。他在小港组织了抗日救护队，抗战胜利后，他亲赴华东解放区考察。解放战争期间，又在东北锦州将自己兴办的果园作为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点，为辽沈战役作出了贡献。”

到了93岁高龄，李祖平对父亲李善祥还是非常敬佩。

### 毅然要求入党 费尽周折找党

李祖平考入西南联大化学系，系主任是曾昭抡。李祖平在学习之余，积极参加社会科学研究会，一个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团体。当时昆明是地方实力派龙云当政，龙云和蒋介石有矛盾，他对知识分子、对大学生的进步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云南的抗日救亡运动十分红火，生活书店公开出售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还有毛泽东的著作。

西南联大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大学联办的，全校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开始时990多名学生，后来增加到1950多名。校舍很简陋，但名师云集，有冯友

兰、吴有训、朱自清、陈寅恪、叶公超、钱钟书、钱穆、吴大猷、周培源、潘光旦、闻一多、费孝通、吴晗等著名教授和民主斗士，可谓集全国学者之精华。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方局，中共云南省特委改为云南省工委，正式成立西南联大党支部，确定袁永熙为党支部书记，邢福津为组织委员等；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从重庆考上联大地质系，任宣传委员。李祖平在“社科”秘密学习社会科学理论，经常听范长江、张奚若等优秀学者的演讲，和社员们一起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对马克思主义很喜爱。

1941年1月4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蒋介石对共产党新四军举起屠刀，用七万重兵包围新四军军部指战员和干部，仅2000多人突围。李祖平很担忧自己的几个弟妹，还有小港参加新四军的十几个青年。后来接到父亲李善祥的告知，知道又兰妹早已突围去苏北，祖宁弟（志光）在事变前患重病回到家乡秘密治疗后，参加新四军浙东纵队，三妹李采芝不幸被俘，小港青年汪波不幸牺牲。

父亲信中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救亡紧要关头竟然干出亲痛仇快之事，天下再没有如此不义与无耻之人了。父子俩对共产党反而更信任了，觉得抗日救国只有共产党能挑此重任。

在“皖南事变”前，西南联大学生中党员已发展到83人，占云南全省党员总数247人的三分之一。“皖南事变”发生后，联大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学生在壁报上大肆污蔑新四军是叛军，袁永熙布置党员、积极分子在《群声》壁报上贴出《皖南事变剪报特辑》，李祖平内心义愤难

平。这时云南省工委紧急通知袁永熙等人：国民党特务康泽带着黑名单和举办集中营的计划赶到昆明，准备大逮捕。省工委指示，要立即将部分面目较红的党员和进步骨干撤离联大，分散隐蔽。袁永熙、邢方群、陈琏都转移了。

就在这时候，李祖平却毅然要求加入共产党，这是1941年3月。同年9月，李祖平毕业后到重庆一化工厂当技术员，继续寻找党组织，不幸的是接头的关系人找不到了。

李祖平不甘心，他竟然冒着风险直接摸到了重庆红岩。谁都晓得，当时，在红岩周围都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万一被特务发现，后果不堪设想。红岩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南方局的驻地房子，就是他的堂兄李祖贤无偿送给共产党的。李祖贤当时办的六合建筑设计公司也在重庆。李祖平想找到党的念头十分强烈，他按照堂兄的草图，小心地找寻红岩的大门，总算找到了那扇党的大门。

八路军办事处的朱语今接待了他，耐心地听了李祖平的陈述，叮嘱李祖平，为了安全，以后可以到《新华日报》社找他，眼下先作为联系对象，等西南联大正式关系转来再接上关系。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李祖平回到上海，住在愚园路堂伯父李咏裳的家里，碰到了辗转来到上海，而且带着四妹采荷的父亲。四妹刚从集中营放出来，20岁刚出头的姑娘，在集中营里经受了炼狱的考验，面容憔悴，但坚持要找三五支队，就是新四军浙东纵队，他们在1945年10月北撤到淮北、苏北。

1946年一个春天的下午，原西南联大的同学王凝找上门来，王凝是当年李祖平

的联系人，4年后终于又联系上了。

王凝约李祖平一同去马思南路“周公馆”看望陈家康同志，陈和王两人听了李祖平详细汇报找党组织的经过，决定接上李祖平中共正式党员的关系，由朱语今单线领导。

### 志同道合伉俪 食品工业专家

2008年12月，我们见到90多岁高龄的李祖平时，他拿出西南联大的一张毕业文凭，有校长梅贻琦、蒋梦麟等签名。西南联大那段时光，虽然过去70年了，他依然十分怀念。

经妹妹的介绍，他与一位新四军老战士程敦彦结婚。这位女战士的早期经历和他很相似，是一个师范生，1937年“八一三”后参加抗日宣传队，1939年3月，秘密参加共产党。1940年12月，在安徽泾县参加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关在上饶集中营，在集中营和李锦在一起，与敌人斗争，毫不屈服。她是1934年12月由其父亲想办法保释出来的。

上海解放后，李祖平奉命参加上海军管会轻工业处接管工作，以后历任上海益民制革工厂、上海益民食品厂厂长，轻工业部上海食品工业设计院院长、上海轻工业设计院副院长及中国食品科技学会理事、上海市食品学会副理事长，1982年9月离休。

李祖平从事食品工业生产、科研和工程设计工作，完成了不少食品罐头、乳品、发酵食品、淀粉产品、速冻食品、芳香和烟草企业的工程设计和设备设计，使我国食品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大大提高，其中一些设计得到国家和受援国的好评、表彰和奖励。

（根据《东南商报》内容改编）

## 胡芝风：从理工女到京剧名旦

○熊 姝



胡芝风学长

年逾八旬的她，1956年考上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中途却转行做了京剧演员，成为梅兰芳的关门弟子。在艺术芳华绽放最精彩的时刻，她又告别舞台，转身搞起戏曲理论研究。中国少了一个科学家，却诞生了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家。

从清华的理科高才生，转行成为京剧演员，又从演员成为学者和导演，耄耋之年的胡芝风一生颇为传奇。

2019年11月18日，胡芝风从苏州风尘仆仆地赶赴北京，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做了一场题为“戏曲表演艺术的美学精神”的讲座。4个小时的讲座，她的一双眼睛始终熠熠生辉，那种浑身是劲儿的样子，完全不像一位耄耋老人。她说，只要谈戏曲就不累。对戏曲艺术的爱，已经浸入她的骨子里。

1938年冬，胡芝风出生于上海，家境殷实。还在襁褓中时，她就常被外婆抱着

去听绍兴戏。小时候，父亲对胡芝风的兴趣爱好全力支持，骑马、游泳、芭蕾，她样样精通，可最爱的还是京剧，甚至长大想唱戏。大户人家的小姐，怎能去干“下九流”？家里对她入梨园行的想法反对声一片。父亲比较开明，请来当时的京剧名伶吴继兰为她进行京剧开蒙。

考大学时，无法违拗家人的意见，胡芝风考取了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可那份与京剧的情缘始终难以割舍，她最后背着刀枪把子来到清华园，一边遨游于科学的海洋，一边吮吸着艺术的芬芳。在科学与艺术之间徘徊良久，胡芝风内心的天平最终还是倾向了后者。中国也许少了一个科学家，但却诞生了一位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家。

1959年，在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的推荐下，胡芝风拜梅兰芳为师。一见面，梅兰芳便称赞她学京剧的决心，风趣地称她为“大学生小徒弟”。拜师那天，胡芝风平时所仰慕的欧阳予倩、荀慧生、萧长华、姜妙香、俞振飞、言慧珠等，都到了现场。胡芝风恭恭敬敬地向梅兰芳夫妇行跪拜叩头礼。梅兰芳高兴地对同仁们说：“我年纪大了，本不打算再收徒弟了，可是，芝风是大学生来从艺，我心里高兴，就破例再收一个，算是关门徒弟吧。”师从梅兰芳的那段日子短暂而快乐，“梅先生不仅讲唱腔、身段、技巧，也讲绘画和雕塑”，胡芝风坦言，梅兰芳的创造精神对她的艺术道路影响

深远。

胡芝风的成名作是京剧《红梅阁》。1962年，风华正茂的胡芝风已是苏州市京剧团的主演。她在上海观看了李玉茹主演的京剧《红梅阁》，一下子被剧中李慧娘圣洁的形象吸引住。她将全剧内容用速记法记录下来，随后吸收芭蕾的成分进行大胆再创作。胡芝风主演的《红梅阁》曾在武汉连演30场，打破了当地演剧场次的纪录。

然而，好景不长。受政治运动的影响，胡芝风因主演《红梅阁》这部“鬼戏”而受到批判，她的艺术生命像《红梅阁》中李慧娘的魂魄一般，飘忽于天地无光的暗夜中。“美哉慧娘，临别依依”，她不得不与心爱的李慧娘告别，而这一别就是17年。

1979年春天的一个午后，剧团突然通知胡芝风要重排《红梅阁》。“红梅阁”三个字如同天雷勾动了地火，在胡芝风的心头炸响。夜深人静，辗转难眠的她梦游般地走进排练厅，默默地打开电灯，换上练功服，在舞台上孤寂地旋舞。17年啊，还能找回李慧娘吗？胡芝风心头五味杂陈，泪如雨下……

年届不惑的胡芝风，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对《红梅阁》有了新的认识，她对剧本进行了修改——李慧娘作为美的化身、力量的象征，是封建顽石压迫下突兀傲然挺立的一枝红梅花，《红梅阁》由此更名为《李慧娘》。在表演上，作为李慧娘的饰演者，胡芝风在继承传统表演程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了花旦、青衣、刀马旦、武旦等行当。为追求李慧娘的舞蹈美观，她还大胆运用了芭蕾舞。胡芝风在《李慧娘》中的创新，当时被有些人斥为“离经叛道”，但这并不能阻挡她革新京

剧的步伐。

《李慧娘》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从上海演到北京，从北京演到天津，从天津演到香港，最后一直演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前后演了600多场，掀起了一股文化旋风。有评论这样评价她：“给古雅的京剧灌注了新鲜血液，在北京观众中产生的影响，就像当年四大徽班进京，冲击了宫殿艺术，推动了京剧改革。”

1985年初，在艺术芳华绽放最精彩的时刻，胡芝风意外地收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理论研究班的招生简章。招生简章说，办这个研究班“可以使胡芝风这样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得到系统学习理论的机会……”

谁都没想到，胡芝风会告别鲜花和掌声，一头扎进象牙塔，坐起了冷板凳。两年的理论学习，胡芝风成绩优异。毕业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希望她留院工作，充实戏曲表演理论研究的力量。在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她毅然决定告别华丽的舞台，转身做一名朴素的学者。

胡芝风潜心于戏曲表演理论研究，先后出版了《艺海风帆》《胡芝风谈艺》《戏曲演员创造角色论》《戏曲艺术二度创作》《戏曲舞台艺术创作规律》《戏剧散论》等专著。理论研究之余，她依然坚持创作。在她指导的60多部戏中，有12位演员先后摘得“梅花奖”。

如今，耄耋高龄的胡芝风居住在风景如画的苏州，但她似乎无暇欣赏江南美景。她经常拉着行李箱在全国各地来回奔波，为中国戏曲艺术继续忙碌着……我们的采访一结束，她马上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展开下一段戏曲旅程。

（转自《光明日报》，2019年12月4日）



## 自强的清华更奋进，今年的校庆不一般

2020年4月26日，清华大学迎来了109岁生日。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不能返校的清华学子用“云校庆”这一特殊的方式，共同庆祝母校109岁华诞。清华大学校长、校友总会会长邱勇院士在校庆致辞中深情感言“清华109周年校庆必定是一个特殊的校庆。因为疫情，我们不能邀请亲爱的校友们回到母校。但我相信，‘云校庆’会带给我们同样的温馨、别样的精彩，清华园永远是所有清华人温暖的家”。校庆期间，一系列校内校外同步、线上线下结合的“云校庆”活动精彩呈现。

**校庆日线上直播。**4月26日上午9时，清华大学109周年校庆日活动在大礼堂前举行。邱勇校长和陈旭书记分别以“托思望云端，万里共清华”和“使命光荣在肩，团结奋力前行”为题发表了109周年校庆讲话，向全校师生员工、向世界各地的清华学子致以诚挚的问候，勉励全体清华人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和“行胜于言”的校风，为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注入清华力量。面对疫情，清华长庚医院支援武汉医疗队踊跃请战，以勇气和责任诠释了医者仁心。活动现场，与会校领导为他们一一颁发纪念牌并献上鲜花。

**109圈接力长跑。**4月26日上午，由清华校友总会主办、清华校友跑步爱好者协会承办的“清华建校109年，西操接力109圈暨全球校友110万公里跑步启动”活动在西大操场拉开帷幕。邱勇、陈旭和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集体来到西大操场，与现场的师生、校友一起参加109圈接力跑，为母校献上生日的祝福。

**云报到与云祝福。**清华校友总会运行维护的“清华人”小程序4月20日上线“校庆报到”的功能之后，迅速引发广大校友关注，他们在“云报到”的同时，也纷纷献词祝福母校109周年华诞。校庆期间，师生、校友和各界友人发来“云祝福”17万余条。

**云校园与云展览。**“云校园”依托清华校园地理信息，将地图与校园风景、各类视频、活动报道等进行整合，使广大清华友人和清华学子在线上游览校园景色的同时，又能查看校庆活动的地点、内容等信息，在云端领略清华风物，感受校庆盛况。“云展览”集合校史馆数字博物馆、清华名人专题展、清华档案·学风系列展、艺术博物馆数字展厅系列展览、科学博物馆百年器象数字展厅等，以线上展览呈现。其中，“窗口2020——疫情时期图像档案展”通过网络进行直播，在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云演出与云赛事。**弦歌不辍，行健不息。校庆期间海内外的清华师生、校友为母校带来109周年校庆“云演出”。演出汇聚了清华师生、校友对全世界的真诚祝福，展示了清华人面对疫情攻坚克难、自强奋进的姿态。校庆期间体育部举办的“云运动会”、研究生会举办的“云上体能联赛总决赛”、校团委举办的“‘云战疫’趣味挑战赛总决赛”等赛事活动尽显“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和“无体育，不清华”的体育传统与体育精神。

**云对话与云论坛。**校庆期间，清华大学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全球大

学特别对话：新冠疫情下的大学在线教育及展望”，邀请 6 大洲 14 个国家的 20 所大学校长和教授，以及多名 UNESCO 教育官员和教育专家，通过视频会议跨越时区开展对话，共同探讨如何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在线教育挑战。由清华校友总会、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与学生全球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主办的清华校友 HiTC（科技与创意中的人文）演讲大会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为主题，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 6 位校友分享自己在抗疫期间的故事与思考。

自强的清华更奋进。面对肆虐的疫情，

清华人与全国人民一道众志成城、主动担当，以实际行动践行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今年的校庆不一般。借助于互联网以及 5G、VR 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通过网络策展、视频直播、视频会议等互动方式，纵然相隔千山万水，身处世界各地的清华学子依然能够相聚云端，祝福母校。据不完全统计，校庆日当天“云校庆”网站访问量超过 12 万，通过各种平台在线观看直播报道的总人次超过 413 万。“云校庆”成为清华历史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校庆活动。

（本刊编辑部 宋述强）

## 清华建校 109 年 西操接力 109 圈暨 全球校友 110 万公里跑步启动

在清华迎来 109 周年华诞之际，由清华校友总会主办、清华校友跑步爱好者协会承办的“清华建校 109 年 西操接力 109 圈暨全球校友 110 万公里跑步启动”活动于 4 月 26 日上午在清华西大操场拉开帷幕。在这个特殊的校庆日，清华大学校长、校友总会会长邱勇，校党委书记陈旭等校领导与师生、校友一起，共同接力奔跑，为母校送上最好的祝福。

为落实疫情防控的要求，保证参与师生的身体健康，本次活动只有住在学校的教工、校友和在校生 43 人参加。上午 7 点 20 分，清华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水利系 1964 届校友王凤生学长与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校体委主任史宗恺老师为 109 圈跑步活动发令起跑。11 点 30 分，邱勇、陈旭和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集体来到西大操场，为参加 109 圈跑步的教工、校友和同学点赞。

“祝母校生日快乐！”“一起朝着 110 年跑！”邱勇、陈旭等校领导带领大家绕操场跑步两圈，一起奔向清华大学 110 周年，现场的活动气氛达到了高潮。

在 109 圈跑步现场，由清华校友组成的“回声网络合唱团”通过线上录音的方式录制了《让世界充满爱》《明天会更好》《We Are the World》《重逢》《永远不回头》五首歌曲在现场循环播放。全球各地的清华校友在线观看了现场活动的实时直播。

本次西操 109 圈跑步完成的同时，由清华校友总会主办、清华校友跑步爱好者协会承办的“全球同跑接力，母校百十献礼”活动也正式启动。活动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至 2021 年 4 月 24 日举办，全球校友、全校师生参与者将以跑步线上累计 110 万公里，迎接母校诞辰 110 周年。

（张 静 韩凤良 符 全）

## 清华校友 HiTC 演讲大会成功举办

4月26日，正值清华大学109周年校庆之际，清华校友HiTC（科技与创意中的人文）演讲大会以“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为主题，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6位校友分享自己在抗疫期间的故事与思考——在全球疫情中，在人类挑战前，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能袖手旁观。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致开幕辞。

“希望这个问候能够带去母校对全球所有校友的关心，希望大家平安。”在HiTC演讲大会的开始，史宗恺向校友送上了母校的问候。史宗恺表示，人类正遭遇着巨大挑战，全球各地的每一位校友都会体会到这个疫情带来的重大挑战和重大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都不能够独善其身。史宗恺指出，清华的教育是希望每一个清华的学生在离开学校之后，都能够带着强烈的责任和意识。面对疫情挑战，清华人将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去做那些最艰苦的、最有挑战的事情。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主任梅赐琪讲述了清华教师面对在线教学新课题，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升学生学习体验的探索。梅赐琪认为，一方面教育者要想办法建立起超越技术和知识的连接。在线教学使得人们分离，但是教育者引领人的功能没有改变。另一方面，在线教学让同学们的学习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师看起来是在教一个学生，实际上是在“交”一个家庭。这些让梅赐琪意识到，教育需要“有

时说服，常常引领，总在共情”。

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鸿分享了他在抗疫一线的故事。2月中旬的一天，他和团队从北京出发，次日凌晨抵达武昌站，迅速打响了国家远程医疗队在武汉抗疫的第一枪。他深情地说：“正是这份明知风险仍然选择逆行的初心，让我们的六人行不孤独、很温暖。”董家鸿和他的团队展现出科技报国的担当，自大年初一到初八，仅仅8天COVID-19自测评估系统就通过专家审核上线。此外，他们还将“清华COVID-19智能防控系统”中的部分产品开发多国版本并免费与各国分享。

2007级校友、主持人刘慧凝以“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羁绊”为题，分享了过去几个月让她铭记在心的故事。她从北京第一批援鄂医疗队成员王小辉、在武汉拍摄毕业作品的清华大学学生黄一洋等人的故事中，体悟到“生命的最大价值，就是这路上的相遇、牵绊、麻烦和被麻烦，是‘使用生命’的过程中，又给多少人带去了善意和改变”。

苏世民书院2018届校友卫乐善（Charles Vitry）在伦敦分享他的思考与感悟。卫乐善介绍说，在和苏世民书院同学的讨论中，比较各地区视角、挑战对方观点的事情时常发生。他认为这样的讨论很重要，能够教会人们如何超越自己的国家视角，看到未曾考虑过的新维度，“分享和思考不同的国家视角，是在更深层次上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人

与人之间的联结。”

2017 级博士生余霄讲述了清华不同国家的青年如何在疫情期间加强合作、共同抗疫的故事。作为清华大学学生“一带一路”研究协会会长，他发起了“防控新冠病毒肺炎‘一带一路’青年国际援助计划”，一夜之间招募了近 70 位来自各个国家的志愿者，将 16 种语言的医用物资需求信息通过社交媒体向国际社会发布，将国际医疗物资对接到湖北一线。当国际疫情爆发后，又积极将医疗物资送往意大利、伊朗、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

1983 级校友、南加州大学建筑学院原院长马清运从“为什么选择做建筑师”这一问题入手，讲述了自己对建筑的理

解——让大家“有尊严地、幸福地、身心充满获得感地活在自己的家园里”。在疫情面前，他对“家园”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家园应该彰显人类文明，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在演讲大会上，马清运发起了“绿道”（loop®all）佩戴活动，希望每个人面对自己和全人类的生活时都能够心怀敬畏，意识到在这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的命运共同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本届清华校友 HiTC 演讲大会由清华校友总会、清华大学文化创意发展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学生全球胜任力发展指导中心主办，在爱奇艺、腾讯视频、学堂在线、B 站、快手等多个平台上线，逾 10 万观众收看。

（陈芳婷 庄 臣 关 悅）

## 航院举办“云校庆”系列活动

时值清华大学 109 周年校庆之际，清华校友总会航天航空学院分会举办了“云校庆”系列活动，包括云端沙龙、科研云端展示、校友云祝福，以及与清华视频中心合作拍摄的“云回家”活动，受到了广大校友的欢迎。

航院云端校庆系列活动，从 4 月中旬陆续展开。4 月 9 日，航院教师云端沙龙成功举办，青年教师崔一南通过 ZOOM 网络视频会议的方式，做了题为“极端环境力学理论与计算”的主题报告。4 月 11 日，航院校友会举办了校友云端沙龙，围绕抗疫期间校友们企业发展情况、当前经济发展状况等议题开展讨论。4 月 25 日，航院校友会联合各系所、实验室及研究中心，在航院校友会公众号推出了航院科研系列云端展示，为广大校友呈现了航院各

领域科研进展，受到校友们广泛关注。在 4 月 26 日校庆日，航院校友会公众号推出了航院校友云祝福特色活动“回首大学时光，我想对 Ta 说”。活动展示了航院校友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至 2006 年的不同阶段大学生活的照片及祝福语。在校庆日，航院校友向母校、航院以及老师和同学们送上了真挚的祝福。

与此同时，航院校友会与清华视频中心合作拍摄的“云回家”在学院微信公众号发布。航院院长李路明通过网络视频的方式，介绍了航院近期的工作和主要成就，并鼓励广大校友、航院全体师生在这个特殊时期一起努力工作，共同战胜疫情。在“云回家”活动的最后，李路明院长代表航院欢迎海内外广大校友明年返校团聚。

（航院校友会）

## 清华经管学院 2020 校友论坛举行

4月25日，在清华大学109周年校庆、清华经管学院36周年院庆之际，由《清华管理评论》、清华经管学院高管教育中心、校友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清华经管学院2020校友论坛”在云端举行。本次论坛主题为“助力新经济，探寻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新动能”，邀请多位国内著名学者及优秀企业家，共同探讨面对新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挑战，探寻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新动能。

论坛上，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院士邬贺铨，清华经管学院经济系教授刘玲玲，清华经管学院副院长、人工智能与管理（AIM）研究中心主任徐心，全球移动通讯协会高级顾问、中国移动原董事长王建宙，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童国华，清华经管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教授、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主任、《清华管理评论》执行主编陈劲分别带来主题演讲。  
（经管学院）

## “新冠疫情下生医工程的责任与担当”校友论坛举办

4月25日下午，由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清华校友总会生医药学院分会和清华大学医工交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清华大学生医工程校友产业论坛线上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新冠疫情下生医工程的责任与担当”。论坛通过线上平台进行直播，观看人数超过1500人。

生医工程系研究员刘鹏，生医工程业界校友代表谭国陞、武少杰、朱磊、许坚、苏子华和钱天翼等作为演讲嘉宾出席论坛。清华大学医学院党委书记洪波、生医工程系主任王广志等参加论坛。论坛由生医工程系李睿老师主持。

演讲嘉宾都表达了对学校109周年校庆的祝福，并围绕论坛主题逐一分享。作为程京院士科研团队的一员，刘鹏以“合作、奉献、攻关——用于新冠病毒检测的微流控芯片”为主题介绍了团队开发的几款典型微流控芯片。上海联影诊断治疗事业群联席CEO谭国陞学长（1981级无线电）分享了疫情期间国产医疗设备企业

的担当。东软医疗系统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武少杰（1981级自动化本，1986级生医工程硕）介绍了东软企业在新冠疫情期间的贡献。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超声影像系统研发总监朱磊（1993级生医工程）重点阐述了超声设备在抗疫中的相关应用。航天长峰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苏子华（2000级生医工程）以“航天报国——大安全概念下的医疗产业”为主题，介绍了航天长峰集团的相关情况。天津怡和嘉业医疗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坚（1991级生医工程）介绍了呼吸机产业的现状与未来发展趋势。腾讯公司医疗健康事业部技术委员会主任钱天翼（2008级生医工程博）围绕医疗卫生系统未来的挑战进行了分享。

论坛期间，生医工程系王晗老师和腾轶超老师通过直播带领校友和同学们“云参观”清华校园，看到熟悉的大礼堂、二校门、清华学堂、工字厅，大家都在弹幕里表达了对学校的思念。  
（医学院）

## “山河无恙，云树有思” ——社科学院举办线上校友交流会

4月25日上午，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9周年社会科学学院2020年线上校友交流会顺利举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校友线上“回家”，以“山河无恙，云树有思”为主题齐聚一堂，共话春晖。

通过线上开展“云校庆”活动是创新之举，以此表达愿祖国山河无恙、念同学云树有思的情感。社科学院党委书记刘涛雄，院长、清华校友总会社科学院分会会

长彭凯平，副院长李正风、王天夫、赵可金，院党委副书记李颖，院党委副书记、清华校友总会社科学院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戎珂以及部分社科校友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邀请了科大讯飞执行总裁胡郁作前沿报告，为大家讲述人工智能颠覆式创新及商业生态系统的演进。会议由社科学院2019级博士生辅导员、院团委书记刘充主持。

（贾雨涵 刘建伟）

## “清华机械云论坛暨云路演”成功举办

4月26日，清华校友总会先进制造专业委员会和清华校友总会机械系分会共同举办了“清华机械云论坛”和“清华机械云路演”两场活动为母校109周年华诞献礼。活动旨在为机械系广大师生、校友创造交流畅谈机会，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活动以线上会议的形式举办，并通过直播平台进行同步直播。2500名校友和各界友人齐聚云端，参与两场产学研盛宴。

在“清华机械云论坛”上，尤政副校长就学校目前的工作进展、发展情况和未来展望发表致辞。雒建斌院士结合大疫之后国际和国内发展形势，指出学校和学院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要兼具创新性和实用性，要面向国家需求，助力国家技术和国家工业的发展。汪家道教授从机械系工作进展和人才培养思考两方面进行工作介绍。高旭东教授结合抗击疫情的时事背景，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情况进行梳理，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机械系校友代表胡作寰、

李炜、隋少春、侯润石根据自己所在行业和研究方向，结合我国制造业发展现状，从智能制造、半导体材料、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和工业机器人等细分领域进行报告，分享前沿科技、行业趋势及各自成长历程。“清华机械云论坛”由吕志刚书记主持。

“清华机械云路演”聚焦机械制造、先进制造等领域，遴选了13个机械系教师、校友的优质项目同台竞技。以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川带来的静电自组装二氧化氯缓释消毒凝胶项目为代表，每个路演项目都体现了清华校友的出众实力，是清华大学百年深厚底蕴的缩影。

“清华机械云论坛暨云路演”提供了一个交流对接、了解行业趋势、展示优质项目的平台，促进了机械系老师、校友科技思想的碰撞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希望通过活动加强清华技术与社会需求及资本的对接，通过产学研融合发展，推动地方产业优化升级。  
（先进制造专委会）

## “大咖云集，智慧共享” ——计算机系举行 1996 级校友创新创业论坛

4月26日上午，计算机系1996级校友创新创业论坛以腾讯会议与学堂在线直播的双云端方式举行。计算机系主任、计算机系校友会会长吴建平院士，系党委原书记、系校友会原副会长杨士强老师，系党委副书记、系校友会秘书长贾珈，1996级校友嘉宾刘昊飞、胡宁、周枫、王小川、于滨、龚奕平、张磊、周杰、庄莉，以及其他100余名本系校友参加了内部会议。此外，共有超过2万名观众观看了学堂在线同步直播。论坛由年级联络人闻立杰与嘉宾胡宁共同主持。

自由交流环节中，九位1996级校友

嘉宾依次介绍了自己毕业20年来的创业历程与故事。主题讨论环节中，联席主持人胡宁围绕“回忆清华故事”“工程师创业”“行业洞察”“商业模式”“阶段感悟”“疫后展望”等话题向嘉宾们展开提问。嘉宾们从自身经历出发，结合行业特点，深入探讨碰撞，分享真知灼见，满满的干货为观众们带来了一场智慧激荡的思维“论剑”，也为创业者带来了一场深层次的思想启发。

最后，在校友们对母校109周年“生日快乐”的声声祝福中，本次创新创业论坛圆满结束！

（张超）

## 车辆与运载学院成立一周年校庆云论坛成功举办

4月26日，由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主办的“疫情下的汽车工业如何创新与发展”暨清华大学车辆与运载学院成立一周年校庆云论坛成功举办。论坛由学院党委书记王建强教授主持，来自海内外的汽车行业校友、汽车行业从业者、校内外师生等2万余人观看了论坛直播。

学院院长李建秋教授在开幕致辞中回顾了学院成立以来在人才培养、教师队伍建设、科学研究、学科建设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并介绍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清华大学迎难而上、化危为机，有条不紊开展在线教学工作的情况。随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十三五”新能源汽车重点专项专家组组长欧阳明高教授，汽

车安全与节能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智能网联汽车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李克强教授，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主席、清华大学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院长赵福全教授，清华大学发展规划处处长、学科办主任杨殿阁教授，车辆与运载学院院长李建秋教授，车辆与运载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周青教授等专家学者依次做了分享交流。

今年是车辆与运载学院成立一周年，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论坛以线上直播的形式开展，主讲嘉宾精心筹备，行业校友弹幕留言、精彩点评，共话行业未来发展。十余家行业媒体对本次论坛进行了视频转播和专题报道。

（车辆学院）

## “凝聚开拓，迈上一流”自动化云论坛举行

4月25日，为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9周年、纪念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成立50周年、分享自动化人抗击疫情的故事，以“凝聚各界力量、共谋未来发展”为主题的“2020清华自动化云论坛”举行。

在论坛开幕式上，系主任张涛回顾了自动化系5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成就，介绍了自动化系师生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卓有成效的工作。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1981级）、半导体生产工艺专家岳宏宇（1988级）分别代表校友和北美自动化系校友会致辞。在特邀报告环节，戴琼海院士作了题为“光电认知计算”的特邀报告。戴琼海强调要重视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和交叉创新。2020年，恰逢自动化系已故教授童诗白先生诞辰100周年。会上叶朝辉副教授、彭黎辉教授分别介绍了童诗白先生的生平和童诗白教育基

金计划。在“隔空对话”环节中，来自海内外的自动化系校友突破了物理空间的局限性，围绕“疫情对国内外经济与教育的冲击与变化”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下午举行的云论坛上，自动化系脑与认知科学研究所所长季向阳、控制与决策研究所所长叶昊、工业智能与系统研究所所长宋士吉、信息处理研究所所长张长水分别介绍了各研究所发展历史、名称沿革、队伍状况以及重点研究方向。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贲圣林（1982级）、清华大学自动化系检测与电子技术研究所所长郑小平、思必驰创始人之一俞凯（1994级）、启迪控股高级副总裁文辉（1989级）进行了报告和分享。

自动化云论坛受到了广大自动化系校友和在校师生的广泛关注，累计上线4000多人次。  
（自动化系）

## “85/90再同学，云聚一堂”开学第一课 ——清华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之学习日专场活动举行

5月3日上午，清华1985级（1990届）近500名校友云聚“荷塘雨课堂”，参加清华校友学习日专场活动。在当前国内外新冠疫情的特殊背景下，1985级校友以“85/90再同学，云聚一堂”为主题在云端庆祝母校109岁生日，共上“开学第一课”。

清华大学老校长张孝文通过视频向校友们发来问候。他肯定了校友们毕业30年来为国家和社会作出的贡献，对校友们取得的成绩表示骄傲和自豪。他勉励校友

们坚持学习，坚持锻炼，牢记和践行清华“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号召。他殷切祝愿校友们事业进步、家庭幸福。

1985级水利系水资5班校友、清华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担任本次活动的主持人。他代表学校和校友总会对现场和线上参与活动的校友们表示欢迎。作为1985级毕业30周年活动筹委会成员，水利系水资5班校友、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党委书记

武晓峰向大家介绍活动筹备情况以及后续系列活动安排，包括专刊征稿、纪念品准备、筹款、学术讲座等方面。主持人唐杰依次进行“开学点名”，来自1985级21个院系的校友代表先后来到现场报到，在摄像机前代表院系向母校109岁生日表达诚挚的祝福，为同学们送去真诚的问候，表达30年后再同学的激动心情和期待。1985级机械系压5班校友、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刁庆军主持了“开学第一课”。他介绍了母校举办“校友终身学习支持计划”活动的情况，并提出同级校友毕业30年后，云聚一堂再学习的意义。

本次1985级校友专场学习日活动邀

请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心理学系教授彭凯平，为大家带来“积极心态，幸福生活——心理学的科学启示”课程。彭凯平教授以科学的视角、丰富的案例、客观的研究阐释了积极心态与人的生命价值以及幸福生活之间的关系。他用生动的语言、辩证的思维深入浅出地向大家阐述了积极心态的意义以及如何有效建设积极心态的方法。

本次讲座为1985级校友毕业30年学习日专场活动。活动在1985级校友们的云祝福及五字班《天地同心》的合唱视频中结束。

(郭晓旭)

## 天津校友会举行纪念母校建校109周年 五四青年座谈会

5月16日下午，清华大学天津校友会召开“青春飞扬，君子无悔——纪念母校建校109周年五四青年座谈会”。座谈会由天津校友会青年分部、东丽空港分部、清控科创联合举办，天津校友会副秘书长张翼主持活动。

座谈会的重要内容是天津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郝玉林学长关于“清华校训与君子之道”的讲座分享。他首先介绍了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形成过程和深刻内涵，指出清华校训的本质就是要求大家做“君子”。他号召大家做“上接天气，下接地气，顶天立地的清华学子”。讲座后陈华老师谈其感悟，一是清华一直秉承自强不息、实干兴邦的理念，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二是清华校友做人做事要顶天立地，怀有君子之德；三是为

校友会对青年工作的重视以及青年力量的壮大感到欣慰和欢喜。

在青年校友发言环节，孙梦然作为一名创业者表示虽经历疫情公司受到影响，但相信风雨过后会有彩虹；贾龙作为光复街道的基层干部，疫情期间一直战斗在一线，在为社区居民服务的同时，自己也得到快速成长，他感到无怨无悔；张美侠校友感谢校友会给予她很多支持和帮助，让她能更好更坚定地走自己的人生道路；周博雅作为东丽空港分部秘书长感谢校友会对青年们的关心和支持，作为青年校友，一定会传承“清华精神”、“五四精神”，健康工作、快乐生活。

会后校友们合影留念，并一起餐叙、深入分享交流。

(天津校友会)

## 江西校友会庆祝母校建校 109 周年并召开 2020 年年会

5月24日上午，江西校友会庆祝母校建校109周年暨2020江西校友年会活动隆重举行。受疫情影响，此次活动采取线上与线下联动的方式进行，主会场设在江西南昌泰豪动漫学院。出席本次线上活动的母校领导有清华大学副校长杨斌、清华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同时在线的还有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副秘书长杨柳等，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助理梅晓鹏在南昌出席线下全程活动。大会由江西校友会副秘书长谢淘主持。

杨斌副校长通过云端讲话，对江西校友年会的召开表示热烈地祝贺，并重点介绍了母校实施的“强基计划”的培养目标、选拔程序和培养机制。史宗恺副会长向广大的江西校友致以亲切的问候。他表示江西校友会和江西校友的发展反映了清华大学的光荣历史、光荣传统和光荣文化，期

待江西校友会在进一步的调研总结的基础上，更好地讲好“清华故事”。

江西校友会会长黄代放在大会上致辞并作2019年校友会工作总结报告。重点介绍了江西校友会在联系校友感情、服务地方发展方面开展的系列活动。

会上，196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精仪系光学仪器专业的李剑白研究员、2009年硕士毕业于清华法学院的翁贤杰、2019年硕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法学院的王婷作为校友代表分别发言，学生赣文化交流协会伍绍文会长上台分享了2019学年协会工作情况。

“托思望云端，万里共清华”，此次校友会活动通过线上与线下两种方式联动开展，全球各地的清华人通过直播参与活动。截至大会结束，线上人气值突破10万，整个活动在一片温馨和谐的氛围中取得了圆满成功。

（江西校友会）

## 疫情下的校庆日，乔治亚州清华校友没有缺席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清华用“云校庆”方式，把世界各地的校友编织连接在一起。虽然云论坛、云展览、云演出、云赛事等线上活动让校友们感受到了别样的温馨与精彩，但是乔治亚州清华校友会林玮会长还是感觉缺了点什么。校友会成立20多年来，当地的校庆活动没有一次间断。今年当地的校庆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滑过，实在是于心不甘。

于是林玮临时动议，4月26日在校友会常年搞野餐聚会的Chattahoochee河边的Jones Bridge公园里，像往常一样挂

上清华校旗，欢迎大家来这里和校旗合影，然后以家庭为单位在公园踏青，在河边漫步。更有创意的是，他还设立了捐物箱，号召校友带来罐头、干粮、洗手液等物品捐赠给亚城的无家可归人避难所。

周末，亚特兰大天蓝树绿，云丽风清，校友们走出家门不负大好春光，度过一个特殊难忘的校庆日。母校的云校庆，云端精彩纷呈；亚城的河边游，水上风景独好。心念母校，无论身在何地；携手抗疫，天涯情同此时。母校109周年校庆，乔州清华校友没有缺席。（乔治亚州校友会）

## 南加州清华校友会 2020 云年会贺校庆

暮春四月的南加州，花团锦簇，草长莺飞。清华大学南加州校友会迎来了母校的 109 周年诞辰。每年此时校友会都要举办年会为母校庆生，但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南加州清华校友会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通过网络视频在史上首次举行了在线清华大学 109 周年校庆年会暨清华大学南加州校友会换届交接仪式。

中国驻洛杉矶领事馆教育组的曹乾领事、科技组的张斌领事，大陆和台湾诸多高校的南加州校友会代表，以及南加州地区的众多清华校友近百人通过 ZOOM 远程会议工具在云端相会。新竹清华校友李宜秋担任了活动的主持人，北京清华校友董恒担任活动的总制作。

下午 2:30，南加州校友会 2019—2020 年度会长何盈女士宣布清华南加州校友会年会开始。首先是齐唱校歌，悠扬的校歌让大家彷彿再度置身校园。张婧校友和黄宝如校友分别宣读了北京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和新竹清华大学校长贺陈弘的校庆致辞。何盈会长介绍了南加州校友会成立和发展历程，并代表 2019—2020 年度执委会做了工作汇报。俱乐部和专职部门的负责人轮流进行了工作汇报。董晓源理事长代表 2019—2020 理事会做了工作汇报。接下来是庄严的校友会换届交接仪式。在嘹亮的礼乐之后，卸任会长何盈将会旗交给了新任会长罗重阳，卸任理事长董晓源也将会旗交给了新任理事长黄守华。新任会长罗重阳发表了演讲。他觉得会长的更恰当的称呼是“首席志愿者”。清华人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推动社会变革。“我们

就是清华，我们走到哪里，清华就在哪里”。罗重阳还介绍了新一届执委会的团队构成，并对下一年的工作进行了展望。新任理事长黄守华介绍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包括理事会各个小组的召集人。他说，新一届理事会将奉行八个字的宗旨：弘扬校训，服务校友。

庄严的仪式和工作汇报之后，刚刚卸任的何盈会长和董晓源理事长为了感谢校友，特别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何盈为大家献上了朝鲜长鼓舞《春天的长鼓》；董晓源为大家献上了一曲男声独唱《儿行千里》，在悠扬激荡的管弦乐伴奏下，董晓源用深情而嘹亮的歌声细述对母校的眷恋。

文艺表演之后，是特约嘉宾主题演讲环节。清华大学 1990 级物理系校友、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熊勇博士带来的题为“人类与病毒和癌症之战：免疫系统的分子武器”的学术讲座。熊教授精彩的主题演讲给大家带来了一场科学的盛宴，很多与会的观众都纷纷表示大开眼界、收获满满。

主题演讲完成之后，为了向校友们提供更多的信息和交流机会，年会专门设置了开放时间 Open Townhall。刚刚卸任的何盈会长和刚刚就职的罗重阳会长分别就广泛关注的问题进行了讲解。当天，很多年长的校友们，都不惜花费很大的努力学会 ZOOM 软件上线来为母校庆祝生日。5 点过后，校友们才陆续离开会场，依依惜别，相约明年春天再会。

(南加州校友会)



## 致广大海外清华校友的一封信

亲爱的海外清华校友们：

如同月余前你们心心念念牵挂着祖国的亲人朋友，如今，我们也正时刻关注着海外疫情不断跳动的数字，牵挂着身处异乡的你们。

自从国内疫情爆发以来，海内外清华儿女勠力同心。分散四海的你们放下手头的工作，集结起来投入募捐抗疫的战斗中。你们克服采购、对接、物流各环节的重重困难，跨越山海、跨越时差，将一批批救援物资星夜兼程送到国内战疫第一线。你们说：虽然我们人在海外，但我们时刻关注着祖国的疫情，时刻记得我们身为清华人身上承担的社会责任。虽然你们一再表示“四海同心，无问西东”，但我们还是要郑重地对大家道一声：谢谢！

眼下，疫情正在全球蔓延。无论你此刻身处何地，请相信，病毒或许可以短暂地隔离我们，但绝不会让我们成为孤岛。历史的潮汐中，清华人从不曾在危难前却步，更不会松开紧挽的手臂。“团结”与

“自强”，始终都是我们清华人不变的底色。此刻，校友总会正在广泛联络、动员国内各地区的校友组织和校友，为海外抗疫防疫驰援，与海外校友共克时艰、共渡难关。也希望海外校友组织随时关注本地校友情况，及时了解校友需求，向校友总会随时反馈。请大家相信，我们必将倾力守护你们，一如你们曾为我们做的一样。

在保护好自己的同时，希望身在海外的各位校友、各校友组织也能积极参与到当地的防疫工作当中，为当地的社区做出贡献。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各国协同，通力合作，守望相助。当此之时，清华人责无旁贷。清华之厚德载物，不自今日始，亦必不因时情而滞。时局仍艰，但若同此情、共此心，则天涯无界！

春光已至，愿我们携手并肩，同舟共济，一起度过最艰难的时刻！

清华校友总会  
清华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

## 携手战疫，清华人始终在一起

3月以来，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海外校友的安危牵动着母校师生的心。了解到海外校友急需防护用品，校友总会迅速展开行动，一方面在国内发动校友和校友组织捐赠，另一方面通过海外校友会了解需求。截至5月18日，募集口罩10批次共计255000只，寄出口罩201740只。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各界校友（包括友人）捐赠海外如下：

深圳校友会联系深圳市慈善会、深圳市粤美特慈善基金会、粤美特医疗捐赠5000只医用外科口罩，并发动其下属的紫荆同学会捐赠一次性防护口罩10000只。赤峰红山高新区管委会捐赠一次性

## □ 校友联络

使用防护口罩 5000 只。东莞校友会、汕头校友会捐赠无纺布口罩 10000 只。洛阳校友会捐赠 KN95 口罩 2000 只，并快递至海外校友；另捐一次性使用口罩 3000 只。海南校友会捐赠一次性外科防护口罩 106000 只，并快递给海外校友。珠海校友会捐赠 58400 元人民币协助海南校友会为海外校友购买口罩。苏州图灵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捐赠一次性防护口罩 3000 只。五道口金融学院校友赖清华捐赠非灭菌性医用口罩 90000 只。深圳校友会副会长朱力为捐赠一次性医用口罩 21000 只，并直接将 3000 只口罩寄往美国。深圳校友唐更生捐赠 20000 元人民币。

由于不同国家对进口防护用品规格的要求不同，海关清关手续也不一样，快递公司的排单能力、运输速度差异也非常大。口罩的寄送面临政策、渠道等诸多难题。校友总会协同海外校友组织和国内捐赠校友，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随时调整应对策略，采取多种方式，尽可能以最快的方式将口罩寄到海外校友手中。

经过多日连续作战，满载着校友情的一包包口罩，及时送到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瑞士、瑞典、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在内的 15 个国家的校友手中，覆盖了 40 个海外校友组织。

海外校友组织除了积极联系校友总会，对接当地校友，解决物资需求之外，也十分关注当地校友群体的心理建设和防疫知识普及。温哥华校友会、北美清华校友会联合会和南安省校友会通过微信公众号推送防疫抗疫简报、资料、新冠病毒科普文章。波士顿校友会举办了在线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多位嘉宾解答大家关心的问

题并为校友们进行心理疏导。

海外校友会在保障校友自身健康的同时，积极投身到当地的抗疫行动中。他们募集善款，在校友总会和国内校友的帮助下，采购国内的防护用品，捐助给当地的社区、医院等，帮助身边的朋友乃至陌生人，共渡难关。

**据不完全统计，海外校友组织支援当地抗疫情况如下：**

休斯顿校友会向当地市政府、医疗机构及急救警员捐款 48217 美元、82850 元人民币以及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物品。纽约校友会向当地医院及警察局捐款 35440.8 美元用于购买防疫物资。西雅图校友会向本地单位捐款 13875.25 美元用于购买防疫物资。澳大利亚校友会向当地社区及老人院捐款 11610 澳元用于购买防疫物品。新西兰校友会向当地急救中心捐款 19600 纽币用于购买救护车及口罩。新加坡校友会向当地慈善机构捐款 5000 新加坡元购买防护口罩。波士顿校友会联合当地华人联盟 Westar Alliance 募集防疫物资，接受人民币捐款 102200 元和美元捐款 5501 美元，以及一次性口罩 108510 只和 KN95 口罩 200 只，捐赠给当地多家医疗机构及社区机构。北加州校友会联合清华企业家协会美西（TEEC）购置医用外科口罩，捐赠给当地医疗机构。华盛顿校友会向华盛顿地区同乡会联合会持续捐款。乔治亚校友会向当地医院及警察局救护队捐赠 3M 口罩。埃德蒙顿校友会向当地慈善团体捐赠外科口罩。

无论国内还是海外，只要在疫情严重的地方，都活跃着清华校友参与抗疫的身影。海内外清华人携手并进，共克时艰，在此危机时刻，弥足珍贵！（校友总会）

## 过勇赴浙江、福建访问并看望慰问校友

5月12日、21—23日，校党委副书记过勇先后带队赴浙江、福建访问，并看望慰问当地校友。

在浙江期间，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黄建发会见了过勇一行，并对清华大学长期关注支持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表示感谢。过勇感谢浙江省长期以来对清华大学发展建设的支持，并与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公务员局局长胡旭阳出席清华大学浙江选调生和青年校友座谈会。来自基层公共部门、高校和企业的20名清华校友参加活动，分享了在浙江工作生活情况和成长锻炼心得。过勇表达了学校对奋斗在浙江的校友的问候，并勉励校友们不忘初心、在各个岗位上贡献青春力量。胡旭阳肯定了校友们在浙江的工作表现，勉励大家用实际行动助力浙江改革发展。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张学伟，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张超等

参加了活动。

在福建，省委常委、厦门市委书记胡昌升会见了过勇一行。胡昌升对清华大学长期关心支持厦门发展表示感谢，肯定了清华校友在厦工作情况。过勇感谢厦门市长期以来对清华大学发展建设，特别是人才工作的支持。在与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杨国豪会谈时，杨国豪介绍了清华引进生在福建的发展情况。双方还就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等方面工作进行了交流探讨。在福建期间，过勇一行还先后赴福州市闽侯县看望当地校友，赴清华海峡研究院、厦门校友会驻点单位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调研并出席清华大学厦门校友座谈会，赴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调研并看望当地校友。省委组织部副部长陈炎标，厦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沈阳，清华大学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学生职业发展指导中心主任张超等参加活动。（清华新闻网）

## 第五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拉开帷幕 激烈角逐进行时

清华校友三创大赛是由清华校友总会主办的全方位、多层次、无间歇地支持校友和学生创新创业的大型系列活动，为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校友们、师生们提供展示、交流、融资和成长的舞台，为愿意帮助、辅导、支持和投资创新创业项目的校友们提供参与和对接的平台，推动母校的创新创业教育更上一层楼，为清华校友创新创业提供更大的势能和动能，形成互帮互助的清华创业圈。

自2016年首次举办以来，清华校友三创大赛今年已进入第五届，累计服务

3000多校友创业项目，聘请500多名创业导师、汇集150多家投资机构、上百名天使投资人，与60多个地方政府招商招才机构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合作。本届大赛报名项目930个，创历史新高。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第五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延期比赛，并及时调整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组织比赛，当前，西安、乌鲁木齐、东莞、兰州、深圳、合肥、广佛、郑州、惠州、汕头、上海、扬州、临沂、福建、江西、湖南、浙江、中国台湾，全国各赛区赛点初赛举办如火如荼，预计6

## □ 校友联络

月下旬进入赛区复赛阶段，8月举办总决赛，9月举办颁奖典礼。

疫情中的“三创”，广泛联系与推介校友科技抗疫企业，征集展示101家驰援校友科创企业；向科技部推荐科技抗疫先进成果80多个项目。其中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与国家科技重点专项项目13个，地方科技计划项目9个，其他国家科技计划项目2个；向外交部推荐可用于帮助国外抗疫的校友企业产品40多项。

疫情期间，本着服务创业企业的理念，清华校友三创大赛同步开展线上公益课，邀请产学研各界重量级导师讲授行业动态、创业痛点、分析实际问题，为创业企业蓄力续航。截至目前，公益课已顺利举

办完成13期。

4月22日至5月8日，三创大赛联手同方股份打造的“清华校友三创大赛首期训练营—清苗计划”线上授课启动，20个项目共计40位初创期校友参与了为期6天的创业训练，并邀请导师为项目进行一对一辅导。在同方大力支持下，链租科技、作业不凡两家校友项目申请到中关村高新企业，并安排帮助一家企业解决办公场地问题。

此外，清华校友三创大赛同步参与组织了科创中国系列路演活动，自第二期作为联合承办方参与至今，已主导6期网上路演，遴选推荐18个优质校友项目与172个投资机构/投资人对接。（三创秘书处）

## 清华校友总会召开第八届理事会 2020年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

7月4日上午，清华校友总会第八届理事会2020年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通过视频会议的方式在线召开。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友总会副会长韩景阳、袁驷、王岩等22位常务理事出席会议。会议由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友总会副会长史宗恺主持。

校友工作办公室主任、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从重要会议、抗疫行动、宣传工作、服务工作、日常联络、内部建设等方面汇报了半年来的工作进展。目前校友办（校友总会）的“十三五”规划工作总结已经完成，“十四五”规划正在筹划过程中，总会提出了建设“校友之家”的提案。

招办主任余潇潇向常务理事们介绍了学校推出的“强基计划”及新成立的五大书院的相关情况，党办校办主任丛振涛介

绍了学校110周年校庆的筹备情况。

在讨论交流环节，各位常务理事围绕校友工作、110周年校庆、人才培养等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史宗恺表示，在各位常务理事长期的支持下，校友工作有了新的气象。他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深度参与校友工作，尤其希望海外校友能充分发挥影响力，在校友之间多做联络和交流。目前学校在人才培养方面推出很多新的举措，校友们都非常关心，他建议秘书处发挥联络作用，促成常务理事与各个书院的院长进行交流，希望各位常务理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能提出具体的指导和建议。

最后经讨论，常务理事会责成秘书处根据常务理事们的建议起草110周年校庆校友活动建议书并适时发布。（黄婧）

## 各地校友会简讯

### 2020 新加坡校友会常年大会召开

5月30日，新加坡校友会常年大会在线上举行，51位校友出席。大会特别邀请了校友总会秘书长唐杰等校友总会的老师线上列席。会长张明首先进行开场白，之后在校友会秘书长莫家周的号召下，校友们纷纷打开摄像头，进行云集体拍照及签到工作。随后，校友会理事钟星对校友会会员方面进行汇报，副会长洪浩、黄智勇及校友钱晓冬对过去一年举办的校友活动及兴趣小组活动进行了总结。副秘书长邓煦超和理事赵永昌对新冠疫情相关的捐赠活动进行了分享。莫家周对一年来举办的五次理事会做了报告，财务吴也文进行了财务报告，副财务范真真宣读了过去一年新加入的校友会永久会员名单及为校友工作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校友名单。最后，唐杰对新加坡校友会一年中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并祝贺大会圆满成功。（元 浩）

### 青海校友会第四届理事会 第二次会议召开

5月31日，青海校友会第四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在西宁召开，28名理事以线上、线下的形式出席了会议。全体理事首先学习了清华大学109周年云校庆活动上邱勇校长和陈旭书记的讲话。随后，校友会秘书长潘岳做了2019—2020年度青海校友会工作报告，毛雯芝代表秘书处报告了校友会一年以来的财务情况。会议审议通过并调整了青海校友会理事会、咨询委员会、副会长及秘书处成员名单。与会理事就清华大学110周年校庆的筹备工作进行了深

入交流和讨论，多位理事表达了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的意愿。

（青海校友会）

### 安徽校友会赴长鑫存储参观考察

6月13日，安徽校友会顾问委员会主任邹淦泉、会长查飞和部分校友赴校友企业长鑫存储参观考察，长鑫存储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王厚亮校友陪同参观并座谈交流。校友们首先来到了企业展厅，了解了厂区建设及企业在自动化、无人化、智慧化等方面的进展。座谈会上，校友们听取了长鑫项目各方面的报告，对其取得的成绩赞不绝口，为之自豪。王厚亮欢迎校友们的到来，希望今后与校友会保持更加紧密的联系，加强合作，携手向前。

（安徽校友会）

### 佛山市清华大学校友会 注册成立大会举行

6月19日，佛山市清华大学校友会注册成立大会在华南高等研究院（佛山）举行。会议由校友会秘书长乔富东主持，会议审议通过了佛山市清华大学校友会章程。校友会会长叶青表示，校友会是联接高校、校友、地方的重要纽带。佛山市清华校友会正式注册成立，将进一步加强佛山清华校友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加强佛山市与清华大学的交流合作，引进更多清华大学的高端人才和创新资源落地佛山。与会成员还参观了华南高等研究院（佛山）新落成的展厅。校友会副秘书长、华南高等研究院（佛山）副院长黄韶辉表示，研究院与校友会将在创新资源引进、科研成果转化、项目落地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为佛山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作贡献。

（佛山校友会）

## □ 校友联络

### ● 校友消息

#### 清华十级老学长任扶善欢庆 105 岁生日



5月4日，清华十级老学长、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原劳动经济系主任任扶善教授迎来了105岁的生日，劳动经济学院领导代表全院教师登门祝贺。

任扶善 1915年5月4日生于辽宁营口，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社会学系，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6年起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前身北京劳动干部学校、北京劳动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副系主任、系主任。长期从事劳动经济和劳动法研究，是我国劳动学科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之一，是劳动经济学界泰斗级前辈。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劳动经济学》《劳动法学》《劳动法简史》《世界劳动立法》，翻译出版了《越南劳动法典》；公开发表劳动经济和劳动法学论文数十篇，并汇集成《劳动经济与劳动法文集》和续集出版。

#### 许渊冲老学长度过百岁寿辰

4月18日，著名翻译家、西南联大外文系老学长许渊冲教授迎来了百岁诞辰。生日当天，因疫情影响，亲友、学生和读者们的祝福只能隔空传递，而许先生则如往日一般，起床后做操锻炼，然后读书、写作。

许渊冲 1921年4月18日生于江西南昌。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外文系，1944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外国文学研究所，1948年留学法国。1951年任教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文系。1983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他从事文学翻译长达六十余年，译作涵盖中、英、法等语种，翻译集中在中国古诗英译，形成韵体译诗的方法与理论，被誉为“诗译英法唯一人”。在国内外出



版中、英、法文著译六十本，包括《诗经》《楚辞》《李白诗选》《西厢记》《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等。在百岁诞辰之际，他还为读者带来《林深见鹿：美得窒息的唐诗》《纸短情长：美得窒息的宋词》《燕燕于飞：美得窒息的诗经》。



#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冀朝铸逝世 曾见证中美关系重要瞬间



任  
时  
工  
作  
照  
冀朝铸在联合国

我国著名外交家、联合国原副秘书长冀朝铸于4月29日下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冀朝铸曾担任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的翻译，并见证了朝鲜停战谈判、中美建交谈判等历史性时刻。

### 参与朝鲜停战谈判，荣立三等功

冀朝铸1929年7月生于山西省汾阳县，早年留学美国。新中国成立后，他追随父亲冀贡泉、兄长冀朝鼎足迹，毅然放弃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学业，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1950年10月，冀朝铸就读于清华大学化学系。1951年5月，他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2年4月后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停战谈判中表现出色，获得中朝两国的表彰。

对于参与谈判的经历，冀朝铸这样回忆：“有时在谈判无法突破时，一发美国炮弹就会落到非军事区我方一边，板门店附近，甚至开城。这时就有一个双方联合

调查，一般双方各派一名军官，还配备一名翻译和一名速记员。我方一般派出柴成文上校，我是速记员。速记员的职责不光是记录双方说的话，还要记录落下炮弹上所有的标志和文字，以证明非军事区的协议被破坏了。有一次，一枚美国炸弹落在弹坑里，没有引爆。我跳到弹坑里把炸弹上的所有文字和记号都记下来才爬出弹坑。当时在板门店主持谈判工作、后来的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同志有次对我大哥朝鼎说：‘你弟弟非常勇敢，不怕死，敢跳进没有引爆的弹坑里。’”

当时，停战协定为中文、朝文、英文各一式两份，中方的英文停战协定由冀朝铸负责打字。紧张艰苦的谈判，尖锐激烈的交锋，情况不断发生变化，协定草案每改动一次，冀朝铸就要重打一遍。为此，他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连饭也是在打字桌上吃的，终于形成了最后的正式文本。

1954年1月，我方代表团根据冀朝铸的表现为他记了三等功，颁发了立功奖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也授予他三等功勋章一枚。冀朝铸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把勋章挂在胸前的时刻，是我一生中最自豪的时刻之一。”

### 17年翻译生涯，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回到北京后，冀朝铸被分配在外交部工作，195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 □ 怀念师友

从1957年起，冀朝铸开始担任周恩来总理的英文翻译，在此岗位上一干就是17年，先后参加过“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和中美建交谈判工作。他还曾为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当过翻译。

1955年4月，周总理率代表团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当时，国民党特务在代表团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放了炸弹。虽然周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暗杀没有得逞，但代表团多名人员不幸遇难。而当时因为名额不够，冀朝铸没有坐飞机而是乘船前往万隆，幸免于难。

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周总理出访亚非14国，冀朝铸全程担任翻译。此次出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周总理在回国后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报告时，特地提到了翻译同志的功劳：“这次访问如果没有齐宗华（时任法文翻译）和冀朝铸二人当翻译，就很困难。”

1970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向中国传递口信：准备开辟一条白宫通向北京的直接渠道。

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



1970年10月1日，冀朝铸（左2）同毛主席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

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25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斯诺合影的照片（冀朝铸任翻译）。中国以这种方式向美国发出赞成中美实现高层对话的信息。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周恩来总理前去机场迎接。冀朝铸回忆，尼克松还没完全走到舷梯下面，就远远地朝周恩来伸过双手。

“总理马上迎上去，我也跟上去。我知道自己不能站得太近，也不能站得太远。”冀朝铸说，此前，周总理特地要求，“小冀近一点，每句话都得准确地听清楚，准确地翻译”。然后，冀朝铸替尼克松翻译出了那句有名的话：“我是跨越太平洋与中国人民握手。”

### 关键的关键，是要忠于祖国

周总理曾关怀冀朝铸说，翻译人员到了40岁应该转行，一是工作太辛苦、年纪大了吃不消，二是积累了经验可以做其他的工作。

1973年3月，冀朝铸离开翻译岗位，



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时，冀朝铸（左4）为周总理做翻译

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参赞，正式成为一名外交官。1975年5月他回到国内，先后任外交部国际司副司长、美大司副司长。

1982年3月，冀朝铸再次赴美，为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1985年转任中国驻斐济大使，并兼任驻基里巴斯和瓦努阿图大使。1987年，他成为中国驻英国大使。

1991年1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宣布任命冀朝铸为联合国副秘书长，主管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他是继唐明照、毕季龙、谢启美后，第四位来自新中国的联合国副秘书长。

1992年，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决定进行改组，将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科技发展中心、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跨国经济中心、总干事办公室合并成一个部门，一共有1000多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部，冀朝铸是负责这个部门的副秘书长。

1996年，冀朝铸任期届满，回到国内，担任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直到2005年卸任。

在谈起当外交官的体会时，冀朝铸说：“关键的关键，是要忠于自己的国家。”

（转自“长安街知事”微信公众号  
2020年5月3日）

## 追思“建筑仁者”李道增

○ 张 静

2020年3月19日，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建筑教育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首任院长李道增同志，因病不幸逝世，享年90岁。

李道增院士在建筑学理论和设计实践两个方面均有深入而广泛的探究，并取得了卓越成就。坚持中国建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出了“新制宜主义的建筑学”理念。主持设计了清华大学建校百周年纪念性建筑清华大学百年会堂——新清华学堂、校史馆、蒙民伟音乐厅，以及中国儿童艺术剧场、北京天桥剧场、台州市艺术中心等重要文化建筑工程。

从青年意气风发到两鬓斑白，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他一生耕耘不辍，在建筑领域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有人住高楼，有人处深沟。有人光万丈，有人一



李道增院士

身锈。世人万千种，浮云莫去求。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感动于先生的追求，钦佩于先生的坚持，希望能在一代建筑大师的剧场空间和设计维度中见天地，见人生。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李道增先生。

## □ 怀念师友



2014年9月5日，李道增院士观看“书香之夜”教师节专场音乐会

2011年12月16日，清华大学2012新年音乐会在新清华学堂拉开帷幕，这也是这座剧场的首次试演。远远望去，砖红色的圆形建筑优雅端庄，与百年的园子完全融为一体。舞台上学生艺术团正在徐徐演奏，观众厅座无虚席，一位耄耋老者坐在前排，和全场观众一道如痴如醉。他就是这座建筑的总设计师——李道增。

包括这座剧场在内的一组建筑——新清华学堂建筑群于2011年落成，既是李道增先生的封山之作，也是他献给清华百年华诞的礼物。建设过程中，八十高龄的他多次亲自到工地巡视，对工程施工质量尤其关注，他强调：“这是百年建筑，一定要保证质量。”团队一开始就坚持综合各方意见，不断进行设计优化，比如取消了新清华学堂的电影放映功能，将建筑声学混响时间定在1.6~1.7秒，实现了综合歌剧院的专业声学效果等。

2012年4月8日，新清华学堂正式启用，当天中国爱乐乐团应邀举行首场音乐会。演出后，指挥家余隆激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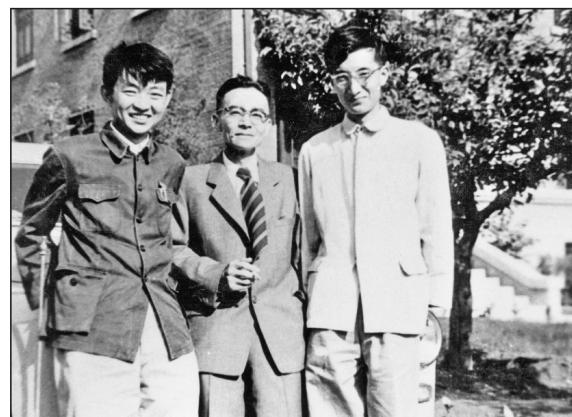
地说：“这是非常专业的剧场，我为清华有这样的剧院感到惊喜！清华有伟大的建筑系！”

李道增17岁进入清华，一生致力于剧场建筑的研究，在夫人石青心里，先生无疑想为母校亲手设计一座最好的剧场。

### “凿户牖以为室”

李道增从小好学善学，是李鸿章所在的李氏家族中公认的学习榜样。1947年，李道增以高分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后转入建筑系。因从小喜欢画画，而建筑专业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他的物理学基础和美术爱好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1946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清华创建了建筑系。1947年秋，梁思成刚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李道增便进入建筑系学习。梁思成那部创中国古建筑研究之先河的《中国建筑史》让李道增着了迷，人生便这样调转了船头。



1956年，梁思成（中）与李道增（左）、林志群参加全国科学规划会议时合影

“梁先生给我们讲建筑史的课，《中国建筑史》教材也是他写的。书的大意是说，建筑活动是以其地域、时代、气候条件和当时能够提供的物产、材料的品种数量，更不自觉地受到同一时间的艺术、文化、技巧、知识、发明的影响，而建筑本身的规模、形体、工程艺术恰恰是民族文化兴衰的一面镜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建筑，将最准确地反映这个国家、民族物质精神继往开来的面貌。他期望的建筑是人对于城市寄托的一种美好理想的追求，使城市成为人们思想精神的载体，得到艺术上的升华。”

李道增回忆，梁先生在我们新同学入学的迎新会上讲了一个小故事，我一直记得。他当年在美国，作为中国代表，跟很多专家商讨联合国大厦的建设方案，拜访了美国现代建筑大师莱特，这位大师非常了不起，是唯一一位上美国邮票的建筑师。莱特见了他以后，第一句话就问他：“你为什么要到美国来学建筑？你们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两千年前就在《道德经》里把建筑的哲学问题讲透了，‘建筑是空间，而非实体，实体包涵的空间才是建筑中的主角’。《道德经》的原话说，‘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从那个时候起，这句话才在建筑界传开，变成了历史名言，大大地长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

当年的清华建筑系只有二十多名学生，但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位先生执教却毫不含糊，重国学也重专业，重理论更重实践。他们在设计课中引进了现代建筑的理论，尝试用包豪斯新学派中的一些观念大胆改革传统学院派的教学体系和内容。李

道增从一年级开始学“抽象图案”，替代古典建筑中的五种柱式。这在当时，可谓开全国建筑系之先河。

梁思成还十分重视加强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提高学生的审美趣味。如果只顾练“技巧”，艺术作品必多“匠气”而少“灵气”与“内涵”。他说：“建筑师应当是在日常生活中最敏感的。建筑师所见到、听到、感觉到的东西比一般人多而深，因此比一般人也多一层美的享受。要善于体验，善于观察，善于分析，处处皆学问。”这些都让年轻的李道增受益良多，也为他日后在建筑设计中使建筑与文化融合在一起奠定了基础。

1952年，李道增毕业留校，先后担任梁先生的秘书兼助教、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系主任。他选择了过去国内少有人涉及、被称为建筑界重工业的剧场建筑作为毕生主要研究方向。1988年清华大学成立建筑学院时，他担任了首任院长。

### “一生的剧场”

1958年，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国家大剧院的建设曾被提上议事日程。几经评比，最终选中了当时年仅28岁的李道增主持设计的方案并委托清华大学作为设计单位。

然而，设计工作一开始便面临重重困难，剧场工程要涉及声学、灯光、舞台机械、建筑设备等多方面的知识，可当时国内既缺乏现代大型剧场设计经验，也没有相应的设计规范，可借鉴的仅有苏联和民主德国的剧场设计。虽是白手起家，但李道增和他的同事们还是迎难而上。他们翻遍了图书馆里所有外国杂志、图书，在汲取国外剧场设计经验的同时，积极开展科

## □ 怀念师友

研工作。此外，还广泛征求著名艺术家们的意见，不断修改完善设计方案。

夫人石青介绍说：“当时李先生刚升了讲师，带了12个高班同学，就是毕业班的同学（来做这个设计），就这么多人。那时候一天等于20年，真的，敢想敢干，没日没夜。”

清华大学从建筑系、土木系等抽调了三百名精兵强将，具体设计方案及图纸全部如期完成。可到了破土动工的时候，却因经费困难被叫停。这一等，就是40年。

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大剧院项目又开始提上议事日程，李道增积极参与可行性研究设计，提供了很好的设计参照。1998年4月，在京开始举办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的国际邀请赛。经过数轮的设计之后，仅剩下几家国内设计单位与国外的设计事务所。这几家国内外设计单位分别组队联合设计，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法国资深设计师安德鲁领衔的巴黎机场设计公司合作。在合作过程中，两家单位分别出具自己为主的方案，相互建议对方方案。为此，清华团队的主要成员（李道增、胡绍学、朱文一、庄惟敏、吴耀东、卢向东）还到巴黎访问，与安德鲁团队协商。

“剧场的古典主义的精髓深深地扎根在李先生的心中。严格的几何关系构图、精细的立面细部、丰富的雕塑、空间秩序、功能应对，都是李先生在剧场设计中坚持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卢向东回忆道，“那次参访过程中，我们参观了巴黎数个剧场，其中有巴黎歌剧院、巴士底歌剧院。在巴黎歌剧院，李先生激动异常，我想，他终于亲身体会了这个神交已久的经典剧场。”李道增兴奋地不停拍照，给大家讲解这个剧场设计的故事。院

方带领团队在歌剧院舞台上上下下参观，李道增不顾年事已高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坚持与年轻人一起爬上巴黎歌剧院的台塔参观。他看得很仔细，问得也很专业。彼时还是青年教师的卢向东在一旁听着，感觉上了一堂生动的剧场课程。

最终李道增提出了一个结合佛教坛城和九宫格构思的设计方案，得到大家高度认可。这个方案的主要剧场布局依然是他在80年代初研方案时的样式，三个剧场一字排开，南北朝向。但是此时的新方案增设了一个圆形的巨大围廊，围廊周边是巨大的水面，围廊、水面、剧场三者之间构建了复杂丰富的室内外空间，与周边的环境具有良好的契合关系。同时，方案本身也高度结合了东西方文化的内在精华，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空间上，既有西方古典建筑的气息，又有东方建筑文化的韵味，反映了其高超的设计水平和学术功底。

在这段呕心沥血的竞赛过程中，李道增几乎付出了全部身心，期间曾多次重病，甚至危及性命，但是什么都不能阻止他参加竞赛的决心。“虽然最终很遗憾未能作为实施方案，但是这个方案反映了先生不断突破自己的追求，让人肃然起敬。”卢向东说。

从而立的血气方刚到古稀的“从心所欲”，40年的等待并没有消磨掉李道增对建筑的热爱。无论是设计国家大剧院、天桥剧场、儿童艺术剧院还是后来的新清华学堂，每当有了任务，他便沉醉于其中，废寝忘食、没日没夜地工作，“对设计达到痴迷的状态”；每当讲解剧场设计理念和构思时，他总会结合戏剧的发展娓娓道来，双眼闪闪发光，表情丰富、手舞足蹈，整个人仿佛也融入了剧场中的戏剧艺

术家的表演之中。

夫人石青曾问先生：“做了这么多（建筑），你最喜欢哪个啊？”李道增回答说：“盖起来的我都喜欢，没有盖的，我虽然很遗憾，但是我也都很喜欢。”

川泽纳小，所以成其深厚；山岳藏微，所以就其博大。一切成就的获得都是李道增多年沉稳努力、日积月累的结果，《西方戏剧剧场史》专著是最好的例证。自1958年始至1999年，他汇集四十余年国内外访问、调研所得的学术积累，出版了这部150余万字、近1500幅插图的煌煌著作。该书横跨戏剧与建筑两个学科，融人文与科技于一体，史料翔实，被公认为是他对剧场研究所作的重要贡献。

### “建筑师得像裁缝一样”

20世纪80年代，生态可持续发展的思潮在国内开始热起来。早在80年代初，李道增就在《建筑学报》上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中国的建筑应该走结合国情的因地制宜的道路，并提出“新制宜主义”的理论观点。这一观点被认为是我国那个时期较早关注生态和可持续发展，并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学术思想之一。李道增主张“因地、因事、因时制宜”，追求在历史、人文和自然环境共同作用下，把人和房子的自然关系调整到最佳状态。其设计思路概括出来则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得体切题，兼容并蓄；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且强调细部设计”。

在那个年代里，我国新建和改建剧场达数百个，连一些县城也拥有了大剧院，其中60%以上占地面积在1万到5万平方米之间。而李道增看来，剧场规模太大并不可取。他一生坚持，建筑师得像裁缝一

样，讲究“量体裁衣”，神居于形。“有很多建筑师他不甘于做服务工作，好像是你必须听我的，这颠倒过来了。”李道增说。

获“首都十佳优秀公建方案”第一名的天桥剧场方案，便是“新制宜主义”思想指导下“量体裁衣”的作品之一。“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忆家”是当年对天桥“场所精神”生动的写照。李道增认为，天桥留在老北京脑海中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下层平民百姓重要的活动场所，既“杂”且“精”，为以杂取胜、以精取巧、中西合璧、土洋结合的民俗文化发祥地。因此，他运用了既简洁、明快、大方、庄重，又丰富、细腻、活泼、可亲的兼有北京地方色彩与时代精神的造型手法，来表现剧场的高雅与民俗相结合的艺术特色。

在考虑观演关系的同时，李道增还将剧场看作一个复杂的、需要经营的综合体。在天桥剧场的设计中，他多次带着团队与著名芭蕾舞艺术家赵汝蘅等众多使用方讨论设计，非常尊重使用方的意见。了解到芭蕾舞演员在上场前需要热身，因此将一个大排演厅安排在舞台后方，化妆间布置在周围，以方便等待上场的演员在排演厅练习热身、就近上场；考虑到剧场接团时演员的住宿和餐饮，主动提出增设演员宿舍和餐厅等等。这个做法也为随后台州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实际使用起了很好的作用。

台州市文化艺术中心位于台州市新区文化广场东南侧，包括一个1080座的剧院和培训中心等一系列文化设施。建筑的天际线与周围山水环境的轮廓线遥相呼应，充分体现文化艺术类建筑的特征，造型活泼。使用当地石材做为主要外饰面材

## □ 怀念师友

料，以廊、桥、墙体、内外庭院相互穿插组合成轻松自由的建筑群体，运用水面、雕塑、浮雕墙面组织外部空间，多种艺术形式的交汇融合使文化中心的艺术主题更加突出。同时重视广场上四幢建筑之间的总体协调，并利用墙、廊、统一材质等共同的造型元素营造既多样又统一的总体形象，是对以西方现代建筑语言表达中国建筑空间特质的一次探索。

李道增遵循安全、实用、经济、美观的原则，结合台州实际情况，回归建筑创作的基本原点，建成节地、节资、节能的多用途文化艺术中心。运营以来，台州市文化艺术中心已达到全年满负荷演出并自负盈亏，与一些求大求全、求特求奇、依靠政府贴补运营的剧场形成鲜明对照。

对于学术和创作，李道增总是以最充满激情的状态去吸收、去涉猎、去钻研、去传播，时刻关注学科前沿和热点问题。1982年即发表过符合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论文《重视生态原则在规划中的运用》，1985年在国内领先开设“环境行为学概论”（已出版同名著作）学位课程，将研究领域扩展至可持续发展生态建筑。

作为建筑学院原院长的他，又是一位理念鲜明、头脑清晰的学科带头人，“一个学校不能随波逐流，应该成为指南针、智囊团，引导发展。”李道增总和学生们讲：“梁先生说，‘建筑师的知识领域要很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位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他从梁思成那里继承了清华建筑办学的思想，也用这一思想领导清华建筑学院的发展，指导学生成长成才。

## “春风化雨乐未央”

李道增对学术的严谨，是他的学生们都充分领教的。

建筑学院现任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庄惟敏教授，博士在读期间赴日本千叶大学进行博士生联合培养，专攻“建筑计画”。建筑计画（即建筑策划）是关于建筑设计前期研究的工作，涉及各建筑相关因素的分析、评价和论述，其目的是研究、归纳和分析推导出建设项目科学合理的设计任务书以指导建筑设计，避免建设项目在一开始出现的错误。近几十年来该研究在西方兴起，被称为Architecture Programming，开创了建筑学领域的一个新的学术方向。尽管英文和日文对其都有明确的文字表达，但在中国还是很不明确，如何定义和明确它的中文表达，李道增非常谨慎和认真。

“先生认为这是建筑学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学科发展的体系问题。”当时庄惟敏的论文已经有了基本雏形，李道增在他多次的通信往来中一直探讨标题的表述，“事实上就是对该研究方向和理论体系的中文名词表达的讨论。当时对Architecture Programming（建筑计画）台湾已经有学者翻译为‘企划和计划’，为此先生参阅了大量的英文、日文资料，了解国外发展的背景，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分析，特别邀请当时任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的林志群先生和建设部设计局局长张钦楠两位资深学者一同探讨中文名称的界定问题。经过慎重地分析，最终确定‘建筑策划’的中文表达，而我的论文题目《建筑策划论——设计方法学的探讨》也就最后确定下来。”

建筑策划的理论也因此受到国内建筑界的关注，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实践和理论积累，建筑策划已经成为当今建筑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知识组成，成为注册建筑师考试中一项重要的知识要点，建筑策划也被纳入《建筑学名词》。

画图是建筑的基本功，学生们都知道李先生做设计、画图既好又快，是一位身怀绝技的“高人”。天桥剧场地处闹市，且地段狭窄，如何将复杂的功能和空间安排妥当？李道增将方案草图绘制得非常细致，将半透明的草图纸覆盖在有网格的坐标纸或底图上进行工作。多数草图都是用尺规完成，有铅笔线条也有墨水线条，修改之处的痕迹明显，或者用涂改液覆盖后再画，甚至局部粘上另外一张纸继续画。

在1993年后，计算机应用开始进入到设计领域，李道增敏锐地察觉到它将对建筑设计带来的巨大影响，从自己的科研经费中出资购买当时最好的计算机，让学生们学习使用。但他依然是拿着异常工整的手绘草图，让学生在计算机上绘制正式图。

“李先生饶有兴趣地坐在我们一旁，盯着屏幕，看着我们点击鼠标、敲击键盘、将图输入，时不时提出修正意见。当看到屏幕上一些有趣的绘图命令执行结果时，李先生会天真地乐不可支。他常常一坐就是半天，甚至一整天。”卢向东说道。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不善言表的李道增，总是这样把对学生的关爱默默融在行动之中，学术上严谨求实没有丝毫的马虎，精神上给予充分的理解和鼓励。

1993年，庄惟敏赴美短期考察。李道增知道后很高兴，耐心地向他介绍应该去哪个学校访问，去哪个建筑参观，还给他写下了小儿子在美国的住宅地址，告诉可以去那里暂住，并细心地告知该乘哪路汽车、到哪站下车、下车站的情景和地点特征，同时给他看小儿子的照片和家人的照片，关照之细致令庄惟敏深深感动。

庄惟敏动容地说：“后来听说李先生为此专门给他的小儿子打电话，告诉他我的详细行程，以及嘱咐他到车站去接我，怕我一个人人生地不熟找不清方向。他就像长辈嘱咐出远门的孩子一样，事无巨细，详尽周到。”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市朝一夫……”七十余载风雨，李道增同清华大学建筑系一道走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系馆旧貌换新颜，依然青枝绿叶。被评为校级精品课的“环境行为学”交换接力棒，依然书声琅琅。上百页教案工整誊写，牛皮纸袋里投影胶片张张精美，建筑学院的办学理念在师生间代代传承。百年学堂翻开新篇章，依然是师生心中最向往的艺术殿堂。悠悠时光里，唤起莘莘学子心底对美的渴望。

“学校百年诞辰的第二天，我正在清华设计院门口等人，突然身边有一辆电瓶单车疾驰而来，我定睛一看，吃了一惊，原来骑车人是李先生。”

庄惟敏回忆道：“我原本以为是李先生心情高兴，偶尔骑着放松一下，可谁知那以后电动单车就成了李先生上下班的代步工具了，而且骑行的速度并不慢。要知道那时的李先生已经是81岁高龄了。”

谦谦仁者，为也欣欣，退也融融。

# 深切缅怀李卓宝教授

○王孙禹（1977级电机）

○刘惠琴（1987级机械）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清华大学原党委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原国家教委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兼高等教育学科组组长、国家教委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首任所长，《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杂志原主编李卓宝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3月13日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91岁。

## 一、救国求学

清华大学文科有着十分悠久的发展历史，其中教育学科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1911年清华学堂设有哲学教育学科，1926年清华学校正式建立教育心理学系。1945年8月抗战胜利，次年5月西南联大宣告结束，随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回原来校址。复员后的国立清华大学未设教育

学系，但仍设有心理学系。

1946年，来自名门望族的李卓宝怀着救国求学的理想，毅然只身从澳门北上，到清华求学。当年的清华理学院心理学系是全国知名的学系之一。那年考取心理学的有陈金秀、李卓宝、姜德珍、马利英等学生。由此，李卓宝成为心理学泰斗、系主任周先庚先生的学生。1950年李卓宝毕业，获心理学学士学位，留校执教。

在清华党组织的关怀和引导下，李卓宝于1948年10月加入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开始革命工作。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3年，任清华大学共青团团委副书记；1950年8月至1966年6月，任清华大学党委委员；1953年至1958年，任清华大学速成中学副校长、党组书记；1958年9月至1966年9月，任清华大学基础部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曾任北京市第二、第三届党员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市妇联常委、北京市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1984年3月至1986年2月，李卓宝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室主任；1986年3月至1992年10月，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首任所长和《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主编。

1987年7月，李卓宝获批研究员资格，是我校文科最早获正高级职称的教师之一。

1993年3月，李卓宝教授光荣离休。李卓宝教授把一生献给了为之终



2009年11月，李卓宝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机构成立30周年暨教育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致辞

生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献给了祖国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给了继承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文化传统的人民教育事业，献给了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伟大事业。

## 二、建所之功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心理学系随理学院并入北京大学。尽管1952年院系调整至“文革”结束，清华大学没有设立教育及相关学科与课程，但关于教育研究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特别是有关教育教学研讨会这样长期坚持的教育研究活动未曾中断。1953年开始，学校共召开过数十次教育教学研讨会，内容涉及学校发展、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以及修订教学大纲、交流教学经验、推进教学改革等等。

李卓宝教授始终是清华大学开展教育研究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

改革开放以后，为适应社会发展及学校学科建设的需要，清华大学对原有院系、研究机构等进行了调整和增设。在李卓宝教授和多位领导的建议下，1979年10月26日，经学校研究决定，成立“清华大学理工科教育研究室”，下设应用心理学研究室、校史研究室、基础教育研究室等，直属学校领导。1980年起，汪家镠、邢家鲤、李卓宝先后任教育研究室主任。办公地址设在明斋东侧一楼北头，白手起家，创业十分艰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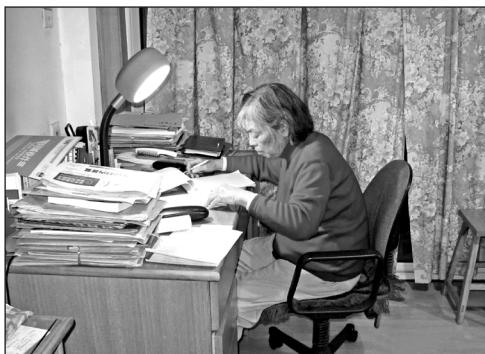
随着清华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1986年2月25日，在校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工作会议联席会议上，决定将教育研究室改为教育研究所，隶属于校机关。下设高等教育研究室、普通教育研究室（附中）、校史

研究室（党委宣传部）、杂志编辑部、资料室。由学校有关校长领导，党支部属校机关党委领导。同年3月6日，校长工作会议通过，任命李卓宝为教育研究所所长。办公地址迁到文科楼五层。

1993年12月26日，校务会议决定建立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育研究所隶属关系由校机关转至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由此，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由一个隶属校机关的行政事务部门转型为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填补了清华学科门类中缺少教育学门类的空白。

李卓宝教授坚持教育研究要大中小学一起抓，认为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是“一条龙”，因而特别邀请附中校长万邦儒兼教育研究所普通教育研究室主任。李卓宝教授曾自嘲，清华大学与别的大学不同，别人称“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我们称“教育研究所”，比人家少四个字——“高等”和“科学”。因为我们不能只讲“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必须考虑到基础教育的发展和衔接；我们不是不追求“科学”，但我们更强调的是，讲求实事求是，讲求解决具体问题。

在高等教育研究尚属创始阶段，李卓宝教授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始终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结合和利用自身丰富的高等教育实践经验，深入调查研究，深刻论述了理工科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对高等教育研究中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关系、领导干部与教师群众共同参与教育研究的关系、教育专业教师与理工科专业教师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思考。为清华大学和全国教育学科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作出了杰出成就。



李卓宝教授伏案工作

### 三、人才培养

改革开放以后，李卓宝教授意识到中国的教育要走向世界，提出要结合我国的国情，学习借鉴西方教育制度中的长处；针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急需培养创新人才，提出要培养学生的独立创造性；针对提高工科人才培养质量的客观需求，提出工科需要有坚实的理科和人文科学基础等重要思想。

为此，教育研究所成立初期曾招收专科生。1990年至1996年曾招收“高等教育管理专科班”和“办公自动化专科班”，开设高等数学、中国革命史、管理学、逻辑学、心理学、专业英语、电工与电子技术、办公自动化应用、普物实验等课程。同时，教育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为高等学校、国家机关、教育管理部门以及重点企事业单位培养输送高质量的毕业生；此外，教育研究所还开办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培养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的教学研究和管理骨干。

自1990年起，教育研究所相继获得高等教育学、教育管理学、应用心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后来还获教育经济与管理、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

1991年教育研究所获批高等教育学硕士学位授予点后，李卓宝教授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并亲自讲授研究生主干课程“高等教育学”。

1993年，李卓宝教授指导的清华大学第一位教育学研究生王宇毕业，并获硕士学位，毕业论文题目为《中国理工科大学毕业设计（论文）之研究》。此后，李卓宝教授名下陆续毕业的硕士生有李学禄，硕士论文题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张岩峰，硕士论文题目为《人与文化——大学人文教育之意义》。

### 四、科学研究

在李卓宝教授的带领下，教育研究所除为教工、学生开设有关课程，承担教学任务外，还积极号召清华大学教育管理人员和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育科学课题的研究，积极参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的发展规划课题，整理编写清华大学校史，为教育研究人员提供相关图书资料等。在此基础上，李卓宝教授亲自推动并建立了一系列教育研究组织和机构，拓宽教育研究的平台，壮大教育研究的队伍，使清华教育研究得以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会。**1986年4月，作为群众性学术团体的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会成立，其宗旨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教育科学的研究，总结我国特别是我校教育工作的实践，借鉴国内外的有益经验，探讨教育的客观规律，促进学校教学质量、科学研究水平和管理水平的提

高，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做出贡献。时任校长高景德任理事长，方惠坚、李卓宝任副理事长，至1990年，教育研究会有会员200余人，下设15个研究小组，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积极开展总结、研究和交流活动。

1990年6月，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1993年12月，召开第三次会员大会。大会通过第三届教育研究会理事会名单，其中，理事长杨家庆，副理事长胡显章、吴敏生、白永毅、郑燕康、王孙禹，秘书长李越，副秘书长李家强、刘惠琴。

教育研究会的成立，使学校教育研究队伍由少数专职和大量兼职人员相结合组成，日常组织工作由学校教育研究所负责，推动了群众性教育科学研究蓬勃开展，并取得大批研究成果，对学校的教育改革和建设工作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李卓宝教授的带领下，教育研究会先后完成了有关“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理工科大学培养人才主要特征”“新时期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规律及其应用”“应用学科高层次专门人才培养途径多样化”，以及“高等教育评估”“高等教育管理”“大学生社会实践”等全国哲学与社会科学“七五”“八五”国家重点课题。

教育研究会承担的课题任务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其科研成果曾荣获国家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全国高等教育学会优秀成果奖、北京市高教学会优秀成果奖等，获奖数量和等级在全国高校中名列前茅。如，《大面积、多层次、多规格开展因材施教》的教改试验研究获第一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清华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试验报告》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1990年教育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还有多

篇论文分获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教育科学优秀论文成果奖和国家教委直属高等工程教育研究协作组优秀论文奖。这些研究成果对繁荣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研究做出了有益贡献。

**清华大学高等教育学会。**2004年12月28日，清华大学高等教育学会正式宣布成立，校长顾秉林担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根据学会章程规定，“清华大学高等教育学会是学校广大教职员的群众性学术团体，接受清华大学的领导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指导。学会将面向高等教育的实践，开展教育科学研究，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此后，我校教育研究会与高等教育学会一并运行，一并开展工作。

**清华大学学生心理咨询中心。**1987年，清华大学建立了高校最早的学生心理咨询中心，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心理服务。2000年，教育研究所设立了心理学研究室。2006年4月18日，成立“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要从事心理学与认知科学的跨学科研究。2008年5月14日，校务会议讨论通过，决定成立“清华大学—伯克利心理学研究中心”，中心积极组织协调校内文、理、工、医等相关学科研究力量，开展跨学科前沿性研究，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致力于心理学的研究和教育。

在李卓宝等专家教授的倡导下，同年5月20日，校务会议讨论决定恢复建立心理学系，其中应用心理学专业由教育研究所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心理学系共同建设。

在学科建设方面，李卓宝教授在创立全国理工科大学第一个教育研究所之后，除了担任教育研究所首任所长外，还曾担

## □ 怀念师友

任理学院领导小组组长等职务。曾多次召集校内外专家学者研讨清华大学心理学科建设问题。作为清华心理系的早期毕业生，李卓宝教授一生对心理学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生从未放弃过重建和繁荣清华心理学学科的梦想。

清华大学工程教育中心。2008年12月3日，校务会研究讨论通过，决定成立“清华大学工程教育中心”，挂靠教育研究所运行。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由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工业工程系、电机工程系、机械工程学院、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基础工业训练中心等院系单位共同发起，在教务处、研究生院、科研院、企业集团的大力支持协助下，形成的‘学-产-研’跨学科和跨单位共同合作的研究机构。校长顾秉林院士受聘为中心名誉主任，原教育部副部长、清华校友吴启迪任中心主任，谢维和、袁驷、王孙禹、林健等任副主任；学校老领导余寿文担任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孙禹任秘书长，李越、张文雪、刘惠琴等任副秘书长。

李卓宝教授对于工程教育中心的成立，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极大的支持。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成为后来成立的“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工程教育研究中心”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工程教育中心”的前身。

李卓宝教授曾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高教组组长，一直积极承担、参与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的领导组织工作。同时，参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优异的科研成果。李卓宝教授承担和参与的部分重大科研课题有：“高等工程科学技术



2008年12月13日，清华园解放60周年纪念活动在主楼举行，三位老学长欢聚。左起：彭佩云、李卓宝、汪家镠

人才类型与主要素质培养的研究与试验（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国家重点项目），“我国理工科大学培养人才主要特征及途径的研究与试验（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国家重点项目）”，“理工科大学生思维能力培养的试验与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教委重点项目）”，“我国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人才培养的主要特征及途径的研究与试验（全国教育科学“八五”国家重点课题）”，“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科学的研究的回顾、现状与展望（中宣部重点课题子课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国家教委课题）”，“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大学教育本质与大学职能等问题的研究（国家教委课题）”，等等。李卓宝教授在科研工作中多次获得国家级、北京市及学校奖励，其中曾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88年）、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9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5年）、中国高等工程教育研究会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2006年）、获全国教育规划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年），等等。

## 五、创办刊物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是国内理工科大学中最早创办的教育研究杂志，也是清华大学最早的文科学术期刊，创刊于1980年。当时刊名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通讯》，李卓宝教授任主编。1986年杂志更名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拥有国内刊号和国际刊号，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是最早被列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核心期刊”。同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还编辑出版了《教育研究参考资料》等内部学术刊物。

李卓宝教授始终倡导《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办刊宗旨，在积极保持和发挥清华大学理工学科研究优势的同时，继承和发扬历史上清华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李卓宝教授始终把《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作为教育研究和学科发展的实验基地，作为坚持和宣传党的教育方针的思想阵地。李卓宝教授始终坚持《清华大学教育研究》必须隶属于教育研究所，强调学术性、专业性，不得商业化、产业化。

## 六、学术交流

为提升自身科研水平，教育研究所积极组织和参加海内外教育及相关学术研讨会，派人员赴美国、德国、日本、苏联等国家和香港、台湾地区进行教育考察，同时邀请专家学者来校座谈、报告，开展广泛的学术交流与互访。

李卓宝教授参与的部分国际/地区学术活动有：1980年5月，作为清华大学访

美代表团成员考察美国教育；1986年1月，率教育代表团考察香港教育；1990年6月，作为中国教育代表团成员赴德访问；1991年6月，作为中国教育代表团成员访苏，在莫斯科召开的中苏高等教育改革研讨会上宣读论文《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此外，李卓宝教授十分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鼓励青年教师参与国际交流，选派青年教师出国（出境）攻读博士学位或做短期访问学者。

作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首任所长，李卓宝教授带领全所师生艰苦创业、砥砺前行，探索既不同于西方教育研究、也不同于师范院校的教育研究之路。在建所之初就明确提出清华教育研究所的宗旨：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研究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改革过程中的理论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规律，努力为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科学体系作出贡献。

经过长期的努力，清华大学的教育研究机构走过了初创和发展的进程，从教育研究室到教育研究所，再到教育研究院的成立。2009年11月6日教育研究院举行成立大会时，老所长李卓宝教授在大会上做了重要发言。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成立，表明了学校对教育学科的高度重视，开启了清华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新阶段。2019年10月，清华大学召开了“教育研究院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李卓宝教授通过视频，表示热烈的祝贺。

如今，教育研究院经过多年的积累，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师资队伍、国际交流和服务学校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学校和国家做出了重要

贡献。

春华秋实，继往开来。如今的教育研究院在学校的坚强领导和大力支持下，团结一心，众志成城，面向宏观教育政策，面向学校改革，面向教育学科前沿，继承李卓宝教授的遗愿，努力推进具有中国特

色、清华风格的世界一流教育学科建设，为清华大学早日跻身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和加快实现国家教育现代化做出更大努力。

敬爱的老所长李卓宝教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2020年4月4日 清明节

## 忆王尚真老会长

○马利国（1993级材料）

初识老会长，在17年前。那时，我刚到廊坊工作，从校友总会网站上发现当地还有校友组织，就约了贵松校友去拜访老会长。老会长在他市政协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他已经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多年了。虽然他已过七旬，但是精神饱满、声音洪亮，见到年轻校友格外欢喜，跟我们聊了很多廊坊的情况。这次见面，让我和老会长、廊坊校友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每逢校友活动，老会长就会打电话叫我参加，我也因此多次给校友们介绍廊坊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并逐渐和校友们熟络起来，结识了热情的郭淦老学长、干练的晓勤师姐和直率的吴文师姐。

“老会长”是我们对王尚真校友的尊称。他热心校友工作，从1991年起创建廊坊清华校友会，就长期担任会长，坚守校友会阵地长达24年之久。由于老会长的远见和争取，校友会成立之初就履行了登记手续，成为一个正规的社团组织。那些年，校友们老的老，退的退，年轻校友本来就少、又都在企业工作，不是人不熟就是事儿不熟，校友工作一时进入青黄不接的境地。老会长最惦记的一件事就是校友会年检，没有人手他就自己跑，每每骑上

自行车去民政部门找办事人员再三沟通。在他的努力下，挂靠单位艰难变更过，校友会几次面临整改而又有惊无险。正是得益于他多年的坚持，在最困难的时候校友会也能够通过年检存续下来。2015年换届，他把会长的接力棒传给我，还专门给当时的业务主管单位市政协领导写了一封长信，接洽会长变更事宜，仍在为校友会接续倾注心血。幸好到廊坊工作的校友越来越多，我们制定章程，成立理事会，还开设了银行账户，年检的事儿再也没有让他老人家操心过。2017年校友总会给王尚真校友颁发了“校友工作荣誉奖章”，他在年会上动情地说：“这不是我个人的荣



王尚真老会长（右）与马利国促膝交谈

誉，而是廊坊校友会的荣誉。”

最近一次见面是春节前，我和鹏松校友去看望他。老会长精神很好，步履轻快，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坐定后，我们聊起校友会换届，还谈到他最近完成的一篇回忆录《报国初心终得实现（海航一兵人生三部曲）》。这是他献给母校清华110华诞和曾经工作过的海军航空学校70华诞的礼物，海军航空兵部队办公室负责同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92岁高龄之际，尚能写出如此长文，且内容丰富，言之有理有据，尤其是许多数据几十年后还如数家珍，一清二楚，实在令人敬佩，从中也领略了当年清华学子的睿智和才情，看到一位老知识分子赤诚的报国之心。王老当年是航校的骄傲和光荣，仿佛一颗熠熠生辉的宝石，后来和现在依然是光芒四射！”对于新班子，老会长则寄予厚望，期许我们做到的是“遵纪守法、传承清华精神的；生机勃勃、可持续发展的；因地制宜、独具廊坊特色的”。时间过得很快，临别他像往常一样穿过小院，执意送我们到大门口。时间在冬日的冷风中定格，这一别却成了永诀。3月中旬，老会长偶感风寒，竟然驾鹤仙去了。

作为清华学子，他始终把清华校训作为自己人生恪守的信条。正如他在《海航一兵》文中写道：“清华大学要求毕业生要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同时配以严格的体育教育。母校不仅给了我深厚的科技专业知识，还给了我健康的体魄。我在廊坊市政协连任一、二两届副主席（时年61~71岁），档案工龄49年。随后，又以市职称评委主任、市专家委主任和多门外语能力，连续工作了十多年，总共超过了60年。”他笑称自己超额完成了母校清华

的一项要求。何止是超额，而且高质量啊！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服务社会，即便九十高龄仍然关心廊坊经济社会发展，虽然不能像以往那样深入一线、面向企业，还特别注意发挥民主协商作用，坚持向市里建言献策。有时，也会把一些分析和见解发表在《廊坊日报》上，比如对廊坊几项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翻番的关注。2019年10月16日《廊坊日报》上刊登的《廊坊散记》是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

老会长是一个坚强乐观的人。他在《人生感悟》中写道：“志存高远是立世为人的根本，心怀光明是不屈奋进的动力，学而不厌是成就功业的条件，自我升华是人生永远的追求。”历史上他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没有被打倒压垮，身处逆境从不怨天尤人，也不自怨自艾，保持了好的心态和好的身体，一身的本事也没有丢，这使得他在恢复工作后能够很快进入角色，为廊坊发展尽其所能，尤其是在外语和技术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去年夏天和他的一次长谈至今记忆犹新。他说，他更喜欢实际工作，所以毕业放弃了留校，有幸参与海军航空兵筹建。改革开放后，他发挥语言与技术的特长经常为企业服务，当时廊坊正处于外向型经济萌发之际，企业往往遍求京津却找不到合适的人翻译对外合作的技术资料。他不仅翻得又好又快，而且收费低廉。市交通局进口两部罗马尼亚汽车，因找不到罗马尼亚语翻译无法入关，他没有学过罗马尼亚语，但是利用他熟悉的意大利语和法语，对同为拉丁语系的罗马尼亚语进行翻译，使得货物顺利通关。霸州一家乡镇企业和法国人合作，准备上马先进煤粉碎燃烧设

## □ 怀念师友

备，三十多页法文图纸到北京四处找人，没有人愿意接，因为翻译按字收费，图纸没什么赚头，再有技术上一旦翻错了，还要承担风险。眼见着法国人要撤，企业总算找到他，他二话没说，就解了燃眉之急。还有企业要出口产品到日本去，需要翻译日本的产品标准，并召开鉴定会，这下难倒了一众人，该技术资料有好多词汇来自英国、德国的音译词，词典里查不到，纯学日文的一看就头大。企业辗转找到他，他利用自己英语、德语还有通晓的技术知识，很快就译出来了，鉴定会得以顺利召开。解决了这么大的难题，即使那

个年代让企业付几百元的费用也没有问题，他只象征性地收了50元。他对日文精到的理解，92岁时还写出文章《谈谈日文中的汉字》，刊登在《廊坊日报》上。

老会长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厚重的一生和光辉的一生。他坚强面对人生，坚持服务社会，坚守校友会阵地。他脚踏实地，将爱国情化为报国行，在自己的岗位上力求做到更好，用实际行动践行了清华校训，是年轻一代清华人的榜样。我们要向他学习，不忘初心，不负韶华，行健自强，把清华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2020年4月

## 怀念同窗挚友贺鹏飞

○何庆声（1970届机械）



海军中将贺鹏飞

疫情期间在家中整理书籍资料，发现一封五十年前鹏飞写给我的信。重读这封信，让我浮想联翩。鹏飞离开我们快二十年了，作为同窗和挚友，鹏飞的形象犹如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1964年9月，我考入清华大学，是最后一个来到光0班的新生宿舍七号楼345室的。先来的五位同学正在聊天，见我进来，王天伟、王朝松、景荣春、邓九仔各

自做了自我介绍，最后一位是身着白色短袖衫、梳着学生头、留着小胡子、还带着矫正牙套的健壮大男孩。“你知道他是谁？”王天伟抢先问我，“不知道。”我不好意思地回答。这时大男孩笑着伸出手来说：“认识一下，我叫贺鹏飞，来自北京。”又是王天伟快人快语地说：“他是贺龙元帅的儿子。”我恍然大悟，把他与敬爱的贺龙元帅联系了起来。

开学上课后，新生们的学习生活是紧张的，即使住同一宿舍，彼此交流也很有限。一天晚自习归来，鹏飞出了个主意，建议睡前来一个“唱歌比赛”。规则有点像当下古诗词比赛中的“飞花令”，别人唱过的不能唱，看谁会的歌多并能坚持到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开始由近及远，经过十几轮角逐很快就从当前的歌唱到中学时代的歌，又唱到小学时代的歌曲，大

家挖空心思，越唱越远，结果是六人不分伯仲。又轮到鹏飞时，他将方向转向了唱苏联歌曲，显然他有优势，又经过多轮角逐，鹏飞以《哥萨克之歌》夺魁。这次活动极大地密切了宿舍同学之间的关系。

我们宿舍同学都喜欢下象棋，但棋艺较高的是鹏飞和朝松。两人年轻气盛、棋逢对手、各不相让。常常是两人对弈，大家观战。有时一盘棋要持续几天不分胜负，晚上熄灯后，打着手电筒还要走上几步，或在被窝里走几步盲棋，早晨起床再复盘。为了表明各自战胜对手的决心，两人信誓旦旦地当着大家的面许诺，朝松说：“我若输了，甘愿把头剃光，决不食言。”鹏飞也毫不示弱，用手指着饭盆儿里的大半个馒头说：“我若输给你，就一口吃下这个馒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经过几天鏖战，朝松完败于鹏飞。本来朝松刚理过发，头发就很短，为了遵守承诺，二话没说，用刮胡刀把头发刮光。一次鹏飞落败，他也毫不含糊，当着我们的面，硬是想尽各种办法将那大半个馒头一口吃了下去。五十年过去了，现在看起来有些奇葩的做法，恰恰将当时年轻人那种不服输、信守承诺的直率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品格或许部分成就了他们各自的人生。后来在改革开放中，朝松勇挑重担挽救了一个濒临困境的国有企业，成为在香港成功上市的凤凰光学的董事长，直至退休。

大一学年开学伊始，学校贯彻毛主席春节讲话精神，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使得学生有较多时间开展文体活动。鹏飞是体育活动的多面手，尤其喜欢篮球。在他的提议下我们班成立了篮球队，还经常和其他班比赛，在系里小有名气。大家



青年时代的贺鹏飞（中）与同窗好友何庆声（右）、王天伟

每天轮流去借球，有时去晚了就借不到。鹏飞提议我们班自己买一个篮球。当时多数同学享受国家助学金，手头拮据，从爱好打球的同学那里只筹到一点点钱，怎么办？鹏飞说他来想办法。恰好他的好友胡劲波同学（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之子）路过，鹏飞向他说了买球遇到的困难，同时手伸向劲波上衣口袋，掏出学生证，里面刚好夹着5块钱，鹏飞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就出这5块钱为班级做贡献吧？”劲波笑了笑，默认了。后来才知道，这是劲波一个月的零花钱。鹏飞拉我急不可待地来到五道口商店，翻出自己的全部零用钱，凑在一起刚好够买一个新篮球。当天下午同学们就用上了新篮球。

大学一年级期间还进行了入学教育，结合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学习，围绕学习目的和动机开展“又红又专”大讨论。以“自己提出问题，自己分析问题，自己解决问题，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的方式，通过班会和小组会在相对宽松的气氛中进行自我教育。在陈玉新、李中和、康立民、杨树先等老师的循循善诱和引导下，同学们思想认识都有很大提

## □ 怀念师友

高，明确了为祖国学习的目的，坚定了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鹏飞由于表现突出，1965年秋成为我班第一批入党的同学。

在鹏飞及班内党员的影响下，我也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不久鹏飞告诉我，党支部委派他作为我的入党联系人。深秋的一天，鹏飞说晚上就入党问题和我交流一下思想，这是党组织第一次和我谈话。晚饭后，我们骑车直奔北京展览馆剧场，入场落座后才知道上演的是苏联电影《斯维尔德洛夫》。我正为今天的谈话纳闷儿，鹏飞说今天的谈话交流就从看电影开始。电影描述了苏联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斯维尔德洛夫短暂而传奇的一生，他协助列宁为争取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捍卫苏维埃政权进行了不懈的斗争，34岁就献身于苏维埃事业。列宁高度评价“他具有非凡的组织天才，他是革命者忠于自己事业的永恒象征，是一切共产党人的典范”。在回校的路上，我们边回忆电影的内容边谈自己的感想。鹏飞说，他从小学开始就喜欢看苏联早期的电影和小说，非常敬仰和喜爱那些在列宁领导下为建立和捍卫苏维埃国家而斗争的英雄人物和先辈们。还更喜欢听和看中国革命战争的故事和书籍，更敬仰和喜爱在毛主席领导下为建立新中国而斗争的那些英雄和前辈们。

鹏飞还结合党史学习说：“中国革命和十月革命相比，面临的困难更多、敌人更强大、斗争更艰苦。经过无数的探索、失败和牺牲，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找到了革命领袖毛泽东。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战胜了国内外一切敌人，建立了人民共和国。”

我心里暗暗佩服鹏飞入学教育收获真

大。不知不觉已进入了校园，便坐在七号楼西侧榕树下的石头上，鹏飞继续说：

“新中国来之不易，无数先烈为此献出了生命。光我们家自父亲参加革命以来，整个家族有多人牺牲，其中包括我的爷爷、叔叔、姑姑们等。我们这一代的使命，就是把党的事业继承下去。必须克服一切私心杂念，积极投身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这就是我要求入党的原因。父母一直严格要求我，要学好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要向工农兵学习，要克服骄娇二气，要学好本领，要和同学打成一片，不摆架子，不要特殊化……”这次真诚的谈话给了我莫大的启发，坚定了要求入党的信念。

陈玉新老师时任鹏飞所在党支部书记，他回忆起在鹏飞入党后，曾经收到过鹏飞的母亲薛明的一张便条。便条是这样写的：

机械系支部负责同志：

鹏飞自入清华以来，有些进步，我感激学校对他的教育和培养。明日我因事外出，在这一段时间内请学校多帮助他。  
敬礼！

薛明 26日

陈玉新老师说，鹏飞生活在战功显赫的革命家庭，又在同年级的学生中率先入了党，但父母对他的评价只是“有些进步”，并“请学校多帮助他”，可见鹏飞的父母对他要求有多高。

1967年1月，由于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阴谋陷害，贺龙元帅蒙受冤案。鹏飞在冤案的牵连下经历过家被抄、被驱赶离家、被造反派通缉搜捕，无家可归。他在轮船上做过苦工，不幸患过急性黄疸型肝炎，被关押在少管所长达半年。1969年

夏，在贺龙专案组监视下，他见到被关押的母亲和已经停止呼吸的父亲。短暂的相见竟是和父亲遗体匆匆告别，与母亲的再次离别。从此一家生离死别，天各一方。一系列不幸遭遇，对他的心灵和身体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和摧残。面对这些痛苦与磨难，他没有被击垮，也没有随波逐流，更没有失去革命家庭的尊严。痛定之后，他坚强地站了起来，又重新回到同学中间。

我清晰记得在系工宣队组织的进驻清华一周年的晚会上，要求每班都要出节目，其他班分别表演的是自编自演紧跟当前形势的节目。鹏飞以极大的热情组织我们班，表演了男声小合唱。在北京光学仪器厂的教改实践中，他虚心向工人师傅学习，与工人师傅打成一片，积极投入到技术革新中，获得工厂的好评。即使在那个是非颠倒、人人自危的社会环境下，同学们逐渐地为鹏飞在逆境中所展现的坚强乐

观的精神所折服，大家不顾有可能被带上“划不清界限”帽子的风险，在他被驱赶离家时，顶着风雪帮助他搬家；在他苦闷和压抑的时候，和他一起去舒缓散心；在他生活上处于窘境时，有同学伸出援手；进行毕业鉴定时，工宣队强加给他“歧视性不实结论”，全班同学以长时间的集体沉默加以抵制。在极左盛行的时期，他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与许多同学们建立了纯真的友谊，有的还成为莫逆之交。

1969年10月，我们系光学仪器专业的师生随无线电系等一起被疏散到四川绵阳分校，继续劳动锻炼接受再教育。12月是绵阳一年中最阴冷的一段时间，我们班被安排手工制作砖坯并烧成建筑用砖。当时很多同学也包括女同学光着脚在有冰碴子的泥水中踩泥，另一些人用手把泥举起摔进木模中将泥制成砖坯。为改善这种艰苦的劳动条件，同学们组织起来，自己

动手设计制作了一台机械制作砖坯的机器。鹏飞在另一些同学协助下，维修一台长期废弃不用的履带拖拉机。经过努力，终于找到和排除了发动机启动时点火时间与活塞运动不匹配的故障，顺利地把拖拉机发动起来并第一个驾驶，接着又教会了其他几个同学。正是利用这台拖拉机再挂上同学们自制的铧犁，再



1970年3月毕业分配前，光0班同学在绵阳分校合影。后排左2贺鹏飞、2排右3何庆声

## □ 怀念师友

往犁过的泥土浇上适量的水，就基本解决了制坯机用泥问题，极大改善了劳动条件，提高了劳动效率。

1970年春临近毕业，由于鹏飞不满工宣队个别队员一些极左的跋扈行为，与其发生了冲突和抗争，受到了打击报复。他被分配到离北京距离最远、交通极不方便的甘肃武都地区。鹏飞坦然地面对了这一切，头也不回地坚定地向前走去。以下是五十年前他到武都后的来信：“……这里比陕北还要穷，你们就可以想象了。山上一棵草也不长，更不用说树木了。水面比县城还要高，四周环绕着耸入云霄的岷山、大巴山，天只有一点儿大……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分别数日，如度几年，一路上的艰难心酸就不用提了，总算活着到了武都。三番五次地想退回来，不进山。但有一股力量鼓舞着我，使我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因为我知道后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永远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颗红心，才能创造美好的未来。只有在战火纷飞的岁月用鲜血和生命才能挽回我在政治上失去的东西。……”重读他的信，我陷入了长时间的沉思。鹏飞在我心目中，除了原有的胸怀理想、脚踏实地的形象外，他还是一个在逆境中有坚定信仰、有追求、又敢于担当的人。

毕业一年后，鹏飞从成都回武都途经绵阳，我们在车站附近的分校招待所住了一夜。那天晚上，他谈起武都一年来传奇般经历，充满兴奋和乐观。他报到后就被分配到武都汽车修配厂，这是一家只有百十来人的小厂。同期还有7位清华和北大毕业生分到武都，见到恶劣的环境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其中几位陆续离开了。

他直接被安排在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在车间里，常常有设备和工具损坏需要修理及更换零件，他就自己测绘并画出草图，征得车间的同意后，有时用车床、有时用铣床……很快把损坏的零件加工好把设备修好。起初工人们并没看好这位北京来的书生。时间一长大家发现，新来的大学生什么活都会干，不怕脏不怕累，都愿意和他一起修车，休息时还喜欢和他聊天。

汽车修配厂地处交通要道，来往车辆很多，大都是国产汽车。一次，从兰州开来几辆进口重型卡车，来厂保养修理。工人们从未修过这种进口车，害怕修不好。鹏飞就鼓励大家接下这个任务，并与他们一起干。两天后，就把车修好了。谁知，一试车，发现汽车工作异常。此时，工人们开始担心车没修好，担心车给修坏了。工厂领导知道后也赶到现场，大家都捏着一把汗。鹏飞却很沉着冷静，带领工人又仔细检查一遍，确信维修过程没有问题。经过细致了解分析后，他果断地让工人把汽油放掉换上柴油，自己跳上车一下就把车发动起来，跑了一圈，发动机工作完全正常。在场的工人都高兴得跳了起来，领导也松了一口气。这件事一下子使鹏飞成了全厂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人，也进一步增强了工厂对他的信任。

20世纪70年代初实行计划经济，机床设备、汽车零配件等都是按计划采买，根本就轮不到边远山区小厂的份儿，工厂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厂领导就把购买设备和零配件的重任交给了他。鹏飞没辜负厂里的信任，他利用在北京部委的关系，几番周折终于买到了工厂急需的镗床和汽车零配件。厂领导高兴地让他亲自验收购买的机床，还专门配备工人向他学习如何

使用镗床。为工厂解决了生产中遇到的大难题，他也成了厂里的大能人。鹏飞在工厂里的表现和趣闻不胫而走，他的身份也渐渐为人所知。一次，他在武都参加篮球比赛，尽管贺龙元帅的冤案尚未昭雪平反，场内外还是人山人海，很多人从老远地方赶来，就为看看贺龙元帅的儿子。鹏飞在武都工作了两年，他乐观、积极、自强不息，就像一粒种子撒落在贫瘠的土地上，在逆境中顽强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粉碎“四人帮”后，鹏飞子承父业，于1977年参军入伍。为挽回“文革”耽误的宝贵时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政治，刻苦钻研业务，以强烈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开展工作。历任总参谋部装备部参谋、副处长、副部长，1985年任部长。在军队精简整编、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形势下，他负责组织研究、制定全军武器装备发展规划，开展新武器装备技术的引进与合作，改进和加强军援军贸工作。1992年，调任海军副司令员。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致力于海军装备建设的跨越式发

展和战斗力的快速提升，他积极组织制定规划，勾画发展蓝图，注重顶层设计；突出质量建设，贴近实战要求，精心组织新武器装备的实验鉴定和演练演习，还关心海军航空兵建设；并开展多边军事外交、海上军事安全谈判，率舰艇编队首次成功出访美国。

尤其在辽宁号航母发展进程最艰难的时候，他敢于担当，敏锐抓住了“瓦良格号”航空母舰的购买良机。他曾说过：

“这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因为以前不会有卖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如果错过，就连我自己都不会原谅。”想尽办法排除了某些国家的阻挠和干扰，终于把“瓦良格号”航母带到中国，为中国航母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为实现中华腾飞殚精竭虑，忘我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2001年3月，鹏飞因病去世，享年56岁。鹏飞是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五大代表。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4年晋升海军中将军衔。

鹏飞英年早逝，令同学们无限惋惜。在毕业50周年之际，我们无限怀念鹏飞同学。近20年来，无论老同学们何时相聚，鹏飞传奇的一生仍然是我们谈论的话题，仿佛他从来不曾离我们而去。我们为有鹏飞这样的同学感到骄傲和自豪。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宋小逸、田芊、陈玉新、刘雪冬、王朝松等同学和老师的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2020年5月4日



1980年5月，贺鹏飞与光0班同学合影。右1贺鹏飞，右4何庆声

## 张思学同志逝世 享年 91 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张思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0年5月25日在乌鲁木齐逝世，享年91岁。

张思学同志1929年10月出生于山西洪洞县，1944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1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组织部组织指导处组织员、副组长，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管理处干事；1955年11月任中共南疆区党委组织部、党委直属工厂总支书记，1957年1月任新疆喀什农具厂、石粉厂、电厂联合委员会书记。1959

年8月作为调干生进入清华大学电机系学习，1964年毕业后任新疆联合机械厂厂长，1965年2月任自治区机械局五处、二机局生产技术处、工办生产技术科处长，1974年4月任自治区军工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78年5月任自治区国防工办党组副书记、副主任，1979年12月任自治区机械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81年9月任自治区机械工业局党组书记，1983年3月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兼经济工作部部长，1985年10月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1991年3月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5年4月离休。

## 高原同志逝世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原党组成员，常务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会原会长，人民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第六届委员、第七届常务委员高原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9年11月8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高原，原名刘崇仁，1927年12月出生于山东省益都县。1946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1月，高原考入清华大学机械系，就读期间，任学生会理事、党小组长、民联组长。1948年9月去解放区，在平山华北局党校直属班学习，任党小组长。1949年1月，在华北革大教研室任研究员、副组长。1952年2月，在华北局党校教务处秘书室任副主任、支委。1952年8月调干入清华学习，1955年毕业时获优秀毕业生金

质奖章。

1955年8月毕业留校，在清华大学动力系工作，任讲师、党总支副书记。1962年9月，任市科委工业处处长。1969年2月，在北京市科委“五七”干校学习，同年12月下放昌平县南口公社劳动。1971年9月任市科技组干部。1971年11月任市清仓节约办公室干部。1972年8月，任市科技局计划组二组负责人。1978年任市科委综合计划处处长、党组成员。1980年任市科委副主任。1983年任市科委党组副书记。1986年任市科委常务副主任。1989年4月北京市自然科学研究高级评委会通过他高级工程师评定，享受教授研究员同等待遇。1990年5月，聘任为市自然科学基金会会长，人民政协北京市委员会第六届委员、第七届常务委员，1994年离休。



# 回忆录

## 我的科研生涯

○滕 藤（1951届化工）

我1930年生，1946年考入上海交大，由于羡慕清华“小解放区”的革命气氛，第二年我又考入清华大学化工系，1948年4月在清华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青”，秋天就加入了地下党。1951年毕业，留校任教，这时我已担任了校团委书记。直到1985年我才离开清华，在清华学习、工作了38年。水木清华是我心灵生命中永远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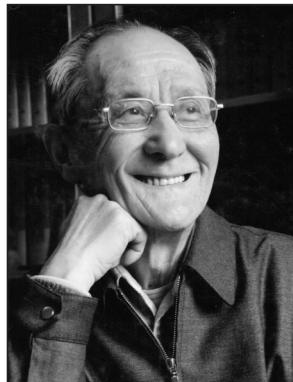
此后八年，我在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长、国家教委副主任几个领导岗位之间频繁调动。包括1987年，中央派彭珮云（任党委书记）和我（任校长）去安徽中国科技大学一年。直到1993年，我63岁时，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并被调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直至离休。

回顾一生，牢记母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积极为祖国、为人民作奉献。这里做些片段回忆。

### 为制作原子弹材料探新路

20世纪50年代，毛主席指示要搞“两弹”，首先要培养人才。在蒋南翔校长领导下，1955年指派何东昌副书记组建工程物理系（实际上是原子能系），并抽调学机械、时任校教务处教学研究科科长的吕应中，学物理、时任人事室副主任的余兴坤和我做助手。当年就招生。

为了学习苏联培养原子能人才的经验，1955年9月蒋南翔校长亲自率高教代



滕藤学长

表团去苏考察，成员有清华教务长钱伟长、北大教务长周培源等，回来时带回苏联有关的教学计划和课程大纲。我们看了非常困惑，一致认为必须派人去学。当时派了四个人，其中有我。

本来去苏联学习都要在国内脱产学一两年俄语，幸好解放后，我跟化工系一位德国教授的夫人学过俄语，打下了基础。后来又参加了周光召他们组织的专业俄语短训班，总算可以基本满足留学的需要。

1957年7月，我作为进修教师来到列宁格勒工学院，学习人工放射性物质工艺学。导师是什维多夫，科学院院士，参加过研发钚、铀这些核弹材料，因此还有少将军衔。我向导师提出主攻制造核材料，他说我们这里拥有门德列夫工作过的全苏联最好的实验室，但要做核材料不行。其实核裂变后不仅是铀和钚，分析其他化合物也有用。我不愿做他布置的化学分析课



列宁格勒学院学习留影  
一九五七年冬，滕藤在苏

题，他让我自己找课题。

于是我去了列宁格勒的谢德林图书馆，这里保存了世界各国核理论与技术的资料。我非常幸运地发现了1955年8月美国给日内瓦第一届和平原子能会议提供的缩微胶卷。其中讲到美国40年代制做原子弹的材料钚，都用居里夫人当年用的沉淀法。“二战”结束后，美国研制出溶剂萃取钚的新方法，叫雷道克斯流程，1954年投入运行。1956年美国汉福特工厂又用普雷克斯流程代替了雷道克斯流程，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处理技术。它比苏联仍在使用的沉淀法，不但效率高，而且可以自动化，对操作人员放射性伤害小。

看缩微胶卷用了我三个月的时间，这个图书馆条件很好，一天三顿饭都可以在里面吃。我从早上9点开馆到晚上11点闭馆，都在馆里工作，和工作人员都非常熟悉。缩微胶卷全是英文，幸好我英文底子还好，全看懂了。看缩微胶卷非常费眼，对我眼睛有了伤害。

我向导师作了汇报，他承认美国萃取法比苏联沉淀法先进，并让我在研究室作

了系统介绍。但我提出在学校做模拟实验，他说这是国防工业，学校做不了，仍让我做他布置的课题。

我按他的布置做了锶和铯的分离、稀土的分离等，导师让我用俄语写了一篇论文，并请他的研究生把俄文润色后，在《分析化学》杂志发表了。导师很满意，让我照这样做下去，再发表几篇论文就可以评副博士。

1958年，蒋南翔校长要办工程化学系，支持核化工的研究，让何东昌同志通知我回来筹建。当时我在苏联不仅学习，管留学生的钱其琛还让我当留学生总支委员会的委员，管4个学校的留学生。他反对我回去，但我还是买了机票回到北京。

1958年7月，清华建立了工程化学系，开始招本科生。首任系主任是张子高，1962年由汪家鼎接任，我于1960年任党总支书记，1962年兼副系主任。

工程化学系建成后，南翔校长认为力量很强，又调我去当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心系两头，仍想搞铀和钚的研究。1959年苏联突然开放，允许我到原子能核电站和国防15号实验室去实习，南翔同志同意我去。去了半年多，回来我就要求不要当宣传部副部长，仍回化系，研究核材料。

我向系里介绍了美国的萃取法，正好汪家鼎也拿到一份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报告，他们做的也是萃取法。我们在实验室用冷试验做了验证，数据都符合。

当时我国在苏联专家指导下，都是用沉淀法，1959年苏联专家撤走后，二机部仍想沿用这种办法。我们听说二机部在吉林要召开一次全国专家会讨论此事，就事先将萃取法写了详尽资料，一到会就先散发这份报告，汪德熙、刘永斌（刘少奇之

子，在苏联学过核科学，回国后在二机部工作）和天津大学都支持我们。主持会议的白文治局长向二机部刘杰部长、刘西尧副局长作了汇报，决定开党组会研究，找我和汪家鼎参加会。我们每人讲了一段，比较沉淀法和萃取法的优劣，并说在实验室已做了验证，现在需要建中试基地，完善生产流程和设备的验证。会议决定上马萃取法，并向周总理汇报，总理批给230万元，后追加到300万元，由清华为主搞会战，取名“712工程”。

搞萃取法，美国资料里稀释剂是煤油，煤油是复杂的混合物，用不好会出大问题。经过考虑用人工合成煤油最好，成分可以控制。在锦州有个石油六厂，总工程师是李贵鲜（后来当过国务委员、人民银行行长），找他们做人工合成煤油，经过放射辐射很稳定，解决了萃取法的关键问题。

建设“712”，开始选址在清华附近的八家，地方上听说有核辐射，就提意见。市委书记刘仁听说，也很关心，认为应另选址。他亲自带我和吕应中开车去南口虎峪，这里后倚大山，前面只有一条路，既安全又保密。于是决定在这里建“712”中试基地，后来这里成为清华建试验核反应堆的200号。

建设“712”中试基地，工程化学系的学生都参加了，和密云水库一样，实现了清华任务带学科的特色。不仅出色完成了萃取法全套设备和工艺流程的研发，还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中试成功后，我让吴华武带一批人去404厂转产。此后我国生产军用和民用核燃料的404厂、821厂的很多技术人员、领导人员都是工程化学系的毕业生。陈宝生当过404厂厂长，况利华

当过404厂党委书记，而且都是连年的模范。

当时，全世界核能工业比较完整的只有两个国家，法国和中国，连美国都不完整，还缺一些环节。我们的核燃料元件全是自己研发出来的。

没有萃取法提取的钚239，就没有我国的第一颗钚原子弹，没有工化系培养出的大批人才和科研成果，就没有后来原子弹、氢弹和原子能发电站的发展。工化系的师生们为此骄傲。

## 发展溶液理论和湿法冶金

“文革”后，工化系扩大招收研究生，并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我不愿局限于研究辐射化学，开始重点研究萃取过程的热力学和动力学。我带的几位研究生很有成就。

当时蒋南翔校长为培养拔尖人才，选拔一批本科生、研究生，由指定教授一对一培养，叫“因材施教”。我带的因材施教研究生黄瑞和能力就很强。我指导他用氟离子电极把溶液中钠、钾、钙、锶、镁测出它们的离子活度，并用数学模型把活度和热力学平衡常数一次测定计算出来。他做成功了。冶金热力学的权威魏寿昆院士看了很有兴趣，召集会议让我作系统讲解，并让我们在他主管的《有色金属》上发表论文。黄瑞和跟我读完硕士后，去美国密歇根大学读博士，该校化工系认为他的硕士论文够博士论文水平。他的导师是搞固溶体的，他用跟我搞溶液那套办法搞固溶体，也获得成功，得到导师和系里赏识，后来担任该校结构分析实验室的主任。

溶液理论的世界中心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J.H.希尔德布兰德教授（1881—1993）是大权威，他百岁生日我

## □ 回忆录

去参加，和他们建立了联系。老教授的一位大弟子K.S.皮策，当过斯坦福大学校长，卸任后继续研究电解质溶液。我把我的第一助手李以圭送到他那里进修，李把皮策教授著名的Pitzer方程由低阶推到高阶，使应用范围更广。皮策特别高兴，把方程改名为Pitzer-Li方程，还要把李以圭留在他那里工作，我只同意他半时在清华，半时在伯克利。后来李以圭研究工作很出色。老教授另一位大弟子J.M.普劳施尼茨，研究有机溶液，我和他合作在中国开了一个化工热力学和溶液理论学术会，本来计划只是中美双边会，他在德国、法国的弟子都找来了，实际开成了国际学术会议。

我有一位搞溶液理论的得意门生李如生，硕士毕业后我就送他到比利时诺贝尔奖获得者伊利亚·普利高津教授那里读博士。教授给李如生一个有关化学的数学模型题，估计他要三个月才能做完。李如生用一个多月就做完了。这个课题把普利高津教授一个低阶理论推广到高阶，教授非常满意，留他在那里搞研究。李如生有个雄心壮志，要打破热力学第二定律，本来研究有进展，可惜英年早逝。

清华的传统还是要把理论运用为经济建设服务。当时冶金都注重火法，把许多珍贵的有色金属都当废渣扔了。我和魏寿昆院士合作，把萃取法应用到冶金，叫湿法冶金，共同署名写了论文宣传此事。当时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对资源综合利用很关心，带着他的搞冶金的班子和我去了包头的稀土矿、攀枝花的钒钛矿、金川的贵金属矿、云南的锡矿和钨矿。他们大多用火法，我一路宣传湿法冶金，在金川说服他们在炼铜后用湿法冶金

从矿渣中提炼金、银、铂、钯等贵金属。其实国际上已经有用湿法冶金直接炼铜的，如英国在非洲赞比亚就建了很大的铜矿，用湿法冶金炼铜。我组织清华工化系师生在金川铜矿完成萃取湿法冶金研究，推动了全国湿法冶金工艺。我国有色金属资源丰富，伴生元素多，清华工化系为资源综合利用作了很大贡献。

1984年是我在清华的最后一年，我和汪家鼎教授研究了核废料的处理问题。压水堆核电站的新燃料含3.2%的铀235和96.8%的铀238，在压水堆中燃烧后，剩铀235约7.6%，铀238约94.3%，我们用萃取法回收铀和钚再制成核燃料元件，重复使用。强放射性废物则直接固化，使它们具备安全处置条件。这样形成闭合循环，既经济又安全。

## 引进、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研究

1993年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副院长，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干这工作有点不搭界。但我在国家教委时分管联合国教科文委员会中国分会的工作，接触到国际上研究社会发展的许多理论，如环境治理、生态经济、可再生能源等都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当时挪威首相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欧美很盛行，而我们国内还少为人知。我认为社科院应负起这个责任。

我首先建议和推动社科院建立有关组织，集合人力开展研究。1997年在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成立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2000年成立生态经济研究中心，开展了许多学术研究活动。

我组织出了三本书：第一本书主要介绍了西方各国的理论发展和他们的观

点。当时台湾把这理论译为“永续发展理论”，我们研究认为不妥，改译为“可持续发展理论”，这个名称为全国所接受。这本书是我和助手李千共同写的，社科院郑玉歆也参加了。

第二本书是我和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郑玉歆合写，他也是清华毕业生。这本书完全是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写的，而且反映了中国的情况和观点。当年获得国家图书奖。

第三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出一套生命大百科全书，其中有一本是讲可持续

发展的，他们约我编写。我约了日本金泽工业大学校长金田一郎、一位奥地利专家和一位香港专家共同编写。这本书完全是从发展中国家角度写的，因为教科文组织成员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很顺利通过。后来在约翰内斯堡开的国际首脑会上，还专门把我写的结论部分抽出来印成专门文件发给各国首脑。

现在，“可持续发展”方针已成为我国重要国策，成为联合国的共识，内涵也大大丰富和扩展。我在社科院总算作了引进、推广的工作。

## 清华校训砥砺我前行

○ 戈 泊（1946—1948 土木）



戈泊学长与夫人，二零一八年

在清华近110年的历史中，抗战八年间是在大后方昆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了西南联合大学，这是清华校史中光辉的一页。我，原名顾骅，于1946年抗战胜利后清华在北京复校后的第一次招生时，以同等学力考入了土木工程学系，又

于1948年9月通过中共城工部进入了华北解放区，在清华只呆了短短的两年。当时我只有16岁，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还不甚了了，但我有幸于1940年至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附小和附中上了六年学，深受西南联大“刚毅坚卓”、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和校风的影响。

### 在西南联大附中和清华的学习生活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附中是昆明的顶尖中学，实行兼容并包的方针，教育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崇尚通才教育。校长是南开大学教授黄钰生先生，各门课程都聘请名师执教，例如学术精湛的任继愈先生曾教过我们年级的国文，杨振宁先生（当时还是西南联大的研究生）曾教过我们的数学，等等。联大附中还鼓励学生自由

## □ 回忆录

发展，不仅追求高超的教学质量，还开设了音乐、劳作、体育等课程，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劳动习惯、动手能力和集体配合的精神。虽然学校对教学要求很严，但我还是有时间阅读许多中外文学名著，并养成了对歌咏和古典音乐的爱好。

1946年进入清华以后真是眼前一亮，过去我经常到西南联大去，看到的都是草房茅舍，现在映入眼帘的都是一栋栋红砖砌就的洋房，真个是天上地下。但是正如梅贻琦校长所说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也感同身受。清华教授们上课与中学迥然不同，无论是用中文还是英文授课都是旁征博引、口若悬河，没有照本宣科的。叶企孙教授给我们上“普通物理”，戴世光教授给我们上“经济学简要”都是谆谆教导、诲人不倦。马约翰教授给我们上体育课，教给我们怎样健身强体，十冬腊月他还穿着短裤，光着头，真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这使我逐步体会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含义，那就是无论做学问或为人处世都必须砥砺奋进、奋发图强，力求进步、永不停息。特别是像自己这样一个资质平平的人，更必须勤勤恳恳、埋头苦干。“厚德载物”就是为人要坦诚，胸怀要宽广，严于律己，宽厚待人。

可是，好景不长，国共内战风起云涌。1946年底发生了北大女生沈崇在东单广场被美军强奸的案件，地下党在各高校组织了罢课游行，我由于少年时代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自然积极参加。1947年内战愈演愈烈，学生运动接连不断，这年

“五二〇”左右，北平全市大中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罢课大游行，清华学生

也经常进城游行。我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是罢课游行的积极参加者。除此以外，我还参加“大家唱”合唱团，排练了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以及《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哟好地方》等革命歌曲，经常到校内外演唱。1947年7月，我被吸收参加了中共南系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自此算正式参加了革命工作。

1948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中共地下党员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在清华全校学生及教职员中已占有很大比重，为了避免敌人大肆搜捕，并为解放南方蓄积力量，党派遣大量党团员南下，潜伏于社会各阶层中。我因为家在上海，也被派遣回家。由于我从小生长在昆明，不通上海话，年龄又小，找职业有困难，家长又不同意弃学就业，只好“离家出走”，重新回到北平。经地下党同学李开鼎介绍，通过封锁线，我到达华北解放区，经城工部派遣，去了正定华北大学学习和工作。当时济南战役已经结束，辽沈战役已经打响，由于工作积极，我于1949年1月10日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 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生涯

1949年初刘少奇秘密访苏，请斯大林派遣六十名苏联专家协助中国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政治经济干部。刘归国后以华北大学、华北人民革命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为基础，筹建了中国人民大学。我随华北大学并入了人大，并参加了人大的筹建工作。

招生任务完毕后，人民大学挑选了一批具有大学学历的干部跟随苏联专家学习。我被分配到计划统计系工业统计教研

室。由于中国要向苏联“一边倒”，实行计划经济，当然这个系是很重要的。当时苏联专家廖佐夫已经到校，计划统计系招收的本科和专修科学生也都到校，本科学生都是青年知识分子和部分熟练工人，专修科的学生都是在职干部。当时我国原有的大专院校中都没有开设有关计划经济的课程，更没有这方面的师资和教材，一切都得依靠苏联专家。而计划统计系只有一位苏联专家，只好由我们这批年轻的大学生赶鸭子上架，跟着苏联专家边学边教，采取现买现卖的办法，勉为其难了。

其他大专院校为了适应新形势，也派了一些教师来人民大学学习苏联式的统计学，于是我们还开设了研究生班。这时我刚满20岁，除了自己学习，还要承担本科、专修科和研究生班等不同类型的教學任务。各类学员的年龄都比我大，真是诚惶诚恐、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为了备课，每天半夜一点以前都睡不了觉。这时清华校训“自强不息”激励了我，在重压之下，我奋力拼搏，完成了各项教学任务，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1953年我被任命为人大工业统计教研室的副主任（主持工作），我们这个团结奋斗的集体，不仅完成了繁重的教学任务，还与国家统计局工业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参加他们组织的工业普查和其他调查研究活动，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能联系中国实际进行讲解，初步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在科学研究方面，我们还参照苏联沙文斯基教授编著的《工业统计学教程》，联系中国实际，编写了一部《工业统计学》，这部教材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颁发的科学研究二等奖。为了奖励我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取得的成果，我被评为“青

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并参加了中共北京市的党代表大会。

1954年我被评为讲师，1956年国务院高等教育部评选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批教授、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也有二十多人，计划统计系评上了两名副教授，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当时26岁，算是新评上的副教授中最年轻的。实行工资制时，我被评为高教六级，也算是个高级知识分子了。

### 在苏联当研究生的体验

1956年，人民大学派了六名教师去苏联进修两年，我被派到国立莫斯科经济统计学院（现名国立莫斯科经济统计信息大学）。新中国成立以后，与美国交恶，掀起了反对崇美媚美的高潮，各大中学都取消了英语课，改学俄语。我作为人民大学的教师，当然得改学俄语。当时盛行俄语速成法，学者裁了许多小纸条，一边写一个俄语单词，另一边写上对应的中文单词，每天都要生记硬背十几个单词。当然凭这点俄语知识要去苏联进修远远不够。于是我在行前每天骑车从人大到设在北京外语学院的留苏预备部，跟随一个班学习口语。但是，到苏联以后，在一个陌生的语言环境中还是不能应付，后来在俄语教师和同房间苏联同学的帮助下，才逐步适应了。

我在国内虽然已被评为副教授，但当时只有26岁，本着清华校训“自强不息”的精神，为了奋发图强、积极向上，我决定改为攻读研究生。经人大领导批准，从两年制的进修教师改为四年制的研究生。

苏联的研究生制度是学习德国的洪堡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办法，精雕细刻，重在扩大研究生广博的知识面，培养他们

## □ 回忆录

独立进行研究工作的能力。无论学习什么课程，都不要求你听课，而是指定一大堆参考书让你去阅读，进行综合梳理，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定期和导师讨论。这种培养方式与清华梅贻琦校长提出的“尊重学术自由、尊重思想独立”的见解不谋而合。在这种培养方式下，我通读了《资本论》等许多俄文马列原著，许多经济学、统计学的书籍和论文，甚至阅读了不少沙俄时代的统计学著作。到学习后期的编写论文阶段，我每天一早就跑到莫斯科市中心的列宁图书馆去查阅资料，中午喝杯咖啡，吃点面包，直到闭馆时才回到宿舍。

苏联的研究生培养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我的独立思考和逻辑思维能力，使我终生受用不尽。其结果是，我用三年半时间完成了研究生学习，最后能够“兼容并蓄”，用俄文写成了一百多万字的毕业论文，于1959年5月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并受到评委会委员们的好评，被授予经济学副博士学位（注：苏联的学位授予制度非常严格，在三千多名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两位在国内已有较高学术造诣的自然科学家获得了博士学位）。

### 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历练

1980年底，我从北京市委被调到国务院新成立的中国专利局担任负责人，当时联合国下属的专门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同意中国派一名官员去该组织担任“高级顾问”，专利局领导决定派我前去任职。那时我国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不到10年，很少有人到国际组织中去任职。当时我已经是51岁的半大老头子了，英语还是三十多年前在西南联大附

中和清华打下的一点基础，现在要只身去资本主义国家工作，还有两个多月就要去日内瓦赴任，能不能应付局面？心中不禁有些嘀咕。我决定临时抱佛脚，参加了北京市白堆子外国语学校的一个英语口译加速班。班上的同学都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我又运用二十多年前在北外留苏预备部学习俄语的经验，不怕丢人，在班上抢先发言，练习英语的听说能力，我的积极态度受到了师生们的好评。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到以后，明显地感到语言方面的差距，因为在这里从领导到同事都是外国人，日常交谈、读写文件、开会都得用英语，我那点英语水平相形见绌。好在联合国各组织都鼓励职员学习外语，办了许多免费的学习班，我每天利用上班时间可以参加一个小时的学习，从英语二级学到英语五级（最高级），根据个人能力经过考核随时可以晋级。我和过去一样，经过勤学苦练，顺利地学完了全部课程。加之平时主动和同事们交流沟通，听、说、读、写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阅读和起草文件的能力，听会和会议发言都渐入佳境。

从1981年到1984年，我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工作了四年，当时该组织的创始人和总干事是美籍匈牙利人鲍格胥博士，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强势领导人，很希望能促进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国建立起保护知识产权制度。我去以后，他们很重视，鲍格胥博士安排我直接在他领导下工作。但是，当时我国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计划经济和“文革”的意识形态在人们的脑海中还根深蒂固，知识分子即便有一些知识，那也是党和国家培养的结果，如果有什么发明创造，应该由

全社会无偿地使用。专利制度要给予发明创造者以长期垄断的独占使用权，那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法权，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不相容的。在计划经济的长期熏陶和影响下，中国人一般都不知道知识产权为何物，特别是听到“专利”二字，更觉得那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甚至有一种本能的抗拒思想。当专利局把起草的专利法草稿提请社会各部门讨论时，遭到一些主流部门的普遍质疑或反对。他们认为我国所有的工业产品和科技产品都是模仿国外的，如果建立了专利制度，国外的发明创造大举进入中国申请专利，那就会堵塞了我们模仿的门路，束缚了我们自己的手脚。能否在中国建立专利制度的争论一直持续了三年多；反对的声浪占上风时，影响了WIPO官员的情绪，我的日子就很不好过。

中国专利法草案先后修改了23次，每个修改草案及其实施细则都会送到WIPO来征求意见。鲍格胥必定召集法律顾问、工业产权司司长和我在一起，逐条逐句地仔细分析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反馈给中方。关于是否在中国建立专利制度的争论，最后经过邓小平同志的拍板才算尘埃落定，有了肯定的结论。直至1984年3月12日，专利法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我身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这个大环境中，耳濡目染，对中国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必要性还是坚信不疑的，对我国专利法、商标法及其实施细则的顺利通过，也算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在此期间，我还对《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专利合作条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等国际条约的作用、意义和参加的必要性等，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了调研报告，报送给国内有关部门，对我国参加这些国际条约，起了一点参考价值。

## 参与创建中国的专利制度

1984年底，我结束了与WIPO的工作合同，奉召回国。1985年初，被任命为中国专利局副局长和党组成员。专利局成立后的前四年，中心工作主要是起草和修改专利法草案，局的业务建设还在筹备过程中。对于建设一个新型的、业务性很强的现代化专利局，大家都很陌生，只能参照国外的经验，一切从头开始。

1985年3月12日，专利法正式生效，也就是专利局正式开张接受专利申请的日子。局党组定的目标是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顺利地接受专利申请，争取当年通过专利审查，授予第一批专利权。WIPO总干事认为能实现这个目标将是一个奇迹，这在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的。局长黄坤益做事很果断，但作风比较民主，充分放手让几位副局长管好他们各自分管的工作。

3月12日清晨，许多申请人就到专利局排队领取申请表格，第一天就提交了四千多份专利申请。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局职工的共同努力，大家同心协力，众志成城，终于胜利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于1985年底以前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授予了第一批专利权，创造了世界专利史上的一个奇迹。

当时局党组分工，让我分管法律、国际合作、文献、出版、宣传、自动化等业务，并担任中国专利局的新闻发言人，除了审查业务以外，其他业务工作都压在我身上。这些业务对我来讲都是生疏的，压力是很大的，但是在清华“自强不息”校训的激励下，本着学习的态度，我勤勤恳

## □ 回忆录

恳，奋发图强，到每一个部门去，依靠群众，进行调查研究。在所有的会议上，我聚精会神地听取每位同志的发言，开动脑筋，认真思索，所以很快就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较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专利文献是专利审查制度的必要工具和基石，每年各国专利局都会公布成百万份的专利文献，专利审查员必须检索浩如烟海的专利文献，才能确定一项发明创造是否属于全世界首创，是否有资格授予专利权。我在WIPO任职期间，就去了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专利局，请他们将多年来积累的专利文献纸件的备份支援中国专利局，装了三大集装箱，为我国的专利审查工作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回到专利局以后，又与一些主要国家的专利局建立了专利文献的互换关系，使专利审查工作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专利局从建局伊始就很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德国专利局援助我们建立了一个现代化的印刷厂，拥有先进的黑白和彩色印刷设备，从一开始就可以自行印制全部专利文献、有关的杂志和书籍。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向媒体通报专利工作的进展情况。每年年底还编印中英文对照的彩色中国专利局年报，向国内外汇报中国专利的发展状况、年内的大事以及重要的统计资料。我们还编印了中国专利局的机关刊物《中国专利》月刊，1987年左右又扩大为《中国专利报》。作为专利局宣传工作的负责人，这些工作都是由我主持筹办的。

专利工作是一项国际性很强的业务，与国外业界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专利局的建设也受到国外同行的热情关怀和支持。我们除了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建立

经常性的业务联系以外，还与德国、美国、法国、英国、瑞士、瑞典、日本等国的专利局以及欧洲专利局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特别是西德科尔总理政府决定拨两千万马克专款，帮助中国建设专利制度，为中国专利局建立了一个印刷厂，提供了全套通讯设备，接收了几百名审查员和管理人员到德国专利局去培训。日本有关部门也赠送了两套富士通计算机，并派专家组来协助安装，指导使用。其他各国专利局也都承担了为中国专利局培训人才的任务，使中国专利局有了合乎国际标准的人才队伍和硬件设备，保证了工作的顺利运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每年都要召开一次成员国大会，每次都由我陪同中国专利局局长前往参加，担任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参与大会的讨论。

现在，我已届耄耋之年，回顾这一生，我有一点体会，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做什么工作，都必须下苦功夫，认真钻下去，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几十年中，我坚持凡是写文章、作报告、作演讲，无论是用中文、英文还是俄文，都必须亲自动脑、动手，亲力亲为。要独立思考，绝不让别人操刀代劳。我遵从“活到老，学到老”的教诲，尽量做到与时俱进；70岁开始学电脑，逐步学会了用中文、英文、西班牙文打字，打了几百万字的材料，速度还不慢；还学会了用中英文上网检索资料。我从68岁学开汽车，一直开到84岁，是一名具有16年驾龄的老司机了。



# 离开清华几十年的工作经历

○牛竞存（1947—1949 外文）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5月初我被党组织调到北平市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少年儿童部工作。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青年团总支部委员，学生自治会第四届理事会的福利委员。和我前后同时从清华大学调到青年团市委任大学部长的还有王浒同志。我到少年儿童部工作不久，部长华顺被调离团市委，团市委任命我接任少年儿童部部长。当时团市委在王府井南口，一个带地下室和小礼堂的二层小楼里办公，工作人员大约有一百人左右，除了杨伯箴、张大中几位领导人外，大部分是刚从北平各大中学校里调出来的地下党团员学生，年龄都是二十岁上下，还有少数老区来的工农干部。当时实行供给制，都没有工资，除免费食宿外，每年发给每人

两套灰色单制服，两年发给一套灰色棉制服；外出工作可以骑公用自行车；没有节假日，工作不分昼夜，当天的事办完才去集体宿舍休息。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北平改名北京，成为首都。大会场设在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东长安街排上的游行队伍，最前面是军队，紧接着是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各界职工和市民群众代表。国家领导人毛主席、刘少奇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登上天安门城楼，礼炮齐鸣，歌声飘扬，毛主席向全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台上台下欢呼“毛主席万岁”，欢呼声和掌声经久不息。中国人民多年来深受帝国主义欺压，日本鬼子入侵中国十多年的苦日子结束了；蒋介石反动政权被推翻了，中国人民心中无比的高兴。这一天中国人民永远铭记、年年庆祝。

在我从清华调到北京团市委工作的四年，每年都参加国庆节庆祝大会，同时我还带两名优秀少年儿童队员（以后改名少年先锋队）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献花。

1999年1月，北京电视台邀请我和当年少年儿童部的江敬文、姬君式同志和几次国庆节给毛主席献花的儿童重上天安门进行采访。那时的少年儿童队员此时都已60岁左右了。他们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对国家贡献不小，有的从事航天事业，有的是优秀教师、科学家、劳动模范。这段采访



前排左2起：陈庸勋（地学系）、牛竞存（外文系）、吴宏宛（社会系）、蒋励君（金凤，外文系）；后排左2起：卢鹤维（刘华，经济系）、王士林（外文系）

## □ 回忆录

被收集在建国五十周年大庆期间播放的纪录片《国典春秋》第一集中。

在少年儿童部工作一段时间，我深感责任重大，自己刚参加工作，缺乏工作经验。我找到团市委书记杨伯箴、张大中同志，要求他们另派一位经验丰富的同志来主持少年儿童部的工作。后来领导将中学部部长周世贤同志调来任部长，改任我为副部长。周世贤同志经验丰富，口才很好，我跟着他工作一年，受益匪浅。1951年初周世贤同志另有重任调出少年部，我继任部长。少年儿童部的同志都把少年儿童看作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十分热爱这项工作。我们到中小学校试建少先队，创办《北京儿童报》，建立起第一个少年之家（在北海公园内），还在景山公园建了少年宫，夏天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夏令营。

1951年我受青年团中央委派，带一个少先队小队去保加利亚参加国际少先队夏令营，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捷克、波兰、民主德国等国家的少先队一起，在斯大林城黑海之滨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夏天。后来成为影剧双栖明星的郑振瑶就是这个队的副队长。回国途中，我们顺路参观了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和苏联首都莫斯科。1951年至1952年期间，江敬文、李学信、王静庄等同志也曾分别带领几个少先队代表队去苏联、匈牙利参加夏令营，到民主德国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北京团市委于1989年为纪念少先队建队40周年，出版了《阳光下美丽的事业》一书，其中有我一篇文章《崇高的事业 幸福的回忆》，就记述了这段工作。



牛竟存（中）和当年曾给毛主席鲜花的儿童及同事在天安门城楼上

的事业 幸福的回忆》，就记述了这段工作。

在北京团市委工作的四年中，我感受最深的是领导们的工作作风非常好。他们没有官架子，密切联系群众，能听取群众的意见。例如团市委领导杨伯箴、张大中同志年底总结工作，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后竟感动得流下眼泪。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没有官气，群众都可以直呼其名，再加上最亲切的称呼“同志”。比如彭真同志当时是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我们见面都叫他彭真同志。在北京下令取缔妓院时，他亲临现场查看、指挥，次日市政府一声令下全市妓院一律封闭。在大搞卫生运动时，他亲自跑到老百姓住的四合院去检查是否彻底干净。连我这个年轻的小干部也常被他叫去询问学校的情况。

记得1952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天，我正陪同一个小学少先队的中队参观崇文区某印刷厂，突然接到彭真秘书打到工厂找我的电话，叫我立即赶到市委去见彭真同志。去后才知道彭真同志叫我汇报当时暑假中小学校老师是否真正得到了休息。因为解放后每年寒暑假教师都要参加政治学

习和许多学生活动，市政府通知今年暑假一定要让老师休息好。当听我汇报今年暑假停办政治课并停止部分学生活动后，彭真同志才放心。每年国庆节前，彭真同志都叫我带上预选出的几个优秀献花儿童到他家与他一起吃顿午饭，在谈笑聊天中进一步了解孩子们的家庭、性格、学习、身高、相貌等情况，最后挑选两名最优秀的儿童上天安门献花。他有时因劳累不舒服星期日到公园去休息，还叫我带几个小学生和他一起到北海公园去划船、走走。北海公园北岸上的第一个少年之家就是在我提议后，他视察并和有关部门批准选择一个宫殿遗址建起来的。

又如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同志也常叫我汇报少年儿童工作，当他听我说团市委领导重视青年团工作忽视少先队工作后，他指示北京团市委领导要十个指头弹钢琴，不仅要抓青年工作，也不可忽视少年儿童工作。他对当时学校对少年儿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光讲大道理并搞形式主义的做法提出批评。为此他给少先队辅导员作报告，要求一定要按照儿童的特点开展喜闻乐见的活动，寓教于乐。

1952年胡耀邦同志到团中央任书记处书记，他平易近人，经常到团市委和学校了解少年儿童工作情况，并亲自给少先队辅导员作报告。团中央少年儿童部部长陈琏同志（蒋介石的大秘书陈布雷的女儿）还经常下来参加少先队的活动，与我们一起探讨工作。在这些领导干部的言行中，我们感受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些共产党的优良作风，从而以他们为榜样，把这些作风贯彻到自己的工作中。

1953年组织上把我从团市委调到华北

团委少年儿童部任少年儿童科长，但1954年8月华北局、华北团委撤销了，组织上调华北团市委书记蒋毅同志到内蒙古工会任副主席。我是他的秘书，就带着刚满半岁的大儿子到内蒙古工会工作了，在内蒙古工会当了三年秘书。过去做少年儿童工作，我熟悉中小学生，我现在必须了解工人，因此再三要求到工厂第一线去工作，以便熟悉工人。

1957年5月，组织上调我到新建第一毛纺厂当工会主席，以后又当了副厂长。我经常到车间和工人们一起劳动，参加他们的班前班后会，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基本上能做到每天与三班工人都能见上。工人们爱厂如家，努力工作，不计报酬，深深打动了我。如老工人房玉山经常加班，不声不响到处检查维修下水道，我发现后给他报了加班费，他却推辞再三后才去领。机修工张师傅经常到垃圾堆里捡废铜烂铁，也会在坏灯泡里收集铜丝用于维修工作。又如修补工党淑珍每天低头修补呢子，珍惜每一分钟，连头都舍不得抬。她的名言是“抬头误三针”。类似事情很多，只要工作需要，厂领导一声令下，全厂职工都会齐心协力，想方设法完成任务。厂领导也是忘我工作，白天深入车间，晚上开党委会到深夜，平时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有时工作需要就通宵不睡。1958年大跃进，全厂完成全年生产任务200%。厂党委决定除书记、厂长、工会主席外，给全厂职工年终发双薪。领导干部吃苦在先，享福在后，也激励着工人。1958年大跃进，我的小儿子出生，产假56天，我只休息了一个月就提前上班了。

我在一毛工作三年，1960年被调到呼市市委政策研究室当副主任，我依依不

## □ 回忆录

舍地离开工人朋友。这时我常下农村了解农民和农业生产的情况。1964年春我又调到呼市科委任副主任，我感到在机关工作开会多，想进一步下乡了解农民，因此报名参加农村“四清”工作队任队长。我骑自行车驮上行李，到桃花公社茂林大队工作近三年。在农村我早起拾粪，白天下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入冬我患了气管炎，巡回医疗的大夫给我打针吃药不见好转，劝我回市里休息治疗，但我不肯扔下工作回去，大夫开玩笑地说：“真是个铁人！”由于劳累，气管炎几个月不好，发展成了慢性支气管炎和肺气肿，从此一到冬天就犯病，折磨得我很痛苦。一直到60岁离休后，我经过多年坚持锻炼，才逐渐好转。

在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的同时，也发动群众提意见，结果发现村里大小队干部基本上都很好，因此战果平平。但我收获最大的是广大农民吃苦耐劳、淳朴善良，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并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大队的妇女队长芦银银是贫下中农，热情能干，我住她家，和她婆婆、女儿们睡在一个大炕上。不久她的大姐从南营子村来了，她大姐的头上有一处伤痕，平日沉默寡言。经过了解才知道，她大姐是南营子村的妇女队长，丈夫早年去世，她带着四个尚未成年的子女生活，全家靠种田、放马、在马路上拾拉煤车掉下的煤渣生活，十分艰难。“四清”运动中她被诬陷、受检查，一时想不开想自杀，用剪刀划伤头部，经过救治被送到芦银银家调养。四个子女中老大已出嫁，其他三个孩子无依无靠。我经过调查了解情况属实。我很同情她的遭遇，在生活上关心她，慢

慢地她很信任我，并向我吐露了心结。为了治愈她的伤痛，我带她回呼市我家居住，一方面带她到市立医院去治疗头上的伤，另一方面找我的邻居公安局长来安慰她，说她没有违法，保证不会再有人找她的麻烦。她因此放心、平静下来了。此外，我还经常给她点钱、粮食，帮助她的家人。后来又到她住家所在的社区为她办了笔困难补助金手续，她十分高兴。不久我和她妹妹把她送回南营子村，孩子们无比兴奋激动地迎接妈妈回家。从此我家和芦银银姐妹两家来往不断，结下了无比深厚的姐妹情。

为了让儿女们体验农村的艰苦生活，我让两个较大的儿女在寒暑假也带上点钱和粮票轮流到她两姐妹家住段日子，让他们从小就体验到农民的艰苦生活，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我老伴是我的同学、同乡，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内蒙古日报社时事部任主编，一度也当“走资派”失去了自由。三个未成年的儿女学校停课，在家独立生活。14岁的大儿子韩大欣买菜做饭；12岁的小女儿晓荣打扫家、洗衣服；10岁的小儿子大明拉风箱帮哥哥做饭。有空时，哥哥带妹妹、弟弟温习点功课。这时在农村的芦家大姐常来看望三个孩子，当大欣参加锡盟建设兵团时，大姐流泪送别。在农村的两家子女长大后多数在呼市找到了工作，成家立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并且都很孝敬老人。大姐的儿子刘文寿很懂事，21岁就参军了，在部队抓紧机会学习文化，复员后到呼市工会工作，之后他又上了工农兵大学。由于他工作敬业、能力强、有文化，很快就当了市工会副主席。文寿为人忠厚、坦诚、热情，我只做了点微不足道的事，他却总记

在心中，每逢过年过节全家聚餐总请我们夫妻一起去吃饭。

1966年春“四清”运动结束，我又回到市政府，被调到文化局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市委决定三个剧团（歌剧团、晋剧团、杂技团）集中在一起开展运动，让我负责组织工作组领导运动。晋剧团马德才反对工作组，当时中央认为谁反对工作组，谁就是反对革命。因此马德才同志首先被打成“反革命”。群众起来批判三名三高、文艺黑线，康翠玲、任翠凤等晋剧团名演员都被批判。不久又反过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因批判马德才、镇压了群众，执行资反路线，而被揪斗批判。我被戴上三顶帽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假党员”（地下党）、“地主狗仔子”（父母是地主），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我曾主动诚恳地向马德才同志赔礼道歉，马德才也是个老实厚道的同志，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与此同时，我爱人韩蕴清也被当“走资派”扣押，我婆婆被当地主赶回河南老家。不久又开始打“内人党”，说内蒙古的共产党就是“内人党”，被扣压的“内人党”被武力暴打，在火炉子跟前拷打后，夜里被扔到冰天雪地里，很多人被打伤致残。因此我趁还没当“内人党”挨打，偷偷跑到北京、天津老同学、亲友家躲避一年。直到党中央不让打“内人党”了我才回呼市，这期间我老伴也失去了自由。

“文革”去石家庄学习一年多，这段时间家里只留下三个儿女独立生活在市政府家属院两间平房里。当时中小学都停课了，他们只好生活自理，大儿子常去左邻右舍看人家怎样炒菜做饭，有时遇到困难，邻居们都帮忙。1969年呼市各单位的



牛竟存学长（2016年4月）

“走资派”都参加学习班到石家庄学习一年多，我1971年4月从石家庄回到呼市时，只见到我老伴领着两个小儿女接我，原来我大儿子大欣参加锡盟建设兵团去锡盟草场了。

1978年恢复高考后，大儿子考上天津大学，女儿考上南京邮电学院。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工作几年又考进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小儿子参军回来考上电大，他们工作都很好，让我很放心。我们夫妻二人都于1984年离休，这时都已超过60岁了。我和老伴分别在报社和附近的小学校义务帮了几年忙才休息。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清华的老同学们和北京团市委的老伙伴都已退休，每年都有聚会。我身在呼和浩特，但他们聚会总叫着我，我也争取每次都去参加。大家非常亲热，争着要我住他们家，互相叫着当年的绰号，我虽然八九十岁了，他们仍叫我“小牛”，我们都有共同语言，共同关心党和国家大事，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清华百年校庆时，我和大儿子都是校友，参加了各种活动。现在我还和老校友、老伙伴们有电话来往。



## 何以“归成”？

### ——清华校园文化对中国第一代留美建筑家的影响

○ 赖德霖（1980级建筑）

本文根据赖德霖教授2019年10月12日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的“归成——中国近现代建筑研究与宾大建筑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演讲整理，内容有所修改和补充。

关于毕业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这个展览，童明老师一开始就跟我商量，了解我的一些想法。他还对我做了访谈，其中内容大家可以在录像里看到。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展览还会巡回到清华，所以我谈的内容主要是针对在南京的展览，忽视了清华的部分。这次是第三次展览，在清华举办，邀请我来参加这个研讨会，我就想到应该把这些学生在清华受到的教育做一个介绍，来探讨清华母校的教育对他们日后事业的一些影响。

从展览中大家可以了解到，这些出自清华学校又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对中国近代的建筑设计（代表者如杨廷宝、赵深、陈植、童寯、梁思成）、建筑教育（如梁思成、陈植、童寯、哈雄文、王华彬）、城市规划和设计（如梁思成），建筑学术（如梁思成、童寯）、学会（如梁思成、杨廷宝、王华彬）、历史遗产研究与保护（如梁思成、童寯、杨廷宝），以及建筑行政（如哈雄文）

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可以说他们是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精英中的精英，对中国建筑现代化的影响非常深远。但是我们不能忘掉，还有很多早年出自清华的建筑留学生，例如吕彦直、董大酉、庄俊、黄家骅、张锐、董修甲、巫振英、张光忻，他们大都是清华学校的毕业生，而关颂声是清华学校津贴留美自费生，也与清华有缘。他们虽然并非留学宾大，但对中国建筑的现代化同样作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还有一些与清华有关的建筑工程师，如蔡方荫、杨宽麟、谭真、薛次萃、李铿，他们有的是中国建筑师学会会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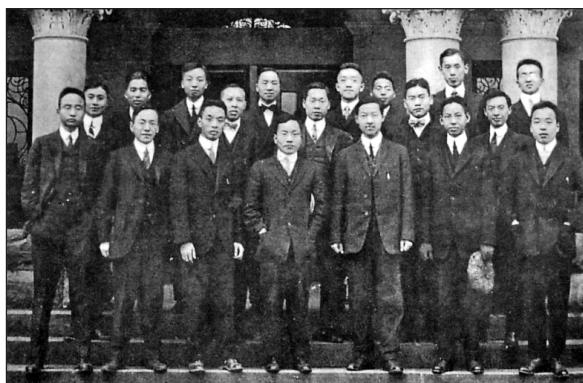


图1 1914年中国科学社社员合影。前排左2周仁，左3任鸿隽，左5赵元任，左6杨铨（杏佛）；二排左2秉志，左3胡明复，左4金邦正，右1吕彦直；三排左2过探先，左4胡适，右2杨孝述，右1刘震伟。图片来源：赵新那、黄培云编《赵元任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有的是中国工程学会的会员，当年都是非常著名的结构工程师。结构工程师庄秉权也是清华学校的毕业生，今天在座的诸位可能都不知道他是谁，我至今也没能找到一张他的肖像照片，但是如果我说郑时龄院士是他的学生，大家就会知道他很重要。

事实上，他们的贡献并不局限在建筑界。图1这张照片是中国科学社成立时的一张合影，摄于1914年。其中有非常著名的人士，如前排左3是任鸿隽，左5是赵元任，左6是杨杏佛，后排左4是胡适。但中排右1还有一位学建筑都听说过的人，他就是吕彦直。这位南京中山陵和广州中山纪念堂的设计者还曾是中国科学社的成员，这个事实过去中国建筑界还不知道。

吕彦直在1929年去世后不到三个月，国民政府曾颁令对他嘉奖。这是民国时期的国家级奖励，在1949年之前，吕是唯一一位获得该奖的建筑师。1949年以后还有一位建筑师在台湾获得这一奖励，他就是关颂声。二人都是清华校友，非常值得母校师生自豪。表彰关颂声的嘉奖令说他“学成归国，服务社会，贡献颇多。……比年对海外侨胞之联系，与手工业之推广，悉力以图，咸收绩效。更热心体育，培植人才，选拔所得，于国有光”。关颂声在台湾有“田径之父”的美誉。嘉奖令最后一句话是称赞他在1949年后对台湾体育事业的推动，可见其贡献已经超越了建筑的专业范畴。

在1930年代中国的国货运动中，这批与清华有关的留美建筑家还曾积极宣传和推广国货建筑材料。如1936年的中国建筑展览会常务委员中就有庄俊、赵深、董大酉、裘燮钧（1895—？，1917年清华学校官费留美，1918年获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

系硕士学位）和梁思成。关颂声和赵深还担任了征集组的正副主任，林徽因和董大酉担任了陈列组的主任。展览期间，梁思成和童寯曾对公众做公开讲演，梁思成讲“中国建筑结构之变迁”，童寯讲“现代建筑”。

总而言之，这批清华毕业或与清华有关的留美建筑家对中国建筑和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展览，不仅要了解美国的教育对于这批中国建筑师有多么大的影响，而且还有必要思考，为什么这么多对中国社会和建筑的现代化作出如此巨大贡献的人都与清华有关？所以我现在要讨论清华母校对他们事业发展的影响。

在开始之前我先介绍1921年出版的《清华周刊（本校十周年纪念号）》。在这期专辑里，编者介绍了当时清华学生在德智体三个主要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绩。其中德育居首，内容包括自治、社会服务、爱国运动、救灾，以及砥砺的团体等许多方面，可见清华对德育教育以及学生的德育发展非常重视，也非常鼓励。爱国运动中包括“五四”“五九国耻纪念”以及天安门游行等。智育方面包括会社，其中有“宗教的”和“学术的”两类，而在学术类中有普通的、科学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以及技艺的。可见当时，清华学生有着非常广泛的兴趣，而学校也给他们个性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机会。在智育方面还有一项很重要的训练，就是“技艺的”，包括演说、戏剧、音乐、绘画。体育方面的课程和活动更多。这三个方面也构成了我所说的清华校园文化的主要内容。

早在1911年2月制订的《清华学堂章程》中就已明确指出，清华学堂“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

## □ 史料一页

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1917年1月29日新学期开学，校长周诒春给全体学生演讲，训育学生重视反省、克己、务本、注意功课、操练身体及顾全大局等。同年2月，他又为高等科四年级即将毕业学生做择业问题的演讲，提出“择业不当贪货利、骛虚名，亦不可拘于时事之盲论，及父兄亲友之成见，当以天性之所近，国家所急需，及能造福于人类为权衡。”清华办学之注重德育亦可于有“清华之父”美称的校长曹云祥在1922年上任伊始对《清华周刊》记者的谈话之中窥见一斑。他说：“抑余更有希望于同学者，即平时于讲求学问之外善能于道德上加功。盖学识易求，道德难修。至道德一端，尤以大量涵养毅力为立身处世之根本，盖其人学识虽强，而于以上数节未能修养，则虽大材大用，以其眼光浅窄，贪图小利，不善容人，不知从大处着想，因此不能成大业。”由此可见，清华的德育包括了自我修身和社会关怀两个方面。

与“德育”类中的“社会服务”相关，清华学生组织了很多社会团体，目的都是为社会服务。所以1923年清华学校毕业生，杰出的教育家、科学家、诗人、戏剧家、音乐家和禅学家顾毓琇（1902—2002）和同学梁治华（即梁实秋，1903—1987，著名文学家、学者、翻译家）在毕业时曾对清华的教育做过一个总结，其中关于社会教育，他们说：“不明白清华内容的人多说清华是贵族学校，我却不愿替它辩护。因为从表面上看来，清华实在当得起这个名词。但是清华学生的生活却不是贵族式的生活，如果说清华学生大半是贵族的子弟，我更敢大胆说清华学生大半是托尔斯泰式的贵族子弟。他们的服务

精神却非普通一般平民所可及。”他们办的社会服务组织前后有16种，其中包括给学校的工友办“校役夜学”，与周围农村的民众结交“村人友”，还给附近的民众开办“城府职业学校”（1915—1921）、“西柳村露天学校”（1919—1921）、“星期六学校”（1914—1918）、“星期日学校”（1916—1918）、“平民图书馆”（1920—1921）、“改良乡村教育研究会”（1919—1921）等。这些就是清华学生在上学的同时为社会所做的工作。

学生们在清华学校上学期间还有很多机会接触到很多校外著名人士，听他们演讲各种问题。例如南开大学的校长张伯苓曾讲《中国教育现状》，韦尔德博士讲《知行合一》，美国律师罗士讲《学生之爱国心》，孔教会会长陈焕章讲《孔教与中国之关系》，蔡元培讲《人道主义及爱国心》，胡适讲《我国文学改良词题》。其中影响可能最大的是，梁启超在1914年11月5日来讲《君子》。他提出“君子之道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之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就成为了清华的校训。不难看出，这些名家演讲都会起到励志和开阔眼界的作用，非常有助于学生树立人生观和世界观。如下面我将谈到，杨廷宝1915年进入清华，他是学校孔教会的成员，他很可能听到过陈焕章的演讲，他还酷爱武术，而他日后坚持探索中国风格现代建筑很可能就源自他在清华读书时所培养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清华学校为奖励德育曾设有“铜墨盒奖”。日后与陈植和童寯两位校友合办了华盖建筑事务所的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赵深（1898—1978）在清华学校学习时曾在1915年获得过这一奖项，梁实秋在其回

忆文章《清华八年》中说到自己因偷看禁书被斋务主任发现而与铜墨盒奖无缘。不过他依然为清华的教育而感到自豪。他介绍说“清华是预备留美的学校，所以课程的安排与众不同，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公民（美国的公民）……都一律用英语讲授，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下午的课如国文、历史、修辞、中国文学史……都一律用国语，用中国的教科书”。其中公民课和修身课应都与德育有关。1933年参与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中国馆设计的过元熙（1904—2005）建筑师也是清华毕业生，他在1923年毕业时曾写文章讨论清华生活并特别提到公民一课对他的影响。他说：“我现在所顶喜欢念的学科，就是公民学。因为那里头所讲的东西，完全是普通智识，讲到我们应该怎样去造福社会，我们同社会国家的关系是怎么样，都是个个（原文）人所应该知道的，我读了这本书以后对于我将来的责任，又明白了好多。”他的话帮助我们了解这门课的内容，并认识它对于培养学生公民精神的意义。

1916年第66期《清华周刊》曾在《校闻》专栏中报道“演剧记事”，介绍了学生们自编自演的《贫民惨剧》。这出剧表现了身处社会底层的贫民生活的悲惨状况，该剧在北京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演出，“观者甚众，咸为动容，若亲历其苦境”。剧组中的总干事之一是张光圻

（1895—？），他是1927年上海（后改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创建时的发起人之一。爱好美术的朱彬（1896—1971）担任了布景设计。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的洪深，以及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和国学大师的汤用彤是这出剧的编剧。由此可见，这出剧不

仅体现了这批清华学生们的社会关怀，还体现了他们各尽所能的贡献精神，以及团队工作的合作精神。

朱彬留学回国后与校友关颂声和杨廷宝创办了中国近代最为著名的华人建筑师事务所——基泰工程司。他在清华时曾以智育“绘造图样”获得清华学校金牌一面。1918年他到美国后，曾给母校的老师Danton博士夫妇写过一封信。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在费城的生活并不好。但他说：“能够克服的苦越大，我越会为自己高兴。毕竟我们的政府送我们来不是让我们享福。”这就是一名清华学生的志向，他到美国是为了学习，所以对所经历的磨砺能泰然处之。

这期《周刊》还介绍了高、中两科的（年）级长、班长及自修室长的选定结果。张光圻当时是高四级的级长，梁思成是中等科国文班乙班的班长。与张光圻同级的甲班班长是孙克基（1892—1968），他后来成为著名医学家。上海妇产科医院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的一件名作，它是国第一所妇产科医院，是孙克基当了医生以后投资建造的医院，设计者是庄俊（1888—1990）。庄在1910年通过考试获得庚款资助，是第一位留学美国学习建筑的中国人。他在1914年回国后担任了清华学校的驻校建筑师，负责监造校园建筑。学生的这些自我管理工作应该非常有助于培养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梁思成还在1923年担任了学生会交际科的正主任，当时的主席是徐宗涑（1900—1975）。徐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回国后曾任东北大学化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九一八”事变后他到上海水泥公司任职，对中国的水泥工业的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梁思成全集》里有梁思成、陈植与他的合影。

1922年《清华周刊》第238期曾刊登一篇署名为“思成”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不见于《梁思成全集》，当是梁思成先生的一篇佚文。文章的题目是《对于新校长条件的疑问》。在文中他针对清华同学们在校长选择上提出的“中英文兼优”“办教育有名望”“没有政党臭味”三个条件一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对于第三条，他说：“人类是有‘群性’的动物，他们群性的产品就是社会，在社会上的团体活动就是政治，所以政治同社会是不能分离的，除非没有社会，有社会便有政治……一个人既与政治有关系，他就必定有所属的政党。”他针对有人担心学生受政党的利用的顾虑说：“受不受人利用，本来权就在学生自己，不是别人所管得着。若说不受人利用，天下哪有这种事。若说怕人受利用，那人便是没有意志。”文章还说：“我们学生若是遇着政党要来利用我们，只要是正当的，于社会有益的，于我们自己有益的，我们自然不反对他利用，并且应当欢迎。若说不正当的，我们自己把持住主意，不受他利用就是。有谁能干涉我？”这篇文章显示出梁思成对于政党的态度以及他对自己能够在与政党的关系上保持自主的自信。这一自信可以帮助后人理解他在1949年时选择留在大陆的决定以及他所经历的命运。

1922年至1923年，梁思成还担任了《清华年报》社的美术编辑。童寯比他低两个年级，当时是他的助手，一年后也升任美术编辑，而过元熙则担任了发行经理。《年报》的英文编辑主席曾由全增嘏（1903—1984）担任，他后来成为中国近

代著名英文刊物——《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杂志的编辑。《年报》英文编辑中还有江元仁（1902—1968），他后来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土木工程系，回国后任教于上海交通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建筑系三四年级学生到上海，由陈植向大夏大学磋商借读，陈植和童寯继续教设计，作为二人校友的江元仁也曾出手帮助，教授工程。由此可见，这些校友学生时代的友谊日后发展成为他们在事业上的相互支持和合作。

提到童寯先生，我又想到《清华周刊》第345期（1925年5月1日）上刊登的他致总编辑的一封信。信中提到344期《周刊》刊载消息说“社长王慎名君随足球队南下，社中职务交童寯代拆代行”。但童寯特别解释道：“王君只委托寯向司达（德霖按：Miss Stars，见下）女士接洽演讲，其余社务，由梁衍君代理，请为更正，以免社友误会。”就是说他绝对不贪他人之功，我做了什么就是什么。这封信虽短，但足见童寯的君子品性。信中提到的《清华周刊》社务代理梁衍后来也曾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他还是美国现代建筑大师赖特的第一名学徒生。他在1933年回国后曾任基泰工程司设计师，抗战后到美国，曾作为Harrison and Abramovitz事务所主要设计师之一，负责联合国建筑工程设计。

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清华校园文化的影响也非常大。闻一多曾作画表现当时学生在天安门前演讲的情形。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也曾说：

“自五月十九日以后，北京学生开始街道演讲。我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我们一小队人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

横排在街道上，人越聚越多，讲演的情绪越来越激昂，……五四运动原是一个短暂的爱国运动，热烈的，自发的，纯洁的，‘如击石火，似闪电光’，很快的就过去了。可是年轻的学生们经此刺激震动而突然觉醒了，登时表现出一股蓬蓬勃勃的朝气，好像是蕴藏压抑多年的情绪与生活力，一旦获得了迸发奔放的机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沛然而莫之能御。当时以我个人所感到的而言，这一股力量在两点上有明显的表现：一是学生的组织，一是广泛的求知欲。”

“五四”运动是由中国民众抗议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未能捍卫中国权益而引发，但广义的“五四”运动还包括1915年中国民众为抵制日本《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简称“二十一条”）而发起的游行示威活动。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中国方面被迫在5月9号签字。“五七”或“五九”因此称为中国的“国耻日”。清华学校自此每年举行国耻纪念一次。1919年举行国耻纪念年会时，“同学激于五四之事，尤觉创巨痛深，故举会时精神较前更为诚挚恳切”。会上发出《誓言》：“中华民国八年五月九日，清华学校学生，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此誓。”这个《誓言》掷地有声，十分庄严，今天听起来都令人热血沸腾。

受其同事和学生回忆的影响，今天人们印象中的杨廷宝先生是一位与世无争、无可无不可的谦谦君子。但作为一名经历了“五四”运动的学生，他至少曾经也是一名热血青年。杨的家国情怀清楚地体现在他于1924年3月31日发自宾大的一封有关西藏问题的信。信中说：“校中古物陈

列所有演说西藏之风俗人情，直谓该区为独立国家，界乎中国与英属印度之间。闻之异常诧异。西藏向为我国藩属，又为组织民国五族之一，外人何以遽出此言？岂英人虎视狼食，宁造言惑世，以冀遂其兼并之野心耶？吾国人似不可不于西藏问题，特加注意。”这一来信到后，“未数日各报纷载”，而英兵侵入西藏之警耗，连同随后收到的川边人民来电报告，遂引起社会关注。

一个重视德育的校园对于学生人格和社会责任心的培养必然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建筑师学会会员林澍民（1892—1987）晚年致亲友的一封信或许就体现了这一影响。他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之后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建筑工程系，1922年获得硕士学位。他在信中说：“我们的先人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财产，但他们确实给我们留下了比金钱所能购买的任何东西远为宝贵的遗产：读书受教的头脑，慈爱人类的心，和对祖国的爱。”

艺术也是清华学校智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科学、社会科学、哲学和文学并重。在1917年以前，中等科一、二、三年级都有图画课。之后三年级图画课取消，但一、二年级依然保留。爱好绘画的学生于是组织了一个特别图画班，每周六习画两小时。1919年秋天，教师司达女士示意闻一多、杨廷宝、吴泽霖和方来四名同学发起创办了美术社，起初会员有20余人。他们不仅练习各种工具和各种题材的绘画，还研究中外图案、美术史及名家传略，并通过读书报告会相互交流。至1920年底，会员已达50多人。

在清华上学期间，杨廷宝的美术成绩就非常突出。《清华周刊》曾出版他所在

年级的专辑《辛酉镜》，其中介绍他说：

“杨廷宝，字仁辉，河南南阳人。幼无兄弟，惶惶独居。是以孤静成性。稍长，寝疾经年，故体弱甚。尝肄业邑之小学，好嬉游，课程多不及格。未几，辛亥变作，举家避难迁他乡，流离颠沛。廷宝始惕于事变，恍然知向学。次年秋，海内初定，从戚某走开封，跋涉山野，备极困顿。旋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钻坚擎微，三载如一日，学乃大进。四年秋以咨送来本校，入三年级，居校谨言行，勤诵读，汪汪轨度，有文雅风。试英文辄列前茅。好拳术，本年校中比赛拳术，廷宝击剑获第二。尤嗜丹青，作山水人物，惟妙惟肖。尝得本校图画奖。现任《清华年报》图画副编辑及孔教会图画书记。”

专辑中的另一篇文章也说“杨廷宝喜作人物或以铅或以彩皆可观”，“杨廷宝以图画冠全级，获奖颇多”，“《年报》有图画副编辑二人，皆吾级友充之。闻多（德霖按：即闻一多）、杨廷宝是也”。这篇文章中还提到另一位在绘画方面非常优秀的学生方来（字孟晋，江苏武进人，



图2 清华学校美术社成员与教师（应为 Miss Stars）合影。图片来源：林洙《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37页

1900—1922），他1921年从清华毕业后也赴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但很不幸，他在第二年就因病逝世。

清华学生还在1920年12月成立了以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美术的女神“美司斯”（Muses，今译缪斯）命名的艺术团体，其宗旨是“研究艺术及其与人生关系”。它的宣言里说：“我们既相信艺术能够抬高、加深、养醇、变美我们的生活底质料，我们就要实行探搜‘此中三昧’，并用我们自己的生活作试验品。”梁思成和徐宗涑是该社的干事。图2是清华美术社的成员与老师的合影，左起第7人是梁思成，他左侧的女士应该就是司达。照片中右起第3人应该是童寯。

童寯在1925年2月20日曾参观过在北京饭店举办的一个画展，并写了《参观惠具利展览会记》一文发表在《清华周刊》。展览会上的作品出自瑞士艺术家惠具利（Charles Adolphe Egli，1894—1979）之手。他的作品在网上可以看到，非常现代，有塞尚的风格。这篇参观记虽然不见于《童寯文集》，但是其中有他与画家本人就日本绘画、中国绘画和当代西方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的讨论，以及他对其作品的评论，反映出童寯在学生时代就对东方美术和西方现代美术非常关注。

董大酉和梁思成则先后是学校铜管乐队的成员。梁还是学校合唱队的队员。1923年《清华周刊》报道学校12周年纪念，说到“江元仁、黄自、梁思成、应尚能四君合唱。四君服一色制服——淡青色的竹布衫同玳瑁边的大眼镜——歌声亦和谐可听”。黄自和应尚能二人日后都成为了中国著名的音乐

家。1961年梁思成曾在一篇文章中将建筑类比音乐，对北京天宁寺塔的建筑设计作节奏分析，体现出他不凡的音乐素养。

不仅有美术和音乐的教育，这些清华学生在留美之前甚至还有机会接受建筑学的熏陶。第二届庚款留学生庄俊是中国第一位留美的建筑师。他回国后在清华当驻校建筑管理员，期间他曾给同学讲测量课。更值得注意的是，1916年，就在清华大礼堂、图书馆、体育馆和科学馆“四大建筑”正在兴建之时，设计者茂旦洋行（Murphy & Dana, Architects）的建筑师雷先生（Charles E. Lane）进驻清华，他曾给学生介绍建筑学。《清华周刊》的报道说：“高四演讲：上周五晚八时，周校长特请本校工程师雷先生，在物理教室为高四级学生演讲建筑学事项，极多经验之谈。并由狄铁满先生（德霖按：狄授高等科历史、经济）排置电影机械（德霖按：当即幻灯机），以古今有名建筑，现之壁面。听者观者如当卧游也。”

我在研究杨廷宝的建筑时曾注意到他设计的很多立面都遵循了1: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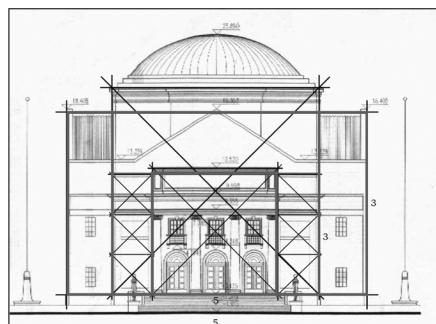


图3 清华学校大礼堂立面比例分析。图片来源：赖德霖、伍江、徐苏斌主编《中国近代建筑史》，第3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6年），475页

2:3、3:5这些斐波那契数列上的比例。非常巧，清华大礼堂的立面设计也暗含了1:1、3:5的比值（图3）。虽然我们并不能就此推断杨廷宝受到了茂飞设计的直接影响，但我相信，清华校园建筑的古典氛围对于培养一代准建筑师的审美并使他们能够很快适应美国学院派（Beaux-Arts）式建筑教育一定不无裨益。

清华从办学初期就非常重视体育，延续至今已是一个传统。清华体育协会于1911年10月成立，1927年与张光圻等参与发起成立上海（后改为中国）建筑师学会，并任职上海市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的巫振英就曾担任过该协会会长。《清华周刊》在1916年5月10日发表的《学校体育之真精神》一文中说：

“国弱者何？民不强也。民胡为而不强？体育之未普而民力无由振也。”“吾校讲求运动，注意体育，冀使同学皆有强健之身体，活泼之精神。以之为学，则学业必进。以之服务，则治举必张。”

《清华周刊》中还有很多关于学校体育的报道或介绍，其中涉及到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不乏其人。如王华彬曾经是棒球队的队员。他1932年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回国后在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任助理建筑师。办事处的主任建筑师是他在清华的学长董大酉（1899—1973），更是学校一名体育健将（图4）。据陈从周《梓室余墨》，董为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董恂士之子，外祖父钱恂为著名学者钱玄同之兄，清季任驻法公使，民初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整理文澜阁四库全书用力至勤。《辛酉镜》中也有董大酉小传，说董“字长秋，浙江杭县人。生一岁迁苏州，就外祖父家。明年外



图4 “本级足球队”，前排中为董大酉。图片来源：《清华周刊—辛酉镜》，1917年6月15日

大父官武昌，举家从之。又明年举家赴日本。六岁时入幼稚园，七岁改庆应义塾寻常小学。善运动，尤以棒球著。是时不习国文，亦不解国语，特一倭人耳。九岁自东京取道上海，涉印度洋至荷兰，乃习法语。明年至义大利，始学国文。清宣统元年，遍游法德比瑞诸都会及著名城镇，秋至义之拿波里，乘舟返国。居杭县，时年十有三也。明年正月肄业仁和高等小学。时识字数甚仅，尚不能缀文语。顾聪明逾恒，所授无不立晓，于时学日进。明年徙湖州，遂考入府中学一年级。洎革命起，避地上海。民国元年正月入圣约翰大学（按：原文，疑为中学），课余惟喜击球。五月随父来京师，六月考入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二年秋，始入本校辛西级。居恒不喜苦读，沉静寡言笑，交接甚稀。好运动，为本校棒球、足球及网球队员。任事亦勇毅，历为《清华学报》及《年报》襄理，成绩卓然可观”。

董大酉对体育的酷爱在他成为建筑师后依旧，如他设计的自宅中都有网球场。除体育外，他在学生时代还爱好手工，是年级中“最著者”之一。

杨廷宝是清华拳术队队员（图5）。他的老师当是清华拳术和剑术教员、著名的武术教育家李剑秋。他去美国留学以

后，《清华周刊》仍有关于他的报道：“此地同学中，老杨是数一数二的富翁，他虽是一个建筑学生，不是经济学家，但他的图纸一出总是洛阳纸贵，得来不少奖金。在清华时，忘不了老杨的拳术。在此地，却见他剑舞梨花，锦绣的衣裳，配着红巾、黑皂鞋，在树叶深丛，五色电光下，几辨不出1921级的老杨。”

关颂声的三弟关颂韬（后为中国著名脑外科医生）在清华上学时也是一名体育明星。而关颂声本人到美国在MIT学习建筑工程的同时，还是学校棒球队的队长和田径队的队员。

体育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有助于培养积极进取的生命态度，公平竞争意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译为“费厄泼赖”，即fairplay），团队合作精神，以及集体荣誉感。事实上，这些品德在很多清华毕业的第一代中国建筑师的身上都能看到，（包括“公平竞争”，如梁思成不以系主任之权录取仅差两分的儿子进建筑系）反映出母校校园文化对他们影响的又一重要方面。



图5 「本级拳术队」，左为杨廷宝。  
图片来源：《清华周刊—辛酉镜》，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五日

非常有趣，这几位酷爱体育的建筑师日后都成为中国现代体育建筑设计的先驱：关颂声和杨廷宝以及他们的清华校友朱彬所办的基泰工程司设计了沈阳东北大学体育场（1929—1931）、（天津）华北运动场（1933—1934）、北平公共体育场（1936）和南京中央体育场全部场馆（1930—1933）等，后者还包括有国术场；而由董大酉主持和王华彬襄助的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建筑师办事处则设计了上海体育场的全部场馆（1934—1935）。

总之，如果要知道出自清华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家“何以归成”？我们必须追溯他们在清华读书时的校园文化。综上所述，我认为这个校园文化对他们的影响至少有六个方面，这就是积极进取的人生观、自由多元的个性、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教程、跨专业交流合作的可能、爱国主义和社会关怀的陶冶，以及知行合一的作风。我相信，他们留美之前的经历对其“归成”的影响一定可以为中国今天的建筑教育，甚至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 百年清华校徽的前世今生

○袁帆（1975级建工）

在当代清华学子对母校的记忆中，一定都少不了那枚镌刻有“清华大学”的“校徽章”。那么，在清华百年历史中校徽是如何演变的？清华最早的校徽是什么样？清华的校徽与哪些人物有关？……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在有关清华校史的书海中四处寻觅。通过对清华校徽一次次演变的梳理，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清华学子对校徽情有独钟，那是因为校徽印刻着清华百年发展的筚路蓝缕，寄托着一代代清华人对母校的深情厚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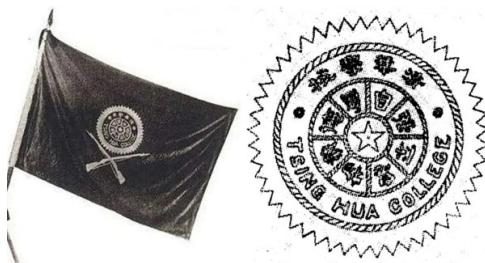
### 一、清华校徽的产生与最早的校徽章

在1928年清华大学正式成立之前，清华经历了1911年4月开始的“清华学堂”（Tsinghua Imperial College）和1912年10月开始的“清华学校”（Tsing Hua College）两个阶段。“清华学堂”的名号仅仅存在了一年多，就因为“辛亥革命”

的爆发变成了“清华学校”，而那时候“校徽”的概念在中国还远远没有普及，初创的清华学堂是没有校徽的。在1911年的《清华学堂章程》中也确实未见有相关记载。

清华学堂“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方针”。到了清华学校时代，伴随着1914年11月5日，我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学者梁启超（1873—1929）以《君子》为题在清华学校进行演讲，其中强调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因其所体现的民族奋斗精神而为清华学子铭记于心，并通过他们的实践逐渐被衍化为清华文化的精髓。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第一次被当作清华精神的外在标示，是出现在1916年为清华学校“兵操训练营”设计的军旗上。1916年12月28日《清华周刊》的消息称：“兵操军旗样式现已绘定。旗系紫



《清华年刊》刊登的兵操军旗样式和旗徽

色，中间置白色圆圈，内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圈下绘枪两支，亦系白色。光彩夺目，颇壮观瞻。”1917年6月出版的《清华年刊》刊登了这面军旗的样式。同时，旗徽的圆形图案也被单独刊印在1917年年刊的封面上。另外，这个圆形图案还出现在1918—1919年《清华周刊》总138—172各期的封面上。

这条消息虽然没有阐明军旗设计方案的征集过程、创意由来和设计者背景，但旗徽上最醒目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八个字，却表明了有着强烈“雪耻”意识的清华人非常看重并认同其精神，及至后来将其当作清华的校训而流传至今。但即使如此，那个阶段的校史上也仍然没有将这个图案作为校徽的记载。也就是说，初期的清华学校还是没有校徽，但将这面旗徽的图案当作校徽的雏形却也并不牵强。

清华学校没有校徽的历史延续了近14年，直至1926年才告结束。清华校史明确记载，1926年11月25日，“校评议会议决：通过校徽之格式：圆形、斜十字”。由此我们可以确定，从这一天起，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款校徽（右图）诞生了，它也为后来的清华大学校徽设计奠定了基础。这款校徽的图案与1917年发布的兵操军旗圆形图案相比只有细微差别。这也标志

着，清华在那时已经认识到“校徽”对塑造学校形象的重要性，这对清华的校园文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经过三年的酝酿与准备后，1928年8月清华学校改称“清华大学”，之后正式定名为“国立清华大学”。但“清华大学”并没有简单地继承“清华学校”的校徽。1928年11月末《清华周刊》（总第445期）目录页就刊印了一款校徽图案。但这个图案应该没有得到学校的批准，就是说在改办大学的最初几年里，“国立清华大学”也是没有正式校徽的。这个立论，来源于学校秘书处在1932年3月23日向全校师生发出的《校徽图案征集启事》中所称：“查本校尚无一定校徽以资识别，兹特广征图案藉备参考”。

1932年在清华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时正是梅贻琦（1889—1962）开始担纲清华大学校长，带领全校师生走出建校初期“校长不断更换，师生情绪波动，发展方向不明”困局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间点上启动清华大学第一次校徽制定工作，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了梅校长兑现“但求能够尽自己的心力，为清华谋相当的发展”诺言的扎实起步，以及通盘考虑清华文化发展所采取的实际举措。至于梅校长是如何具体参与这项工作的细节，虽然已无从考证，但依据常识，清华在他



清华学校校徽

上任之初即正式启动校徽图案这项基础工作，没有“一校之长”的关注和定夺显然是不可能的。

校徽征集工作进行约半年之后有了结果，1932年9月6日的校务会议决议：“制定两种校徽，一种采用钱稻孙设计的图案，另一种采用旧校徽大意，另请艺术家绘图。”这些情况都说明，当时清华非常重视校徽的设计工作。另外，关于清华大学“校徽章”的设计制作，清华校史上也有明确的记载：“1933年3月9日，本校校徽制成分发。系采用钱稻孙设计图案，用白色华字作底，呈鹰翅形，中间一紫色‘清’字。”这里所说的，应该是将“鹰翅形”校徽图案制成了“校徽章”发放。

1934年6月1日《清华周刊》（第13~14期）向导专号在“目录”页之后，刊登了清华大学校旗和校徽图案。其中校徽图案共两个，圆形的在上，“鹰翅形”在下。按照“旧校徽大意”绘制的圆形图案是由三个同心圆再加一个齿形圆环构成的圆面，外环为中文“清华大学”校名（繁体）、英文校名（TSING HUA UNIVERSITY），中环左右并列着“自强



清华大学最早确定的两款校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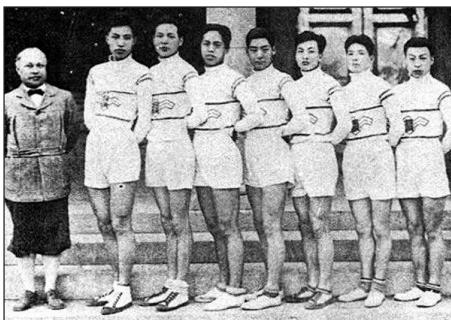


清华大学最早的校徽章

不息”与“厚德载物”两个词组构成的校训字样，中心为五角星，其基本形制沿用至今。不过这个校徽的设计者是谁，仍然没有表明。

所有这些信息都清楚地表明，清华大学早期曾经使用过两款正式校徽，其中“鹰翅形”校徽曾经率先制成校徽章发放，并广泛使用过一段时间。关于清华的两个校徽，也有一种说法是“圆形校徽是正式校徽，‘鹰翅形’是非正式场合用的校徽”。但这种说法并未见诸于清华校方的正式文件，所谓“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也很难界定。

至于我们特别关心的清华大学的第一款校徽章是什么样呢？通过上述校史资料的记载，答案已经非常明确。清华最早的校徽章就是使用的“鹰翅形”校徽图案。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收藏有一枚“国立清华大学”的三角形校徽章，图案采用了“鹰翅形”校徽，这应该就是清华最早发放的那款校徽章。此外，在一张1930年代马约翰教授（1882—1966）与清华越野队的合影老照片上，队员运动服上的图案也是这个“鹰翅形”校徽。这些都证明了“鹰翅形”校徽的使用要早于圆形校徽。这样说的依据是，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早期清



1930年代清华越野队

华根据圆形校徽图案制成的“校徽章”实物，以及圆形校徽当时在其他载体上的应用案例。

不过另一个问题来了，为什么率先使用的“鹰翅形”校徽后来在清华没有继续广泛沿用呢？原因之一应该是圆形校徽的立意更加深刻，另外的原因恐怕要与清华校史唯一记载的校徽设计者钱稻孙有着微妙的关系。

钱稻孙（1887—1966）出身官宦世家，也是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从小就在日本接受了完整的基础教育，后又在西方国家留学，毕业于意大利罗马大学。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他的学术成绩不菲，堪称翻译大家，在音乐、医学、历史等方面也有不凡表现。1932年时，他是清华大学外文系和历史系的合聘教授，1936年9月起还担任过近一年的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和鲁迅（1881—1936）、许寿裳（1883—1948）一起在1912年设计了早期的“中华民国国徽”，能设计出清华大学的校徽也就不足为怪了。

问题的重点是，抗战期间，钱稻孙没有保持应有的民族气节，竟与日伪合作，担任过伪北京大学校长等职，有很多附逆行径。抗战胜利后他以“文化汉奸”之罪

被判刑入狱，付出应有的代价。钱稻孙的这些历史污点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导致“鹰翅形”校徽没有被继续沿用的原因，至今没有发现校史资料中有相关解释，但引起一定联想也属于正常。

## 二、抗战复员后的校徽章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南迁，最后于1938年4月在昆明与北大、南开合并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结茅立舍、刚毅坚卓、弦歌不辍”，坚持办学八年，直至1946年7月才复员，迁回清华园继续办学。在此期间，西南联大的学子都佩戴过标有“联大”字样的校徽（章）。



西南联大校徽章正反面

那么，清华在重回清华园后，是否又采用了新的校徽章吗？答案是肯定的。在1947年2月19日出版的《清华周刊》上有一则关于“校徽”的消息，“本校校徽已定制事，……因定制数量甚多，且每枚后均须刻学号，徽章局表示须二十余日始能制好，故全体发下，得在本月大考完毕后”。从这条消息中，我们可以得知，清



清华大学复员后的校徽章正反面



1949级陈恬生学长保存的校徽和学生证实物

华当时“百废待兴”，但重新制作校徽（章）一事被列为必兴之事，并于1947年春天颁发新徽章。

问题是，当时制作的徽章是什么款式呢？这一点校史中并没有明确记载。但结合清华校徽演变历史的逻辑推断，我们可以确定，这一款校徽章是三角形的。至于图案，从现存的三角形清华徽章实物中，发现有一款蓝底白字的“清华”徽章，背后刻有“36617”的序号，这应该是“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第617号校徽的意思。从徽章制式、字体风格、材料质地等细节综合分析，这款徽章就是清华在抗战复员后重制校徽章的可能性极大。

就在我希望能够找到更多证据时，一位出身于清华世家的1981级校友为我提供了两件关键的证据：一枚蓝底白字的三角形“清华”徽章和一张1949级的“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证”。这两件珍贵的文物同属于1949级农学院“陈恬生”学长，在经历了长达70年的无数曲折之后，终于浮出水面，为还原清华历史上的一段史实提供了确凿的佐证。这枚徽章背面刻有“38850”的序号，而学生证上明白无误地注明了持证人的学号：38850。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充分证明了

清华在抗战复员后重制的校徽章就是蓝底白字的三角形“清华”徽章，而且徽章的序号就是持章人的学号。

### 三、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清华校徽与校徽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由此，清华大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清华的校徽演变也开启了一个新的漫长过程。根据清华校史记载，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1893—1976）“应清华大学师生员工的请求，为本校校徽题写校名‘清华大学’，共写了六个书体，自荐‘右下草书似较好些’”。

1950年9月4日，校务工作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规定“工会会员和学生所佩戴之校徽分别用红底白字和白底红字，上有毛泽东主席所题‘清华大学’四字；在校内居住之眷属所佩戴之徽章用红底白字，上有毛泽东主席所题‘清华’两字”，“11月28日向全校公布制发新校徽，12月1日起开始佩戴。原三角形校徽从该日起一律收回作废”。这一记载明确了清华大学从1950年9月开始采用毛主席的草书体“清华大学”作为字形，制成校徽（章），发



毛泽东主席为清华校徽题写的校名

放至今已经有70年。同时也印证了清华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最后使用的校徽（章）是“三角形”款式。

但是有一点必须注意，那就是毛主席所题写的“清华大学”仅仅是校名，制成的“校徽”实际上只是用于佩戴的“校徽章”，与“校徽”不完全是一个概念。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清华的校徽究竟采用何种图案似乎并没有定论。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1949年后的三十多年间，清华对解放前曾经使用的两款正式校徽没有继续延用，这里面的原因也容易理解，因为那时候对过去的清华定义为“一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资产阶级大学”，所以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对过去的清华校徽采取漠视态度也就在所难免。问题在于，前述“收回作废”的仅仅是三角形校徽（章），而对标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校训的旧校徽并没有见到废止的明文规定。除了毛主席手书的“清华大学”四个字以外，清华在1949年后的三十年里也没有新的校徽设计出来，以至于清华历史上出现一段很长的“校徽”空窗期。这种情况只是在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之后才逐步发生了变化。

#### 四、改革开放后的清华校徽与校徽章

在清华百年历史上，将1977年4月至1984年12月定义为“拨乱反正与全面恢复”阶段。在这近八年时间里，学校的各项工作都经历了一个“鉴别认定，由乱到治，逐项清理，全面恢复”的过程。这里面自然也应该包括对“校徽”问题的认定与设计。1981年10月15日，这个日子看似普通，但在清华文化发展史上却是划时代的一天。这一天举行的校长工作会议



新中国成立后不同时期的清华学校徽章

议确定，“清华大学的英文名为Tsinghua University”。这里的关键在于，其中“Tsinghua”改变了过去“Tsing Hua”的拼写。这就告诉我们，采用了英文新拼法的清华校徽以及所有各类标识，一定是在1981年10月15日之后设计的。清华大学现在使用的校徽就在此列。

除了清华老校徽图案，我们还经常看到另外一种清华“钟型”图案。首先要明确的是，这个图案并不是校徽，而只是一个“清华标识”。该图案最早是为纪念清华建校70周年而设计，设计者是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梁鸿文教授。从一个1981年“清华建校70周年”纪念徽章实物上可以发现，除了“清华”篆字以外，清华大学的英文采用的是“QING HUA UNIVERSITY”，“清华”的英译是采用汉语拼音的“QING HUA”。而在1982年之后的钟型图案中，都改成了“TSINGHUA UNIVERSITY”。这与前述校长会议决定的“英文校名”拼法完全吻合。

关于清华校徽和标识何时被官方认可的问题，校史中记载不详，但另有一处记载非常重要：“2006年4月7日，本校申请的‘清华老校徽图案’商标经国家商标局核准在教育服务类（41类）注册。”这

里的“清华老校徽图案”其实是在1932年清华圆形校徽基础上进行修改设计的图案，其中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没有了齿形外圆，以及英文拼法采用“TSINGHUA UNIVERSITY”，此外增加了“1911”字样。这应该可以定义为清华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确立的“新校徽”。另外，在2006年4月26日清华新闻网的一则关于《“清华老校徽图案”获准成为注册商标》的报道中写到：清华大学2003年12月8日申请的“清华老校徽图案”已被国家商标局核准注册。报道还称，“至此，清华大学已有四个标识在教育服务类和科研服务类成为注册商标。另三个商标分别为：‘清华’‘清华钟型图案’‘清华园二校门图案’”。

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清华新校徽图案被官方确定和认可的第一个正式线索，但我们在公开渠道还是没有找到清华大学管理层面关于校徽问题的有关决定。这一情况直到2014年才得以根本改变。在国家教育部于2014年7月15日核准的《清华大学章程》中，第六章《标示和校庆日》，第四十一条规定：“学校校徽为三个同心圆构成的圆面，外环为中文校名（繁体）、



清华校徽的百年演变



清华钟型标识图案和徽章

英文校名（TSINGHUA UNIVERSITY）和建校时间，中环为校训字样，中心为五角星。”“徽章为题有横式校名标准字的长方形证章。”

在《清华大学章程》中，第一次明确了清华的校徽和(校)徽章是有区别的。从新中国成立至2014年，历经65年时间，清华新校徽终于得到了最正式的官方认定。从1916年的雏形初现，到1926年清华学校校徽问世，再到1932年清华大学校徽出现，直到2014年新校徽的被认定，清华校徽的百年演变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是：新校徽图案没有被确定为正式的“校徽（章）”，清华的校徽章仍然是刻有毛主席手书“清华大学”的长方形金属证章。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必须掌握：1956年成立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至今仍在使用“鹰翅形”校徽。圆形校徽也继续沿用了1932年采用的最初图案。

## 结语

校徽是一所大学的精神体现与文化象征，清华校徽的百年演变虽历经坎坷，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主旨却终究未变，充分印证了清华百多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生生不息，并将伴随着“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而源远流长。校徽又是连接两岸清华的“血脉”，在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大业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校徽饱含的一代又一代清华学子对清华园的归属之情、感恩之情，必将激励着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鞠躬尽瘁、砥砺前行！

这正是：

百年清华聚英贤，自强不息促发展；  
校徽饱含学子情，振兴中华志弥坚！

# 荷 花 池

一九九三年四月廿六日万家宝题

## 清华园的风骨

○胡 钰（1991 级经管）

2020年初的清华园甚为安静，从春节到春天，鲜见学生，更不见游人如织。沉寂其间，难得专注而持续地看学堂春雪飘扬，看荷塘水暖鸭知，看满园玉兰花开，看礼堂草坪转绿，看到这个园子的无比美丽，近三十年呆在这个园子里，也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看着看着，看到了这个园子的更多味道、气概与品格，或许以“风骨”称之为恰。

这个园子曾经属于清朝道光帝五子，八国联军进京后逐渐荒芜，直至1911年清华学堂在此开学，为这块土地注入了新的生机。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再到清华大学，一批批鸿儒学者在此任教，一批批青年才俊在此就读，清华园由此从皇家的花园变为知识的花园。

记得一次雪后在大礼堂附近漫步，看到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前摆着一束花，显然刚放不久，虽略显干枯，但在白雪的映衬下依然鲜艳。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国学



王国维先生纪念碑

研究院，旨在“研究‘中国固有文化’，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沟通”。陈寅恪先生代表研究院同仁于1929年撰写的碑文已成经典文字，成为清华学人心中的烙印。其文开篇即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其文结语更是意味深长：“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其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更是成为清华学人的学术品格，也被写入了2014年颁布的《清华大学章程》。

顺着此纪念碑向北走不远处，是闻一多先生雕像，先生手持烟斗的坐像后墙上，是他的一句话：“诗人主要的天赋是爱，爱他的祖国，爱他的人民。”当我漫步到这里时，同样，看到了白雪映衬下的一束花，依然鲜艳。闻一多先生1912至1922年在清华学校学习，才华与血性并重，想当年“五四”运动爆发期间，他就手书岳飞《满江红》贴在学校食堂门口，在美留学期间则写了荡气回肠的《七子之歌》，至今传唱。记得90年代初我在清华园读书期间，还与同学们策划过话剧《失落的烟斗》，以梦境来讲述一个在校生与闻一多先生的对话，现在想来，也算一部“穿越剧”了。

从闻一多先生塑像向西走就是水木清华荷塘，水边坐落着朱自清先生的雕像。先生面朝东南而坐，右手轻轻放在腿上，



闻一多先生雕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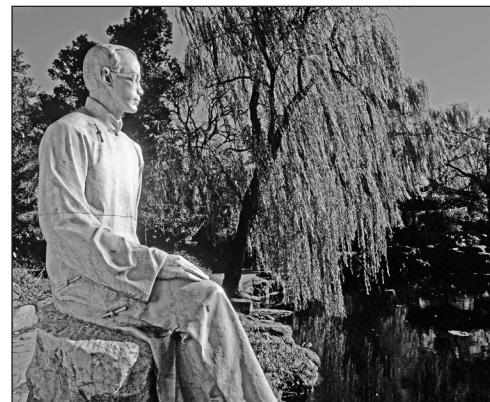
清瘦而洁白，静静地注视着春去秋来的荷塘和充满活力的学子们。每每看到这座雕像，想到先生临终前不到50岁、体重不到80斤，但仍坚持中国人的气节，坚持学术上的追求，感慨万千。在1948年上海文协和清华同学会上海分会举行的追思会上，鲁迅夫人许广平说：“我从追悼文字中，发现朱先生两句话，一句是他死前说的：‘不要忘记，我是签字拒绝美援的。’这表示他保持中国士大夫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高风亮节。还有一句话是：‘我要向青年学习，但时间不许可。多给我时间，慢慢地来。’这是说，他并不夸张，切实，肯跟年轻人一起前进，是有前途的。”朱自清先生担任清华中文系主任16年之久，对清华的感情是细腻的，散文《荷塘月色》成为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之一，也成了清华园最好的“广告”，先生对清华精神的理解也是深刻的，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就说“清华的精神是实干”。

正是因为有了王国维、陈寅恪、朱自清、闻一多等许多学者，清华人文研究有了自己的独特风格，清华园有了自己的独特风骨。1988年，在清华举行的

“纪念朱自清先生逝世40周年座谈会”上提出了“清华学派”的问题。后来，清华中文系徐葆耕教授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表了著作《释古与清华学派》，系统总结了“清华学派”的学术思想及风格，其中的许多论述发人深思：“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学派’结束了它在清华园的历史，但它依然活着，并且发展着。”今天重新解释传统，“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是为了给现代中国人乃至人类‘寻找精神家园’”。

我至今依然记得，当年曾许多次在清华图书馆老馆遇见在那里读书写作的徐葆耕老师，那种投入、满足与快乐的感觉溢于言表。他研究清华人文传统，既发掘其穿越时空的丰厚价值，也反思其不足与发展。在他看来，历史上的清华精神中缺乏形而上思维是一个弱点，而当代社会上的卑微的洋奴思想与浅薄的市侩气息也在渗透进校园，会导致清华优秀传统的失落。在交谈中，我能清晰地体会到葆耕老师的忧虑，更能感受到他勤奋地希望从清华传统中找寻答案的努力。

吴宓先生曾说：“传统等于现在中的



朱自清先生雕像

## □ 荷花池

过去。”对国人乃至人类来说，传统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知不知”的问题。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日新月异，但精神世界却大致稳定。精神的追求与特质依然如百年前乃至千年前。更重要的是，许多物质冲突源于精神冲突，解决观念之争才是真正的和平之道。如何以历史构筑现实，以精神构筑物质，成为当代人文学科发展的重要任务。

2020年元旦前，张克澄兄来办公室聊天，带来他的新著《大家小絮：风骨清华人》，讲述了他的父母张维、陆士嘉和许多老清华人的故事。在这段安静的日子里，在清华园的办公室里，仔细读此书别有味道。

陆士嘉当年去申请德国哥廷根大学力学教授路德维希·普朗特的博士生，得到的答复是“东方人数学不行，女孩子就更不懂逻辑了”，但她就是不信邪，刻苦自学，通过了特别考试，成为普朗特在关山门两年后重新收的学生，且是学生中唯一的外国人、唯一的女学生。有趣的是，冯·卡门是普朗特的第一个博士生，而钱学森在美国期间师从冯·卡门，因此有人曾开玩笑说陆士嘉是钱学森的“师姑”。新中国成立后，张维、陆士嘉成为清华历史上第一对教授夫妇。

令人感慨的是，在后来中国科学院增选学部委员时，陆士嘉获得严济慈、周培源、钱学森等七人推荐，但她得知后就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写信表示不参加，把名额让给年轻人。还有50年代工资定级时自己申请自降一级，单位配汽车也不坐，等等，许多举动仔细读来，切感何为“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切感清华人之风骨。

书中还讲到了梅贻琦、蒋南翔两位校长和“清华香肠”的故事，让人对清华文化中注重内修、低调做人、高调做事的内涵有了更生动的理解。

梅贻琦担任校长后，发现随着清华地位上升，校中有人开始表现对他人的不屑，就告诫同仁说，清华香肠好吃，清华人都知道，须知大街上也有卖香肠的，我们不必到处去宣传，外人在尝过清华香肠后便知清华真正的味道。

蒋南翔担任校长后，发现有清华学生到了工作单位骄傲自满难管理，就给同学们讲，到了新单位，不要急着亮清华牌子，要放下身段，虚心向老同志、工人师傅学习。真要是有本事，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得到大家的认可，那时知道了你是清华毕业生，你就给母校争了光，那时候清华因你而骄傲。你就是“清华香肠”！

读这些故事，我不禁会心而笑。在2019年底的“新生导引课”的最后一节课上，我用现在学生们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期待，即“行跳形不跳”。这些00后的学生可以说是21世纪的“清华香肠”了。

这本书里的清华人物很多，故事很生动，也很细小，但却是“一滴水中见大海”，可以看到清华人对学术的追求，对“俗谛”的淡然，还有对祖国的热爱。这些清华传统中的人、事与精神都成为当下清华的组成，依然在影响着一届届青年学子。

事实上，自1912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学校起，就以“培植全才，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方针。从办学原点起，清华的精神与文化逐渐沉淀日积月累，百年后成为这个园子的最大精神财富，水木烙印则成为许多清华学子的共同特征。

1912年首任校长唐国安说：“师生之间，首重感情；教育之方，端赖道德。”清华学子对母校的感情是无比深的。毕业于清华外文系的季羨林先生曾说：“每次回到清华园，就像回到我母亲的身边，我内心深处油然起幸福之感，在清华的四年生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愉快的四年。”其实，对许多清华学子来说，Tsinghua is not a real hometown, but is really a hometown.

1924到1928年担任校长的曹云祥说：“吾人今日所汲汲者，不在输入文化，

而在将所输入之文化，如何融合，如何承受，令其有适用于国家。”清华学子对国家的感情是无比深的。徐葆耕教授就认为，“对于那些最优秀的清华人来说，民族尊严感是他们个性中最重要的、最顽强的部分。”

一个世纪来，许多清华人的言与行、思与情，点点滴滴汇成了清华园的风骨，如果用陈寅恪和闻一多两位先生的语言来说就是：发扬真理，爱国爱民。

或许，也可以用更简单的语言来说：知识与爱。

## 话说清华白楼

○黄 培

科技的发展使世界的空间变小、距离缩短。清华的大小们利用互联网微信群，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清华园孩子”联系在一起，大家畅聊小时候的美好回忆，讲述发生在特殊年代的故事……这勾起了我对清华白楼的回忆。

“文革”前，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宿舍分为多个住宅区，如解放前不同历史时期修建的北院、西院、照澜院、普吉院、胜因院、新林院，解放初期学苏联修建的教工宿舍1~8公寓，为校级领导和高级教授修建的9~12公寓，鹤立独行的13公寓，1950年代为教职工修建的连排平房一区至六区，1960年代初为教授修建的15、16、17公寓，等等。这15、16、17公寓因其外观涂有白色水刷石面层而被称为白楼。

我家是1961年从照澜院搬到清华白楼的。那时虽然都住在清华园，但是由于住在不同的家属区，受文化氛围和家庭环境

的影响，不同住宅区的孩子还是能看出来的。有件事使我记住了白楼孩子的与众不同。那是“文革”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清华主楼建筑群已经竣工但是尚未投入使用，因为我父亲黄熊（建筑结构专家）参与了主楼的建筑设计，所以我对那座宏伟壮观的建筑充满了好奇，非常想进去看看。清华主楼高10层，当时是北京最高的建筑物，加上东西两个配楼，总面积有7万多平方米。从1956年开始建造至1966年完工，建造的标准和质量直到20世纪末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水平。在我们这群孩子的眼里，当年的主楼相当于清华的人民大会堂，神圣而庄严。

一天，我与几个同学央求看门的大爷允许进去看看。大爷问我：“你家住哪儿呀？”我说：“白楼。”大爷脸色立刻大变，呵斥道：“住白楼的孩子还想进主楼看看？没门！告诉你，这里的装修还没你

## □ 荷花池

们白楼好呢！你要想看就回家去看吧！滚！”我真不知道自己哪句话惹怒了他，但是记住了：以后不要随便告诉陌生人我家住在白楼。

清华白楼坐落在清华校园的西区，毗邻清华西门，一条不到十米宽的万泉河将它与学校主干道清华路隔开，环境清幽典雅。万泉河源自海淀万泉庄西，最后流入清河。那时河上仅有一座可容一人通过的没有桥栏的钢筋水泥桥，外人不轻易走，所以在孩子们眼里，白楼更像是世外桃源。

小时候听我父亲讲，清华大学师生自己设计的白楼，最初是为苏联专家设计的。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还好的时候，清华不但聘请了苏联列宁格勒土建学院的萨多维奇专家担任校长顾问，还陆续聘请了60多位苏联及东欧专家来校指导教学改革工作。因此白楼的设计模仿了苏联建筑，每家窗台前都设计了摆放鲜花的花坛，防震级别采用了当时国家的最高标准，内部装修生活设施齐备，供应热水和暖气。因为苏联人喜欢晒太阳，所以楼顶特意设计为宽敞明亮的平顶露天晒台，白天可以清楚地看到颐和园佛香阁和玉泉山塔。

白楼交付使用后，根据上级指示，学校将新房分配给了本校的教授、副教授以及学校中层以上的领导干部居住，因此那时清华人都称白楼为教授楼。

白楼房屋的户型设计每栋不同，分配对象也不同，主要是按照教授级别和行政级别分配的。16公寓大多数住的是三级以上教授和校级领导干部，15公寓和17公寓大多数住的是六级以上教授、副教授和学校中层领导干部。另外，从居住环境来讲，白楼一层比其他楼层门前面多了一个



1967年春天，黄培在白楼前留影

小花园，可以种植花草树木。为了照顾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授和西南联大时期的教授，一层住宅全部分配给了这批人，他们大多数属于清华的“108将”，也是清华教师中的宝贵财富。

清华“108将”的称呼来自于蒋南翔校长的讲话。蒋南翔在清华工作期间，对知识分子一直抱着真诚团结的愿望。当时，清华教师中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教师108人，蒋南翔就经常讲“108将是学校的稳定因素”。他还多次谈到，高等学校最宝贵的财富，不是巍峨的高楼大厦和贵重的仪器设备，而是富有科学知识和教学经验的教师——教授和副教授。团结老教师，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是办好高等学校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引用梅贻琦校长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关于清华“108将”的由来，1953年主持这项工作的清华大学原副校长陈士骅回忆到：“1952年院系调整后，学校进行教师定级定薪工作，时为1953年初。由钱伟长主持，北大方面来的人，由陈士骅基本拍板。按年资、学历、著作、发明专利。博士是教授，副博士（硕士、特许工程师）为副教授。年资，在学校一年算一

年，在校外三年算一年，到了十年头，就可以为教授了。定级定薪先以某系为标兵，纵向排队，横向比较，调整而定。最初定了103人，在工字厅，陈士骅对蒋南翔说：还差5人就是108将了。蒋十分得意，就同意加5人，就成了108将了。”当年清华大学被评为一级教授的有14人，包括：刘仙洲、张子高、陈士骅、钱伟长、张维、陶葆楷、孟昭英、赵访熊、马约翰、梁思成、章名涛、张光斗、施嘉炀和谢祖培。一级教授黄文熙是1956年从外单位调入的，所以那时清华一级教授共有15人。1955年，随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成立产生了第一批学部委员（现称院士），清华大学有7人名列其中：刘仙洲、钱伟长、张维、孟昭英、梁思成、章名涛和张光斗。

如国内著名的排水工程与环境工程专家陶葆楷、电子学家孟昭英、国际知名焊接专家潘际銮教授等，那时都住在白楼。电机工程专家、朱镕基总理的老师章名涛教授在“文革”初期也搬进了白楼。

那时清华新房分配是按照单位进行的，不像现在是按照个人学历和资历计算

总分排序分配的，因此白楼各系教师居住地点相对比较集中。以我家居住的17公寓一门洞为例，除一层居住的是两位外系教授（101号是留美博士、电机工程系教授童诗白，102号是留美博士、水力工程系教授陈樸生），其他各层住的全部是土建系（那时土木工程系和建筑工程系合并）教授、副教授和归国华侨。如201号是系党支部书记刘小石家，202号是邝守仁教授和江丕权教授两家，203号是莫宗江教授家，301号是朱畅中教授家，302号是黄熊教授家（我家），303号是胡允敬教授家，401号是吴增菲教授家，402号是康寿山教授与关肇邺教授两家，403号是罗福午教授家，501号是赵炳时教授家，502号是楼庆西教授家，503号是李承祚教授家。二门洞也住有土建系教授，如304号是汪国瑜教授家。其中莫宗江教授、胡允敬教授、汪国瑜教授以及住在16公寓401号的张昌龄教授与梁思成教授共同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国旗的设计，他们的贡献被载入史册。其他各位教授都参与过国家重大建筑工程的设计，对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住在这

种文化氛围浓厚的环境中，所听、所看、所接触的事物肯定与众不同，成长中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单位同事宅邸相对集中的好处是商量工作方便，小时候我常拿着父亲写的字条或者图书等，送到楼上或楼下的某位教授家，所以与各家的大人和小孩都比较熟悉。坏处是在“文革”中才体验出来的。“文革”期间，哪位家长受到冲击或者政治上受到当



白楼外景

## □ 荷花池

权派的怀疑，外系的大人可能还不清楚，门洞里的孩子就都知道了，住不住在白楼是衡量家长有无“政治问题”的风向标。那时清华房管处的人政治嗅觉非常灵敏，政治立场非常坚定，如果有谁受到“政治审查”，即使性质未定，也必须搬出自白楼。白楼发小滕运先生在《清华校园往事》中写道：“‘文革’前父亲作为校党委委员、化工系主要负责人，我家住在16公寓……‘文革’初期搬到了17公寓……后来又搬到西院……”也就是说，随着他父亲滕藤先生政治命运的起伏，他家的居住条件从四居室搬到两居室，后来又搬到平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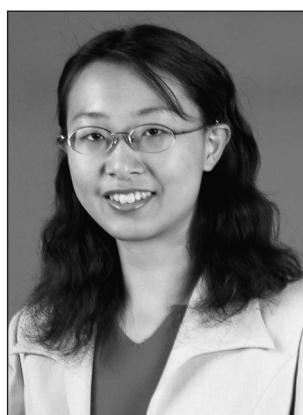
“文革”期间，清华大学各派政治势力斗争激烈，知识分子成为“臭老九”，被各派随意批斗，有的白楼人家即使没有搬出自白楼，也被“掺沙子”搬进一家工人或者造反派，24小时监控你的一言一行，完全没有个人隐私。我家也因无法忍受这种“政治”待遇，于1972年搬出了白楼，搬进了由我父亲参与设计和建造的新林楼。

感谢清华这座拥有厚德载物历史文化气息的校园，为我们的成长提供了通识教育的基础，让我们拥有了应付复杂生活的本领和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心。

2016年5月14日初稿/2018年3月12日修改

# 诗歌、诗人与诗社 ——清华大学“火石新诗社”创办人自述

○李 石（1997级化学）



李石校友

李石，1979年2月生于贵阳，1997年被保送进入清华大学化学系。2001年本科毕业转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攻读伦理学硕士

学位。2004—2007年留学意大利，在罗马LUISS大学攻读政治哲学博士学位。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9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任教。

李石在清华求学七年，热心于学校的各类人文活动。1998—2000年，参加学生电影社团“露天社”，并于2000年任社长；其间组织编辑清华校内极具影响力的学生刊物《露天报》，2000年获得清华大学学生社团“最佳女社长”称号。2001年，创办清华大学学生新诗社“火石新诗社”，并定期出版社刊《火石诗歌》。其诗作《露天，一个极美的词》被收入《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诗集（新诗卷）》。

我在意大利留学时，曾与我的导师卡特教授聊起诗歌。卡特教授很惊讶，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都会写诗。他知道我写诗，就问我：“你为什么会写诗呢？”我想了想，回答说：“不是我想写，而是有时候一些很美丽的句子会漂浮在我的脑海里。于是，我就把它们写下来，再琢磨、修改，最终成为一首诗。”卡特教授听完更困惑了：“一些美妙的句子漂浮在脑海里，怎么从来没有这样的句子漂浮在我脑海里呢？”这后一个问题，却是我回答不了的。或许，不是我在写诗，而是诗歌选中了我，选中了我的手、我的口、我的心和我的灵魂。

“我是2000年的元旦开始写诗的，或天意？或人为？这一天我是不会忘记了。接下来是一些平淡的日子，在浓重的开端之后，一切都显得没有诗意，我想，应该等诗来抓住我，而它却一直没有来……”这段话引自我的第一本自编自印诗集《我的4/3》。这就是我第一次开始写诗时的情形。

在开始写诗之前，我对诗歌并没有特别的感觉，也从来没有特意阅读、背诵或者学习过诗歌。然而，从某一天开始，美丽的句子就与我不期而遇，时不时地飘落在我的脑海里，借我之手写出一首首美妙的诗歌。

2000年前后，我的人生突然之间因为诗歌而沸腾。校园里的点点滴滴都给我带来灵感，不断地激发我的创作。除了写诗，我还积极参加校园诗会、诗歌比赛，给各种诗歌刊物投稿，甚至还创办了诗社。

那时，北京高校校园诗歌创作的中心是北京大学。每年春天，北大的“五四文学社”都会举办“未名诗会”。有一年，

我收到当时赫赫有名的“五四文学社”社长胡续冬的邀请，代表清华到北大参加诗会。在诗会上，我朗诵了让自己痛彻心扉的作品《关于家的联想》，也记不得当时听众们的反响如何，只记得把自己感动了。据说，那是好多年来，第一次有清华诗人到隔壁学校去参加诗会，这大概也是我最大的荣幸了。除了在北大，我还跟着清华的诗友们去农大、北师大等学校赶过场子。诗人们汇聚一堂，各显神通，品味着似懂非懂的句子，忽而感叹，忽而困惑，真是无忧无虑却爱上层楼的年代。

我虽然沉迷于哲学、诗歌，但并不是一个耽于空想的人。除了写诗、参加诗会之外，我还脚踏实地为清华诗歌的发展做了一件重要的事。2001年，我与清华的几位诗友相约，创办了学生新诗社——“火石新诗社”，中文系的蓝棣之老师担任诗社的辅导老师。同年，《火石诗歌》创刊，我们邀请清华老校友著名九叶派女诗人郑敏老师为社刊题写了刊头。

时隔多年，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去郑敏老师家的情形。郑敏老师的家就在清华西门附近，我们一行三五个同学，带着自己的诗作，也没买什么东西，就登门拜访。与郑敏老师说明我们创办诗社的想法，郑敏老师很高兴，也很激动。赶紧在桌上铺好宣纸，磨上墨汁，“火石诗歌”四个大字一挥而就。临走前，我们围在郑老师身边合影留念，郑老师说了好多鼓励的话，希望我们能把诗社一直办下去。事实证明，我们确实没有辜负郑老师的希望。火石新诗社自创办以来定期举办诗会，编辑刊物，以诗会友，聚拢了清华新诗创作的星星之火。

火石新诗社创办至今已20年，虽然没



有大红大紫，却一直倔强地活着。正所谓“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2008年，我从意大利留学回国，应邀回清华参加了一次火石新诗社的朗诵活动。看到新一代的校园诗人们能因“火石”的微光而激发创作的灵感，心里倍感欣慰。

在个人的诗歌创作方面，我一直积极投稿，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人读到。当时，《诗刊》就是我心目中最伟大的刊物，所以，我不断地把自己写的诗歌寄过去。在投了好几次稿之后，我终于收到了回信。让人大失所望的是，《诗刊》的编辑在信中批评了我的诗歌，并建议我参加他们主办的诗刊学习班，而学习班收费不菲。我确实非常想发表自己的作品，而且也知道，如果参加了学习班，我的作品很可能得到发表。但是，我坚信，真正的诗歌绝不是可以通过程式化的学习写出来的。

诗歌，尤其是现代诗，实质上是个人化的语言实验，要想写出好的诗歌，确实需要积累，文化的积淀，文字的磨砺，都必不可少。但是，写诗绝不可能通过可普

遍化的方式学会。因为，如果某种语言应用的方式可以普遍化的话，那这种表达方式就进入了日常语言的领域，也就不再是诗歌了。

虽然很难得到广泛的认可，但我并没有放弃对诗歌的追寻，或者说诗歌没有放弃我。2000年底，我整理自己一年之中写的几十首诗歌，自己印制了50本诗集，送给朋友、老师和同学。2001年底，我又印制了第二本诗集，并以其中一首诗的标题《黑板也会老吗》命名。就这样，我继续着写诗、读诗、以诗解忧、以诗会友的诗歌生活。直至2010年，我终于在书籍出版社出版了自己第一本正式出版的诗集《美丽，就像春风》，其中收录了我十多年来写下的100多首诗歌。

至今为止，我的诗歌还没有获得过什么“有分量”的国内外大奖，但我清楚地知道诗歌的力量，这源于两件与诗歌有关的小事。我经常回忆这两件小事，以激励自己的创作。一是在某个诗会上，我送了一位素不相识的诗人一本自己的诗集，本来以为萍水相逢，以后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谁知道，大半年之后，我们又偶然相遇，她一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像失散已久的亲人。她激动地说：“你知道吗？那天你送了我诗集，我坐地铁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结果我居然坐过站了，你的诗写得太好了！”我一时语塞，激动地说不出自谦的话来。要知道，我自费出版的诗集，还成堆地在家里放着，根本没有什么销路。我一直以为自己的诗歌写得不好，所以卖不出去。在那之后，只要一想到这位诗友“地铁坐过站”的事，我就坚信，我的诗歌是有力量的。

还有一次，我和S君暑假回家，我父

亲开车带我们在花溪附近的一家小餐馆吃饭。在等饭菜的间隙，我父亲突发奇想，说让我和S君念一下自己写的诗歌。我猜想当时的情况大概是这样：我父亲一直觉得S君不怎么样，而我也学着S君不务正业，所以，他想了解一下我们成天倒腾的都是什么，再借机教育我们俩。推脱不了，我就背了一首本科毕业时写的诗歌《四年醉一回》。诗歌不长，很快就背完了，没有任何夸张的语调和语气，就像一个要挨批评的孩子，站在父亲面前背书。

背完之后，是出人意料的安静，劈头盖脸的批评并没有如我所料的那样随之而来。我期盼地等着挨批评，至少被数落两句。父亲却起身去倒水，直到隐约看到父亲爬满皱纹的眼角上挂着几滴晶莹的泪珠，我才忽然明白，父亲被我的诗歌感动了。或许，这就是诗歌的力量，它让所有的隔阂、不理解都在瞬间融化，让无话可说的父女，心意相通。

## ● 诗词书画选登

### 毕业六十余载有感

○俞静澄（1959届工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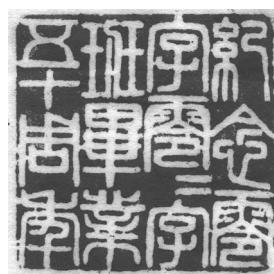
退休居京享清福，梦中依稀清华园。  
物九苦读有五年，党的培育记心间。  
红要红透专要深，健康工作五十年。  
多年征战五〇四，边疆荒山建三线。  
年轻初心为报国，何惧创业苦与艰。  
大渡河畔凉山下，核工所在是我家。  
同窗有人驾鹤去，怀念至深情无边。  
自认年华未虚度，人生无悔亦心安。

诗歌如哲学一般，已经伴随我二十年。哲学成为了我的职业，我每日都辛苦地在这片土地上耕耘、播种、收获；而诗歌却像一壶美酒，当我累了、乏了，坐在田间地头，掏出心爱的酒壶，品上一两口。这甘醇的液体就会贯穿我的身体，浸润我的灵魂，让我想入非非，让我飘然欲仙，让我爱，让我痴，让我狂，让我庆幸来到了这世上。

### 篆刻

#### 纪念零字零零字班 毕业五十周年

○王伯雄（一九七〇届精仪）



### 画堂春·贺清华云校庆

○张 刀（1985级力学）

4月26日清华举办云校庆，欣逢毕业三秩受邀归校，奈何新冠未去，归梦不成。因受命填词以贺。

睽违三秩总销魂，执函无奈妖氛。  
银屏惆怅旧时春，雨浥香尘。  
惟梦鸡窗花影，欣看红日如轮。  
征鸿可凭翼穿云，捎得怀恩。

## 庆祝母校建校 109 周年 (诗二首)

○孙道祥 (1970 届精仪)

### 谱写新篇

改革统领诸事先，掀起学校快发展。  
坚守育人根本事，狠抓学风关键点。  
为民复兴正施教，初心责任记心田。  
目标顶尖催人进，一流大学续新篇。

### 梧桐情深

大路清华贯西东，梧桐隔街对相拥。  
巨冠如盖罩行道，细枝似藤编彩虹。  
夏日为廊防阳晒，冬天成屏御风隆。  
每行此地皆怀感，常思前辈发心中。

## 举国抗疫夺取胜利

○田 芹 (1970 届精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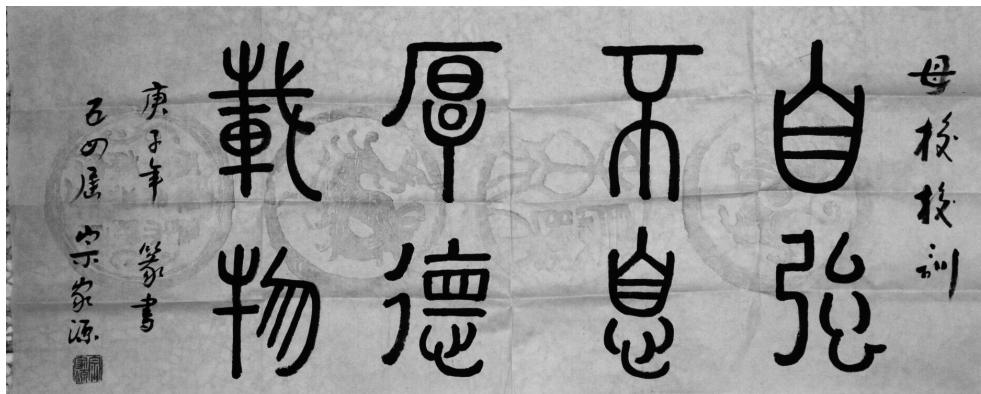
近日，观视频援鄂医士凯旋，场景极动人，有感而诵之：

己亥冬起，忽传瘟疫；封城自闭，百姓泪弃；  
华夏震惊，荆楚告急。八方来助，同心协力；  
白衣天使，闻风赶及；不畏生死，驰援医治。  
风雨同舟，顶风而逆；爱心倾注，守望相助；  
素未谋面，心心相惜。奋战数月，关心备至；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以命救命，何其壮矣。

庚子春至，含泪送别；暖风十里，无不感激；  
谢恩一跪，感天动地。病毒无情，人间有情；  
大爱无疆，万众有幸；山河无恙，国家有望。  
初战告捷，不可轻心；疫情未抑，尚需努力；  
排除万难，夺取胜利。风月同天，山川域异；  
人类共命，全球相依；齐心抗击，可歌可泣。

### 《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

悉《通讯》由81期开始改为季刊，甚喜！在母校即将迎来110周年大庆之际，我计划用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及大草六种字体，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并分期寄上。今先将篆书寄去，敬请刊登。 宗家源 (1954届水利) 2020年6月1日于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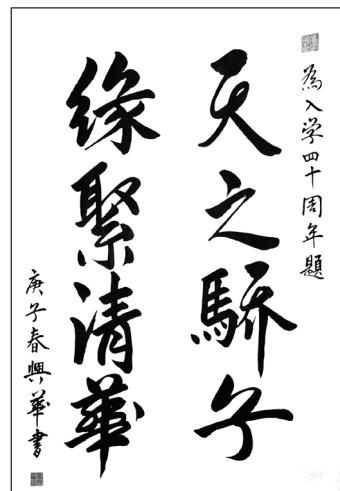


## 望海潮·云校庆感怀

○徐友春（1970届精仪）

紫荆花艳，芳菲四月，  
满园桃李芬香。  
学子自强，春秋五秩，  
百年名校荣光。  
矢志力行扬。教科研鸿志，有所担当。  
争创一流，立足世界，续前航。

如今难聚荷塘。恰冠毒肆虐，  
非比寻常。  
华夏动员，全民抗疫，  
严防死守肩扛。  
云校庆相帮。武汉封已撤，  
防范时长。  
庆贺清华华诞，共祝更辉煌。



书法 庆祝清华入学四十周年

○卢兴华（一九八〇级精仪）

## 七绝·母校云校庆有怀

○杨超鸿（1990级材料）

为避瘟君故出群，丁香初结隔屏闻。  
百年水木清清处，分我书窗一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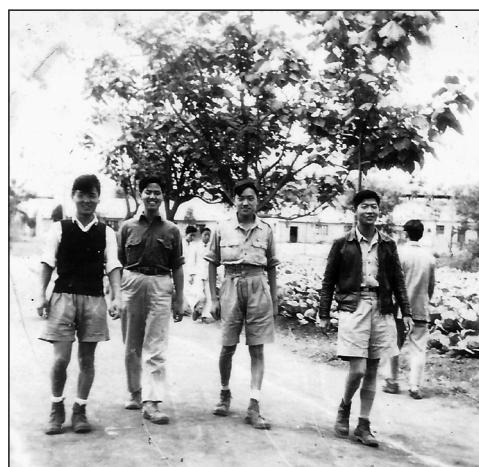
### ● 珍藏之窗

#### 胜利的喜悦

1946年5月4日上午，西南联大召开大会，宣布联大解散三校复员。四位联大学生满怀喜悦走在春光明媚的校园里。

左起：物理系一年级的楼格已经办好转电机系手续，物理系二年级的李政道正准备留美，土木系一年级的叶铭汉已经办好手续转物理系，物理系四年级的陆祖荫即将毕业去复员后的北大任教。他们对未来充满向往。

叶铭汉（1949届物理）供稿



## 四张照片寄 深情

○蒋本珊

我的父亲蒋大宗（1922—2014），1944年4月毕业于西南联大电机系。现将父亲的几张联大时期的老照片提供给清华校友刊物，以资纪念。



毕业的庄重——1944届电机系毕业照



从军的喜悦——1944年2月，父亲与15名清华同学一起经驼峰航线加入远征军驻印军，图为父亲戎装照



母校的深情——在印缅战场，为庆祝联大校庆，父亲与同学们举着用纸版画出的联大校徽合影留念



考试的严格——这是父亲珍藏的联大实验报告，一共有多少份。这份实验报告还有一个故事，当年交实验报告时晚了几个小时，老师在报告上批注 late，成绩被打对折，90 /2 了，可见联大的要求有多么严格！

这些珍藏，父亲生前已全部捐给西安交大档案馆保存。后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提出要收藏，他又专程从交大档案馆要回了几件，现原件保存在抗日战争纪念馆。

蒋大宗生前为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创始人之一。作者为蒋大宗学长之女。

# 清华要闻



◀ 清华大学召开“双一流”建设周期总结专家评议会



▲ 陈冯富珍、梁万年受聘清华大学万科讲席教授，邱勇、陈旭颁发聘书



▲ 清华大学智能社会治理研究院成立



华大学-国家博物馆文物科技保护联合研究中心  
成立仪式暨首次工作会议



▲ 清华男篮CUBA夺冠

# 师生校友欢聚，庆祝自动化系建系 50 周年

9月26日，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建系50周年纪念大会在新清华学堂举行。自动化系的各年代校友代表相聚在共同热爱的家园，约34万人次师生、校友和社会各界人士同步收看在线直播。



◀ 陈旭书记与自动化系校友和教师代表合影，左起：曾勇、杨保华、鲁国庆、姚坚、陈旭、刘文煌、刘川生、吴永杰、杨振斌、吉吟东



▲ 曾讲授“模拟电子技术基础”的胡东成教授（左2）参加活动



▲ 自动化系两任主任王桂增（左3）、管晓宏（左4）与自动化系工业智能与系统研究所部分教师合影



▲ 校友倪岳峰（右3）、胡胜发（右1）回校看望老师、同学



▲ 师生欢聚，左起：吴澄、顾涵芬、贺美英、宋安澜



▲ 1987级同窗喜相逢，左起：叶昊、王京春、张冬梅、龚宇、殷勇

# 师生校友共庆核研院成立 60 周年

9月26日，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建院60周年总结纪念大会在新清华学堂隆重举行。来自国家部委、高校、企事业单位代表和校内师生代表近500人齐聚一堂，共同回顾核研院历史进程，共话核研院未来发展。



▲ 邱勇、安继刚、滕藤、陈至立、华建敏会前亲切交谈

▼ 中核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余剑锋校友（前左）出席活动并致辞



▲ 刘永德、王寿君、王大中、穆占英、唐亚平出席活动



▲ 师生校友相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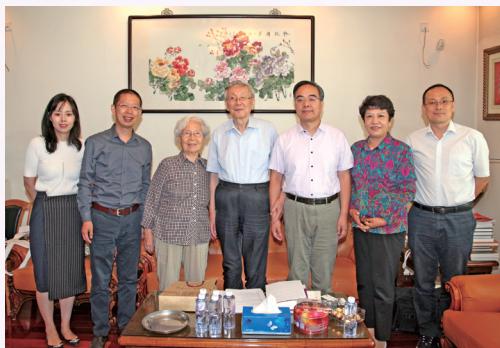


▲ 大会现场

# 校友联络



◀ 1970届校友  
毕业50周年  
座谈会召开



▲ 电机系领导看望金怡濂院士（左图，中）和张履谦院士（右图，右）



▲ 校友总会召开2020年第一次院系校友工作会议



► 1990级入学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举行

# 第五届清华校友三创大赛圆满收官



▲ TMT/AI/大数据总决赛（郑州）产业领军人才专场座谈会



▲ 健康医疗总决赛（天津）比赛现场



◀人居环境组总决赛（成都）为创新创业导师颁发聘书

▼集成电路总决赛（佛山）圆桌对话



▲先进制造、文创体育总决赛（洛阳）合作对接交流会



交友三创大赛集成

▶ 颁奖典礼暨南京中华门创将创新成果大会（南京）



# 各地校友 活动掠影



▲ 内蒙古清华校友与到访的陈旭、过勇等校领导座谈交流



▲ 四川校友与到访的校友总会副会长王岩座谈交流



▲ 南京校友会举办选调生工作经验交流会



▲ 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纪念暨清华校友迎110周年校庆跑步活动举办



▲贵州校友会召开2020届新校友交流座谈会



▲清华大湾区校友欢乐大满灌网球赛广州站完赛



▲天津校友会召开2020年新校友座谈会



▲东莞、深圳校友举办创业交流并徒步清溪湖



## 各地校友 活动掠影

◀海南校友会举办2020级  
海南新生座谈会

# 各地校友 活动掠影

▶ 厦门校友会2020  
送新会举行



▲ 上海校友会以接力跑致敬祖国、献礼母校



▲ 湖北清华校友迎新会举行



▲ 江西校友会组织  
校友参观鲤鱼洲清华  
大学江西实验农  
场旧址

▶ 常州校友会  
举办2020年度  
常州籍清华新  
生座谈会

